

THE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 里斯本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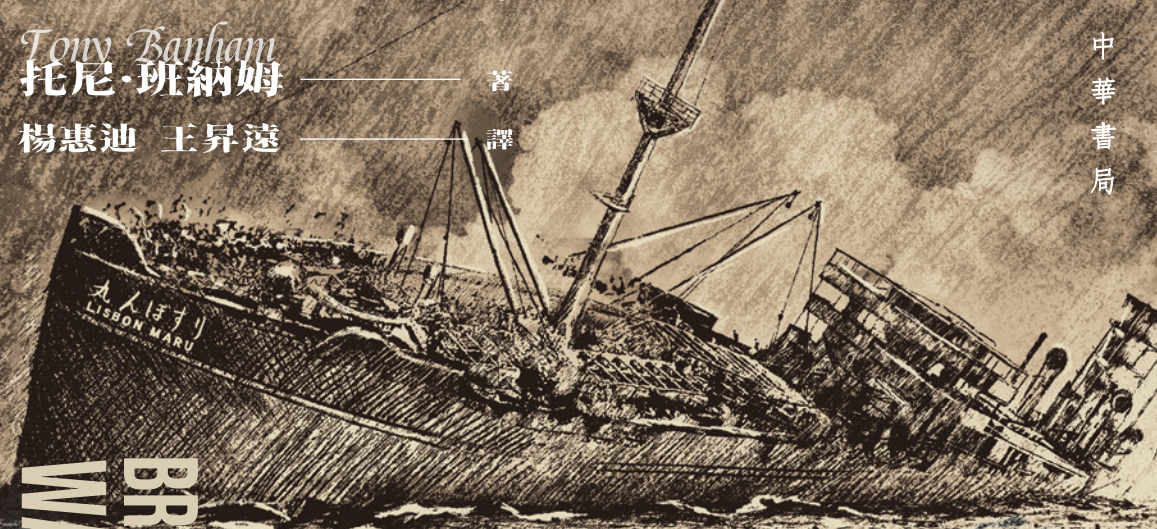
Tony Banham
托尼·班納姆

著

楊惠迪 王昇遠

譯

中華書局



BRAIN'S FORGOTTEN
WARTIME TRAGEDY

沉沒

里斯本丸 沉沒

Tony Banham

托尼·班納姆 ————— 著

楊惠迪 王昇遠 ————— 譯

中
華
書
局

作者

托尼·班納姆（Tony Banham），曾在荷蘭皇家殼牌公司和歐洲航天局從事研發工作，2014 年獲得澳大利亞國防學院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任《香港皇家亞洲學會學報》榮譽編輯。1989 年移居香港，創立「香港戰爭日記」項目，致力於研究與記錄 1941 年香港保衛戰、參戰守軍及其家屬等相關人員命運，發表多部關於香港戰時經歷的著作；經常進行歷史主題演講，並協助眾多歷史學家、政府機構、廣播媒體、學生及其他研究者開展相關工作，擔任紀錄電影《里斯本丸沉沒》的歷史顧問。

譯者

楊惠迪，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候選人，在《世界社會科學》《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信睿周報》等學術期刊和思想類報刊發表論文、評論多篇。

王昇遠，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近現代中日文學文化關係研究以及戰後日本文學史與思想史研究。代表性著作為《文化殖民與都市空間——侵華戰爭時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體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年）、《妥協與對抗：日本知識人的戰時與戰敗》（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 年）等。

推薦序

/ 方勵（紀錄電影《里斯本丸沉沒》導演、製片人）

2024 年 9 月 6 日，我執導製作的紀錄電影《里斯本丸沉沒》在中國大陸電影院全線公映。上映三個月內，一百幾十萬觀眾觀看，我在十幾個城市與觀眾做了 150 多場映後交流。震撼、感動、汨目，這是幾乎所有觀眾的集體觀後感，電影也榮獲了 20 多個獎項和榮譽。

我特別要告訴大家，這部紀錄電影的歷史事實和準確數據，主要源自常住香港的英籍歷史學家托尼·班納姆博士的心血之作 *The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 Britain's Forgotten Wartime Tragedy*（《里斯本丸沉沒》）一書。托尼·班納姆博士在我們的電影裏數次出鏡接受我的採訪，並無償地貢獻了他的著作，為電影提供了可靠的歷史事實依據。另外，作為電影的歷史顧問，托尼幫助我們核對了 1816 名盟軍戰俘的姓名、軍銜、所屬部隊，每一個事件準確的發生時間和地點，以及日軍運輸船前後甲板的艦炮型號等等，還幫我們校對、修改了電影裏的所有英文對白字幕，是我們電影主創團隊的重要成員。

托尼在 1998 到 2004 年間親自採訪了幾十位當時健在的「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倖存戰俘和美軍潛艇人員，獲得了珍貴的一手口述歷史信息。2006 年托尼傾六年心力創作的 *The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 出版後，這段被湮沒了 80 多年的慘案才逐漸被世人了解，才有了中國香港和舟山坊間的一羣熱心人士和學者組織的紀念與研究活動。2014 年，我和韓寒導演在舟山東極島拍攝電影《後會無期》

時，才有機會偶然聽說了 1942 年 10 月 2 日東極島海面發生的「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日軍射殺盟軍戰俘的暴行，以及舟山漁民冒死施救盟軍戰俘的義舉。震撼之餘，韓寒在電影《後會無期》裏寫了一首憂傷的歌詞。我通過搜索找到了沉船，製作了與書同名的紀錄電影《里斯本丸沉沒》。在電影製作的六年裏，我和托尼成為了好朋友、好搭檔，並有幸成為他調查、研究、撰寫「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光影呈現接力夥伴。2023 年 8 月 15 日，我們在英國倫敦舉行了《里斯本丸沉沒》初剪版的試映會，電影得到了托尼的認同和讚揚，我心底那塊石頭才算落了地。謝謝托尼！

也要謝謝我的好朋友王昇遠教授和他的小夥伴楊惠迪博士，他們以其深厚的中英文功底、對「里斯本丸」事件的深入研究理解，以及對《里斯本丸沉沒》紀錄電影的熱情支持，這麼快就把托尼的 *The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 譯為中文，你們辛苦了！

還要謝謝香港中華書局，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80 周年這個重大紀念節點，在《里斯本丸沉沒》紀錄電影香港公映的日子，你們隆重推出本書中文版，真是要祝賀你們！

讀者朋友們，《里斯本丸沉沒》紀錄電影的觀眾朋友們，你們在托尼的書中可以讀到更全面的歷史真相、更豐富的事件細節，聽到更多倖存盟軍對中國舟山漁民的感激之情。「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中舟山漁民冒死救援跳海逃生遭遇日軍射殺的盟軍戰俘，孫立人將軍率部援助駐緬甸英軍撤入印度，浙江軍民救助轟炸東京的迫降美軍飛行員，這些都是中國軍民在二戰中救援盟軍的重大事件和壯舉。這本書值得朋友們閱讀收藏，謝謝大家！

2025 年 7 月 2 日

繁體中文版序

/ 托尼·班納姆 (Tony Banham)

這本書成書至今已有 20 年了，當時我寫得十分匆忙。

童年時的我對歷史其實並不感興趣。我出生於英國的一個鄉村地區，儘管那時戰爭已經結束了 14 年，但那裏卻依然籠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之下。當然，那片土地也曾發生過其他的歷史事件：早期的人們製造燧石工具、歐洲大陸的入侵者來來去去、黑死病奪去了半數人的性命，隨後「羊毛繁榮」（羊羣與其帶來的巨大財富）改善了當地人的生活。但是，二戰改變了這一切。

我年幼時只知道能在田野中找到子彈和炸彈的殘骸，而漸漸地，我開始對這些東西所訴說的故事着迷。大學畢業後，我搬到了歐洲，先後在荷蘭殼牌石油公司的研發部門和意大利的歐洲航天局工作，也順帶了解了這些國家的歷史。所以，當我最終來到香港時，已經 30 歲左右了，年紀稍長，也多了些許智慧，已準備好去研究這座城市的歷史了。

我很幸運。大約在 40 年前某個晴朗的日子，我漫步在香港島南岸，無意間看到一戶人家的花園裏有一堆家用品，那是一家德國人，他們在香港生活多年，即將返回祖國。在那堆東西的最上面，放着一本有關香港戰時歷史的書。我詢問對方能否將其送給我，他們欣然應允了。

我一口氣讀完了那本書，直到深夜才入眠。但隔天早上（是個

周日)，我一大早便搭計程車前往書中提到的一個地方——黃泥涌峽，當年香港守軍與日軍曾在此爆發了激烈的戰鬥。我一到那裏，就在地上找到了一枚日製 6.5 毫米的有阪步槍彈殼，並將它撿了起來。那一刻，我手中握着歷史，人生因此而改變，我徹底為之着迷。

我一直熱衷於寫作，離開英國之後，每年都為自己設定一個寫作計劃，有時寫電影劇本、廣播劇，還有喜劇作品，或者是一些如今讀來都令我尷尬不已的浪漫小說。1999 年，我寫了一本書作為聖誕禮物送給父母。這本書裏有 12 篇鬼故事，風格模仿的是維多利亞時代末期英國鬼故事的奠基者 M. R. 詹姆斯。不過，我的故事全部發生在我父母居住的英國小村莊裏，那也是我成長的地方。

當那本「小書」印刷、包裝並寄出後，我便開始思索 2000 年的寫作計劃。自從找到那枚日本步槍的子彈殼後，我一直在收集有關香港戰事的書籍、文章與文物，並意識到，這些資料與筆記也許能夠為一本書的寫作打下基礎。於是就將當年的寫作計劃確定為寫一本關於日軍入侵香港的歷史作品。

最初我並不打算做原創研究，只想蒐集所有的一手和二手資料，再將它們整合為一份「完美」的戰史。但我趕上了好時候——萬維網誕生了。我建立了第一個專門講述香港保衛戰的網站 (www.hongkongwardiary.com)，而它打開了數千扇門。那時還沒有谷歌，也不夠「現代」，但藉助當時的搜索引擎，凡是對那段香港歷史有興趣的人都能找到我。我會回答他們的問題，也會反過來請教他們是否有信息可以提供。如果他們是當年駐港士兵的子女（很多人都是），他們常常會將父母遺留下來的信件、日記與其他文件交給我。那時，很多與我聯繫的就是那些已經年邁的老兵本人，垂暮之

年的他們渴望有人講述自己的故事。

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寫了一部關於 1941 年 12 月香港保衛戰的作品。這個項目一直延續到了 2002 年，才得以出版，書名叫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絕無可能》）。但這本書卻給我留下了一個問題——很多接受過我採訪的老兵，以及許多家屬（那些死於戰俘營的人和在此後歲月中去世的人的家屬們），都向我提到了同一艘船：「里斯本丸」。

這就是我為何如此急迫的原因。

2003 年，第一本書出版之後，我立刻開始着手寫「里斯本丸」的故事，因為那些老兵所告訴我的，是一個近乎完美的三幕式悲劇，完美得讓我難以相信之前從未有人寫過它。第一幕，戰俘們在戰鬥中倖存了下來，被一艘船送往日本當奴工；第二幕，船被擊沉，數百人喪命；第三幕，命運讓一些人活了下來，但就在他們獲救的關鍵時刻，劇情又出現了殘酷的反轉，幾人因颱風造成的空難而不幸身亡。所以，我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在倖存者們尚還健在的時候完成這本書。

不久之後，我寫出了一份尚不成熟的七萬字草稿，興奮地寄給了我的出版商，而他又將其轉交給了一位對此類題材有所研究的大學教授進行評審。很快，出版商就收到了回覆。

出版商是一位英國紳士，他打電話給我說，在他給我讀這份評審意見之前，我應該坐下來給自己倒一大杯杜松子酒。那份評審的開頭還不錯，上面寫道（大意如此），「班納姆沒有犯太多的打字錯誤」。但接下來的內容卻對我大加批評：班納姆遺漏了這個，也忽視了那個；班納姆未參考以下檔案資料；班納姆對美國潛艇兵的描

寫過於單一，等等等等。

我開心至極，如果這樣的酷評出現在書出版之後，那將會是致命的打擊，但它們在出版前被提出來卻價值千金。這份審稿意見本質上是一份指南，它告訴我應該「如何把研究做得專業到位」。我認真跟進了每一條線索、建議和批評，結果這本書比原初的版本好了十倍。

但真正讓這本書獲得成功的是倖存者們自己。「里斯本丸」上的經歷是如此痛苦，以至於他們將這段記憶深埋心底多年，甚至都無法向自己的家人和子女們傾訴，因為那實在太過痛苦、有着太多的情緒了。但後來，我就是在那個恰到好處的時間節點（他們意識到如果不講出這些故事，它們終將隨自己一同葬入泥土）出現了。而我只是一個無名之輩。老兵們可以和我交談，是因為彼此之間沒有情感負擔。再加之，我已做足了功課，對他們的經歷十分了解，這就能夠彌合我們之間的隔閡。有些人甚至伏在我肩頭，放聲痛哭，傾訴着多年來的心事。若早十年，他們可能仍會選擇沉默；若晚十年，就太遲了。幸運的是，我來得剛剛好，這本書也就此而誕生了。

如今，倖存者們都已謝世，他們去與那些在船上、在外海、在日軍戰俘營、在回國途中，以及在此後漫長歲月裏日漸凋零的戰友們團聚了。

他們的故事早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久而久之，也成了我的故事。這是一種怎樣的感覺，我雖嘴上說不清楚，但卻心若明鏡。他們一個個都離去了，劇終人散，獨獨留下我一人。歲月荏苒，空留一人。

我是唯一留下的人。

英文版原序

/ 托尼·班納姆 (Tony Banham)

暴風雨和雷電。

船長及水手長上。

——威廉·莎士比亞《暴風雨》，第一幕，第一場首兩句^❶

我正坐在我的「書房」（其實不過是個儲藏間，但按照香港的標準，也算得上是書房了）裏，思考着該如何找到「地獄航船」「里斯本丸」三號貨艙的倖存者。

那個貨艙位於船體中部，關押着來自英國皇家炮兵團的戰俘。1942年9月底，這些戰俘被從香港押送至日本礦山和碼頭做苦工，他們最靠近美軍魚雷擊中船體的位置。船尾首先開始下沉，而他們又被關押在最靠後的地方，所以傷亡最為慘重。這段歷史關乎軍事史上最嚴重的英美「友軍誤傷」事件，而他們掌握着關鍵信息。

我查閱郵件時，突然收到了一位名為傑克·艾田蒲（Jack Etienne）的人的來信：「剛剛在網上看到您那本書的介紹。我當年在第八海岸炮兵團12連服役，在赤柱被俘，同時也是『里斯本丸』的倖存者。順帶一提，我是最後一位在香港的皇家炮兵團號手。」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305頁。——譯者註

一月之後，我坐在書房裏，翻閱着關於「里斯本丸」的近百頁筆記，心想，如果不能從擊沉這艘老舊貨船的美軍潛艇「鱸魚號」（USS *Grouper*）的視角來講述，這個故事將是不完整的。

我再次查看了郵箱，傑克又來信了，他回答了我冗長的提問，並在郵件末尾加了一句：「對了，我還和『鱸魚號』上的一位船員保持着通信，而且我們還見過面。」

致謝

賴着你們善意殷勤的鼓掌相助；
再煩你們為我吹噓出一口和風，
好讓我們的船隻一齊鼓滿帆篷。
而今我已撒開了我空空的兩手，
不再有魔法迷人、精靈供我奔走；
我的結局將要變成不幸的絕望，

——《暴風雨》，第五幕，第一場^❶

1990年，當我開始收集資料（這後來促成了本書的完成）時，「里斯本丸」的倖存者可能尚有百餘人健在。到了2003年1月，我正式投入寫作時，就只有9位在世。到了3月，這個數字減少到8位；7月，7位；10月，6位。雖然我最終又找到了其他幾位倖存者，但好在我的研究還算及時。

這些老兵們，以及近年來與我聯繫的他們的後代，無一例外地都傾力相助，慷慨分享信息。我特別要感謝：

香港保衛戰及「里斯本丸」的老兵們：

弗蘭克·貝內特（Frank Bennett），香港通訊連（二號艙）。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373-374頁。——譯者註

他是與我取得聯繫的倒數第二位「里斯本丸」倖存者，核實了諸多其他資料中的重要細節。^❶

傑克·艾田蒲（**Jack Etienne**），皇家炮兵團（三號艙）。傑克和他的妻子露絲在幾個月時間裏與我密切合作，幫我整理出傑克的戰時「傳記」。作為為數不多的三號貨艙的倖存者之一，他的講述尤為珍貴。

湯姆·「泰菲」·埃文斯（**Tom “Taffy” Evans**），米德爾塞克斯軍團（二號艙）。湯姆如今定居菲律賓的馬尼拉，他退休前一直生活在香港。我妻子也來自菲律賓，所以我們有許多共同的熟人。

伯特·加拉德利（**Bert Garradley**），皇家炮兵團（三號艙）。雖然我未能與他直接對話，但傑克·艾田蒲多次代我聯繫他，幫助我解答問題。

華萊士·黑斯廷斯（**Wallace Hastings**），皇家海軍（一號艙）。正當我以為已聯繫到所有倖存者時，華萊士主動找上門來。他對於大阪體育場醫院的記憶獨一無二。

阿爾夫·「諾比」·亨特（**Alf “Nobby” Hunt**），皇家海軍（二號艙）。儘管在香港保衛戰中身負重傷，諾比仍高齡健在。他的信息豐富，提供了大量照片和文件。我唯一「抱怨」的是，作為一名皇家海軍人員，他本應分在一號艙！

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Garfield Kvalheim**），美國海軍（「鱸魚號」潛艇）。加爾（他的海軍朋友也稱他為瓦爾）與妻子弗蘭在我研究的過程中提供了巨大幫助。我們通信數月，還原出了加爾在「鱸魚號」上的完整經歷，使之成為傑克故事的對照。加爾和弗蘭

❶ 1942 年期間，貝內特以「弗蘭克·『強尼』·約翰遜」之名擔任陸軍一等兵。

曾居住在世界各地，如今在華盛頓州的海邊定居。

羅斯·林納伯格（**Ross Lynneberg**），新西蘭皇家海軍志願預備隊（一號艙）。羅斯也是一位海軍人員，他慷慨而詳細地與我分享了自己的經歷，這讓一號貨艙的故事變得栩栩如生。他至今仍居住在新西蘭。

詹姆斯·麥克哈格·米勒（**James McHarg Miller**），皇家蘇格蘭軍團（二號艙）。米勒現居澳大利亞，其女兒的轉述為我提供了內容豐富、富有感染力的證詞。

丹尼斯·莫利（**Dennis Morley**），皇家蘇格蘭軍團（二號艙）。與諾比一樣，丹尼斯是一位「郵件狂人」，從頭至尾都給予了我極大的幫助，並慷慨地寄來許多感人的照片與戰俘營的紀念品。

威廉·格蘭特·謝潑德（**William Grant Shepherd**），皇家海軍（一號艙）。在我急需一位一號貨艙親歷者的證言時，謝潑德的女兒及時聯繫上了我。謝潑德的回憶條理分明，與羅斯的經歷相輔相成，讓皇家海軍戰俘的經歷得以清晰展現。他如今居住在加拿大。

雷吉·肖爾（**Reg Shore**），米德爾塞克斯軍團（二號艙）。他是最早與我通信的受訪者之一。不幸的是，他於 2002 年去世，未能看到這項研究的完成。

比爾·斯普納（**Bill Spooner**），皇家蘇格蘭軍團（二號艙）。作為最後幾位被中國漁民從海中救起的倖存者之一（比大多數同伴晚了數天），比爾早前曾在網上發表過回憶錄。當我寫信向他女兒請求引用授權時，驚喜地收到了比爾本人的回信。

雷格·韋斯特伍德（**Reg Westwood**），皇家工兵團（二號艙）。他在本書完成前去世了，但與他的通信令人愉快。我尤其難忘諾比

形容他們兩人的初次相遇——在中國南海（South China Sea）中央的一塊浮木上。他們之間深厚的友誼一直持續到 2003 年韋斯特伍德在加拿大去世。

「里斯本丸」船上人員的子女和親屬：

蘇·艾倫（Sue Allen），皇家炮兵團亨利·「哈里」·威辛頓的姪孫女。

雷格·班納姆（Reg Banham），皇家炮兵團湯姆·班納姆之子。

瑪麗·巴克（Mary Barker），皇家蘇格蘭軍團托馬斯·哈密爾的姪女。

肯·布萊克莫爾（Ken Blackmore），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珀西·奇滕登的姪子。

格里·博格（Gerry Borge），皇家蘇格蘭團約翰·博格之子。

羅恩·布魯克斯（Ron Brooks），皇家炮兵團查爾斯·弗雷德里克·布魯克斯之子。

基思·布朗（Keith Brown），米德爾塞克斯軍團「托珀」·布朗之子。

安東尼·巴克（Anthony Bucke），皇家通信兵團西里爾·巴克之子。

邁克·巴特沃斯（Mike Butterworth），皇家蘇格蘭軍團傑克·巴特沃斯之子。

謝恩·卡瓦納（Shane Cavanagh），香港防衛軍團內維爾·貝德·卡瓦納之子。

格雷格·奇澤姆（Greig Chisholm），皇家蘇格蘭軍團詹姆斯·

約翰斯頓的曾孫。

貝蒂·克林根 (Betty Clinghan)，皇家海軍約翰·麥克費倫·卡西迪的姪女。

瓊·康諾利 (June Conolly)，皇家工兵團亞歷山大·西姆·希爾頓之女。

伊莎貝拉·庫珀 (Isabella Cooper)，皇家蘇格蘭軍團詹姆斯·麥克哈格·米勒之女。

傑夫·考克森 (Geoff Coxon)，皇家炮兵團約翰·羅伯特·吉爾的姪子。

莫伊拉·卡思伯森 (Moirá Cuthberston)，皇家海軍約翰·達菲之女。

萊斯·達菲 (Les Duffy)，皇家海軍約翰·達菲的姪子。

尼娜·埃爾斯拉德 (Nina Elsrud)，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巴茲爾·埃里克·亨廷的姪女。

瓊·芬威克 (Jean Fenwick)，皇家蘇格蘭軍團比爾·斯普納之女。

多麗絲·弗羅加特 (Doris Froggatt)，皇家海軍羅伯特·阿特金森之女。

安德魯·弗澤 (Andrew Furzer)，皇家海軍唐納德·弗澤之子。

伊恩·高 (Iain Gow)，皇家蘇格蘭軍團詹姆斯·高之子。

西蒙·哈蒙 (Simon Harmon)，皇家炮兵團艾倫·哈蒙之子。

阿德里安娜·豪威爾 (Adrienne Howell)，皇家陸軍後勤兵團哈格里夫斯·邁爾·豪威爾之女。

凱·休斯 (Kay Hughes)，皇家炮兵團約翰·「木腿」·古迪納

夫之女。

伊恩·英格利斯 (Ian Inglis)，皇家炮兵團約翰·英格利斯之子。

格林·瓊斯 (Glyn Jones)，皇家海軍電報員托馬斯·西奧多·瓊斯之子。

道格拉斯·蘭利-貝茨 (Douglas Langley-Bates)，皇家工兵團羅納德·蘭利-貝茨之子。

加雷思·盧埃林-威廉姆斯 (Gareth Llewellyn-Williams)，皇家海軍陸戰隊亨利·盧埃林-威廉姆斯之子。

希拉里·盧埃林-威廉姆斯 (Hilary Llewellyn-Williams)，皇家海軍陸戰隊亨利·盧埃林-威廉姆斯之女。

利·內夫 (Leigh Neve)，米德爾塞克斯軍團詹姆斯·阿爾弗雷德·梅納德的姪孫。

科爾姆·奧布萊恩 (Colm O'Brien)，米德爾塞克斯軍團丹尼斯·麥格拉思的姪子。

梅蘭妮·帕克 (Melanie Parker)，皇家炮兵團約翰·希迪之女。

羅賓·保爾特 (Robin Poulter)，米德爾塞克斯軍團威廉·保爾特之子。

馬爾科姆·鮑威爾 (Malcolm Powell)，皇家陸軍軍醫隊弗朗西斯·弗洛倫斯的姪孫。

肯尼思·薩蒙 (Kenneth Salmon)，皇家炮兵團安迪·薩蒙之子。

馬爾科姆·肖特 (Malcolm Short)，皇家工兵團西德尼·查爾斯的姪子。

莫伊拉·薩默斯 (Moirra Sommers)，皇家海軍威廉·格蘭特·謝潑德之女。

戴維·斯坦福 (David Stanford)，皇家蘇格蘭軍團弗雷德·斯坦福的孫子。

希拉·斯通 (Sheila Stone)，皇家通信兵團威廉·麥考密克之女。

艾倫·湯姆森 (Allan Thomson)，皇家蘇格蘭軍團維克多·湯姆森之子。

芭芭拉·廷德爾 (Barbara Tindle)，米德爾塞克斯軍團塞繆爾·亞瑟·阿特金斯之女。

艾琳·特林德 (Aileen Trinder)，皇家蘇格蘭軍團喬治·特林德的兒媳。

保羅·沃恩 (Paul Vaughan)，皇家海軍雷金納德·帕萊特妻子的孫子。

馬克·威登 (Mark Weedon)，米德爾塞克斯軍團馬丁·威登之子。

蘇·威爾金森 (Sue Wilkinson)，皇家蘇格蘭軍團比爾·斯普納之女。

馬克·威廉姆斯 (Mark Williams)，皇家海軍斯蒂芬·梅洛斯的姪孫。

其他給予慷慨協助與專業支持的人士包括：

芭芭拉·安斯洛 (Barbara Anslow) ^❶

伊迪·巴傑 (Edie Badger)

科林·戴 (Colin Day)，香港大學出版社。

❶ 原姓為雷德伍德。

巴尼·戴伯特（Barney Deibert），卡爾·謝林（「鱸魚號」）之姪。

羅傑·丁格曼（Roger Dingman），南加州大學歷史學教授。

傑弗里·埃默森（Geoffrey Emerson）

露絲·艾蒂安布勒（Ruth Etienne）

蘇珊娜·哈里斯（Suzanne Harris），美國國家檔案與記錄管理局。

理查德·海德（Richard Hide）

羅德尼·海德（Rodney Hide）

讓·伊斯雷爾（Jean Israel）

蒂姆·柯（Tim Ko）

弗蘭·克瓦赫海姆（Fran Kvalheim）

格雷格·萊克（Greg Leck）

戴維·李斯特（David List）

羅傑·曼塞爾（Roger Mansell），日軍戰俘研究中心。

尼爾森·馬爾（Nelson Mar）

維克·馬什（Vic Marsh），湯姆·馬什中士（溫尼伯榴彈兵團）之子。

帕特·穆里根（Pat Mulligan），詹姆斯·帕特里克·穆里根（皇家炮兵團）之子。

海蒂·邁爾斯（Heidi Myers），美國海軍歷史中心。

安妮·奧佐里奧（Anne Ozorio）

理查德·皮瑟（Richard Peuser），美國國家檔案與記錄管理局。

伊恩·奎因（Ian Quinn）

約翰·里克斯（John Reakes）

伊麗莎白·萊德（Elizabeth Ride），賴廉士（英軍服務團）中校之女。

海倫·里格比（Helen Rigby）

布賴恩·羅伯茨（Brian Roberts）

安娜·羅薩里奧（Anna Rozario）

格雷格·施羅德（Gregg Schroeder）

金·「肯特」·沈（Kin “Kent” Shum）

格倫·「馬蒂」·斯坦（Glenn “Marty” Stein）

羅德里克·薩達比（Roderick Suddaby），帝國戰爭博物館。

羅恩·泰勒（Ron Taylor）

弗蘭克·維克托（Frank Victor）

范培德（Peter Vine），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

約翰·R. 瓦格納（John R. Waggener），懷俄明大學。

賈森·沃迪（Jason Wordie）

西蒙·姚（Simon Yau）

我還要感謝舟山羣島的人民和政府給予的幫助與熱情款待。

上述所有人士都提供了寶貴的信息，彌補了我研究中的許多空白之處。當然，書中若仍存在任何遺漏或錯誤，文責自負。

我已盡力查找本書所引用作品的版權持有者，若有任何我未能找到的被引用作品之版權持有者信息，歡迎隨時與我聯繫，我將在後續版本中署名致謝。

人物表

真是奇跡！

這裏有多少好看的人！

人類多麼美麗！啊，新奇的世界，

有這麼出色的人物！

——《暴風雨》，第五幕，第一場^❶

「里斯本丸」上的英國戰俘：

亞瑟·阿爾西（**Arthur Alsey**） 皇家蘇格蘭軍團軍樂手，1942年時 31 歲。

塞繆爾·亞瑟·阿特金斯（**Samuel Arthur Atkins**） 米德爾塞克斯軍團二等兵，25 歲。

弗蘭克·貝內特（**Frank Bennett**） 香港通訊連信號兵，25 歲。

查爾斯·弗雷德里克·布魯克斯（**Charles Frederick Brooks**） 皇家炮兵團準尉，41 歲。

傑克·艾田蒲（**Jack Etienne**） 皇家炮兵團炮手，19 歲。

亞瑟·「比爾」·埃文斯（**Arthur “Bill” Evans**） 名義上隸屬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的平民，40 歲。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 年，第 368 頁。——譯者註

湯姆·埃文斯（**Tom Evans**） 米德爾塞克斯軍團二等兵，
26 歲。

韓美洵（**Geoffrey Hamilton**）^❶ 皇家蘇格蘭軍團軍官，25 歲。

華萊士·黑斯廷斯（**Wallace Hastings**） 皇家海軍醫護兵，
24 歲。

哈格里夫斯·豪威爾（**Hargreaves Howell**） 皇家陸軍補給與
運輸勤務隊軍官，38 歲。

阿爾夫·「諾比」·亨特（**Alf “Nobby” Hunt**） 皇家海軍水兵，
23 歲。

約翰·英格利斯（**John Inglis**） 皇家炮兵團下士，25 歲。

羅斯·林納伯格（**Ross Lynneberg**） 新西蘭皇家海軍水兵，
21 歲。

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 皇家蘇格蘭軍團二等兵，26 歲。

丹尼斯·莫利（**Dennis Morley**） 皇家蘇格蘭軍團二等兵，
23 歲。

丹·奧漢隆（**Dan O’Hanlon**） 皇家海軍水兵，22 歲。

艾倫·波特（**Alan Potter**） 聖約翰救傷隊軍官，43 歲。

威廉·保爾特（**William Poulter**） 米德爾塞克斯軍團軍需軍
士，33 歲。

安迪·薩爾蒙（**Andy Salmon**） 皇家炮兵團炮手，23 歲。

❶ 韓美洵曾於 1941 年加入港英政府任職官學生（政務官前身），二戰後（1946 年）重新加入港英政府，歷任首席助理華民政務司、助理輔政司、兩局秘書、副防衛司和人事處主任等職，於 1964 年出任副輔政司，1969 年卸任，同年獲授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BE）。——譯者註

威廉·謝潑德 (William Shepherd) 皇家海軍輪機技師，
22 歲。

亨利·「猴子」·斯圖爾特 (Henry “Monkey” Stewart) 「里斯本丸」戰俘指揮官，42 歲。

威廉·斯普納 (William Spooner) 皇家蘇格蘭軍團二等兵，
25 歲。

阿爾夫·泰勒 (Alf Taylor) 皇家通信兵團代理下士，約
25 歲。

馬丁·威登 (Martin Weedon) 米德爾塞克斯軍團 B 連連長，
26 歲。

雷格·韋斯特伍德 (Reg Westwood) 皇家工兵團工兵，24 歲。

羅伯特·賴特 (Robert Wright) 米德爾塞克斯軍團二等兵，
約 28 歲。

「里斯本丸」的日本船員：

新森源一郎 (Niimori Genichiro) 日本官方翻譯，49 歲。

經田茂 (Kyoda Shigeru) 船長，43 歲。

和田義雄 (Wada Hideo)^① 「里斯本丸」戰俘指揮官，約 25 歲。

杉山 (Sugiyama) 船上部隊高級指揮官，約 30 歲。

新岡源太郎 (Niioka Gentoro) 大副，約 40 歲。

① 根據〈りすぽん丸事故顛末報告〉(昭和十七年十月)以及紀錄電影《里斯本丸沉沒》判斷，此人應該是日本陸軍中尉和田義雄 (Wada Yoshio)。作者所參考的戰後審判記錄中僅出現了 Wada Hideo 的名字，我們推斷這可能是在庭審過程中日語發音錄入有誤所致。——譯者註

荒木要 (Araki Kaname) 二副，約 35 歲。

檜山清之進 (Hiyama Seinoshin) 三副，30 歲。

美國「鱸魚號」潛艇官兵：

羅伯特·漢密爾頓·克洛斯 (Robert Hamilton Close) 電機工程師，29 歲。

約翰·R. 戴克馬 (John R. Dykema) 通訊官，中尉，24 歲。

愛德華·羅威爾·霍爾特 (Edward Rowell Holt) 魚雷軍官，27 歲。

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 (Garfield Kvalheim) 機械師，25 歲。

約翰·丹寧·梅森 (John Denning Mason) 中尉，約 35 歲。

羅布·羅伊·麥格雷戈 (Rob Roy McGregor) 艇長，35 歲。

艾伯特·W. 韋弗 (Albert W. Weaver) 供應與行政、電氣與工程助理，27 歲。

小威廉·溫特 (William Winter, Jr.) 副艇長兼領航員，32 歲。

目 錄

推薦序.....	i
繁體中文版序.....	iii
英文原版序.....	vii
致謝.....	ix
人物表.....	xviii
一、引言.....	1
二、香港淪陷.....	8
三、戰俘：香港，1942 年.....	34
四、那艘船：里斯本丸.....	58
五、那艘潛艇：鱸魚號.....	88
六、「動力充足，航線筆直，航行正常！」：十月一日.....	107
七、「放棄那艘船！」：十月二日上午.....	130
八、漫長的游泳：十月二日下午.....	156
九、生存與死亡：十月三日和四日.....	179
十、上海：十月五日和六日.....	190
十一、重返大海：十月七日至九日.....	197

十二、日本：十月十日	206
十三、戰俘：日本，1942 年至 1943 年	216
十四、戰俘：日本，1944 年至 1945 年	255
十五、解放	271
十六、重逢	298
十七、後記	316
 附錄一 判決：對經田茂的審判	 353
附錄二 「里斯本丸」人員名單的來歷	373
附錄三 統計數據	380
附錄四 縮略語對照表	382
附錄五 在個體記憶與歷史真實之間 ——專訪戰爭歷史學家托尼·班納姆	 385
附錄六 戰爭記憶的接力 ——專訪《里斯本丸沉沒》導演方勵	 395
參考文獻	406

圖 錄

1. 戰爭爆發前的香港海港（皇家炮兵團 T. A. 詹姆斯上尉攝）
2. 戰前布魯克斯一家（羅恩·布魯克斯提供）
3. 1941 年 12 月 8 日九龍及新界地圖（托尼·班納姆繪製）
4. 1941 年 12 月 18 日香港島地圖（托尼·班納姆繪製）
5. 「里斯本丸」
6. 「里斯本丸」剖面圖（基於英國公共檔案館 2351114 號原件繪製）
7. 美國海軍 SS-214 「鱸魚號」潛艇（來自 SUBNET，J. 克里斯利與 R. 斯明基聯合提供）
8. 「鱸魚號」潛艇剖面圖
9. 「里斯本丸」的沉沒（英國公共檔案館 2341114 號檔案）
10. 「里斯本丸」沉沒手繪圖（W. C. 約翰遜繪製）
11. 「鱸魚號」截獲的「里斯本丸」沉沒的電報通報

12. 1942 年 10 月 10 日「里斯本丸」倖存者在門司港登陸，右二為波洛克（查塔姆皇家工兵博物館藏）
13. 查爾斯·弗雷德里克·布魯克斯死亡的正式通知書（羅恩·布魯克斯提供）
14. 塞繆爾·阿特金斯倖存的正式通知書（芭芭拉·廷德爾提供）
15. 加拿大遣返證明（丹尼斯·莫利提供）
16. 1998 年倖存者們重聚的合影，從左至右：諾比·亨特、吉姆·法拉斯、雷格·韋斯特伍德、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丹·奧漢隆（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提供）
17. 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與傑克·艾田蒲在 Mark 14 型魚雷前：「迴旋」魚雷（傑克·艾田蒲提供）
18. 廣畑戰俘營解放儀式（站在美國國旗與旗杆之間者為華萊士·黑斯廷斯）
19. 「里斯本丸」沉沒位置示意圖

一、引言

五呎的水深處躺着你的父親，
他的骨骼已化成珊瑚；
他眼睛是耀眼的明珠；
他消失的全身沒有一處不曾
受到海水神奇的變幻，
化成瑰寶，富麗而珍怪。
海的女神時時搖起他的喪鐘，
叮！咚！
聽！我現在聽到了叮咚的喪鐘。

——《暴風雨》，第一幕，第二場^❶

2003年7月，一場颱風正逼近香港。書房外的行道樹被吹得東倒西歪，落葉連同零物雜什也被捲入到狂風的漩渦之中，漫天飛舞。窗外風聲稍歇時，倒伏之木可得片刻舒緩，但旋即又被猛地向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319頁。——譯者註

前拖壓下去。

就在這場暴風雨中，我想試着概述一下自己在未來兩年裏將要寫出的那個故事：

在上海以東的海牀之上，距舟山羣島最東端的島嶼約六海里處，有一艘鏽跡斑斑的沉沒貨船殘骸。它的船體因魚雷的尖銳撞擊而被撕裂開來，貨艙內遍佈骸骨。

這艘舊船於 1920 年在日本首次下水，此後便以「里斯本丸」之名在七大洋上航行了 20 多年。1942 年 10 月，它被美國「鱸魚號潛艇」(USS Grouper) 擊沉，然而這次沉船不單讓日本失去了重要的戰爭物資，對美國人而言，他們所不了解的是，船上還載有十個月前香港淪陷時被俘的近 2000 名英國戰俘。

其中，逾 800 人在沉船中遇難，時至 10 月底，又有 90 人死於休克與傷病；此外，還有 100 多人再也沒能回到英國，命喪於嚴酷的日軍戰俘營。

在距此時間更近的某些戰爭中，美軍對英軍的「友軍誤傷」事件雖然殘酷，但規模都相對較小；「狂風戰鬥機」(RAF Tornado) 的兩名機組人員以及「武士」裝甲戰車上的 11 名士兵都未能倖免。在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此類事件很少導致致命的後果；在「先發制人」的殺傷性武器出現之前，人們通常能夠先於人員損傷而化解掉這種「友軍誤傷」的危機。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還不到一年，就

發生了比以往所見任何戰爭都更為慘重的悲劇。小小一枚魚雷擊中了目標，竟先後讓 1000 多名英國軍人為此而殞命。

但這位美國潛艇指揮官卻從未遭到過譴責，當那艘被誤判的船碰巧經過潛艇的船頭時，他只是利落而專業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這是關於那艘船的故事，它講述了讓兩船遭遇的那場戰爭，以及所有相關船隻上的、所有人的命運。

「里斯本丸」之名，我已熟知多年。在寫香港保衛戰這段歷史時，^①我獨自收集了 1941 年 12 月駐港英軍的完整名單（總人數約為 14000 人），並追溯了他們的命運軌跡。我發現，英聯邦戰爭公墓委員會（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屢次將其死亡原因記錄為「失蹤於『里斯本丸』」，有超過 700 人都被如此標註。後來的研究顯示，許多出現在 1942 年 10 月 1 日或 2 日死亡名單上的人，實則都喪生於該船。這艘骯髒小船上的遇難人數比 30 年前的「泰坦尼克號」多了一半，但後者激發了人們無限的興趣，同名電影還取得了世界最高票房的成就，而前者則完全被人們所遺忘。我耗費了好一陣子才搞清這場悲劇的規模，並最終意識到，自己所面

① 《絕無可能：1941 年香港保衛戰》（*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1941*），香港大學出版社，2003 年。

對的，是軍事史上最大的美軍對英軍的友軍誤傷事件。^①

說是悲劇，並不為過。雖然我把自己早期的研究嚴格限定在 1941 年 12 月所發生的事件^②上，但後來一直有人聯繫我，詢問他們那些十個月後殞命於「里斯本丸」的至親信息。（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很少甚至未曾與家人聯繫過的）遇難者為數甚多，許多家庭一直搞不清楚親人們確切的死亡日期和地點，他們曾因沉船、傷病、營養不良、力竭、休克和寒冷而變得虛弱，或許在沉船後還挺過了一兩個星期。很多家庭都在拚命地尋找一個小冊子——一位名叫韓美洵（Geoffrey Hamilton）的倖存者在 1960 年代所寫的《里斯本丸沉沒》^③，那是當時有關這一話題能找到的唯一作品，書名聽着就很吸引人。最後，一位當年船員的親屬好心寄了一份複印件給我。我滿懷期望地等待着，結果卻發現它只有 30 多頁，且已被其他的諸多作品所徵引，對我了解這個故事助益甚微。

① 不幸的是，還發生過其他更大規模的非英國的「友軍誤傷」慘劇。四個月前的 6 月 22 日，「蒙得維的亞丸」（*Montevideo Maru*）被美軍「鱈魚號」（*USS Sturgeon*）潛艇擊沉，導致 1053 名從拉包爾轉移至海南島的澳大利亞人喪生。「丹後丸」（*Tango Maru*）被美軍「紅石魚號」（*USS Rasher*）潛艇擊沉，造成 3000 名印尼勞工死亡。同年晚些時候，逾 1000 名印尼人在「膠州丸」（*Koshu Maru*）沉船時喪生；在 6 月的「樂洋丸」（*Rakuyo Maru*）、9 月的「豐福丸」（*Hofuku Maru*）和 10 月的「阿里山丸」（*Arisan Maru*）等沉沒事件中遇難的各國戰俘數量與此相近。然而，最大規模的單次傷亡發生在「順陽丸」（*Junyo Maru*）上。1944 年 9 月 17 日，英國皇家海軍「貿易風號」潛艇（*HMS Tradewind*）將其擊沉，造成 5620 名印尼人喪生。

② 指爆發於 1941 年 12 月的香港保衛戰。日軍在偷襲珍珠港當日即入侵香港，駐港守軍因作戰失利且孤立無援，最終宣佈投降。——譯者註

③ 這本小冊子的原標題為 “The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 ”。——譯者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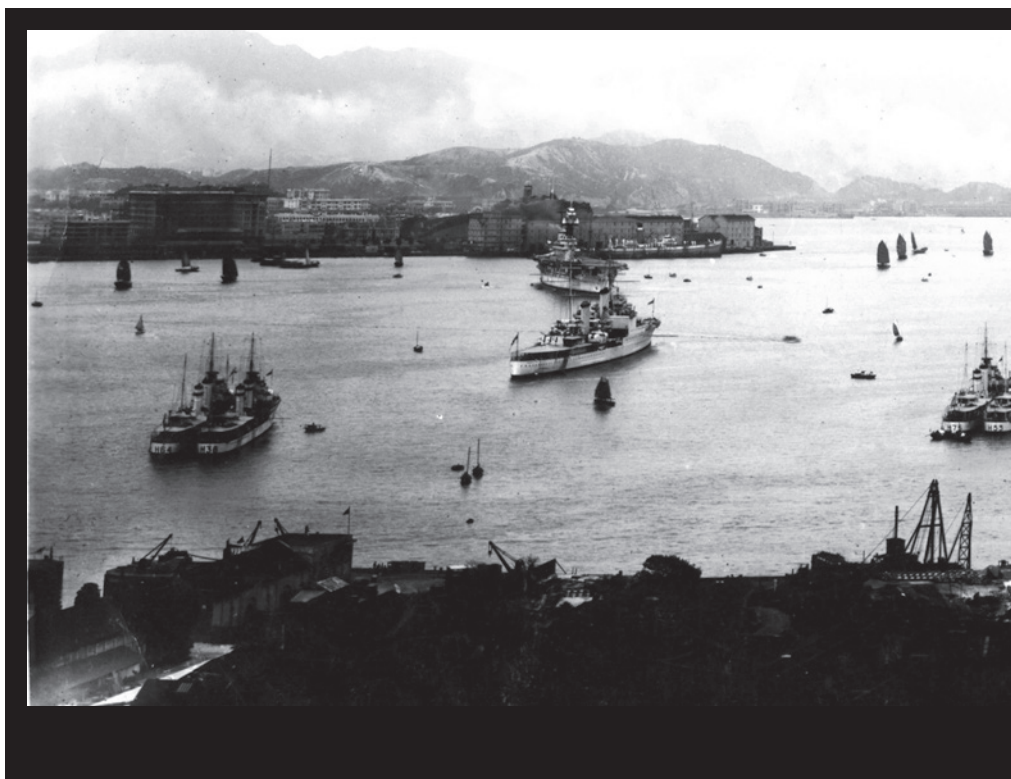
對美國潛艇兵而言，這同樣是一場悲劇。這些極為勇敢的人幾乎是 1942 年盟軍在太平洋上唯一能發揮效用的軍事力量。對盟軍而言，東部海域已充滿險情，即便可以小規模地反擊日本船艦，也能像杜立特（James H. Doolittle）的東京空襲那樣鼓舞士氣。擊沉「里斯本丸」的美國貓鯊級潛艇「鱸魚號」（USS *Grouper*）上的船員們，剛浮出海面為電池充電（襲擊成功後，他們連續 48 小時遭到日軍深水炸彈的攻擊），就了解到了「里斯本丸」上的戰俘及其命運，他們背負着這份記憶度過了餘生。

對我而言，嚴肅的學術研究之起點是編製一份該船上罹難者的完整名單。對大部分陣亡士兵而言，這項工作只不過是要把香港西灣紀念碑上「里斯本丸」的相關條目，鐫刻到那些無人知曉的墓碑上。而皇家海軍一向難找，因為人們通常不是在其喪生之地，而是在母港來祭奠那些未葬的遺體。我詳細搜尋了 1942 年 10 月皇家海軍的完整死亡名單，耗費數月時間將所有殉難者的名字編製成冊。

可是，那些沉船事件中的倖存者境遇又如何呢？就個人而言，我一直對英國官方的態度感到不滿，他們幾乎不曾承認被戰爭傷害的家庭所遭受的痛苦，而只會紀念那些在服役期間死亡的軍人。戰爭經歷本身是極具毀滅性的，因此那些被迫承受它的人也需要被銘記，而對於那不幸淪為日軍戰俘的人們來說，更是如此。

在此，我得到了意外的幫助。2002 年 11 月，我的朋友伊麗莎白·萊德（Elizabeth Ride）^❶ 為我提供了一份完整的香港戰俘名單，

❶ 香港保衛戰中英軍聯合戰地救護隊的指揮官賴廉士（Lindsay Ride）中校之女，其父後從戰俘營中逃出來，在中國祕密組建了英軍服務團。



上面標記了所有搭乘「里斯本丸」及其他船隻前往日本的戰俘。^❶

這份名單^❷本身就極具吸引力，它是由一位異常勇敢的中國人編製的，這位先生在戰俘營為日軍做文員，每晚會帶一兩頁紙回家，並把記錄下來的名單交給英國間諜。

最後，我得到了 1942 年 9 月 25 日所有登船人員的完整名單。

❶ 共計六艘船從香港駛往日本，除「里斯本丸」外，其餘均安全抵達。

❷ 詳見附錄二〈「里斯本丸」人員名單的來歷〉。



戰爭爆發前的香港海港（皇家炮兵團 T. A. 詹姆斯上尉攝）

強風驟起，在窗邊呼嘯，暴雨模糊了視線，讓我看不清那些樹木，每一滴雨敲打在沿山傾瀉而下的水流上，復又激起一些水霧。當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面前就擺着這份陣亡者名單。「近 2000 人」說起來倒是容易，但要凝視他們的名字和年齡（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已經死亡）卻又談何容易。

二、香港淪陷

好了，陛下，別再說了。

讓我們不要把過去的不幸重壓在我們的記憶之上。

——《暴風雨》，第五幕，第一場^❶

昔日曾讓人引以為傲的香港如今已成硝煙瀰漫的廢墟，環顧這一切，英皇陛下的皇家炮兵團炮兵傑克·艾田蒲（Jack Etienne）扔下了他的軍號和喇叭，用軍靴狠狠地將其踩扁。剛剛傳來要放棄赤柱村——香港島上最後一塊抵抗日軍入侵的陣地——的命令，傑克奉命吹響撤退和哀悼陣亡士兵的號音。那是 1941 年 12 月 26 號，節禮日^❷當天，他當時 18 歲，並已意識到自己將以戰俘的身份度過 19 歲生日（以及未來不知多少個生日）。

此時，5000 英里之外，24 歲的美國人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 年，第 369 頁。——譯者註

❷ 節禮日是英國與大多英聯邦國家在 12 月 26 日慶祝的國定假日。——譯者註

(Garfield Kvalheim) 正在加利福尼亞州山羊島潛艇接收站的鍋爐房裏辛苦工作。^❶ 這位有着冒險精神的年輕人曾為加入加拿大皇家空軍、成為飛行員而跨越邊境，但卻未能如願，因此被列為逃兵。現在，他是一名剛入伍的潛艇兵，等待着被調往舊式的 S-28 號潛艇（服役於聖地亞哥，當時正停靠在馬雷島進行維修）^❷ 上服役。然而，不管克瓦赫海姆情願與否，在等待期間，他必須要維持接收站裏老式燃油鍋爐的運轉，以確保基地裏的蒸汽和熱水供應。美國海軍仍在為幾天前珍珠港所遭受的襲擊而感到痛心，他們不想浪費任何資源。

儘管克瓦赫海姆並不知道，他會在自己 25 歲生日那天試圖殺掉傑克·艾田蒲。

這兩人將於十個月後相遇，但即便在那時，他們也沒有機會互致問候。相反，他們將分別處於魚雷殘酷的短距射程之兩端。儘管困難重重，但命運冥冥中注定了他們會在某個時刻相遇。

當勝利的日軍押送傑克和其他約 2000 名英國、加拿大和印度戰俘（可靠的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第一營士兵首當其衝）離開赤柱時，這位年輕的炮兵環顧四周，滿眼盡是戰爭留下的殘骸。和其他許多

❶ 山羊島位於舊金山灣，現在更廣人知的名字是耶爾巴布埃納島。

❷ 1931 年至 1939 年間，S-28 號潛艇（S 級潛艇沒有名字）服役於珍珠港，之後被轉至加利福尼亞州的聖地亞哥。1941 年 12 月 7 日，該艇作為第 41 潛艇分隊的一員，在馬雷島海軍造船廠進行大修。此項工作於 1942 年 1 月 22 日完成，隨後 S-28 號返回聖地亞哥基地，恢復其在水下聲吶訓練學校的戰前訓練任務。S-28 號（SS-133）在新任艇長 J. G. 坎貝爾（他上任還不到一個月，這是其首次指揮）的指揮下，最終於 1944 年在與海岸警衛隊巡邏艦「信賴號」（*Reliance*）進行魚雷演習時失蹤。潛艇沉沒的確切原因始終未能查明。

人一樣，在穿過黃泥涌峽戰場向北行進時，他看到了幾天前戰歿者的遺體仍然散落各處，感到自己從未如此接近死亡。但他錯了，與十個月後將被迫忍受的痛苦相比，他與戰友們的這段短暫而激烈的戰鬥經歷簡直微不足道。傑克在隊伍中機械地邁着腳步，思緒不由地回到了 18 天前日軍發動進攻的那一刻。

珍珠港上空瀰漫着令人難以置信的滾滾濃煙。當美軍引以為傲的「亞利桑那號」（USS *Arizona*）和其他軍艦沉入到湛藍瑰麗的夏威夷海水下 50 英尺的海底時，船員們也都紛紛溺水，這場始於日本魚雷、終結於美國核彈的太平洋大戰就此拉開序幕。

幾乎在同一時間，日軍對菲律賓、馬來亞、威克島和香港發起了進攻。^❶馬來亞和號稱「堅不可摧」的堡壘——新加坡堅持到 2 月 15 日卻出人意料地宣佈投降，連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都感到難以置信。在菲律賓，從巴丹半島到最後的科雷吉多島，美國守軍在日益殘酷的環境中艱守了整整五個月之久，然而，被日軍最先攻陷的盟軍領土卻是香港。

港英當局對此並未心存幻想。他們知道敵軍會發起進攻，於是在 1940 年下令駐港英軍之婦孺（以及商界人士）全部撤至澳大

❶ 人們時常困惑於珍珠港遇襲發生在 12 月 7 日，而香港、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遭到攻擊却是在 12 月 8 日，這僅僅是因為國際日期變更線位於新西蘭以東（即位於夏威夷和東南亞之間）而人為導致的現象，事實上，這些攻擊幾乎是同時發生的。

利亞。^①

負責操縱英國皇家炮兵團的大型海岸炮主炮手查爾斯·弗雷德里克·布魯克斯（Charles Frederick Brooks）一家當時就住在赤柱，他們也在撤離人員之列。^② 他的兒子羅恩·布魯克斯（Ron Brooks）這樣描述了撤退之旅：

1940年，我的母親艾米莉·布魯克斯（Emily Brooks）、我的哥哥傑夫（Geoff）和我從香港〔我想是搭乘的「加拿大皇后號」（*Empress of Canada*）〕撤離到馬尼拉。記得我們當時坐在一輛帆布頂的軍用卡車後面，在傾盆大雨中駛離那艘船，船隻的輪廓映襯在天際線上。我們無法在馬尼拉久留，於是先在一個美軍營地住了一段時間，後來被臨時安置到一家名叫「馬略卡棕櫚樹」（*Las Palmas del Mallorca*）的西班牙旅館裏，之後我們乘坐「阿瓦提亞號」（*MV Awatea*）前往澳大利亞。我記得自己在船上度過了五歲生日（1940年8月6日），當時船停靠在「星期四島」附近——我想船暫停於此處，是為了轉運來自環礁的郵件。我母親當時應該是40歲，（我的哥哥傑夫）十歲。

我們到達墨爾本後，和其他撤離人員一起被安排住在北部郊區

① 有些女性在最後關頭找到了必要服務部門（指那些在非常時期或特殊情況下，為滿足人們基本生活需求而提供的關鍵性服務部門——譯者註）的工作，從而免於撤離，但後來在赤柱拘留營中她們一有暇時便追悔於此。另一些人，儘管認為自己百分之百是英國人，却被澳大利亞認為「歐亞混血」而拒絕接收。

② 參見照片「戰前布魯克斯一家」。

克羅伊登的一家旅館裏。這家旅館的設施很簡陋，拿屋外的桶子做便溺之所。我在克羅伊登開始了自己的學生生涯，傑夫應該也去了同一所學校。我記得當時曾去參加過聖誕節演出，學習在石板上寫字；還記得有次在旅館的廚房桌上被打了麻藥拔過牙。我母親在旅館裏有位叫福西（Fossie）的朋友，她曾是赤柱的一名教師。

此次撤離行動說明，英國的情報部門在香港表現得很出色。他們不僅了解事態的嚴重性，還準確預判了敵軍入侵的具體日期。1941年12月7日，所有前線陣地均已全面部署完畢，這無疑表明襲擊將至，情報部門預測進攻會在24小時內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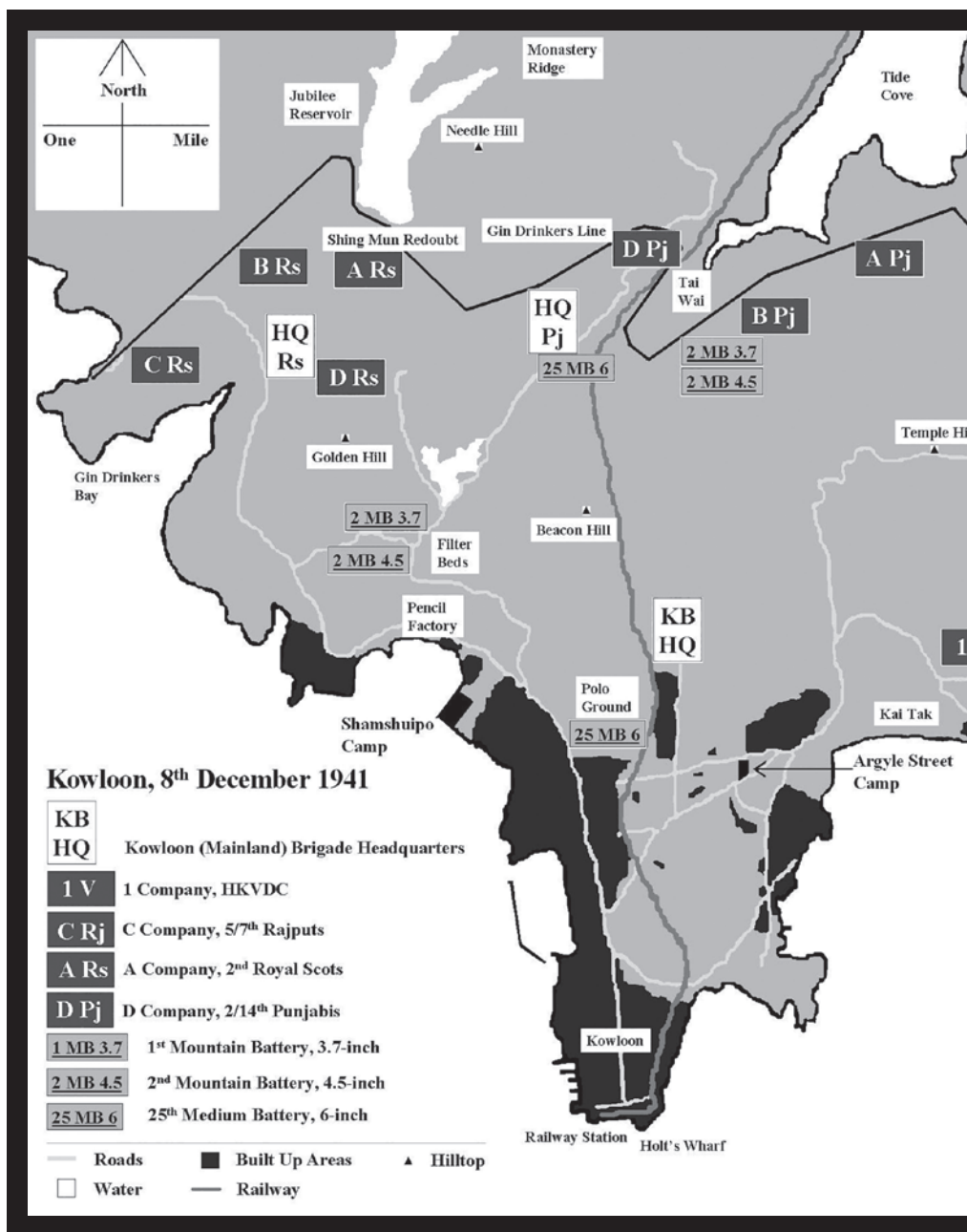
如其所料，日軍於12月8日清晨從中國越過邊境，進入新界。^❶

弗蘭克·貝內特（Frank Bennett）只是近2000名香港駐軍中的一員，他後來才發現自己淪為了「里斯本丸」上的一名戰俘。作為香港通信連的一名信號兵，戰鬥打響時的情形讓他最為記憶猶新。貝內特於1917年出生於樸次茅斯，是家中的第18個孩子，他在少年時就加入了皇家通信兵團。當時他駐紮在位於香港中心地帶的維多利亞軍營，那天早晨他抬頭看到轟炸機遮天蔽日：「好像沒人知道發生了什麼，大家都以為這只是一次讓我們提高警惕的演習。」接着，日軍的炸彈落了下來，人們才恍然大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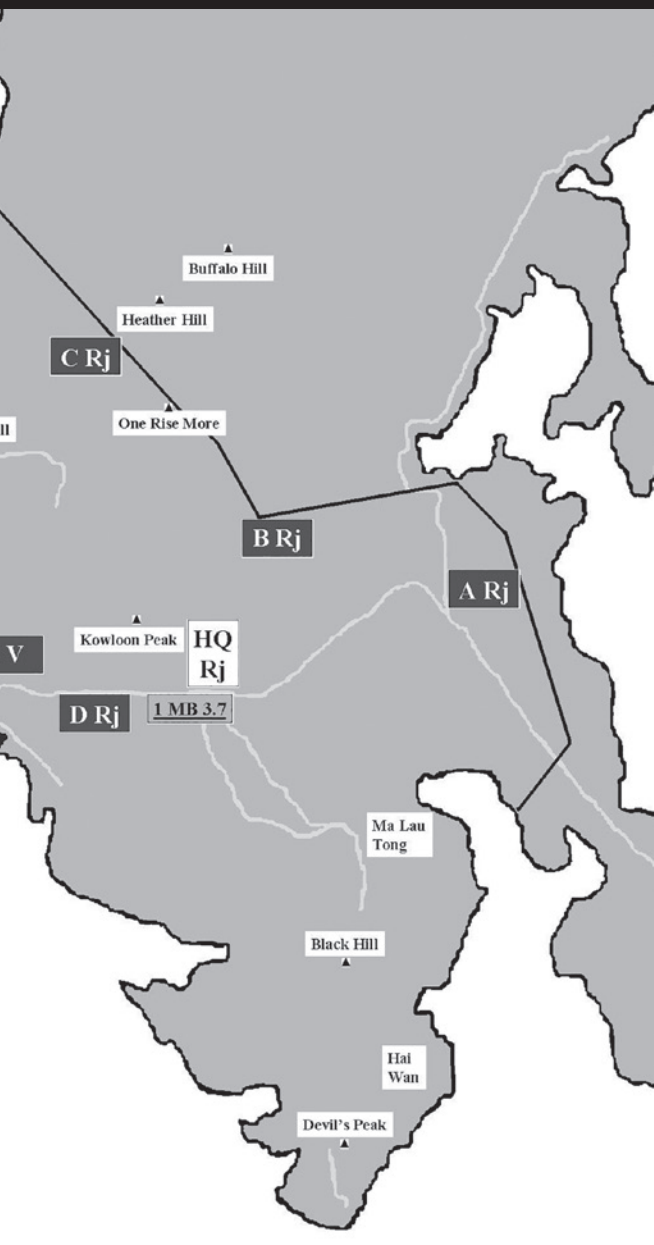
❶ 香港地區包括中國大陸的一部分（九龍的建成區，以及其北面的新界）、若干離島，以及緊鄰九龍南面的香港島。——原註
另，後文中所出現的「大陸」一詞，除特別註明外，均表示香港地區的中國大陸部分，不另註。——譯者註



戰前布魯克斯一家（羅恩·布魯克斯提供）



1941年12月8日九龍及新界地圖
(托尼·班納姆繪製)



開戰後的 36 小時內，在香港島對面的大陸一側，一支日軍步兵軍團已從醉酒灣防線北面的針山上俯瞰全局。醉酒灣防線是一條由碉堡、鐵絲網和戰壕組成的漫長而曲折的防線，工事簡陋且兵力不足，而香港保衛新界的希望就全寄託於此。它始建於 1937 年，年久失修，港英當局最初的計劃是直接放棄這條防線以及整個香港地區的大陸部分，任由入侵者佔領。然而，就在日軍進攻前三個星期，加拿大步兵的兩個增援營抵港，這讓戰術發生了改變。現在，這條橫貫新界的醉酒灣防線由三個步兵營防守：皇家蘇格蘭軍團第二營駐守西段，旁遮普第 2/14 營把守中段，拉傑普特第 5/7 營防守東段。^❶

日軍注意到這個防禦陣地最堅固的據點——所謂的城門碉堡——兵力不足，便決定立即發起進攻。數小時內，城門碉堡即告失守。^❷

皇家蘇格蘭軍團被逼無奈，只能撤退到南面位於金山山頂周圍的一個更為薄弱的陣地，那裏只有一些勉強刨進堅硬地面的淺散兵坑。翌日清晨，山頂上爆發了一場激烈而殘酷的戰鬥。一位名叫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的年輕蘇格蘭士兵被捲入其中。

米勒於 1915 年 10 月 26 日出生於格拉斯哥。他的父親（也叫詹

❶ 在當時的英國陸軍中，由於裁軍或某些部隊受創嚴重，當兩支部隊被合併起來後，其部隊番號同時也會疊加起來，比如第 3 和第 4 倫敦縣義勇騎兵隊（Country of London Yeomanry）在戰鬥中損失嚴重而必須合併時，其番號會變為「倫敦縣第 3/4 義勇騎兵隊」。——譯者註

❷ 儘管被稱為「碉堡」，該陣地不過是幾處佈防稀疏的小型防禦體和掩體，由混凝土隧道和露天通道連接而成。

姆斯）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軍隊服役，後來從事軍需工作。米勒之母在其幼時就撒手人寰，父親便把他送去了格拉斯哥的一所男童院。後來，他從那裏參了軍。

黎明時分，整個排的人都被叫醒，並被警告要保持絕對安靜，做好立即行動的準備。日軍似乎趁着夜色前進到距我們僅 100 碼的地方，並在那裏紮營過夜。我們有了突襲的條件，上級傳令要求大家裝上刺刀。這將是一場肉搏血戰，絕不能手下留情。我想我們每個人都在默默地向上帝祈禱，希望能活過這場戰鬥。衝鋒命令既出，我們心跳加速，腎上腺素飆升，奮力地衝向了敵人。這是完全是一次突襲，我們直到衝到敵軍面前才被他們發現，緊接着就開始了近身肉搏。我只記得，當自己揮刀刺殺、用槍托砸向任何襲來者之時，總感覺視線模糊、心跳加劇。

但日軍已在其他地區獲勝並突破了防線。顯然，眼下守住大陸已是不可能之事。香港駐軍司令克里斯托弗·莫德庇（Christopher Maltby）將軍做出了唯一合理的決定，那就是將駐軍全部撤回香港島。

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羅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在香港島寶雲道軍醫院三號病房的陽台上，目睹了這場戰敗與撤離——他和駐軍中的許多人一樣，正飽受瘧疾的折磨：

當我到達醫院時，那裏一片混亂。病房裏擠滿了傷病者，牀位已不足以安置從海港對岸不斷涌來的新傷員。牀墊都鋪到了地上，我分到了其中一張。日軍對香港的系統性炮擊和空襲正處於最猛烈

的階段，在一片混亂之中，醫生、護士和勤務兵依然都在勤奮而高效地工作着。儘管深受瘧疾困擾，我對其也唯有欽佩之情，他們真是了不起！

到 12 月 13 日清晨，（除了少數在短暫的大陸戰役中陣亡或被俘的士兵外）香港駐軍已全部撤退至香港島。在那裏，他們與加拿大皇家步槍團、溫尼伯榴彈兵團以及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第一營的機槍手等其他三個步兵營會合。大家與其餘駐軍（包括皇家炮兵團、皇家海軍、香港義勇防衛軍以及在隔離地帶確保軍隊運轉所需的所有支援部隊）一道等待着侵略者的到來。日軍並不急於冒險發動兩栖攻擊，他們兩次敦促駐軍投降，但均被拒絕了。在接下來的一周裏，守軍遭到日軍不間斷的轟擊，眼看着周圍的防禦陣地被蠶食殆盡。新西蘭皇家海軍志願預備隊的電報員羅斯·林納伯格（Ross Lynneberg）對此次轟炸記憶猶新。他出生在惠靈頓，是一位擅長拳擊和游泳的運動員，父親在當地賣肥皂。由於父母不願冒險，不允許其加入皇家空軍，於是他轉而加入了海軍預備役，同時為一家保險公司做辦公室雜務。隨着戰爭的到來，他被解僱了：「僱主立即通知我，下周不用來上班了。」由於失業，他最終被動員入伍。林納伯格在戰事爆發前一天經由新加坡抵達了香港。

他隸屬於香港駐軍的中樞部門——要塞司令部，在執行無線電任務時，林納伯格發現自己出現在一架日本轟炸機的瞄準鏡中：

俯衝轟炸機的目標之一是地下司令部的入口。在一次空襲中，當我正要從這個入口離開時，看到一架俯衝轟炸機向我直衝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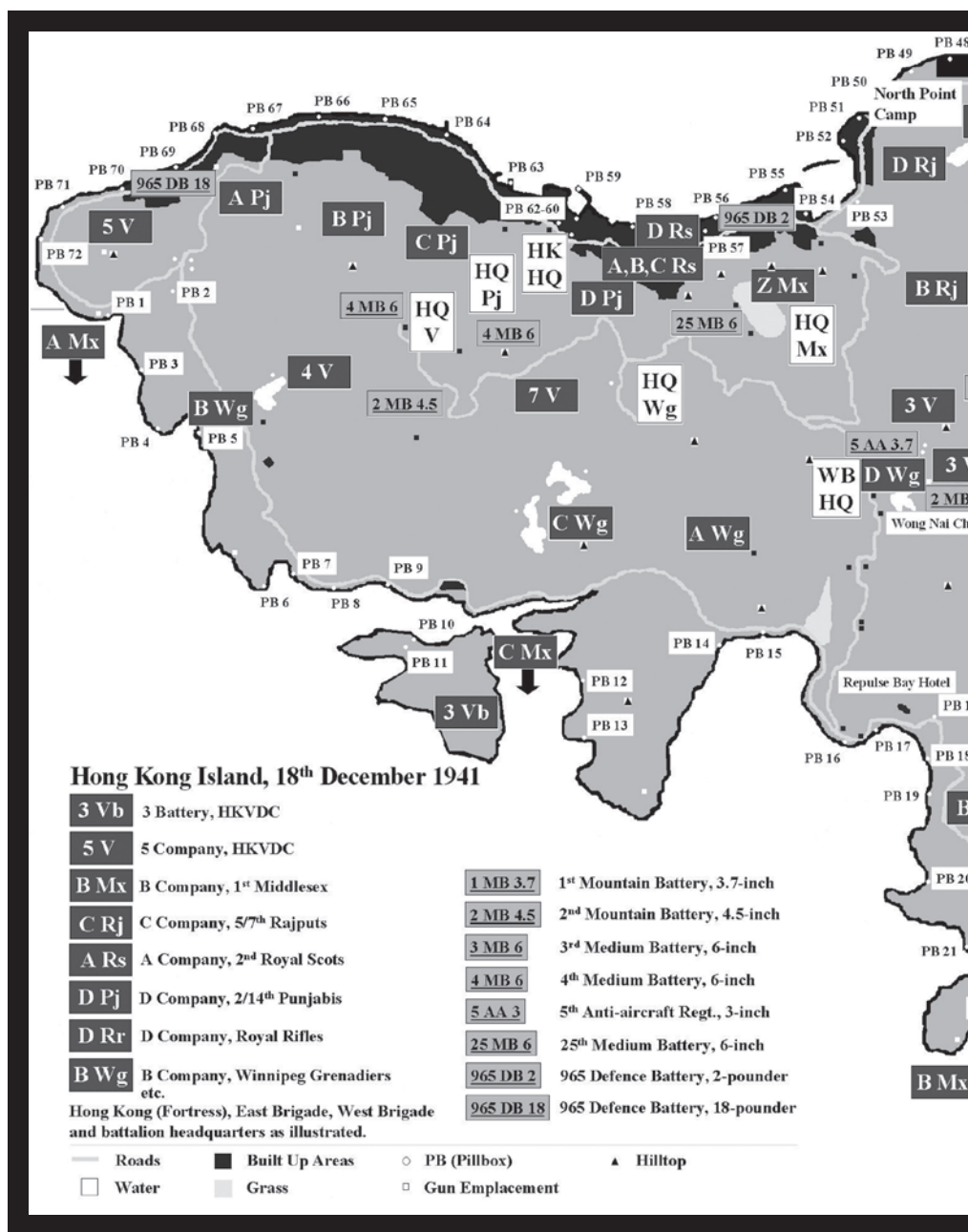
來——它就在爬升的瞬間投下了炸彈，我眼見着炸彈徑直襲來，霎那間，時間靜止了。當炸彈距我似乎只有幾百碼時，它掠過我的頭頂，在司令部上空爆炸了。

然而，由於轟炸效果日趨減弱，又加之東京方面施壓要求速戰速決以便將部隊調往他處作戰，日軍便開始有序部署他們的侵略計劃。在12月18日的夜幕下，着火的儲油庫和油漆廠捲起的滾滾濃煙更掩住了視線。日軍第38師三個經驗豐富的步兵團乘小船橫渡海港，香港守軍兵分東、西二旅，嚴陣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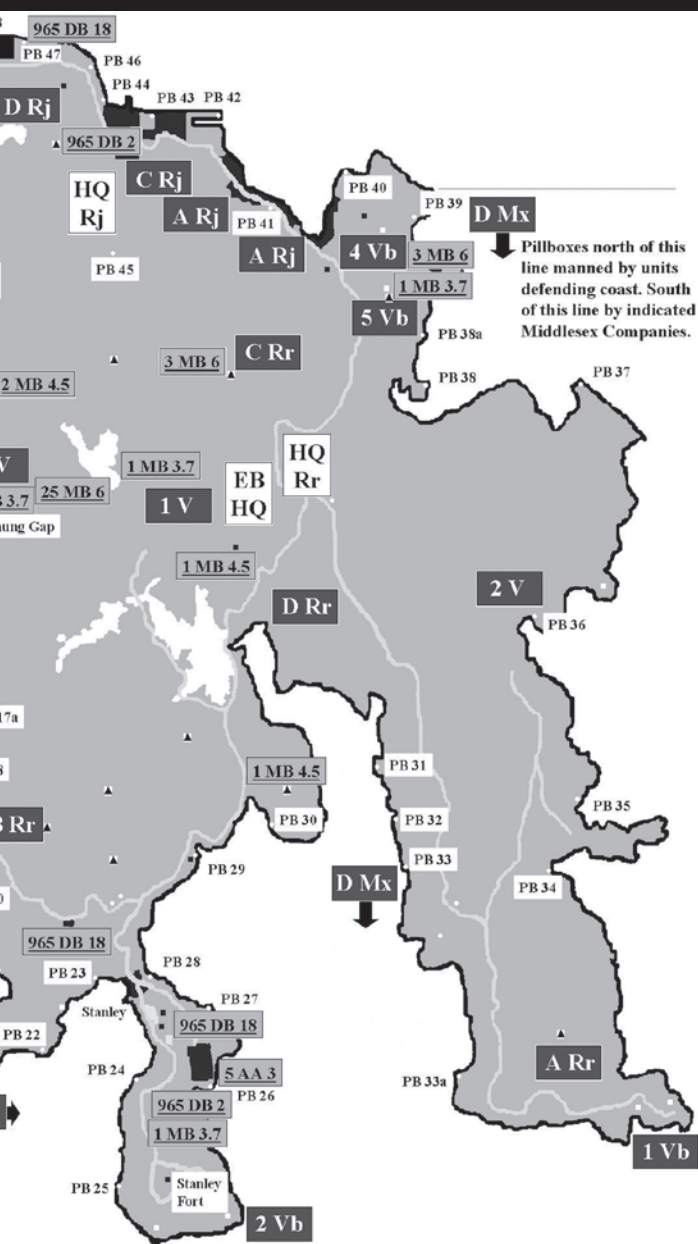
侵略者先是突襲了從醉酒灣防線撤回後、領命防守港島東北海岸的第七拉傑普特步兵團的第五營（來自舊英屬印度的精銳職業軍人）。日軍攻破了這些陣地，爾後向西推進，直至遭遇到香港義勇防衛軍和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阻擊；向南推進到橫貫港島的黃泥涌谷地時，他們遭遇到把守於此的溫尼伯榴彈兵團和更多的香港義勇防衛軍。

從那一刻起，局勢陷入混亂——皇家蘇格蘭軍團第二營投入了戰鬥，他們在島中央進行着絕望而零碎的反擊，傷亡慘重；皇家炮兵團要麼被擊潰，要麼就加入了步兵的戰線；皇家海軍官兵全部離開軍艦，登上卡車奔赴前線；皇家工兵團端起步槍與皇家空軍的將士們並肩作戰，共同反擊。

為阻斷日軍從九龍方向渡海增援的步兵，皇家海軍命令香港的魚雷快艇編隊駛入港口，他們規模雖小但實力強悍。當時身在12號魚雷快艇（MTB）上的阿爾夫·「諾比」·亨特（Alf “Nobby” Hunt），幸運地活過了接下來的一個小時。



1941年12月18日香港島地圖
(托尼·班納姆繪製)



亨特於 1919 年出生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德五英里外的一個小村莊，^① 他的父親負責照料一個馬廐，訓練狩獵與比賽用馬。環遊世界一直是亨特的抱負之所在。幸運的是，一位馬廐主人的兄弟是海軍五星上將萊昂內爾·哈爾西（Lionel Halsey）爵士，他也是亨特的教父。每當哈爾西來到這的樹林裏打獵時，亨特都會幫他拿着備用槍支。雖然 14 歲的他還未到加入海軍的年齡，但哈爾西看出這個孩子對航海滿懷熱情，便為他在利物浦的商船訓練艦上謀了一個差事。亨特在那裏學習了航海技術和通訊，而且令人難忘的是，他還是喬治五世國王為第一條默西河隧道揭幕時的儀仗隊成員之一。15 歲那年，亨特加入了巡弋於伊普斯威奇附近的「恆河號」（HMS *Ganges*），並接受無線電報員培訓。16 個月後，他被海軍派往「皇家主權號」（HMS *Sovereign*）到地中海巡航，之後又轉至另一艘戰艦「皇家橡樹號」（HMS *Royal Oak*）。西班牙內戰期間，他在該國沿海巡查兩年，借聖讓德呂、巴約訥和帕爾馬等基地之便，保全英國商船的利益。1938 年底，他得到了一個更富異域情調的派遣任務——被派往香港的「蟬號」（HMS *Cicala*），此艦在西江（沿途可達廣州和惠州）以及珠江三角洲水域執行反海盜巡邏任務。

如今，亨特發現自己正戴着耳機站在駕駛艙外，他緊緊地抓着

① 亨特有六個兄弟和一個姐姐，其中五個兄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到了服役年齡。其中兩人在英國皇家空軍擔任飛行員，一人在艦隊航空隊（Fleet Air Arm）駕駛超級馬林海火式戰鬥機（Supermarine Seafire），另一人加入了皇家海軍，最後一人在第八集團軍服役，參與了北非和意大利戰役。令人驚歎的是，他們全都在戰爭中倖存了下來。

疾馳的12號魚雷快艇，手持遙控莫爾斯電報鍵（和一支簡化版的劉易斯機槍），身旁是站在駕駛艙內的艇長。

魚雷快艇繞過港口最西端的青洲，全速向東駛入激戰水域。在靠近天星碼頭時，他們遭到了野戰炮、迫擊炮、機槍和步槍的持續攻擊。日本戰鬥機俯衝下來對他們進行掃射，突然，一發炮彈直接擊中了駕駛艙。

亨特回憶道：

艇長和大副都當場陣亡，舵手也沒能倖免於難。待在輪機艙的海軍士官跑上甲板上問道，「發生什麼事了，諾比？」他和我握了握手，接着就被機槍擊中，掉進了海裏。我也同時被一顆子彈洞穿了鋼盔，額頭上被劃出一道深痕。我當時肯定是昏過去了，當我清醒過來時，發現自己漂在海水中。^❶

亨特掙扎着越過港口，劈波斬浪游到九龍，爬進了一個暴雨排水溝。他半身泡在水中時，發現自己左腿中了兩槍，左上臂也挨了一槍，後背還受了一些彈片傷。幾個日軍士兵划着舢板靠了過來俘虜了他，並用帶倒鈎的鐵絲網將其捆綁起來。直到一名長官趕到，

❶ 艦長約翰·巴克斯特·科爾斯（John Baxter Colls）、大副喬治·斯佩丁·麥吉爾（George Spedding McGill）和輪機艙海軍士官托馬斯·艾略特（Thomas Elliot）三人都陣亡了。

亨特才被下令鬆綁。^❶

另一位年輕水手威廉·格蘭特·謝潑德（William Grant Shepherd）在「燕鷗號」（HMS *Tern*）服役時有着截然不同的經歷。^❷他 1920 年出生於鄧迪北部的一個蘇格蘭農場，最初是在一家紡織廠當機械維修工學徒，後來在 1940 年加入海軍，成為了一名輪機艙技師。1941 年初，謝潑德被派往香港，他先是和亨特一起在「蟬號」（HMS *Cicala*）服役，後來調到了「燕鷗號」。在 12 月 19 日，當他所在的炮艇即將沉沒時，他最初最擔心的卻是自己的軍禮服：

我記得當時自己很惦記那套從未穿過的新禮服，我甚至決定在離開炮艇時穿上它。當時受命加入陸軍去保衛香港時，我們完全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將會是什麼。記得搶佔香港南部班納山上據點的那天，我整晚都想方設法在一輛軍用大卡車的掩護下打個盹。黎明時，我們一隊人馬開始向香港仔工業學校進軍，就在這次進攻中，我被一個日本狙擊手的子彈擊中。「燕鷗號」上的一位軍士長趕來救我，現在回想起來，對於他所認為的必要之事，我的反應挺滑稽的。考慮到當時的困境，他不得不撕開我受傷那條腿的褲縫，而我

❶ 阿爾夫的冒險之旅並未就此結束。12 月 23 日，一枚從港島方向射來的大炮彈炸毀了關押他以及另外兩名魚雷快艇倖存者的隔壁房間。他們被灰泥和瓦礫掩埋，幾名日本士兵當場喪命。阿爾夫被放在一扇舊木門上，並被帶到亞皆老街，「與大約 30 名被俘戰友會合」。儘管沒有藥物和綑帶的治療，但他的傷口却癒合得不錯。在亞皆老街時，一名美軍醫生用剃鬚刀刀片為他取出了手臂和腿上的子彈。大約三周後，他們被轉往深水埗戰俘營。

❷ 「燕鷗號」是一艘鳥級內河炮艇，1927 年由亞羅船廠建造；「蟬號」是一艘昆蟲級內河炮艇，1916 年由巴克萊·柯爾船廠建造。

卻因為自己「整潔的禮服」被弄壞了而感到懊惱。^❶

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威廉·保爾特（William Poulter）也在奔赴班納山。作為一名職業軍人，1935年他在駐軍艾塞克斯的科爾切斯特時，遇見了多蘿西（多芙）並與之成婚，翌年，他們的兒子羅賓出生。1938年，保爾特被派駐香港深水埗的南京軍營，他們一家住進了銀禧大樓。「那裏是已婚軍人的寓所，是我們住過最好的地方。」保爾特所屬的連隊指揮部設在壽臣山11號，他們的任務是防守從南朗山到南灣一線的碉堡。作為連軍需軍士長，他的職責是為這些陣地提供食物和彈藥補給。

我從壽臣山出發，準備給在班納山上的弟兄們送些食物，結果遭遇了日軍的伏擊。我們奮力突圍，殺出了一條血路。我司機的耳朵被打掉了一大塊；我左拼右擋，脖子和肩膀還是被一些手榴彈碎片所擊中，頭部被劃傷，腿上也被打出了傷疤，但傷勢並不嚴重。記得手榴彈擊中地面的那一刻，一片橙光閃過，我告訴自己，「比爾，你完了」。可讓我備感驚訝的是，自己居然大難不死。

最終，他還是趕到了香港仔工業學校，在投降之前他一直在那裏擔任屋頂警衛，抓住一切機會為駐守在班納山上的士兵們提供食物。

隨着日軍向內陸進軍，戰火蔓延到了全島。不久，侵略者阻隔

❶ 謝潑德於12月23日被轉移至瑪麗醫院，並通過手術取出了大腿上部的子彈。這個手術雖然本身並不困難，但卻導致了脊椎感染，這使他的康復歷時很久。

了香港守軍的東、西二旅：南進的日軍將東旅進逼至赤柱地區；同時，另一支部隊則將西旅逼到了中環商業區。在這場激烈的遭遇戰中，許多士兵都是九死一生。

此時，來自倫敦的皇家蘇格蘭軍團士兵丹尼斯·莫利（Dennis Morley）躺在醫院的病牀上，聽着日軍的槍炮聲愈來愈近。莫利出生於 1919 年，從學校畢業後，他去了薩里郡米徹姆區的飛利浦電台做學徒。由於渴望旅行並了解其他國家人們的生活方式，他決定從軍。在以樂手身份加入皇家蘇格蘭軍團後，莫利被派駐印度拉合爾的第二軍營。

1938 年，第二營被調往香港，當時軍方認為這是世界上最好的駐地。儘管作為樂隊成員，莫利有很多外出演出的機會，但他還是覺得「任何有點判斷力的人都知道戰爭遲早會爆發」。

日軍甫一發起進攻，莫利便在大陸一側加入了戰鬥，還參與了島上黃泥涌峽防禦戰。到 12 月 23 日，他已躺在聖艾伯特修道院醫院了。^❶ 那天早上，日軍最終還是攻佔了此地。

我對日軍接管的第一印象，就是那個我在之後的三年零八個月裏都難以忘記的詞——“kura！”^❷，日本士兵們端着刺刀橫衝直

❶ 聖艾伯特醫院位於現今司徒拔道 43 號的位置。莫利補充道：「我因疑似患上瘧疾，在聶高信山戰鬥之後被送進聖艾伯特醫院（當時他在黃泥涌峽西側與皇家蘇格蘭第二營指揮部一同作戰）。回想起來，我確定那其實是現在所謂的『戰鬥疲勞症』，因為從第一天開始我就一直在戰鬥。」

❷ 可能指的是“korose”（殺せ），意為「殺死他們」。——原註
事實上，文中所謂“kura”恐為日語「こら（kora）」（用於喊住某人以責罵或批評之時使用的語氣詞）一詞之訛。——譯者註

撞，威脅着我們。不過他們很快就離開了，真是謝天謝地。大家後來才得知太平間裏有一具日軍軍官的遺體，上面還蓋着日本國旗，幸賴於此，我們才逃過一劫。^❶

從聖艾伯特修道院沿山坡一直往下走，就是灣仔皇家海軍醫院了，看護士官華萊士·黑斯廷斯（Wallace Hastings）也躺在了這裏的病牀上。1918年8月4日他出生於肯特郡的達特福德，家有五個姐妹和一個弟弟。黑斯廷斯的父親本是當地一名理髮師，但後來他在鎮上開了一家自己的理髮店。離開學校後，黑斯廷斯的第一份工作是為當地一家汽車代理商當倉庫管理員學徒。但其父老華萊士·黑斯廷斯更有見識，他認為參軍會讓兒子有更好的前途。為此，他諮詢了兒子以前的校長，校長同意讓小黑斯廷斯重返學校繼續學習，準備參加皇家空軍學徒學校入學所要求的教師學院^❷考試。但由於參軍並非自己的真心志願，小黑斯廷斯故意讓自己在最終的考試中折戟。

16歲半時，他來維克斯·阿姆斯特朗軍火廠打雜，幫忙造炸彈箱。在父親不斷的批評和懇求下，18歲時他終於下定決心加入皇家海軍，並在查塔姆軍營簽下了服役12年之約。「我選擇加入看護部

❶ 這名軍官是由加拿大皇家步槍團的彼得·阿蘭（Peter Allain）和一名英國士兵從戰場上抬回來的（感謝邁克爾·帕爾默提供這個細節）。瑪麗·柯里修女不僅遵循了用日本軍旗包裹遺體的傳統，還確保進入醫院的日本人知曉了這一點，從而使醫院裏的人員倖免於難，她因此被授予皇家紅十字勳章。

❷ 教師學院（the College of Preceptors）於1846年在英國創立，旨在規範教學行業。——譯者註

純粹是為了能戴上尖頂帽、穿上橫帆式制服，而不是戴圓頂帽、穿喇叭褲！」

在「彭布羅克號」(HMS *Pembroke*) 和吉林厄姆 (RNH *Gillingham*) 皇家海軍醫院完成基礎訓練後，他於 1939 年首次被派駐中國艦隊^❶的「狼蛛號」(HMS *Tarantula*)，隨後又被調至「海鷗號」(*Scamew*)，最後來到了香港的添馬海軍基地。

與莫利不同，黑斯廷斯未能參與到戰鬥中（他說，「很遺憾，我對香港保衛戰毫無貢獻」），因為他當時正在醫院接受扁桃體切除手術。當醫院方圓百米內激戰四起之時（摩理臣山、巴里士山和灣仔市場），他所能做的一切僅僅是聽着越來越近的槍聲和慘叫聲……

戰爭變得愈發酷烈。在投降前，香港這支小規模駐軍的陣亡率已超過百分之十，此外還有無望獲得現代化醫療救治的數千名傷員。

受訓不足且裝備簡陋的加拿大部隊（加拿大溫尼伯榴彈兵團和加拿大皇家步槍團）倚靠一些據點阻滯了日軍的攻勢，並在其他火力點發動了極為勇猛的正面進攻。無論日軍的火力多麼強大，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第一營（他們因在最糟糕的情況下也能找到樂子而著稱）都毫不退縮。而由歐亞混血所組成、不被看好的香港義勇防衛軍第三連，在戰略要地渣甸山上堅守到全員非亡即傷。

在香港島南面，戰前曾吸引了海明威等名人光顧的豪華酒店——淺水灣酒店——陷入了包圍之中。一條道路縱貫港島南

❶ 「中國艦隊」(China Station) 是英國皇家海軍在 1865 年至 1941 年間駐守中國的艦隊編制。——譯者註

北，將其一分為二，而該酒店正位於此路最南端的戰略要地，於是它便成了天然的攻擊目標。酒店內的客人（混雜着身份迥異的社交名流、難民、百萬富翁和軍人）報告稱，12月20日早晨，日軍已經出現在酒店外的路上。那時，有七年軍齡的米德爾塞克斯軍團老兵湯姆·「泰菲」·埃文斯（Tom “Taffy” Evans）恰好就住在這家酒店。

1916年，埃文斯出生於薩福克郡的伊普斯威奇，1934年在倫敦米爾希爾軍營入伍，後來被派駐到香港，他為此感到很開心。（「香港物價很便宜，我每周用16先令的零用錢就可以過得很好。」）埃文斯是一名通信員，但他很快就發現自己已身陷於戰火之中。他跟隨着年輕的彼得·格朗茲（Peter Grounds）中尉向酒店車庫（他們剛目睹日軍將英軍俘虜拖進那裏）發起進攻，當這位年輕軍官被擊中時，埃文斯就在其身旁咫尺之處。

埃文斯說：「他好像是被一個狙擊手殺死的。那個狙擊手是從前一天晚上已被日軍佔領的、酒店對面的車庫過來的。我們和其他人一起，在酒店大門外的牆邊與敵軍交火，彼得就在我身邊被子彈擊中了頭部。我們將他帶進了酒店，但卻被告知他是撐不下去的。」^❶

這一切都是徒勞的。在缺少空中掩護、解圍無望、還要面對眾多經驗豐富而又殘酷無情的敵軍時，單憑匹夫之勇是無法取勝的。香港保衛戰充其量只是讓日軍無法獲勝的整體消耗戰的一部分，但香港守軍牽制並損耗了日軍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難以更替的精

❶ 中尉彼得·格朗茲死後被埋葬在食品儲藏室外的酒店花園裏，戰後其遺體已無法辨識。原先的酒店在1982年被拆除了，但車庫却沿用至今。

銳力量。

然而，守軍在 1941 年聖誕節當天的投降依然是體面的，即便是久經沙場的日軍也為遭遇到如此頑強的抵抗而感到驚訝。這支雜牌軍是由當地義勇軍、英國和印度的正規軍、未經沙場的加拿大新兵，以及充當步兵的英國皇家海軍水手組成。儘管他們明知勢已難為，仍然英勇作戰。香港唯一的希望就是拖住敵人以待新加坡方面的馳援。不過，「反擊號」(HMS *Repulse*) 與「威爾士親王號」(HMS *Prince of Wales*) 戰艦被擊沉的消息剛一傳來，這一希望便徹底化為了泡影，因為新加坡也是大難臨頭，自身難保。雖有傳言稱中國軍隊正前來解救香港，但隨着香港島上抵抗力量的節節敗退，幾乎無人懷疑他們終將失敗的現實。

1941 年 12 月 26 日凌晨，也就是投降協議正式簽署數小時後，香港保衛戰才在港島南岸風景如畫的赤柱村之槍炮聲中結束。傑克·艾田蒲、查爾斯·布魯克斯及其戰友們曾在此戰中操控着巨型海岸炮與敵軍交火。

投降後，香港義勇軍的韓美洵 (Geoffrey Hamilton)^❶ 帶領他的士兵們從灣仔峽附近的戰線撤出。他曾被編入皇家蘇格蘭軍團，接替一名在戰鬥中陣亡的軍官。韓美洵寫道：

在到達馬己仙峽後及奔赴山頂的途中，我們遇到了一輛野戰救護車，其指揮官情緒激動，意識也不太清醒。他還沒收到投降的消

❶ 韓美洵的日記現存於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本書中所有引文均來自他的日記及其出版的小冊子《里斯本丸沉沒》。

息，以為我們是逃兵，便舉槍相對。因為解釋無效，我不得不告訴他，若不放下手槍，他就會被殺掉。然後大夥將蒂爾尼（Tierney）^❶和罹患瘧疾且頭部受傷的軍士長馬西森（Matheson）送上了救護車……去山頂時我們路過了觀龍角警署，那裏火勢兇猛，彈藥和手榴彈在大火中爆炸，子彈和彈片四處亂飛。但大家已經疲憊不堪，心情沮喪，只能視若無睹，蹣跚而過。幸運的是，無人受傷。抵達山頂車庫的集合點後，我們吃了一頓飯，那是這麼多天以來的第一頓熱飯。

戰爭結束後，守軍清點了損失。在總人數從未超過 14000 人的部隊中，^❷已有逾 1500 人陣亡，傷者更多。18 天的戰鬥讓所有人都筋疲力盡、營養不良。

他們坐待日軍將其俘虜，覺得能在戰鬥中活下來已是幸運，卻完全不曾料到，在即將到來的囚禁生活中，因疾病、營養不良、虐待以及「里斯本丸」事件而喪命者，幾乎是在戰場上死於子彈、炸彈、炮彈、迫擊炮和刺刀人數的兩倍。

駐軍的妻子和孩子們徒有憂心。對於那些留守香港的家庭來說，最初幾乎是音訊全無，但不久後，諸如誰犧牲了、誰還活着這

❶ 在投降後不久的一次日軍轟炸中，連軍需軍事長蒂爾尼在灣仔峽附近嚴重受傷，並於 12 月 27 日在畢打街的香港酒店（當時被用作急救醫院）去世。而今，那裏已是置地廣場所在地。

❷ 這個數字涵蓋了參與了香港保衛戰的所有部門，包括宣誓成為民兵的警察以及（因常身處前線，故也遭受了傷亡的）護士。

些小道消息便迅速散佈開來。而那些撤離至澳大利亞的家庭，由於與外界信息隔絕，他們只能努力維持着正常的生活，絕望地等待着親人的消息。

此時，羅恩·布魯克斯與其服役於皇家炮兵團的父親已有 3000 餘英里之隔。他回憶道：

不知過了多久，我們搬到了聖基爾達海濱郊區一套（就當時的標準而言）相當不錯的公寓裏，當時有很多撤離者都被安置在了這座城市，我還記得和住在附近一家小旅館裏的其他撤離兒童們一起玩耍的情形。聖基爾達是墨爾本的海濱遊樂場，這裏應該有許多公寓、賓館和小旅館可供住宿。我們的公寓位於一樓，樓下有一個與走廊相通的門廳。這間公寓有客廳、兩間臥室、廚房和浴室，後面還有一個寬敞的露台。整套公寓分為兩棟樓，每棟四戶，我家這間即為其一。房東是一位奧地利猶太裔女士（基斯納夫人），她有兩個十幾歲的女兒，他們一家都是難民，住在其中的一套公寓裏，向他們交房租就成了我每周的例行差事。公寓位置極佳，坐落於貝克斯菲爾德大街 332 號，這是一條沿海岸線從墨爾本港延伸至聖基爾達的林蔭大道。在 332 號路段，大道分成了兩條單行道，中間隔着一片約 50 碼寬、種着棕櫚樹的草坪。後來在戰爭期間，草坪上挖了一條「Z 字形」的戰壕。我們公寓對面是海濱步道、游泳俱樂部的更衣室和海濱浴場，附近還有一個佔地面積很大的聖基爾達公園。

傑夫和我就讀於聖基爾達小學，學校就在從弗林德斯街車站始發的電氣化鐵道線終點站旁，從我們的公寓走幾步就到了。傑夫應

該是不久後就轉到了（可能是在艾伯特公園附近的）技術學校，他飽受嚴重哮喘的折磨，這對其一生都影響很大。傑夫和我在聖基爾達的日子應該都過得相當滋潤，我們可以（即使在美軍到來之後）在聖基爾達無拘無束地到處閒逛。傑夫還有一輛自行車，讓我好生羨慕！若不算與父親身居兩地這一點，最初那段時間，我母親也應該過得挺愉快的。記得她在聖基爾達有幾個朋友，日子過得也算安穩。但這一切在 1941 年聖誕節香港淪陷後發生了改變，那時我們才真正地開始擔心起父親的境遇。

香港已然淪陷。至少在當時，這座城市與外界的聯繫已被完全阻斷。

三、戰俘：香港，1942 年

他們仍舊囚禁在一起
如同你離開他們的時候一樣

——《暴風雨》第五幕，第一場^❶

1941 年 12 月 29 日，傑克·艾田蒲（Jack Etienne）和與東旅一起在赤柱被俘的 2000 餘名士兵，在日軍命令下，穿越黃泥涌峽，向香港島北岸中部的北角行進。這是一支由炮兵、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皇家步槍團、香港義勇防衛軍、皇家海軍以及其他部隊的散兵游勇組成的雜牌軍。這段路途讓人心情沉重，步履維艱。幾天前，許多在黃泥涌峽戰鬥中被俘的士兵已被沿着同一路線押往北方，而那些掉隊的傷員則被帶到路邊就地處決，他們的遺體與此前戰歿者的遺骸一同橫陳路旁。

一名溫尼伯榴彈兵團的士官憶及早前的那次行軍時說：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 年，第 363 頁。——譯者註

有些人倒下了就再也爬不起來，其他人就拖着他們前行。日軍必定是下達了丟下這些人的命令，因為我們聽到了慘叫聲，隨後還在路邊看到了那些不幸者的屍體——他們被鬆綁後便遭刺殺。我曾想索性倒地不起，聽天由命，但聽到那些慘叫聲後，我下定決心，只要那已疲憊、僵硬的四肢還能動彈，就要走下去。我已感覺不到炎熱、沙塵抑或傷痛，那種麻木的感覺讓我窒息。我和其他人一樣，只是步履蹣跚地走着，每走幾步就得避開一個摔倒的戰友。有個高大的英國人情況非常糟糕。儘管我們這羣人不停地懇求、嘀咕和咒罵着，但他還是不斷地跌倒。每次倒下，他都會被守衛用步槍頂着，被其他人費力拽起來後，再踉踉蹌蹌地走下去。就是在這裏，我第一次觀察到苦難與囚禁中的一個現象——別人越不幸，自己的痛苦感就會越輕。那個高大的英國人每次跌倒都會捱打，守衛大部分時間都在盯着他，每次他跌倒都能讓我們趁機喘口氣，但最後他再也站不起來了。我們被命令停下來，守衛拿出了剪線鉗，把英國人解開並踢到了路邊。當他們用刺刀捅他並將其扔下懸崖之時，我聽到了他痛苦的慘叫。^①

在行軍的終點，等待傑克和他的戰友們的是北角的一個難民營。這個營地是三年前為安置那些躲避國內抗日戰爭戰火的難民建造的。在18天的戰鬥中，這裏遭受了大量炮擊，任何尚有些許價

① 作者湯姆·馬什（Tom Marsh）中士儘管在行軍中頭部中彈，仍然倖存了下來。他也熬過了戰爭，成為「里斯本丸」之後下一批被押往日本的戰俘。這段引言摘自他兒子保存的一份完整手稿。

值之物都被飢民們洗劫一空，留給戰俘們的空餘一片污穢。大門周圍滿是（日軍沿這片海濱入侵時）死去的馬匹，士兵們腫脹的屍體浮於海上，輕輕撞擊着港口的圍牆。

羅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剛剛瘡疾癒出院。他寫道：

經過兩天的辛勤勞作，北角營地看起來勉強像個樣子了，但那裏的生活卻毫無愉快可言。這期間，營地常受大風與惡劣天氣侵襲，由於我們的棚屋最靠近海邊，又無遮擋，風暴襲來便首當其衝。雨水會滲進來，狂風都快把屋頂掀翻了。每有海上風暴，我們就會泡水。在北角，我們已隱隱有種不祥之感。

第二天黎明不久，戰敗的守軍主力（約 7000 名在港島中部、西部與西旅一同被俘的守軍）陸續在維多利亞集結。^❶ 中午過後，他們乘渡輪橫渡至九龍。上岸後，日軍守衛以 500 人為單位將其分成若干個隊伍，並各自隨意地帶上他們的戰俘離去。一些士兵聽到日軍看守費勁地說出「深水埗」這個詞兒，於是就給這些「領路者們」指明了正確的方向。對許多士兵來說，那裏的營房就是他們曾經的家。到達後，他們與許多戰鬥初期即被獲勝日軍俘虜的士兵會合。不久，從香港各處的軍事醫院復歸的康復傷員也陸續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通信兵弗蘭克·貝內特（Frank Bennett）回憶道：

❶ 儘管這個術語如今並不常用，但在 1941 年，「維多利亞」被視為香港的「首府」。在 21 世紀，與該地區大致對應的城區被稱為「中環」。

在離開自己的軍營之前，我們就被告誡過，只能帶必需品。這是軍士長彼得·威格澤爾（Peter Wigzell）^❶的建議，據我所知，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當過戰俘。每個人除了自行決定攜帶的物品之外，還被分發了一件連隊的物資，可能是辦公設備、廚房用具或是食物。所有物資都被記錄在案，領受者須按軍隊規定到目的地交還。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行軍途中有那麼多物資都被丟棄了，但到最後，每一件辦公用品卻都被如數上交了。

據一名同行的香港義勇防衛軍炮兵描述：

我們進入深水埗的第一印象是這裏開闊、有序，以及有着還算堅固的建築——看到草地和樹木免於戰火，我們感到由衷的欣慰。但靠近一看，景象遽然一變。軍營是日軍空襲的首要目標之一，銀禧軍營因遭持續轟炸而被夷為平地，^❷許多小房子都被損毀。然而，比炸彈更具災難性的是搶劫者的掠奪，他們在英國守軍撤離九龍後一湧而至，席捲了一切。掠奪行為的徹底性令人顫慄，它超越了所有人的想像，這揭示出一種大多數歐洲人難以想

❶ 卡魯（Carew）在《命運的人質》（*Hostages to Fortune*）第116頁中提到，威格澤爾在「里斯本丸」沉沒前就已在船上死於白喉。英聯邦戰爭公墓委員會（CWGC）的內部檔案甚至聲稱，他於1942年9月被埋葬在亞皆老街。然而官方記錄顯示，他在船隻沉沒時失蹤，且沒有已知的墓地。

❷ 銀禧大樓是一個兩層的大型建築群，最初建造用於安置軍官。而北角營地原是1938年匆忙建成的難民營，深水埗則是專門修建的軍營，建築標準要高得多。

像的極度貧困。^❶

與北角一樣，這裏除了磚頭和混凝土之外，已是一無所有。深水埗已經變成了一個毫無生機的空殼營地。皇家蘇格蘭軍團中尉韓美洵回憶道，「我們就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沒有門窗抵擋襲來的一月寒風。我當時只穿着短褲和長綁腿，^❷到了晚上就用綁腿裹住身體保暖，而且我們也都很飢餓」。

日軍將印度部隊送往另一個戰俘營——馬頭涌^❸，但他們將宣誓加入民兵並以此身份參與戰鬥的香港警察作為平民關押在赤柱營。^❹

新當局於1月4日將參戰人員的家屬集中起來，安置在香港島西北部西營盤海濱一些衛生條件極差的「短租」旅館中。^❺到1月21日，他們最終被轉移至固定拘留營——赤柱，那裏正是他們的丈夫、父親們紛紛殞命的戰場。但就拘留營的條件而言，赤柱並不

❶ 作者詹姆斯·貝特蘭（James Bertram）是一名來自新西蘭的新聞記者，他在最後時刻自願加入香港義勇防衛軍，並參與了赤柱防禦戰。貝特蘭雖免於登上「里斯本丸」，但後來也被送去了日本。這段引文出自他的著作《在戰爭的陰影下》（*The Shadow of a War*）。

❷ 一條纏繞在小腿上的布條。

❸ 馬頭涌戰俘營位於九龍亞皆老街以南。

❹ 民兵身份實則只維持了三天。此後，根據他們自己的要求，他們又重新正式成為了一般警察。不過，那些在當民兵期間被俘的警察最終與普通戰俘一起被關押在深水埗營地。

❺ 如前所述，大多數英國籍的婦孺都被命令撤離到澳大利亞避難。然而，一些人選擇在香港找到必要服務工作並留下來。撤離令並不適用於那些不被認為「英籍」的婦孺。

算差。儘管口糧從未按被拘留者所需配給，人員過度擁擠也一直是個考驗，但日軍很少有虐待行為，疾病也從未像在戰俘營裏那般失控過。

一位既是平民護士又是年輕媽媽的女性回憶道：

當我們搬到赤柱時，一位護士給了我一個搖籃讓尼古拉斯用。我要給孩子餵奶時，發現一個全副武裝的日本士兵在面無表情地盯着我。漫長的行程中塵土飛揚，卡車中途屢屢被攔停檢查且顛簸不斷，抵達時的場面混亂無序。在朋友們的幫助下，我們擠在地板上勉強熬過了第一夜，沒有燈光，也幾乎沒有食物和水——對一個整晚一直在哭的飢餓嬰兒而言，這是一次煎熬。由於這場變亂，餵養他的奶水已不多了，而對他來說，這場長達十周的漫長飢旅才剛剛開始。多虧在司徒永覺（Selwyn Clarke）醫生的努力下，紅十字會及時送來了奶粉，否則這場飢餓會奪去他的生命。^①

在香港之外，參戰士兵的家屬們一直在等待消息。全世界的報紙都報道了香港戰役以及發生在聖誕節當天的投降，從那以後，則是音訊全無。突然間，數千封官方信件寄到了戰俘親屬們的手中，信中並未保證他們的親人還活着，這讓每個收到信的家庭都感到惶

① 護士瑪麗·霍普·古德班（Mary Hope Goodban）是香港義勇防衛軍二等兵傑拉德·阿切爾·古德班（Gerald Archer Goodban）之妻，後者是拔萃男書院（Diocesan Boys' School）的校長。1941年12月，就在日軍入侵後不久，他們的兒子尼古拉斯出生於瑪麗醫院。這段引文來自奧利弗·林賽（Oliver Lindsay）的《日落西山時》（*At the Going Down of the Sun*）。司徒永覺當時是香港醫務處主任。

恐不安。在澳大利亞的布魯克斯一家於香港守軍投降不到一個月時就收到了第一封信件，內容如下：

陸軍部

1942 年 1 月 20 日

夫人：

關於英國駐墨爾本高級專員公署已向您傳達的信息，我謹直接通知您，根據本辦記錄，您的丈夫、皇家炮兵團一級準尉 C. F. 布魯克斯（軍號 1410996）在 1941 年 12 月 25 日香港守軍投降時服役於香港。我們正在通過外交和其他渠道竭盡全力搜求有關他的信息，但遺憾的是，在此期間，我們須將他列為「失蹤」人員。

一有任何信息，我們都會立即通知您。為此，如您地址有變，務請告知本辦為盼。如您從其他渠道獲知任何消息，也請與我部聯繫，不勝感激。

謹啟^❶

新西蘭海軍通信兵羅斯·林伯格（Ross Lynneberg）最初被關押在深水埗：

❶ 本書將以皇家炮兵團的布魯克斯（Brooks）和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阿特金斯（Atkins）收到的官方信件為例，儘管還有數百個家庭收到了幾乎完全相同的信函。

在被關押了將近一個月後（1942年1月26日），海軍人員被集合起來，送回香港島的北角營地，這裏此前收容過中國難民，但自守軍投降後就被法裔加拿大人佔用了……^①那羣看着我們轉移營地的中國人，不再是一個月前那一臉鄙夷、吐口水的模樣——事實上，他們都面露哀色。我們沿着海岸線行進，整段路約有一英里長，到處都是被沖上岸的「好鬼子」（死去的日本兵）——有些地方堆滿了屍體，散發着惡臭，上面籠罩着黑壓壓的蠅羣。^②

到達營地後，我們發現有一個自抬軍階的「海軍軍官」在掌控局面。^③所幸，此人後來死於日本，免於在戰爭末期被軍事法庭審判。負責我們的是中國艦隊的指揮官，他很快就摘掉了這個假軍官的海軍軍銜袖環。

這個營地裏有1000多名加拿大人，加上我們的海軍士兵，總人數增加到2000人左右。這裏的伙食一度比之前的營地要好，每天配有三頓簡餐——其中兩頓是米飯。為了增強我們的體力，他們還配給了罐頭食品、鯨魚肉、鹹鴨蛋和蔬菜。

到1942年1月底，日軍已將戰俘分散到三個營地。在香港島的

① 此前暫時被關押在北角的英國戰俘已被送往深水埗。艾田蒲就提到，當他到達已被清理過的深水埗營地時，「整個深水埗營房被徹底洗劫一空。從北角來到這裏後，我們被安置在勉強可住的房間裏」。

② 許多人都報告稱看到了這些正在腐爛的遺骸。然而，這些遺體很可能是印度第5/7拉傑普特兵團的士兵，他們的屍體被日軍拋入了海中。

③ 一些人聲稱那個冒名頂替者是海軍陸戰隊員埃里克·霍斯利（Eric Horsley），但事實上他是在「里斯本丸」上遇難的。

北角，實際上關押着逾 1500 名加拿大人，^❶還有很多皇家海軍，以及一羣在馬來亞海域被俘的荷蘭潛艇艇員（他們於 2 月 1 日抵達）。在九龍，印度正規軍被安置在馬頭涌，而大部分英國正規軍和香港義勇防衛軍的部隊則試着去適應深水埗的條件。

他們需要適應新環境，其中被抱怨最多的是伙食問題。一些士兵就是無法接受以米飯為主食（儘管米飯供應也不足）。最初煮的大鍋飯並不好吃，常常是鍋底的米都燒糊了，但上面的米還是夾生的，而中間煮熟的部分少到根本不夠分。

據一位香港義勇防衛軍的高級軍官回憶：

營地裏有數千名士兵，而我發現我們能得到的口糧卻只有大米。皇家工兵團負責在廚房煮飯，等飯的隊伍排得很長。我設法找到了負責配給的軍官，告訴他：「看，你還不如把大米給我們，讓我們自己煮。」他同意了。由於我們中的一些人就生於香港，知道該怎麼煮飯，至於那些不會煮飯的，倒是都知道怎麼吃飯。^❷

炮兵傑克·艾田蒲回憶道：

❶ 在「里斯本丸」選完人離港後，這些戰俘被轉移到深水埗。有趣的是，許多加拿大人是乘坐「阿瓦提亞號」抵達香港的，而此船之前曾運送眾多婦孺從香港撤離。這艘在此期間聲名遠播的郵輪後來於 1942 年在阿爾及利亞附近被擊沉。

❷ 引述來自博特略（Botelho）上尉，他是香港義勇防衛軍第六連的指揮官，在香港的戰俘營中一直被關押到戰爭結束。這段引文出自伯奇（Brich）和科爾（Cole）所著的《被俘歲月》（*Captive Years*）。

皇家炮兵團的廚房其實原本是間臥室，我們的廚師不得不在浴缸裏煮飯！有一段時間我們只能吃米飯，一些軍官抱怨說我們必須要有蔬菜；結果第二天日本人就拉來了滿滿一卡車的菊花說，你們不是要吃蔬菜嗎，那就吃吧！不得不說，這確實讓伙食發生了一些變化。

由於營養不良和衛生條件惡劣，疾病很快在營中蔓延開來。痢疾時常失控，肺炎頻發，而像乾性腳氣病^①這樣的維生素缺乏症^②也悄然侵襲着幾乎每一個人。隨着營養不良和維生素缺乏症在戰俘中擴散，死亡已是他們習以為常之事了。

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羅伯特·賴特回憶道：「奇怪的是，（日軍）會主動參加死者的葬禮，還謙恭地說着『非常抱歉』，但卻拒絕承擔每天發生的死亡事件之責。儘管只要他們再多付出一點，大多數死亡是可以避免的。」^③

除了食物和疾病之外，另一個主要的困擾便是無聊。

韓美洵說：

很難找到打發時間的方式。西里爾·瓊斯（Cyril Jones）^④有一副撲克牌，我們經常連續幾個小時玩貝濟克牌。有一段時間，我受

① 這是一種特別令人痛苦的病症，患者腳部劇痛難忍，以至於無法入睡。

② 由一種或多種維生素缺乏引起的若干種疾病。

③ 1964年，賴特出版了一本名為《我是地獄營戰俘》（*I Was a Hell Camp Prisoner*）的優秀作品。本文中引用的所有賴特的言論均來自此書。

④ 瓊斯曾指揮皇家蘇格蘭步兵團第二營A連，駐守於城門碉堡，他在戰鬥初期便被俘。

邀與我的指揮官西蒙·懷特（Simon White）上校和另外兩位上校一起打橋牌，但我不太喜歡與這些大人物們一起玩牌，尤其是當我們輸牌時，上校總是責怪我。

在4月，日軍決定將深水埗戰俘營的軍官轉移至亞皆老街的另一個戰俘營。同時，海軍部隊離開北角，返回深水埗。

新西蘭人林納伯格此前一直待在北角戰俘營：

我們居住的棚屋在戰爭期間遭到過機槍掃射，千瘡百孔，破爛不堪，其中許多屋子還因炮火攻擊而被部分損毀。比如說，這座營地裏就有一個混凝土碉堡，由於建造時壓縮成本，混凝土質量很差，風日復一日地刮走了其中的砂粒。^①我們在這個營地的時間都花在修繕棚屋、學習各種課程，以及計算每次揮動蒼蠅拍能拍死多少只蒼蠅這種事情上了，我們經常能一次拍死幾十隻。

睡在混泥土地面上十分不舒服，於是我們中的一些人用木條搭了些離地幾英吋高的牀，但其中做得最出色的當數默多·斯圖爾特（Murdo Stewart）^②。他還帶着海員配發的摺疊小刀，並用其做了一

① 「壓縮成本」指的是臭名昭著的「劉美美（Mimi Lau）事件」，事實上，這些建築物的混凝土塊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裏在香港都被俗稱為「劉美美」。劉美美與防空總監史柏堅（Steele Perkins）有一段情史，據傳這段關係使她的家族企業獲得了大量與戰爭相關的建築工程合同。他們通過在混凝土配比中減少水泥用量來節省成本。史柏堅於1945年去世。據說，戰後劉美美與另一位重要人物、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也有過一段情史。

② 一位後來在「里斯本丸」上喪生的新西蘭同胞。

張帶腿的木條牀，使牀完全離開了地面。在冬天來臨之前，許多人患上了痢疾，所幸亡者不多。人們很快就明白了不要給別人點煙的道理，因為加拿大人會借火點煙，然後把自己的煙靠在你的煙上，趁人還沒反應過來，利用空心煙管吸走一半的煙絲。

由於伙食太差，這個冬天對我們而言異常嚴酷，大家穿上了所有能穿的衣服，除了要去領飯和向日軍報數外，成天待在牀上。在這個營地待了三個月後，許多人都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症狀——儘管我們的指揮官們都竭力相助，不斷援引國際法向日軍提出要求。結果，我們在1942年4月18日返回深水埗時，軍官們被從士兵中分離了出來，這使得日軍更容易控制我們。這次轉移發生在一個雨天，我們被迫在水沒腳踝的閱兵場上站了好幾個小時，期間還不斷遭到日軍毆打，這進一步打擊了大家的士氣。他們強迫我們把隨身的小包和被褥扔到水裏，然後煞有介事地在成堆的物品中進行搜查。經過疲憊不堪的一天後，我們又回到了先前的營地，再次被搜身、點名之後，才回到棚屋休息。由於接下來幾天天氣都沒有好轉，衣物無法晾乾，大家都情緒都低落。

棚屋的狀況仍和我們三個月前離開時一樣糟糕，僅有的變化是增設了可用作公共牀鋪的長椅，架設了一道電鐵絲網。這在我們剛離開的那個營地裏也有，它確實很有用——一天早上，人們發現一隻日本人的狗死在了上面。日本人用這道新鐵絲網被用來折磨那些想要靠近兜售物品的中國人，或是那些想見男友的女孩們。這些不幸的人會被集中起來，用鐵絲捆住，並留出一長段的鐵絲端頭。將這羣人澆水濕透後，這段鐵絲會被扔到電網上，那些痛苦的中國人發出的慘叫聲就像受驚的豬叫一般。

英國當局發出的信件而今紛至沓來。彼時，對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山姆·「萊尼」·阿特金斯（Sam “Leny” Atkins）家人而言，財務問題並不是他們最關心的，但按照軍隊的程序，他們還必須要處理這件事。

覆函請寄至祕書處並註明編號：E 3210 A

退役軍人事務部戰時服務補助金處：Heyhouses Lane Lytham St. Anne

電話：St Annes 2300

電報地址：Millalac. St. Annes Lancs

1942 年 5 月

夫人：

S. A. 阿特金斯，二等兵，軍號 6213420，米德爾塞克斯軍團

關於您目前領取的戰時服務補助金事宜，我部已接到戰事部通知，您的家屬津貼將繼續發放至 1942 年 8 月 9 日。

據此，本部已批准您的戰時服務補助金同步延期至上述日期。

1942 年 5 月 11 日至 8 月 9 日期間的領款簿已寄往牛津郡芬斯托克郵局，您可持 PE 45C 憑證前往該處領取。

祕書處謹啟

牛津郡查爾伯里鎮附近

芬斯托克學校路

阿特金斯夫人收^①

① 本信函由阿特金斯家人提供。

1942年6月初這個時間節點，對於傑克·艾田蒲（Jack Etienne）、查爾斯·布魯克斯（Charles Brooks）、山姆·阿特金斯（Sam Atkins）和他們的戰俘同伴們並不意味着什麼，他們也不會意識到在中太平洋即將發生的事件會改變戰爭的進程。他們疾病纏身、飢腸轆轆、無聊至極，對家人乏善可陳，並且迄今為止他們也沒有機會寫信。6月3日，香港船塢防衛軍（Hong Kong Dockyard Defence Corps）的二等兵弗朗西斯·詹寧斯（Francis Jennings）死於急性腸炎和心力衰竭。緊接着，5日和9日，通信兵約翰·利特爾（John Little）、炮兵下士約瑟夫·羅傑斯（Joseph Rodgers）都相繼死於痢疾。

傑克·艾田蒲說道：

六個月後，深水埗的情況變得很糟糕，許多戰俘都患上了痢疾。看到那些你認識多年的熟人變得骨瘦如柴，真是令人心碎。而此時又出現了另一個禍因——糙皮病，它導致舌頭、睪丸等部位的皮膚脫落，^①作為受害者之一，我對此深有體會。還有一種折磨人的病是「電擊腳」。只要能吃得好一點，這些病其實都能避免。當時有個盛傳的謠言說有一名軍官和三名中士在與日軍合作，^②後來這被證實了。還有傳言說我們中的一些人不久將被押送到日本。在此期間，毆打依然頻發。

① 患者們稱這種令人不適的症狀為「草莓球」或「香港球」。

② 戰後，一名軍官和兩名中士因被控通敵而被審判，最終均被無罪釋放。

羅伯特·賴特回憶道：「我在深水埗被關押了六個月，作為戰俘，那段時間我只有絕望之感。這是漫長的折磨、焦慮和苦難的開始，也是飢餓、疾病、殘暴和殺戮的開始。」

隨着時間的流逝，由於惡劣的條件、與外界的資訊隔絕，又加之看不到盟軍，戰俘們的士氣嚴重受挫。^❶ 然而，就在香港投降後的幾個月，當香港戰俘們還在適應新環境時，在 3000 英里外的太平洋中心，一場具有戰略決定性的戰役正在一個名為中途島的偏遠島嶼周邊展開。

參與這場戰役的其中一艘艦艇是全新的美國潛艇，彼時正在執行其首次戰時巡航任務。在香港的戰俘們當時都未聽說過這艘潛艇，即使聽說過也絕不會想到，幾個月後，他們的命運會與這艘潛艇發生如此戲劇性的交集。

在中途島戰役期間，香港的情況幾無任何改變。由於持續的營養不良及其對健康和士氣的直接影響，又有數名戰俘相繼死去。他們滿腦子想的一直都是吃的，正如一位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年輕戰俘所寫的那樣：

主啊，

您知道，在深水埗，

❶ 當美軍轟炸機開始出現在香港上空、襲擊日軍艦船和軍事設施時，英軍士氣受到了極大的鼓舞。然而，第一次空襲直到 1942 年 10 月 25 日才發生，這距離戰俘被押上「里斯本丸」已有一個月之久了。

一個人要如何掙扎而求生路。
 在亞皆老街，我們食不果腹，
 唯以白米、青菜聊解飢腸。^①

主啊，
 晚餐着實難咽下，
 盤中唯見菊花。

軟白之蛆，
 黑硬象鼻^②，
 摻以雜質與沙礫，
 米飯之糙催人泣。

主啊，
 我知我不該怨懟，
 亦莫以我不懂謙卑。
 心懷感念去追憶，
 所幸，此身尚在生期。

可是主啊，
 您也會厭倦於這劣質湯汁。
 何為心中所念之事？

主啊，

① 亞皆老街營地曾在短時間內作為軍官的專用營地，不久後就被關閉了，軍官們被轉移回深水埗營地，儘管他們仍然被安置在營地內的獨立區域。該詩的作者是羅傑·羅斯威爾（Roger Rothwell）。

② 此處為「象鼻蟲」之略。象鼻蟲是鞘翅目象甲科昆蟲的通稱，因其喙部形狀類似大象的鼻子而得名。——譯者註

若不能離開這亞皆老街與深水埗，
能否賜與我們香氣四溢、堆積如山的肉食？

主啊，

若您能賜予維生必需品，
儘快寄送紅十字會的包裹愛心，
我們將感激不盡。

傑克·艾田蒲說：「飲食非常糟糕，只夠維持來回於宿營地和廚房的體力，我們要儘量避免做任何費力的事情。環境惡劣到有人因痢疾而死，眼睜睜地看着人們一個個消逝，簡直太可怕了……實際上，每個人都在想，自己能活到幾時，是不是最後一個死掉的。」

皇家蘇格蘭軍團的威廉·斯普納（William Spooner）在營地醫院工作，他的記憶和艾田蒲幾乎別無二致：「當時的情形真讓人心碎。那些曾經強壯健康、正值壯年的男人們，如今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他們穿着破爛的衣服，在營地裏蹣跚而行，血液和黏液順着雙腿往下流。他們的臉上寫滿了絕望、痛苦，時而又是俯首聽命，直到不可避免地加入那些麻木者的行列。」

羅伯特·賴特就親身經歷過這種病痛：

六月底，我染上了痢疾，被送進了醫院，但那裏沒有任何治療手段。我在那裏待了三周，病得很重，以至於我確信自己一定會死在那裏。日復一日，我意識恍惚地躺在鐵牀上，眼看着周圍的人一個個死去。那種難以形容的恐慌和折磨讓我深受其苦。肌肉從骨頭

上萎縮了下去，眼窩深陷，兩頰凹陷。既無慰藉可言，亦無藥物可醫。

賴特算是幸運的，他靠着燒焦的鍋巴和米湯，挺了過來，也是能從這個「痛苦病房」中活着走出來的少數人之一。進入這裏的人往往會認定自己已是必死之人，對疾病的恐懼幾乎與疾病本身一樣具有毀滅性。

人們想出了各種心理上的應對之策，以在戰俘生活中艱難求生。聖約翰救護機構的一位年輕中尉阿倫·斯坦利·波特（Alan Stanley Potter）通過對大海的熱愛來振奮自己的精神。海浪拍打着深水埗銀禧軍營後方的海堤，在營地裏的他眺望此景，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推開我的囚窗，
俯瞰遼闊的景象，
島嶼點綴着海港，
山丘環繞，
正前方，通往大海的航道在召喚我遠航。
牢房四周遍佈鐵網，
守衛持械監視，
阻擋我心之所向。
無妨，自由可源於想像，
它穿越了彼方航道，奔向海洋。
當晨曦破曉於山崗，
當海灣被光芒照亮，

我走下夢魘縈繞之牀，
首先將目光投向
那奔涌的潮水，自由地流淌
穿越神聖的航道，奔向海洋。
當火球般的太陽俯身，歸巢西降，
映襯於那火紅的霞光，
青衣島如城堡般矗立一方，
落日餘輝召喚着我，
駛過航道，奔向海洋。
當夜幕降臨，籠罩着寂靜的營房，
沉睡將我速速捆綁，
在所有有關遠方的夢鄉，
喚起曾經的過往。
眼前浮現出永恆的景象，
那近在咫尺的航道，通向海洋。
此地雖鮮有舒適可享，
我卻有恆久之樂以當，
它瀰漫於起伏的山丘與海港，
環繞着我的營房。
而最無上的奢想，
便是我通往大海的航向。
我們的人生也是這樣，
置身狹小之隅，
行動受限，但不妨視野寬廣，

歲月流淌，凡人終將死亡，
而永恆的自由，
就靜候在駛向大海的航道之上。

波特最終得以穿越那個航道駛向大海，但卻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代價。^❶

英國陸軍部也在忙着寫信。投降至今已過了七個月，家屬們開始收到第一封告知他們的親人依然活着的官方通知：

陸軍部福利事務官

1942年7月10日

親愛的布魯克斯夫人：

我於7月8日向您寄送了關於您丈夫成為戰俘的通知。顯然在投遞過程中出現了錯誤，現隨信附上該通知的副本。

謹啟

（附上7月8日的原信）

❶ 他是諾福克郡諾里奇市的威廉·A.波特（William A. Potter）和弗洛倫斯·波特（Florence Potter）之子，薩塞克斯郡沃辛市布羅德沃特區奧利芙·梅布爾·波特（Olive Mabel Potter）之夫。

1942 年 7 月 8 日

親愛的布魯克斯夫人：

我很寬慰能通知您，已從陸軍部收到正式消息，您的丈夫 C. F. 布魯克斯（軍號 1410996，皇家炮兵團一級準尉）此前被報告為失蹤狀態，現確認他已成為戰俘。

謹啟

陸軍部

1942 年 7 月 14 日

夫人：

關於英國駐墨爾本高級專員公署向您通報的那則信息，我已奉命進行了確認。從官方渠道收到的報告顯示，您的丈夫 C. F. 布魯克斯（軍號 1410996，皇家炮兵團一級準尉）現為日軍戰俘。目前尚未收到關於他的戰俘營地址或戰俘編號的詳細信息，一旦有進一步的消息，我們將立即通知您。

謹啟

不久之後，一些幸運的家庭收到了戰俘本人寫的第一批簡短來信，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有足夠的精力寫信。

查爾斯·弗雷德里克·布魯克斯 (Charles Frederick Brooks)
香港 S 戰俘營 (無日期)

親愛的艾姆：

我一切安好，身體還算健康。這裏的條件非常糟糕（字跡模糊）。^❶ 夏天就要到了，天氣已經開始暖和起來了。你和孩子們怎麼樣？我真心希望你們都健康快樂。不要為我擔心，我會沒事的。告訴家裏人我很安全。我會儘可能經常給你寫信。保重。

愛你的

查理

到 1942 年 8 月初，自投降以來，香港戰俘營中已有 186 人因傷病或其他原因去世。^❷ 後來，又有兩大衝擊接踵而至。

第一個是「流放」。這個詞在幾個月裏只被當成了又一個謠言。許多倫敦人對這個詞感到熟悉，因為它是一種古老的懲罰——將罪犯流放到殖民地（尤其是澳大利亞）是上個世紀一些法官最喜歡的判決。而這次新的流放是在日本人的堅持下倉促安排的，他們將 616 名戰俘押上「福建丸」^❸，送往日本本土為戰爭工業服務。該船於

❶ 這句以「這裏的條件」開頭的話被審查員嚴重刪改，但在原件中大部分內容仍可辨認。

❷ 這個數字包含了盟軍的平民。

❸ 原文作“*Shi Maru*”，它是第一艘將英軍戰俘從香港運走的船。這艘船實際為「福建丸」，參見〈香港占領地 督部命令〉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C01000620700，昭和 17 年《陸亜密大日記 第 40 號 1/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譯者註

9月3日離開香港，船上的人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刺頭」，也就是那些出了名的、不願向日本當局低頭的「硬漢」。

羅伯特·賴特回憶道：

（深水埗）各部隊指揮官奉令提交那些不服從管教的士兵名單，其中包括兩個月前拒絕簽署「不逃跑」聲明的人^❶……他們會被送到一艘破舊不堪的沿海船隻上，當其登上通往此船的渡輪時，我們向他們豎起大拇指以示鼓勵。他們在當天下午啟航……沒有人願意離開深水埗前往日本，因為對我們來說，那是一個未知的國度。

第二個衝擊是白喉。這種疾病在早些年是人人聞之喪膽的兒童殺手，但時至1942年，人們已經獲得了有效的治療方法。不幸的是，儘管日本人並缺少治病用的血清，他們卻未向戰俘營提供。斯普納說：「比上述所有疾病都嚴重的是，我們還爆發了白喉。用『爆發』來形容此病的氾濫都屬於是輕描淡寫，因為感染者中有90%都是因窒息或心臟驟停而亡的。」

白喉一般通過接觸感染者的呼吸道飛沫傳播，這種傳染性高又令人窒息的疾病潛伏期為二到五天。細菌主要感染鼻腔和喉嚨，並產生毒素，對感染部位周圍的組織造成損害。這種毒素還會隨血液擴散至身體其他器官，尤其是它會對心臟和神經系統造成同樣的損傷。

❶ 在投降後不久，戰俘們被命令簽署書面承諾，表示他們不會試圖逃跑。許多人拒絕簽署，因此遭受了許多折磨，直到他們的軍官告知他們，在脅迫下簽署的文件是無效的。

不出所料，在深水埗擁擠而不衛生的環境中，白喉迅速蔓延，在疫情最嚴重時每天有五名士兵因感染此病而亡。然而，在死亡人數達到這一程度之前，又一則關於轉移的消息開始流傳開來。這一次，同樣不只是謠言。

韓美洵回憶道：

我們在亞皆老街營地待了五個月後，大約有一半的軍官被轉移回深水埗，^❶並被告知自己將被送往一個「非常美麗的國家」，我們猜測可能會是日本。關於這是否對我們有利，大家紛爭不已。我們認為生活條件或許會有所改善，但這也意味着我們可能要等到戰爭結束才能獲釋。當時我們仍未放棄香港會被救援部隊光復的希望。

友軍確實正向我們靠近。一艘美國潛艇於9月1日獨自在中途島開始了它的第二次戰時巡航任務，自15日起便一直在指定海域待命。到了20日，這艘潛艇悄然轉向上海方向。

❶ 豪威爾（Howell）在經田茂（Kyoda Shigeru）戰爭罪行審判中的證詞中稱，「在（9月18日）上午9點的閱兵中，有46名軍官被點到名字，其中大約10人現在還活着。我們被命令在40分鐘內趕到深水埗營地」。

四、那艘船：里斯本丸

一句話，他們把我們押上船，駛出了十幾里以外的海面
在那邊他們已經預備好一隻朽腐的破船，帆篷、纜索、桅檣
什麼都沒有，就是老鼠一見也會本能地退縮開去
他們把我們推到這破船上
讓我們向着周圍的怒海呼號
望着迎面的狂風悲歎

——《暴風雨》第一幕，第二場^❶

第二次轉移時，日方要求徵調 2000 名「健康」俘虜。這不僅旨在為日本的碼頭、礦山、工廠和港口提供奴隸勞工，還將為深水埗營地騰出足夠的空間，從而最終關閉北角營地。^❷

來自米德爾塞克斯軍團、隸屬於馬丁·威登（Martin Weedon）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 年，第 311 頁。——譯者註

❷ 北角剩餘的英國皇家海軍和加拿大戰俘於 9 月 26 日被轉移到港口對岸，以填補深水埗營地因此次轉運而空出的位置。

上尉 B 連的賴特回憶道，「對於我們的軍官來說，這是一個最為艱難的時刻，他們拒絕選擇那些明顯不適合長途旅程的人。最終日軍自己來挑選徵調人員」。賴特和威登都名列其中。

戰俘們都焦急地等待着「徵調名單」的公佈。與此前的徵調不同，這次名單上有許多五個月前被調往亞皆老街營地的軍官，以及數百名皇家海軍人員。然而，被徵調者大多是原本就在深水埗營地的正規軍其他軍銜人員^①。其中之一，便是皇家炮兵團的傑克·艾田蒲（Jack Eticmble）。他還很年輕，卻已經受夠了在香港艱苦而殘酷的戰俘生活。

艾田蒲說：

幾個月後，我需要進行牙齒治療，我們的牙醫帶來了一些工具，檢查之後說他沒有補牙的材料，所以最好還是把牙給拔掉。他讓我坐在椅子上，幾名戰俘抓着我，壞掉的牙齒一下子就被拔出來了。日本人的暴行依舊，如果不向他們鞠躬，就會被逼着將裝滿沙子的消防桶舉過頭頂。有兩個年輕的中國人向我們揮手，日本人看見了就把他們叫過去，兩名哨兵帶着他們穿過營地走到一個小碼頭。一名哨兵把他們帶到盡頭，指着港口裏的什麼東西，另一個則立馬衝上去用刺刀刺死了他們，然後將其扔進港口，有說有笑地離開了。後來，幾個小分隊被派往啟德^②填炸彈坑。當守衛要求交出

① 其他軍銜人員是指除軍官以外的所有軍銜。

② 1941 年，啟德是英國皇家空軍在香港的主要基地，同時也是一個民用機場。它一直作為香港國際機場服務到 1998 年，之後被赤鱗角機場取代。

手錶時，我沒交，結果挨了一頓打。在登上里斯本丸之前，我們就一直過着這樣的生活。

艾田蒲 1923 年 6 月 27 日出生於澤西島，他在 14 歲時就輟學了。他的父親是一名建築工人，但傑克就像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Garfield Kvalheim）一樣，渴望去看看這個世界。1937 年 9 月，他加入皇家炮兵團，在伍爾維奇接受了一年的訓練，並於 1938 年 9 月作為號兵畢業。1938 年 12 月，他乘坐「迪爾瓦拉」號（HMT *Dilwara*）啟程前往香港，加入第八海岸炮兵團，並在 18 歲生日那天成為了炮兵，協助操作守衛香港著名港口的 9.2 英寸大炮。

艾田蒲原本計劃於 1942 年 1 月離開香港，但日軍的襲擊打亂了他的計劃。如今，在被迫以戰俘身份滯留了九個月後，他終於要離開了——不過目的地卻是日本。

在這些被徵調者得知將要被轉移之時，許多人抓住機會趕緊給家裏寫了一封信，山姆·阿特金斯（Sam Atkins）便是其中之一，他家人最近才收到政府發來的關於他財務事宜的通知。

S. 阿特金斯

香港 S 戰俘營

1942 年 9 月 24 日

親愛的瑪麗：

這是我寫給你的第二張明信片，希望你現在已經收到了。
我一切都很好，非常渴望見到你和孩子們。

我們每年只被允許寫三次信，所以你就不要心懷期待了（字跡模糊），而且每封信限 200 字以內。

替我好好親親安妮和芭芭拉，另外，親愛的，你也要開心一點。

我們將被轉移到另一個營地，到達後我會告訴你新的地址。

愛你的丈夫

倫尼·阿特金斯

少數幸運兒雖也名列其中，但因病情太重而被判定無法登船，他們就被留在了深水埗。^❶

深水埗戰俘營因軍官們的回歸和海軍部隊的到來而人滿為患，那裏的鐵絲網都快被他們撐破了。經過疫苗注射、編號和拍照後，日本人認為艾田蒲和其他被選中的人已經做好了啟程的準備。隨後，他們給每個即將登船的人發放了一套新裝備（包括一雙靴子、帆布鞋、內衣、襯衫和短褲、兩條毛毯、一個飯盒、餐具、一件外套和一個背包）。

9 月 25 日凌晨 4 點，天氣仍然悶熱、潮濕。被徵調的戰俘們匆忙咽下了早飯（米飯和魚），並領到了兩個小小的甜麵包作為應急口糧。隨後，他們便前往深水埗營地的銀禧閱兵場（Jubilee Parade Ground）^❷ 集合。他們每 50 人為一組，在分隊長帶領下待

❶ 目前無法確定這些人的完整名單，其中很多人可能不久後就因病去世。不過已知炮兵連軍需軍士阿爾伯特·里克斯（Albert Reakes）是其中之一。

❷ 銀禧閱兵場在深水埗戰俘營內，位於銀禧大樓和營房之間。——譯者註

命。由於等待的時間太長，有些人在離開營地前就把應急的甜麵包吃掉了。最終那個「豬頭」^❶來了，並向大家講話，由新森源一郎（Niimori Genichiro）進行翻譯。他告訴大家，和田義雄（Wada Hideo）將擔任船上的指揮官，還有大約 25 名衛兵隨行。林仙（Hayashi）軍士長所指揮的衛兵隊伍，包括兩名醫務兵——高橋軍士長和上山軍士長、負責發放口糧的小島中士，還有兩名軍士以及 18 名二等兵。^❷

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HKRNVR）的吉姆·法拉斯（Jim Fallace）回憶道：^❸「1942 年 9 月 25 日早上 5 點 30 分，徵調隊伍集合完畢，從那時起任何人都不允許離開隊伍。7 點半時，負責所有營地的日方總指揮官來講了幾句話。他說，我們將被送往一個比香港氣候更好的地方，我們必須努力工作，而且要守規矩。」

這個約 1865 人^❹的隊伍從銀禧閱兵場出發前往竹碼頭（Bamboo Pier）^❺。每名戰俘在登上擺渡船前都被噴灑了消毒劑，然後被送往停泊在昂船洲南面附近的一艘鏽跡斑斑的舊貨船上。

❶ 作為香港所有戰俘營的總指揮官，德永德（Tokunaga Isao）大佐在戰後面臨戰爭罪審判。他被判處死刑，但後來改判為終身監禁。

❷ 關於此事件的所有日方細節，包括時間表、日方人員、貨物、船上的對話及船隻在不同時期的狀態，均來自於 1946 年在香港對「里斯本丸」船長經田茂的戰犯審判記錄，檔案編號 WO 234/1114。

❸ 法拉斯的陳述來自檔案 PRO CO 980/67。他不僅在沉船事件中倖存，而且（正如後文所述）還成功逃脫。

❹ 部分病情嚴重的人在船隻啟航前被轉移。據記載，「里斯本丸」出發時船上仍有 1834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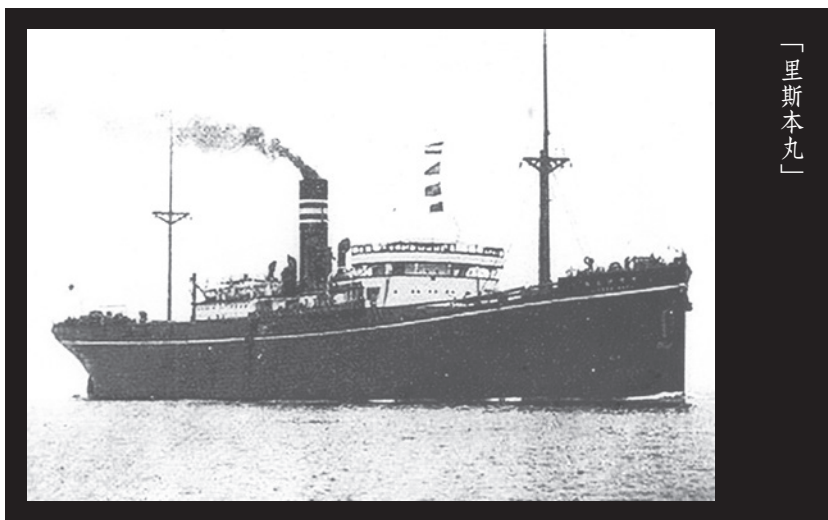
❺ 竹碼頭原是緊鄰深水埗戰俘營南側、伸入海港的碼頭。戰後，這片海港的區域經填海造地，現已是一片陸地。——譯者註

運送戰俘的船看着讓人並不舒服。靠近船身時，他們第一次看到船頭處用白色油漆寫着英文和日文的「里斯本丸」^①字樣。「里斯本丸」與它的兩艘姊妹船「里昂丸」(Lyons Maru)和「利馬丸」(Lima Maru)一樣，是一艘排水量約 7000 噸的貨輪。這艘船由橫濱船渠株式會社 (Yokohama Dock Company Limited) 建造，船體編號為 70，其龍骨鋪設於 1919 年 10 月 15 日，並於 1920 年 5 月 31 日下水。^②該船的早期航運經歷不甚明了，但 1934 年 5 月 5 日，它曾運載一批日本移民抵達舊金山。1938 年，它又被拍到出現在倫敦附近的泰晤士河口。從 1942 年 6 月到 8 月底，英國間諜記錄到它在香港的太古乾船塢進行維修。據英國政府駐重慶的相關部門稱，該船曾因鍋爐房前方的船體中部遭到水雷或魚雷爆炸而受損^③。8 月底它離

① 通過會說日語的朋友丹尼爾·威爾斯 (Danyll Wills)，我請教了神戶的日本學者岡本崇男 (Okamoto Takao)，為何所有日本船隻都叫「某某丸」。他回答說：「非常感謝您提出這個有趣的問題。但我的回答可能會讓您和您的朋友失望，因為我沒有找到任何有語言學依據的解釋。不過，我可以告訴您為什麼大多數日本船的名字都以『丸』結尾。第一個原因非常簡單且有說服力：根據法律規定，船隻須以『丸』命名。但這些規定通常是在已有傳統的基礎上制定的。自中世紀以來，『丸』就作為後綴被添加到寵物、盔甲、長笛 (樂器) 和船隻的名字中 (請不要問我日本的中世紀是從何時開始何時結束的——也許是從 9 世紀開始)。除了船隻之外，所有這些物品都是私人物品。因此，船主 (通常是有權勢或財富的人) 很可能用『丸』來命名他們珍貴的船隻 (要知道真正富有的日本人在本質上是無神論者)。最難解釋的是『丸』的詞源。日語語言學最薄弱的環節就是詞源學，只要日語的起源仍然存在爭議，日語詞彙就很難在語言學上找到有着充分依據的詞源解釋。」

② 資料來自日本商船三井株式會社日本海事協會信息服務部經理內田達夫。後來橫濱船渠株式會社與三菱重工株式會社合併。

③ 經田在戰犯審判中指出，這一損壞是在 Buku (與作者溝通後發現審判材料原文如此，暫無法確認這是何地——譯者註) 發生的。



開香港時，載運了一批鉛錠和其他金屬貨物。一份被截獲的文件顯示，它隨後被用作運輸部隊的船隻，^❶並於1942年9月4日出現在瓜達爾卡納爾島。這艘老舊貨輪已漂洋越海22載，現任船長為經田茂。

商船船長經田茂（Kyoda Shigeru）是一位42歲的男人，家裏的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都在日本等他回家。（1921年12月1日從航海學校畢業後）他有20年的航海經驗，於1922年至1926年擔任日本

❶ 內容如下：

馬來遠征軍曉2948部隊總部，影山隊（「里斯本丸」）；

宇品船運總部指揮官（佐伯文郎中將）；

第三船舶兵團指揮官（櫻田武少將）；

第三登陸部隊指揮官（淺尾時正中將）。

（盟軍翻譯處，第七艦隊司令部，南太平洋地區，當前譯文，序號0457，繳獲文件，1943年4月2日），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

郵船公司（NYK Line）的三副。1929 年晉升為二副，又於 1939 年晉升為一副。隨後，他首次成為一船之長，指揮「盛岡丸」（*Morioka Maru*），但好景不長，1942 年 3 月 4 日，這艘重達 4469 噸的貨船在長崎縣佐世保附近被水雷擊沉。後來，經田受命擔任「加爾各答丸」（*Calcutta Maru*）的船長，但在 1942 年 5 月 1 日，該船以及另外五艘日本貨輪和兩艘護航艦被美國「特里同號」核潛艇（*USS Triton*）發現，後者發射了兩枚魚雷，均擊中了位於船隊前端的「加爾各答丸」。緊接着，「特里同號」又向船隊中的另一艘貨船發射了兩枚魚雷，但均未命中。潛艇穿越到日本船隻的下方後，又向受損船隻發射了兩枚魚雷，一枚未能命中或未爆炸，而另一枚擊中並使船身斷裂，「加爾各答丸」隨即沉沒。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遭遇了兩次沉船事故之後，經田於 1942 年 9 月 9 日被任命為「里斯本丸」的船長，並於 9 月 15 日登船就職。

船上共計裝載了 1676 噸貨物，大部分貨物（包括銅、廢鐵、鉍礦、棉花、金砂^❶、鉛、鋁、錳礦、鎢和皮革）將運往旅程的第一站——大阪。然而，其中有 32 噸的貨物是要運往東京的、5 英吋的高爆彈（HE）。

二副荒木要（*Araki Kaname*）儘管因登革熱^❷而感到身體不適，但依然還是待在了駕駛艙裏。他於 1927 年加入日本郵船株式會社

❶ 儘管為戰爭罪審判而準備的貨物裝載圖中清楚地標明了金砂貨物，但在同一份文件中找到的打印貨物清單中並未提到這一點。在經田茂的審判中，他曾兩次暗示對貨物描述有誤，但具體是什麼錯誤始終沒有明確說明。

❷ 主要通過蚊蟲傳播的熱帶疾病，症狀為發燒和關節劇痛。——譯者註

(Nippon Yusen Kaisha)，此前曾在「竹山丸」(*Chikuzan Maru*)^❶擔任三副，現在是「里斯本丸」上 12 名軍官^❷之一。

這兩位經驗豐富的軍官在駕駛艙內注視着戰俘們登船。他們計劃將這些戰俘以及稍後登船的日本軍隊，連同大部分貨物一起運往大阪。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三點，接駁船不斷往返，將戰俘們運到這艘船上。

儘管經田可能不知道約翰·梅斯菲爾德的〈貨物〉(*Cargoes*)一詩，但對於大多數即將登船的戰俘而言，他們從學生時代起就對這些詞句很熟悉：

從遙遠的俄斐駛來的尼尼微大船，
划向巴勒斯坦陽光燦爛的故國港口，
船上滿載貨物，
有象牙、猩猩、孔雀，
有檀香木、雪松木和甘甜的白葡萄酒。
從巴拿馬地峽駛來的西班牙大帆船，
在熱帶長滿棕櫚的綠海岸間航行，
船上滿載貨物，

❶ 「竹山丸」於 1943 年在越南海域沉沒。該船於 1907 年在蘇格蘭利斯港建造，取名為「獵人號」(*Hunt*)，用於澳大利亞航線。1938 年，它被賣給了上海的馬士基公司 (A. P. Moller)，並更名為「阿里阿德涅·穆勒號」(*Ariadne Moller*)。該船恰巧在日軍入侵香港時被困於此，並於 1941 年 12 月 12 日自沉於港內，後又被日軍打撈並重新命名。

❷ 通常船上會有 11 名軍官，但因此次船上多了一名以乘客身份登船的二副，他在荒木生病期間接替了其職務。荒木於 9 月 30 日恢復工作。

有肉桂和葡萄牙金幣，
 有鑽石、黃玉、祖母綠和紫水晶。
 肮髒的英國渡輪，煙囪結滿了鹽，
 顛簸在狂暴三月的英吉利海峽沿岸，
 船上滿載貨物，
 有煤碳、鐵軌、鉛塊，
 有木柴、五金和廉價的馬口鐵餐盤。^❶

戰俘們從接駁船上抬頭望去，儘管這裏位於接近北回歸線的緯度，他們一定會認出「里斯本丸」就是日本版的「肮髒的英國渡輪」。

香港通信連的弗蘭克·貝內特（Frank Bennett）回憶道：「我們分組坐上接駁船，從軍官營區盡頭的一個小碼頭出發。當我們靠近時，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船首的炮。這引發了一場討論，關於這艘船是否可以被歸類為武裝商船，以及它是否能被直接擊沉。」

魚雷快艇的倖存者阿爾夫·「諾比」·亨特（Alf “Nobby” Hunt）在戰鬥中受了重傷，幾乎未及恢復^❷。他說：

我們登上一艘駁船，它把我們送到了「里斯本丸」。海軍被命令進入一號船頭貨艙，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皇家蘇格蘭軍團以及一些較小的部隊被安排在二號主貨艙，皇家炮兵團則進入駕駛室後方

❶ 採用鄒仲之譯本，暫未找到相關出版物，詳見：https://blog.sina.com.cn/s/blog_59f90d830101ndtb.html（2024年12月30日查看）。

❷ 事實上，諾比的「死訊」曾被通知給其父母。他的名字出現在樸次茅斯的海軍失蹤人員紀念碑上，但在寫作本文時，他仍然健在。

的三號貨艙。經過一番推推擠擠之後，我們發現一號貨艙已經擠滿了人，大約十幾名皇家海軍人員被安排進了二號貨艙。所有貨艙都有兩層，每層又都用粗糙的木頭分隔成兩層，以運輸最多的人。不幸的是，當我們被命令下艙時，只有船底龍骨的壓艙物上還有些許空間。壓艙物是一些雜亂堆放着的、裝滿沙子的粗麻袋，散發着腐爛蔬菜和尿液的惡臭。許多麻袋已經破裂，到處都能看到老鼠侵擾的痕跡。僅有的一點光來自於一個昏暗的燈泡和上方艙口透下來的光線。

皇家海軍看護士官華萊士·黑斯廷斯（Wallace Hastings）回憶道：

登船時，皇家海軍分遣隊被安排到了船頭艙，因為大家覺得他們能承受海上可能會出現的「搖晃顛簸」。對此我很怕遇到這種情況，因為即便是最輕微的波浪也會讓我暈船。我和一羣來自香港皇家海軍醫院以及添馬艦的看護官們在一起，還有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的海軍軍醫傑克遜上尉。我還記得的看護官名字包括：肯·巴格斯（Ken Baggs）、托馬斯·埃克爾斯頓（Thomas Eccleston）、托馬斯·麥克雷迪（Thomas McCready）、雷金納德·貝利（Reginald Bailey）^❶、諾曼·亨迪（Norman Hendy）、羅納德·豪森（Ronald Howson）、丹尼爾·劉易斯（Daniel Lewis）、艾倫·彭伯頓（Allen

❶ 貝利對險境並不陌生。在香港戰役期間，他因與惠特菲爾德中尉（英國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駕駛救護車前往黃泥涌峽救助傷員而受到表彰。

Pemberton)、格溫福·托馬斯 (Gwynfor Thomas)、約翰·艾利森 (John Allison)。我們下到貨艙後，在二層平台的左舷前部隔艙處找到了一個角落，就在那裏安頓下來。

終於，往返於船隻與碼頭之間的接駁船完成了運送任務，所有被選中的戰俘都登上了船。

包括英國皇家海軍、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 (HKRNVR)、商船隊、皇家海軍船塢警察和香港船塢防衛軍 (HKDDC) 在內的共計 362 人，都被安排擠到了一號貨艙，由 J. T. 波洛克 (J. T. Pollock) 中尉指揮。包括阿爾夫·亨特 (Alf Hunt) 在內的另外 17 名海軍人員則轉移到了二號貨艙。

英國皇家炮兵團和香港新加坡皇家炮兵團 (HKSRA) 的部分成員在「扎茲」·皮特 (“Zazz” Pitt) 少校的指揮下，被趕進了三號貨艙。但又出現了一些人根本無法擠進去的情況，因此，原本分配到這個貨艙的 380 人中，一部分人被轉到了二號貨艙。還有一小部分人員自發交換了艙室。

炮兵下士約翰·英格利斯 (John Inglis) 說：

作為一個蘇格蘭人，我一生中總是有各種各樣的預感，而一想到被困在那個地獄般的地方，我就感到十分噁心，心裏充滿了恐懼。我找到了兩個最要好的朋友約翰·「瑞普」·鮑文 (John “Ramp” Bowen) 和羅德尼·「吉迪」·吉登斯 (Rodney “Giddy” Giddons)，告訴他們我不想待在那裏，得儘快逃出去。儘管他們說如果我試圖逃出去，日本人就會殺了我。我回答說我願意冒這個

險，然後就走了。讓我備感欣慰的是，他們也跟了上來，一到甲板上我們就瘋狂地衝向了另一個貨艙。日本人正驅趕着那些不幸的戰俘們進入貨艙，四周充斥着尖叫聲和日本人的吼喝聲。我們對返回原貨艙的命令置若罔聞，幾乎是從梯子上摔落下去的。

他們當時還沒意識到，能離開戰俘們所在的三號貨艙（最靠船尾的貨艙）是多麼幸運。

最大的二號貨艙容納了 1075 人^❶，主要來自皇家蘇格蘭軍團第二營和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第一營。不過，這個船艙也安置了許多小股士兵，包括皇家工兵團（RE）、皇家通信兵團（RCS）、皇家陸軍軍醫隊（RAMC）、皇家陸軍軍需隊（RAOC）、皇家陸軍牙醫隊（RADC）、皇家陸軍補給與運輸勤務隊（RASC），以及被從一號和三號貨艙擠出來的船員和炮兵，甚至還有一些始終未能被轉移到赤柱平民拘留營^❷的不幸平民和警察。

貝內特所在的香港通信連便是這小股部隊之一：

我就是在這裏見到姪子萊斯·史密斯（Les Smith）的，他隸屬於皇家工兵團第 40 要塞連。我沒有時間和他寒暄，因為我們都被

❶ 具備基本數學能力並了解「里斯本丸」的讀者會注意到，這個 1834 人的總數略高於經常被引用的 1816 人（參見第 230 頁註釋 1），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名單不完整、對開船前撤離的病患人數不確定等等。

❷ 在最後時刻將香港義勇防衛軍（HKVDC）和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HKRNVR）徵召入伍，這讓平民與戰士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

帶着往前走，經由一個木製樓梯下到了貨艙裏。這個貨艙看起來又大又陰暗。依託着四面牆（在海軍術語裏這被稱之為「艙壁」）上搭建了一個兩層的平台，上面鋪着薄薄的草蓆。我們的貨艙裏有600人左右，每個人被分到大約18英吋的空間。我清楚地記得挨着自己的是來自樸次茅斯的巴斯蒂·菲普斯（Busty Phipps）。

這個貨艙由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第一營的指揮官「猴子」蒙克里夫·斯圖爾特（“Monkey” Moncreif Stewart）中校負責，他同時也是所有戰俘的總指揮官。

然而，正如皇家陸軍補給與運輸勤務隊豪威爾中尉所指出的那樣：

不能說斯圖爾特中校指揮着這1800名士兵，是他堪稱軍人楷模的風範及其領導的頑強撤退行動使他獲得了尊重。在1941年香港保衛戰期間，他率軍以一敵八，堅持抵抗長達一周之久，穿越了灣仔兩英里的廢墟。而真正的指揮官是一個殘酷無情的日本翻譯官新森——過去的九個月裏，他一直在戰俘營裏作威作福。^①

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馬丁·威登（Martin Weedon）上尉描述了二號貨艙的住宿條件：「（二號貨艙）被分為兩層，上層住着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皇家工兵團和皇家通信兵團的士兵，下層則住着皇家

① 豪威爾記述了這段沉船經歷，準備出版，該文本現由其女保管。本書所引用的豪威爾的言論均來自該文本。新森實際上並非指揮官，而是實際指揮者的代言人。

蘇格蘭軍團和皇家炮兵團的士兵……兩層之間的交流要藉助兩個木梯，從上層到甲板則架着三個梯子。」^❶

威登所在連隊的羅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注意到，至少在二號貨艙的上層，居住空間被粗糙的木板隔成了12英尺見方的「隔間」，每間大約能容納20人。在賴特的隔間裏，有亞瑟·艾爾斯（Arthur Iles）、「颱風」蓋爾（“Typhoon” Gale）、喬治·伊薩德（George Iszard）、威廉·斯蒂爾（William Steele）、弗蘭克·米金（Frank Meakin）、威廉·休斯（William Hughes）和理查德·蒂維（Richard Tivey）。旁邊的隔間住着患有腳氣病的人，包括威廉·鮑爾斯（William Bowles）、珀西·哈切特（Percy Hatchett）、沃爾特·海沃德（Walter Hayward）和托馬斯·戈爾曼（Thomas Gorman）。^❷ 在下層，士兵們只能在貨艙底部找地方睡覺。

三個貨艙的條件都差不多。艙內人滿為患，甲板下沒有任何廁所和盥洗設施。住在一號貨艙的羅斯·林納伯格（Ross Lynneberg）描述道：「由於空間所限，沒法讓所有人同時躺下，所以我們只能輪流休息，許多人因患腳氣病每次只能睡幾分鐘。」皇家蘇格蘭軍團的樂隊成員亞瑟·阿爾西（Arthur Alsey）在二號貨艙見到了類似

❶ 戰後，威登寫下了《天皇之客》（*Guest of an Emperor*）以記錄其經歷。本文中引用的威登言論均來自該文本。

❷ 這是某種未來的預兆：艾爾斯、休斯、蒂維、海沃德、哈切特、蓋爾和伊薩德都沒能在沉船中倖存下來。斯蒂爾雖然從殘骸中被救起，但因脊椎骨折在前往上海的途中死亡，米金也沒能活到年底，只有患腳氣病的鮑爾斯、戈爾曼和賴特本人活到了戰爭結束。（賴特的書實際上提到了「颱風塞爾」。然而，船上並沒有叫塞爾的人，後來他提到一個「蓋爾」。根據英軍取簡單綽號的傳統，這幾乎可以確定就是蓋爾。）

的情況：「到下午 3 點，已有 500 人擠到了下層貨艙，600 人擠到了上層貨艙。這裏沒有盥洗設施，頂層甲板上有 12 個廁所，四條小便管道。我們還被禁止斜靠在船邊。」^①

傑克·艾田蒲在三號船艙的經歷也好不到哪裏去：

我所能看到的就是一大羣人擠在一起，幸運的是我設法找到了足夠大的空間躺了下來。我剛安頓好自己，一個炮兵連士官長（BSM）就走過來說要我挪開，因為他想要那個位置。我拒絕了，他又命令我移開，我再次拒絕。兩個中士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告訴了他們，他們隨後告訴士官長大家都是戰俘，他必須另找位置。

由於不知道什麼時候起航，他們只能儘可能先安頓下來。然而，許多登船時看似「健康」的人，在船上擁擠、不潔的環境中開始出現一些令人擔憂的症狀。

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的吉姆·法拉斯說：

據估計，至少 75% 的被徵調士兵都患有某些疾病，其中被感染最多的是痢疾、白喉、腳氣病（濕性和乾性）、糙皮病，許多人還患有腹瀉和嚴重的皮膚病。由於食物不足和維生素缺乏，腳氣病和糙皮病最為明顯。在前者的病例中，士兵們的腳疼得厲害，很多人

① 阿爾西的日記現存於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本書中所引用阿爾西的言論均來自該文本。它是於 1966 年手寫的日記，但可能是根據一份褪色的原件抄錄的。

因此而失眠。須注意的是，直到船啟航的前一天，仍有人因疑似白喉被送回營地。

法拉斯的戰友亞瑟·埃文斯（Arthur Evans）說：

啟航前我們在船上待了兩天，在 26 日和 27 日的早晨，疑似白喉病患者仍被送回了營地。我們一上船就發現痢疾患者和其他病患須被隔離，而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們安置在鋼鐵甲板上。在各艙口之間能找到的任何空間都用上了，他們就躺在毯子上，下雨時就用防水布遮擋一下。

人們在停泊的船上比較平靜地度過了頭一晚。9 月 26 日早晨，船上的人醒來時看到的是一片風平浪靜的景象。

樂隊成員亞瑟·阿爾西（Arthur Alsey）回憶道：

睡得還不錯，6 點 30 分起牀，天氣涼爽宜人。我上午 9 點吃了半塊麵包和加糖的茶作為早飯，從 9 點 30 分到下午 2 點，我就一直待在甲板上，能看到日本人在廚房煎牛排、還能聞到所散發出的誘人香味。……晚上 8 點前所有人都得下到貨艙。沙羅克^①借來手風琴，帶着小伙子們唱歌。下層的熱氣令人窒息。我的腳一直疼到深夜。^②

① 皇家蘇格蘭軍團的下士哈羅德·沙羅克，他沒能在沉船事件中倖存下來。

② 阿爾夫患有乾性腳氣病，第二天他再次提到，「我的腳讓我整晚都睡不着覺」。

阿爾夫·亨特（Alf Hunt）說：「26日下午，大批日本士兵登上了船，佔據了貨艙的上層。大概是帶着即將回家的念頭，他們看起來都很精神，彼此間有說有笑。」^❶

這 778 名士兵都來自同一個日本軍營，指揮官杉山中尉將帶領他們返回日本，爾後繼續與盟軍作戰。^❷

這些人是「里斯本丸」的船長在等待的最後一批乘客。所有人都登船後，9月27日早上8點，船駛離香港。船上的人所思各異。對某些人來說，這似乎是個機會，因為日本的條件肯定不會比深水埗更糟吧？但另一些人即將離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無論那些婦孺是被拘禁在赤柱，還是在城市內「自由」地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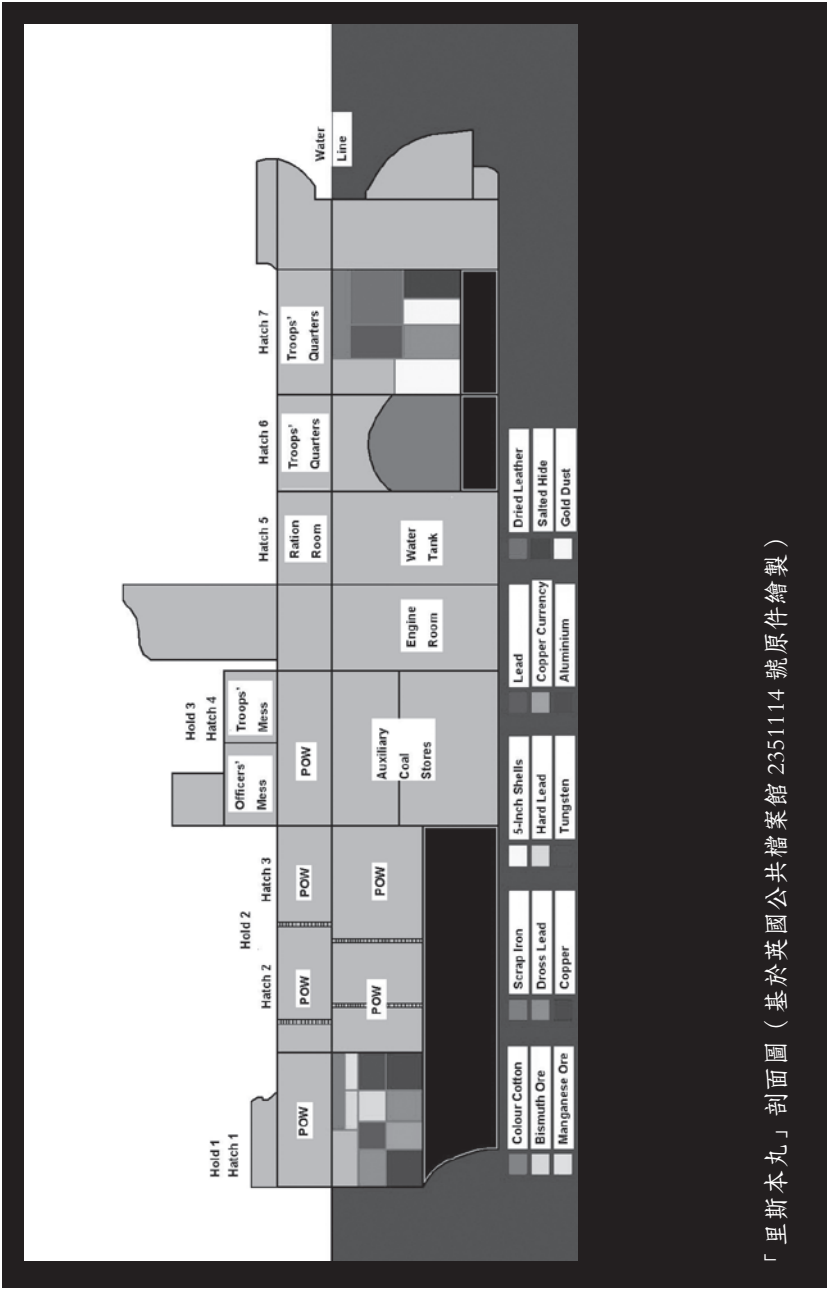
懷特說：「我們駛離香港時，獲准在甲板上待一個小時。那是一個烈日炎炎的下午，我發現自己站在戈爾斯頓先生^❸旁邊，他曾服役於香港警隊。起初我們都沒說話，當船駛過我們最後抵抗的陣地——赤柱半島時，我看到淚水順着這個男人的臉頰流了下來。」

來自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威廉·保爾特（William Poulter）也

❶ 日本士兵佔據了上層甲板的一部分，以及船尾方向的貨艙。豪威爾提到他們在「後部貨艙」，法拉斯（描述「里斯本丸」有四個貨艙）則稱他們在「駕駛艙後面的四號貨艙」，並補充道：「一些日本士兵被安置在四號貨艙的上半部分，軍官們則位於駕駛艙下面分配給他們的地方。」這完全正確，但或許將「四號貨艙」理解為第三貨艙更合適（即日本人在炮兵後面）。造成混淆的原因是第二貨艙有兩個艙口，我遵循的慣例是，第二貨艙是在二號和三號艙口下面的，第三貨艙是在四號艙口下面的。如「里斯本丸剖面圖」所示，在更靠後的位置還有其他幾個貨艙。

❷ 這可能是第 228 團的一個營，他們正在前往瓜達爾卡納爾島的途中。英軍戰俘似乎未與這些日本軍隊有任何交流，儘管戰俘中有幾人懂日語，但雙方好像始終被完全隔離開來。

❸ 這可能是香港警察湯姆·戈爾曼（Thomas Gorman）中士。



「里斯本丸」剖面圖（基於英國公共檔案館 2351114 號原件繪製）

在甲板上，他已經從手榴彈傷中恢復過來：「離開時我們都被允許到甲板上，看着這個港口，我心裏五味雜陳。我第一次來香港是在1927年，當時還是上海防衛部隊的一員。十年後，我帶着妻子和兒子一起回到這裏。至少他們（現在在澳大利亞很安全）沒有被捲入其中。」

吉姆·法拉斯說：「船離開香港時沒有護航，一路上幾乎一直保持在海岸線的視距範圍之內。途中唯一遇到的是一艘同向行駛的貨船，船上載着鐵路車廂。」

隨着香港那熟悉的天際線漸漸消逝於視野之外，戰俘們盡力適應起了新的環境。雖然海面上風平浪靜，但船上的條件遠算不得舒適。甲板上擠滿不堪，寒冷而骯髒。船上有四艘救生艇和六隻救生筏，貨艙裏還放着一堆木棉救生圈，但這些卻沒為他們帶來多少安慰。沒有人考慮到沉船時會用到救生圈，他們只是把它當作枕頭來用。

他們的早飯是米飯和茶，晚上是米飯、茶和「牛肉罐頭」（腌牛肉），後者多虧了「猴子」斯圖爾特，他在登船前用戰俘營的資金從日本人那裏買了些必需品。^❶

一些人幻想着美國海軍會像「阿爾特馬克號」事件那樣前來馳援。這個事件在急需好消息的盟軍中廣為流傳：一艘英國驅逐艦成功解救了約300名英國船員——他們被德國戰艦「斯佩海軍上將號」（*Graf Spee*）所俘，並被關押在德軍備用船「阿爾特馬克號」

❶ 在1946年的戰爭罪審判中，經田茂指出，他曾看到一名戰俘高級軍官在「里斯本丸」上通過翻譯新森與和田中尉談判。「我不清楚具體細節，但我想其中一個決定是向戰俘發放食物，讓他們自己煮。」

(*Altmark*) 上。這一成功給許多人帶來了希望。但北海的英國皇家海軍實力強大，皇家空軍也有能力在挪威約辛峽灣定位「阿爾特馬克號」，而且一旦救出了這些人，送他們回蘇格蘭的利斯也是咫尺間之事。然而在中國的南海和東海，情況卻大有不同。

這一渺茫的希望逐漸破滅，船上的人們隨之開始適應起海上的日常生活。早晨 6 點起牀，7 點點名，半小時後供應早餐（米飯和洋葱湯），接下來是自由時間。在昏暗的貨艙裏，士兵們玩起了骰子和跳棋。不少人堅持寫日記，或是傳閱船上少得可憐的幾本書，直到它們被翻得都破爛不堪。一些愛社交的人會去其他隔間串門，做點問答遊戲，賭點錢，還會在晚上唱唱歌。在一號艙，一等水兵比爾·迪林（Bill Deering）用口琴演奏為眾人助興，「魔鬼」巴特勒（“Bogey” Butler）則講起了故事。在三號艙，投彈手丹頓（Denton）在活躍着氣氛。像許多老兵一樣，二號艙的皇家通信兵團「道奇」·格林（“Dodger” Green）中士有着講不盡的葷段子，士兵們也樂在其中。^❶ 二等兵米奇·邁爾斯（Micky Myles）^❷ 偷偷將手風琴帶上了船，在工兵瓊斯的伴唱下，他為大家精彩地演奏了《翻滾在三葉草地上》（Roll me over in the clover）和《哈勒赫的男兒們》（Men of Harlech）。

傍晚 6 點進行了第二次點名，半小時後是晚餐時間（仍然是米飯和洋葱湯）。不過在最初兩天，「猴子」斯圖爾特儲存的腌牛肉和

❶ 有趣的是，除了格林外，所有這些「表演者」都活到了戰爭結束。

❷ 雖然斯普納和其他人把名字拼寫成“Miles”，但正式記錄顯示是“Myles”。

香煙讓伙食得到了補充。

甲板上只設有一個水龍頭，因此士兵們沒法好好洗滌，不過他們被允許每天給水壺灌兩次水。廁所是狹窄的木質便所，設置在甲板兩側，懸伸到海面上。起初，想使用廁所須向日本人請示，但很快日方就指派了一名英國士官負責管理這項不受歡迎的排隊工作。

弗蘭克·貝內特回憶說：「第一次去便所（benjo）^❶時（不管需不需要都得去），那搖搖欲墜的結構把我嚇壞了。那是個懸在船邊的架子，上面放着一個長寬為 4 英吋乘 2 英吋的木條，供人坐便。你只需坐在那塊木板上，背對大海，就可以隨意解手。我注意到甲板上堆着許多雞籠，還有很多日本士兵守在船尾。」

阿爾夫·亨特說：

獲准上廁所時，要爬到上層甲板是個大問題。要避免踩到其他人的身體，還要爬過兩個狹窄的扶梯或梯子，這些都相當危險。我們中那些自我感覺身體倍兒棒的人試圖把沙袋攤平，用我們僅有的一條毯子蓋住，但潮氣幾乎立刻就滲了進來。條件非常糟糕，實際上簡直堪稱嚴酷。大約有八九百名戰俘被擠進了主貨艙，那裏非常熱，空氣污濁，呼吸極其困難。那空間剛夠一個人舒服地坐着，要躺下那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把腿搭到別人身上。

雖然「猴子」斯圖爾特表面上保持着鎮定，但他明顯感受到了壓力，因其要對將近 2000 名士兵負責，而當時的環境讓他難以掌

❶ 日語中「廁所」的意思。

控眾人的命運。總是盡心竭力地為人着想讓他在士兵中獲得了極高的人望，這次他也謹慎地發放著帶上船的香煙存貨。他的存在本身便意味著權威。但當一名士兵企圖在發放香煙的隊伍中排兩次隊時（每人僅兩隻煙），他罕見地勃然大怒，並且在士兵們面前第一次罵出了髒話，這讓下屬們深感震驚。^❶ 壓力開始顯現出來，但直到後來人們才知道到它究竟有多大。

醫務人員懷疑有些士兵從一開始就是帶著白喉登船的，而現在病情終於爆發了。到 28 日，船上已有 12 例疑似病例。儘管在「里斯本丸」起航前，已將有症狀的患者送回深水埗，但後來還是有多達 200 人染上這種疾病。醫務人員奧菲瑟（Officer）、佩奇、林奇、傑克遜、艾倫·彭伯頓（Allen Pemberton）、哈里·佩勒姆（Harry Pelham）等人竭盡全力，想要在甲板上為病情最重的患者騰出些空間。

當船上的人們覺得疾病、食物短缺以及前往日本後不確定的未來最為堪憂之際，那些返回香港的人已意識到，他們最大的安全威脅可能會來自美國的潛艇。

這些人中包括皇家炮兵團 12 連的詹姆斯·帕特里克·穆利根（James Patrick Mulligan）。他是寧願在香港熙熙攘攘的街頭東躲西藏，也不願淪為戰俘的幾個士兵之一。在日軍實施真正的安檢工作之前，他就徑自從北角戰俘營逃了出來，現在在香港境內自由行事。

他的兒子接着講述此事說：

❶ 那個肇事者在戰爭中倖存下來。根據米德爾塞克斯軍團內部的傳統說法，他從那天起直到去世，再也沒有抽過煙。

在我父親得知戰俘們當時正處於被趕上「里斯本丸」的最後時刻時，他人在彌敦道上靠近一家英國軍官俱樂部的地方，一個年輕的中國女孩說出了這個出乎其意料的消息，他跟我詳細地講述了二人之間的對話。顯然，他不認識那個女孩，也不確定她是在告訴他實情還是在試探自己是否是個告密者。據說，在她離開後，他就跑到一個能看到此船之處，確認了它的確正在裝載戰俘，船上蒸汽機已然啟動，即將啟程。然後他去找了他的聯絡人，但那人似乎對這個最新消息毫無興趣。他暗示我說他的聯絡人是個「美國佬」，並且明確告訴我「美國佬無視了他的情報，結果這艘船被魚雷擊中了」。我還知道，戰後他在上海接受過美軍的盤問，從上海返回香港後，又接受了英軍敷衍了事的問詢。

他從未提到過英軍服務團（BAAG），我傾向於認為他對英軍感到失望，因此不願與他們共事，尤其不願與軍官階層打交道。他的故事總是關於如何獲得金錢、如何與「美國佬」交換情報，他最常講的一個故事是戰爭結束時「美國佬」給了他一大筆錢，並要求他留下。但他拒絕留下，把錢都送人了，更願意回英國去見那個與他在戰前一直通信的女孩，她最終成了我的母親。最近，他的一個兄弟告訴我，在英國待了幾年後，他後悔在戰爭結束時沒有把握好留在中國的機會。^①

同樣，當時獲准仍可在香港境內自由行事的香港醫務處主任司

① 穆利根最終逃到上海，在那裏一直等到戰爭結束。1999年，他在剛剛與當年收留他的中國姐妹重新取得聯繫後不久，便去世了。

徒永覺（Selwyn Selwyn-Clarke）說：

1942年9月，我得知將有近2000名戰俘從深水埗被運往日本的勞改營，在那裏幾乎沒有機會逃離。我曾看到日本船隻進入香港港口進行維修，受損之處必定是美國船隻或飛機造成的。於是，我覺得自己有責任設法通過我們的渠道將「里斯本丸」運輸戰俘的細節和起航日期傳送給美軍指揮部，以確保該船不會遭到攻擊。此前，我曾利用澳門祕密通訊渠道，傳遞了敦促國際紅十字會在香港設立代表機構的消息。這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嘗試通過同樣的途徑傳遞信息，但悲慘的是，此次沒能成功。無論是因為我的情報沒能及時送達正確的地方，還是因為其他某些錯誤，「里斯本丸」最終還是被擊沉了。^❶

然而，英軍服務團一直在密切關注着此事。這是香港義勇防衛軍（HKVDC）的賴廉士（Lindsay Ride）中校從深水埗戰俘營逃脫後建立起來的一個祕密組織。他曾是香港大學的教授，同時也指揮義勇軍的野戰救護隊。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年僅19歲的他便被派往法國），他沒費多少時間就和幾名夥伴從深水埗戰俘營逃了出來。他的目標是在華南地區建立一個軍事情報組織，與仍在營中的戰俘保持聯繫，並為其他逃亡者提供幫助。英軍服務團從小股隊伍起步，發展成了一支強大的力量。儘管在1942年

❶ 摘自其自傳《足跡》（*Footprints*）。司徒永覺是一個意志特別堅強的人。他堅持援助戰俘的行為讓他遭受了監禁和刑罰，這些傷害是他終生都未能完全康復的。

秋天還只是一個新生的組織，但它在香港有許多耳目，很快就獲取了戰俘運輸的相關消息。

9月12日，賴廉士首次收到了一艘船隻正運載着戰俘航行的消息。消息寫道：

這是9月10日祈德尊（Duggie）發來的51號報告。600名來自深水埗的戰俘已於3日或4日的夜晚被運往「東方太陽」之國，另有1000名戰俘被安排在月底運送。此信息的來源是您在16號便條中提到的收信人，以及我在15號信件中提到的那位。^①

大約兩周後，就在里斯本丸啟航前一天，他們的另一名特工給身在桂林的賴廉士發送了一條消息：

① 香港大學圖書館萊德檔案集。英軍服務團不被允許使用任何編碼設備，因此所有消息都必須明文發送。他們很快發展出了一套包含約100個代碼詞的基本系統〔如ALFS代表深水埗，Hbs（意為「嘶嘶作響的混蛋」）代表日本人，SEPTIC代表司徒永覺，KELLOG代表香港銀行等〕。當代碼詞不夠用時，就讀取單詞的首字母，或使用其他語言。這份通信的原始「編碼」內容如下：

RIDE KWEILIN

FIFTYONE DATED 10/9 STOP. ALFS VALUE SIX HUNDRED IN
NAVE AD SOLEM ORIENTEM NOCTE TRES OR QUATRE STOP
FURTHER CARGO VALUE ONE THOUSAND BEING ARRANGED
FOR MONTH END STOP SOURCE ADDRESSEE YOUR CHIT NUM-
BER SIXTEEN AND SUBJECT MY L/15 STOP
DUGGIE.

（註：KWEILIN現在拼寫作Guilin；Duggie是祈德尊（Douglas Clague）少校，他於1942—1943年間擔任英軍服務團惠州前線總部指揮官；16號便條的收件人是埃德蒙斯頓，當時他仍在新華酒店活動，後被日軍處決；L/15號文件提到的是司徒永覺。）

梅欽，重慶。致（中校）賴廉士。9月25日，64號特工證實了51號特工在9月10日的報告，稱600名戰俘將前往福爾摩沙^❶（現在的台灣，這是第一批運送），今天則有1200名戰俘被運往日本門司。^❷

因此，在中國並與世界各地保持着聯繫的英軍服務團，得知有一艘載有戰俘的船隻已在航路上，但在香港以外，無人知曉此船就是「里斯本丸」這一關鍵信息。於是，這艘船繼續航行，絲毫沒有意識到危險將至，也沒有任何盟軍潛艇知曉此船上運載着英國戰俘。

在接下來的三天裏（從9月28日到9月30日），船上的戰俘

❶ 此詞源自葡萄牙語“*Ilha Formosa*”，意為「美麗之島」，在1950年代前是歐美國家對台灣的主要稱呼。——譯者註

❷ 原文如下：

“MACHIN [Military Attache' CHINA] CHUNGKING FOR RIDE
QUOTE DOUGGIE SIXTYFOUR DATED 25/9 STOP CONFIRMA-
TION DUGGIE FIFTYONE DATED TENTH STOP REPORT SIX
HUNDRED POWS GOING QUOTE FREDDIE ORANGE ROB-
ERT MONKEY ORANGE SUGAR ACK UNQUOTE TWELVE
HUNDRED QUOTE MONKEY ORANGE JAMES EYE UN-
QUOTE ISLAND NEAR QUOTE JAMES ACK PUDDING ACK
NUTS UNQUOTE TODAY STOP IF IN DOUBT ABOVE SUB-
STANCE CONSULT ANY MAXIE SPARKER STOP UNQUOTE
OLSEN

2/Lieut.,

Kweilin
26.ix.42

for C.O., British Army Aid Group
37/2 Wen Woo Road”

文末提示如果看不懂密碼可以尋求無線電報務員的協助。64號特工是羅鴻瑞中士，他曾在香港義勇防衛軍第四連服役。

們感到愈發地飢餓和虛弱，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航程將會戛然而止。船長也因染上了登革熱而倒下，他已回到自己的艙室，只有必要時才會到駕駛艙去。即便是那時，他也不得不坐在藤椅上。

在一號貨艙的華萊士·黑斯廷斯（Wallace Hastings）抱怨道：「接下來幾天的大部分時間裏我們都待在甲板下面，沒有任何活動，大家只是聊天、睡覺，還有猜測我們在日本會有怎樣的未來。只有在獲准上廁所時，才能上到甲板。」

賴特把情況描述得更糟：

那些得了腳氣病的人晚上無法入睡。他們因痛苦而呻吟哭泣，不停地來回走動以緩解疼痛。他們用手抓着那破爛易折的木欄杆（這是他們與下方深不見底的船艙之間唯一的分隔），一邊向上帝祈求，一邊呼喚着自己的母親。他們像幽靈一樣游蕩，激起了大家的憤怒、抱怨與憐憫，我們為此而徹夜難眠。直到天快亮時，他們才結束了這段折磨，精疲力盡地睡去。

然而，即便到了9月29日，正如其中一位腳氣病患者阿爾西所描述的那樣，人們仍在設法自娛自樂：

我讀了一本短篇小說集，並用它換來了《靜靜的頓河》（*And Quiet Flows the Don*）。^❶ 布朗迪、阿爾夫、沙羅克和赫克托參加了米奇·邁爾斯（Micky Myles）贊助的音樂會，他給表演者們分別發

❶ 有人聲稱船上只有一本書，但阿爾西也記得讀過《我控訴》（*J' Accuse*）。

放了十包、六包、四包和兩包香煙以為獎勵。真是聽不下去。布朗迪以《黃昏之歌》(*Just a song at Twilight*) 獲得一等獎。我和赫克托聊天到晚上 10 點，雙腳疼得我徹夜難眠，艙內昏暗無光。

第二天，他繼續寫道：

開始下起雨來，艙蓋被蓋上了。白喉患者被用防水布蓋着留在了甲板上。風很大，天氣很冷。有米飯、腌牛肉、一勺蔬菜和茶。艙內一片漆黑、悶熱難耐。赫克托開始向我講述了那段讓他獲得了姻緣的情事，他妻子曾在貝辛斯托克的一家精神病院住了六個月，之後才回到家中。這對婚姻來說真是一次考驗。

然而，也有人已經預感到了即將到來的災難。

豪威爾中尉說：

有意思的是，有時真的會一語成讖。9 月 30 日的晚上，我們躺在二號貨艙裏的日式草蓆上，一根帆布通風管勉強為這個擁擠的艙室送來一絲空氣。我們有些許不祥地討論起了船難。我談到，在過去 30 多年的生命中自己已經歷過兩次這樣的災難：第一次是和女朋友（現在是我的妻子）一起坐度假遊輪時，我們的船在離長崎不遠處撞上了一塊未被標記的巖石（多年後我親眼目睹了這座城市被原子彈轟炸，那地方離我最後被關押的戰俘營只有幾英里）；第二次是我隨橄欖球隊前往上海時，一艘橫衝直撞的船在漆黑一片的吳淞口附近撞壞了我們的船尾。上校冷冷地說了句「事不過三」。他

還補充道，如果我們走「之」字形航線還會遇到麻煩，出事了找我。

等待他們的確實是難以逃避的困境。一艘在月夜的海浪中無人察覺的低矮灰色船艇正在水中悄然潛行，它在幾小時的航程前方張開了羅網。

五、那艘潛艇：鱸魚號

我們看見莊嚴的王船絲毫無恙明明白白在我們的眼前；
我們的船長一面看着它，
一面手舞足蹈。

——《暴風雨》，第五幕，第一場^❶

在 1942 年的太平洋戰場上，潛艇被盟軍寄予了厚望，因為當時幾乎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在 1941 年底和 1942 年的太平洋戰爭中，盟軍的海軍損失驚人。英國皇家海軍在馬來亞海域損失了「反擊號」和「威爾士親王號」〔以及許多其他小型船隻，包括駐香港的「珊奈特號」（HMS *Thanet*）〕^❷。更糟糕的是，他們還失去了香港和新加坡的海軍港口設施。在珍珠港，美軍徹底失去了「亞利桑那號」和「俄克拉荷馬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 年，第 370 頁。——譯者註

❷ 「珊奈特號」在日軍發動襲擊大約 12 小時之後的 1941 年 12 月 8 日逃離香港。

號」(Oklahoma)兩艘戰列艦，「西弗吉尼亞號」(West Virginia)、
「內華達號」(Nevada)、「加利福尼亞號」(California)、「馬里蘭
號」(Maryland)、「田納西號」(Tennessee)、和「賓夕法尼亞號」
(Pennsylvania)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損壞。美國還失去了輕型巡
洋艦、驅逐艦、改裝的戰列艦「猶他號」(Utah)、各類小型艦艇以
及近 200 架飛機，但他們至少保住了港口設施，這有着巨大的戰略
價值。

從長遠來看，至關重要的是，美國太平洋艦隊的三艘航空母艦
「列克星敦號」(Lexington)、「企業號」(Enterprise)和「薩拉托加
號」(Saratoga)，當時並不在珍珠港，得以倖免於難。然而，由於
這些損失，加上需要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投入大量海軍力量以對抗歐
洲戰區的德軍，^❶在 1942 年的太平洋戰場上，幾乎只有潛艇可用於進
攻作戰。

二戰期間，美國艦隊潛艇的標準型號是貓鯊級 (Gato class)，
以及之後的巴勞鱗級 (Balao class)。1940 年，第一批建成六艘貓
鯊級潛艇（編號 SS-212 至 SS-217），隨後又建造了 67 艘（編號
SS-218 至 SS-284）。^❷

在最初一批的六艘潛艇中，「鱸魚號」(USS Grouper, SS-214)

❶ 英國皇家海軍在歐洲戰區的損失也不輕，其中包括了艦隊的驕傲——
「胡德號」(Hood) 戰列巡洋艦。

❷ 巴勞鱗級潛艇的編號為 285-416。現存的四艘貓鯊級潛艇包括：USS *Silversides* SS236（密歇根州馬斯基根）、USS *Drum* SS228（阿拉巴馬州莫比爾）、USS *Cobia* SS245（威斯康星州馬尼托沃克）、USS *Cod* SS224（俄亥俄州克利夫蘭）。

是一艘較大的潛艇。它的長度超過 300 英尺，寬度達到 27 英尺，水下航速為 9 節，水面航速則可達 22 節。它的船員由 60 名軍官和士兵組成，能夠攜帶 24 枚魚雷和一門 3 英吋艦炮，最大航程可達 11000 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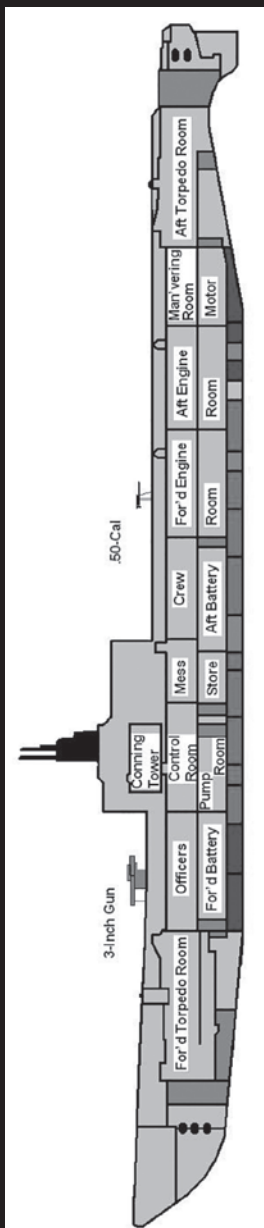
「鱸魚號」由電船公司（Electric Boat Company）建造於康涅狄格州的格羅頓，並於香港投降的兩個月前——1941 年 10 月 27 日下水。1942 年 2 月 12 日它在新倫敦正式服役，由克拉倫·杜克（Claren Duke）中校擔任指揮官，其他軍官包括克洛斯（Close）中尉、J. R. 戴克馬（J. R. Dykema）少尉、小愛德華·霍爾特（Edward R. Holt, Jr.）中尉、J. D. 梅森（J. D. Mason）中尉和 W. 溫特（W. Winter）中校。

在長島海峽完成試航後，「鱸魚號」於 1942 年 3 月 30 日啟程前往珍珠港，加入了後來對日本艦隊造成重創的太平洋潛艇部隊。1942 年 4 月 28 日，A. W. 韋弗（A. W. Weaver）中尉在珍珠港成為了該潛艇的一員。

「鱸魚號」隸屬於第七特遣部隊的中途島巡邏組，與「抹香鯨號」（*Cachalot*）、「墨魚號」（*Cuttlefish*）、「海豚號」（*Dolphin*）、「飛魚號」（*Flying Fish*）、「貓鯊號」（*Gato*）、「河鱒號」（*Grayling*）、「長尾鱈號」（*Grenadier*）、「白楊魚號」（*Gudgeon*）、「鸚鵡螺號」（*Nautilus*）、「河豚號」（*Tambor*）和「鱒魚號」（*Trout*）等潛艇一同執行任務。無論是「鱸魚號」上的潛艇兵們，還是傑克·艾田蒲（Jack Etienne）及其同事們，都未曾料到命運即將安排他們不期而遇。

1942 年 6 月 4 日早晨，「鱸魚號」接到第七特遣部隊司令（CTF-

美國海軍 SS-214「鱷魚號」
潛艇（來自 SUBNET、J. 克
里斯利與 R. 斯明基聯合
提供）



「鱷魚號」潛艇剖面圖

7) ①發來的電報，報告了在一支正駛往夏威夷的日軍主力攻擊部隊中航母編隊的位置。剛抵達中途島的「鱸魚號」隨即潛入島嶼附近的深藍色海域之中，開始了其第一次戰時巡航。②

「鱸魚號」保持潛航狀態，以 6 節的速度前進，並調整航向準備攔截這些航母。7 點 26 分，潛艇魚雷進入戰鬥崗位。五分鐘後，它觀測到海平線上出現了大量飛機——機羣顯然正在從航母上起飛。戰鬥已經打響，空中遍佈戰鬥機纏鬥的身影。「鱸魚號」仍然保持着潛望鏡深度航行，並監視到一架日本戰鬥機正在接近，用機槍和加農炮對他們發起掃射。炮彈爆炸時擊中了潛艇指揮塔附近的海面，於是指揮官杜克下令緊急潛水。從 9 點 17 分開始，船員們聽到了十餘次爆炸聲，這是「鱸魚號」第一次遭受深水炸彈攻擊，但在它漫長而複雜的服役期中絕非最後一次。

在繼續搜尋航母的過程中，「鱸魚號」不斷對海域進行掃視。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內，它遭到了深水炸彈的持續攻擊。11 點 40 分，當它重新上浮至潛望鏡深度時，發現大約十海里外兩艘起火的船隻冒出的煙柱。「鱸魚號」船員認為這些船隻可能就是之前發現

① CTF-7 指的是羅伯特·H. 英格利什（Robert H. English）海軍少將，中途島巡邏組是 7.1 特遣隊。關於「鱸魚號」及其巡航的所有細節均來自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保存的航行日誌，縮微膠片編號 357，可以國家檔案館縮微膠片出版物第 M1752 號進行查閱。

② 杜克在 1972 年 3 月 30 日寫給克萊·布萊爾（Clay Blair）的信中說：「我曾在弗倫奇弗里蓋特沙洲執行過一次為期約兩周的絕密巡航任務，目的是攔截並摧毀一艘日本潛艇，這次任務在中途島終止。」雖然「鱸魚號」的第一次戰鬥巡邏日誌始於 6 月 4 日的中途島，但「所有觀測到的飛機描述」則始於 5 月 11 日，地點是「珍珠港西南 100 海里處」，從 5 月 14 日開始，地點才是「弗倫奇弗里蓋特沙洲」。

的航母，隨即調整航向試圖攔截，並再次下潛以躲避更多深水炸彈的攻擊。

在接近航母之前（大約下午 1 點過後），船員們聽到了幾次巨大的爆炸聲，於是再次改變航向以避開該區域。他們認為自己也許高估了與第一艘燃燒船隻的距離，此時潛艇很可能已經身處那艘燃燒中的航母下方，而它隨時可能沉沒並壓在艇上。當重新上浮到潛望鏡深度後，「鱸魚號」收到了來自第七特遣部隊司令的另一條命令，要求它前往距離中途島 100 海里處的地點進行巡航。

在中途島，當時的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Garfield Kvalheim）已不再負責操作岸基站的鍋爐，相反，他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將身處激戰環境之中。加菲爾德於 1917 年 10 月 1 日出生在華盛頓州塔科馬市，他是挪威移民的兒子。他的母親在塔科馬一家高檔女裝店做裁縫，父親則是一名主要在阿拉斯加附近寒冷海域作業的漁民。在大蕭條時期長大的他，少年時曾在一家甜甜圈公司打工，每周只能掙到一美元。儘管如此，加菲爾德依然有一顆愛冒險的、年輕的心。有一天，他留下一張「我要離職去釣魚了」的便條，便放棄了他在油炸食品行業的美好事業。

每年夏天，部分美國海軍的艦隊會停泊在塔科馬港，並向遊客開放。年輕的克瓦赫海姆便是其中的一位參觀者，他被這些艦艇的魅力所吸引，並渴望去看看這個世界。1935 年 12 月，他應徵入伍，在一艘油輪上服役直到 1939 年 12 月。因為厭倦了重複的工作，他決定離開海軍，到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然而，儘管經濟正在好轉，美國仍然處於大蕭條之中，求職不易。

克瓦赫海姆回憶道：

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平民聯繫到我，說他正在為皇家加拿大空軍招募志願者（當時英國正處於戰爭之中）。我毫不猶豫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因為我一直夢想成為一名飛行員。我被送到加拿大多倫多接受飛行訓練，但由於左耳鼓膜上有疤痕組織而被淘汰。之後又把我派往安大略省溫莎市的機身維修學校。我去找空軍中校說明了我是為飛行訓練才來當志願者的，並請求退役。得到的回答卻是「我們正在打仗，不可能准許退役」。長話短說，我離開了加拿大，回到美國，並重新加入了美國海軍。^❶

到 1941 年 9 月，他被分配到珍珠港的改裝戰列艦「猶他號」上服役。但他並不喜歡這艘老舊而龐大的艦艇，於是自願申請調往潛艇部隊。^❷1941 年 11 月底，克瓦赫海姆被調往加利福尼亞州山羊島接收站進行體檢（和所有美國潛艇兵一樣，還要接受精神科醫生的深入面談）。不久後，他再次被調職，這次是去潛艇部隊。

到 1942 年 2 月，克瓦赫海姆被分配到老舊的 S-28 潛艇上。他

❶ 他繼續說道：「我寫信給加拿大皇家空軍解釋了我的行為。然而，他們回覆說我被列為逃兵了。一切應該都已得到原諒了，因為戰後我收到了一張在加拿大皇家空軍服役的戰時獎金支票。」加爾的確在戰後成了一名技術高超的私人飛行員。

❷ 這是一個明智之舉，因為「猶他號」（一艘始建於 1909 年的戰列艦，後被改裝成美國海軍訓練靶艦）幾周後就在珍珠港沉沒了。該艦的殘骸和 60 名船員的遺骸至今仍在夏威夷海域，而遊客們主要會前往著名的「亞利桑那號」紀念館，使得這段歷史大多被遺忘。

回憶說：

我記得艇長是 J. D. 克勞利 (J. D. Crowley) (我們都叫他布萊艇長)。在 28 號潛艇上，我是機艙的二級機械師，潛航作業時我負責操控尾舵板……要成為一名優秀的潛艇艇員，必須具備與他人和諧相處的能力，擁有健全的心智與出色的體能。珍珠港事件後，每個人都「幹勁十足」，想出海擊沉那些日本人。特別是中途島戰役之後，我們從未想過盟軍會輸掉這場戰爭。

之後，美國海軍又明智地再次調動了克瓦赫海姆的職位。這次至少他被分配到了更符合他冒險天性的地方——駐紮在夏威夷的潛艇補給艦「富爾頓號」(USS *Fulton*) 上。

6 月 4 日，在「鱸魚號」(USS *Grouper*) 潛艇已出發赴戰時，克瓦赫海姆在「富爾頓號」上度過了尋常的一天。自 3 月中旬以來，該艦一直停泊在珍珠港潛艇基地的 S-1 碼頭。當晚，他和其他輪休的船員一起觀看了電影《約克軍曹》(*Sergeant York*)。影片放映到一半，大約晚上 8 點 15 分，振耳欲聾的警報聲驟然響起。他們接到命令，必須立即啟航。

在「布里斯號」(USS *Breese*) 和「艾倫號」(USS *Allen*) 的護航下，「富爾頓號」兩小時之內便駛離了珍珠港。船上的人當時還不知道，日軍已用炸彈和魚雷重創了「約克敦號」(*Yorktown*) 航母，由於面臨沉船的危險，艦長已下令全員棄艦。當救援部隊趕往現場時，大多數船員已身在水中，「波特蘭號」(*Portland*) 和「拉塞爾號」(*Russell*) 巡洋艦正在將大部分人員從海中救起。「富爾頓號」

的任務是將這些獲救船員從巡洋艦上接走，並送回珍珠港。

6月6日中午，在與幾艘大型灰色軍艦會合後，「富爾頓號」以8節的速度與「波特蘭號」並排疾行，利用兩船間架設的高空鋼索，將「約克敦號」的倖存者用煤袋轉運過來。「富爾頓號」上所有休班的船員都參與了救援行動，那些未受傷的「約克敦號」倖存者在上船後，也加入救助隊伍。

就在他們設法將鋼索架到「拉塞爾號」上以便繼續轉運時，護航的「艾倫號」報告發現了潛艇。警覺的軍官們立即命令用消防斧砍斷所有鋼索，分開了兩艘艦艇。

當天晚上，「富爾頓號」放下小船，將最後一批倖存者接上船。它本就不是一艘大船，此刻卻湧入了1891名「約克敦號」的倖存者。

在巡洋艦返回戰場的同時，「富爾頓號」則調轉航向，駛向珍珠港。全船官兵竭盡全力照料倖存者，醫務人員和廚房工作人員晝夜不停地工作，直到6月8日下午駛抵珍珠港。克瓦赫海姆回憶說：「我記得我和分遣隊的其他人一樣，把自己的鋪位讓給了倖存者。（救援行動）主要是由『富爾頓號』的船員們完成，我們分遣隊的人則在需要時提供協助。」

在克瓦赫海姆隨「富爾頓號」停靠珍珠港一天後，6月9日「鱸魚號」潛艇返回中途島補充燃料、補給物資。之後，它在吐噶喇羣島、寶島^❶和橫當島之間航行，最後幾天則在台灣海峽至日本的航運線上巡航。

一個月以來一切太平，但7月6日的17點41分，「鱸魚號」在

❶ 雖然現在通常寫作“Tokara”，但日誌中實際使用的是“Takara”。

14000 碼的距離上發現了一艘 8000 噸的貨輪，並從船頭向該船連續發射了三枚魚雷。由於沒有觀察到爆炸，18 點 07 分它又發射了三枚魚雷，這次全部中的。之後由於沒接到進一步的指示，「鱸魚號」的巡航任務便告一段落。它於 7 月 30 日經由中途島返回了珍珠港。

在那裏，「鱸魚號」及其船員們享受了四周相對平靜的時光，隨後將再次投入戰鬥。他們還迎來了一位新的指揮官羅布·羅伊·麥格雷戈（Rob Roy McGregor）少校。

麥格雷戈出身於一個海軍世家。他 1907 年生於西雅圖，1925 年被美國海軍學院錄取。在海軍學院期間，他作為學員參與了長曲棍球和橄欖球比賽，還是摔跤隊的成員。1929 年畢業後，他先後在「懷俄明號」（*Wyoming*）和「阿肯色號」（*Arkansas*）戰列艦服役，之後轉任於驅逐艦「柴爾德斯號」（*Childs*）。1932 年，他進入康涅狄格州新倫敦的潛艇學校，在三艘潛艇上服役後，於 1938 年首次擔任 S-36 號潛艇指揮官。麥格雷戈曾在亞洲艦隊服役至 1940 年 11 月，返回美國後，又被重新任命為 S-1 號潛艇指揮官，直至接管「鱸魚號」。

在帶領船員展開第二次戰時巡航之前，他沒有太多時間去了解自己的軍官們。

「鱸魚號」的副指揮官兼領航員小威廉·溫特（William Winter, Jr.）少校於 1910 年 6 月出生，他在 18 歲生日那天入伍，1932 年從美國海軍學院畢業，比麥格雷戈晚了三年。

第一副官軍官約翰·丹寧·梅森（John Denning Mason）中尉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沙勒羅瓦，於 1938 年畢業於海軍學院。在派往

潛艇學校之前，他曾在「新墨西哥號」(*New Mexcio*)戰列艦上服役。之後，他又先後被編入 S-44 號潛艇和「鱸魚號」潛艇。

電氣工程官羅伯特·漢密爾頓·「瘦子」·克羅斯(Robert Hamilton “Boney” Close)中尉出生於紐約州芒特弗農，比麥格雷戈小六歲。1934 年他從海軍學院畢業之後，在「康科德號」(*Concord*)輕型巡洋艦服役至 1937 年底。離開「康科德號」後，他進入潛艇學校學習，並分別在 S-30 號和 R-11 號潛艇上服役，最終加入「鱸魚號」。

炮術官小愛德華·羅威爾·霍爾特(Edward Rowell Holt, Jr.)中尉 1915 年 7 月出生於北卡羅來納州希科里。1939 年，他畢業於美國海軍學院，隨後在「亞利桑那」(*Arizona*)號和「庫欣號」(*Cushing*)服役，之後進入潛艇學校學習，畢業後直接被派往「鱸魚號」。

海軍中尉艾伯特·W. 韋弗(Albert W. Weaver)，作為志願預備役甲板軍官〔D-V (G)〕，擔任供應與行政、電氣與工程助理(S&A)。^❶他於 1915 年 6 月出生，並在 1940 年 11 月加入美國海軍。

最後是海軍少尉^❷約翰·R. 戴克馬(John R. Dykema)，同樣作為志願預備役甲板軍官，擔任通訊官和第一副官助理職務。他出生於 1918 年 6 月，並於 1941 年 10 月加入美國海軍。

❶ D-V(G) 在海軍預備役登記冊中被列為海軍預備役軍官的一類——志願預備役(普通服役)。「D-V(G) 指甲板軍官，包括委任軍官和準尉軍官，比如水手長、炮長和魚雷手，他們具備在海上或陸地執行一般任務的資格。」“S&A, Asst. Elec & Eng.” 這個術語連海軍歷史中心都難以準確翻譯，但他們推測最可能指的是「供應與行政、電氣與工程助理」。

❷ 海軍少尉是海軍中尉(Lieutenant Junior Grade)和準尉長(Chief Warrant Officer)之間的軍銜。

在接替「鱸魚號」原艦長克拉倫·E. 杜克（Claren E. Duke）的職位後，麥格雷戈發現艇上士氣低迷。「瘦子」克洛斯在一封戰後的信中如此描述杜克：

我在「鱸魚號」上的第一任艦長是克拉倫·杜克。他在和平時期是一位卓越而成功的潛艇指揮官。我覺得，如果不是和平與戰爭的轉變過於突然和劇烈，他本可以成為一名傑出的戰時指揮官。

然而，「鱸魚號」首次巡航報告的官方總結指出：「由於指揮官多次選擇規避而非主動進攻，因此錯失了許多重創敵軍的良機。」克瓦赫海姆回憶說：

我記得杜克非常嚴厲，根本不受大家歡迎。在那次航程中，可能出現了杜克不願接近目標的情況。在查看了其指揮期間的巡航報告後，我發現導致士氣問題的原因不止一個，主要原因是戰爭初期困擾大多數潛艇的問題——MK14 型魚雷的引信存在故障。太平洋潛艇司令部的報告認為這是由於射擊技術差，但事實並非如此。^❶

❶ 潛艇歷史學家克萊·布萊爾（Clay Blair）認為，英格利什（指揮第七特遣部隊）因杜克能力上的某些問題而解除了他的指揮權，這一點是很清楚的。然而，杜克在其下一個任命——擔任「賓夕法尼亞號」戰列艦的領航官與戰術官期間，獲得了銅星勳章與金星勳章。他的個人檔案在「賓夕法尼亞號」於沖繩遭魚雷襲擊時被銷毀，而後期的檔案也在1956年佛羅里達風暴淹沒其房屋時被毀。杜克前妻所生的子女年幼時就去世了。第112頁註釋1提供了有關Mark 14型魚雷的詳細信息。

麥格雷戈在7月底寫下了他的第一篇艦艇日誌：^①

1942年7月30日，結束第一次戰時巡邏，抵達珍珠港。
1942年7月31日，由潛艇基地、海軍船廠和補給維修艦隊開始檢修工作。主要任務是由海軍船廠為1號潛望鏡安裝並鏟削新軸承。1942年8月23日，「鱷魚號」完成出海準備。未進行去磁或消磁作業。^②1942年8月24日至26日進入訓練期。

8月28日09:00（VW時區）

從珍珠港潛艇基地起航，經由中途島前往指定區域，由「利奇菲爾德號」^③護航。在航行中校準了無線電測向儀（RDF）。護航艦投放了三枚訓練用深水炸彈，距離分別為275、300、350碼，並於傍晚時解除護航任務。

當富爾頓號從珍珠港返回中途島時，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被調派到正在此地補充燃料的「鱷魚號」潛艇。作為該船新的機工中士，他被分配到後部機艙。不久，克瓦赫海姆就迎來了自己第一次真正的戰時潛艇巡航任務，這也是「鱷魚號」的第二次巡航。9月1

① 美國國家檔案與記錄管理局（NARA）：國家檔案館縮微膠片出版物，說明手冊；編號為M 1752。

② 為了保護潛艇免受磁性引爆彈藥的威脅，常規的程序是通過在外部線圈中通入強電流來降低潛艇的永久磁場（消磁）。

③ 「利奇菲爾德號」（U.S.S. *LITCHFIELD*）是珍珠港潛艇部隊第4潛艇中隊的旗艦。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該艦的職責包括護送潛艇進出港口。它在戰爭中倖存下來，並於1946年被拆解。

日，「鱸魚號」抵達中途島並於當天啟程。

9月1日 08:00 (W 時區)

抵達中途島。有水面和空中力量的護航。補充燃料和淡水。「富爾頓號」更換了2號主壓載艙中負壓艙排氣管道上的法蘭^❶墊圈，於16:00 (W 時區) 在水面和空中力量的護航下離開中途島。傍晚，護航隊解散。

在接下來的近三周時間裏，幾乎無事可記。「鱸魚號」加入了第七特遣部隊的進攻巡航隊，與「墨魚號」、「飛魚號」、「黑線鱈號」(Haddock)、「獨角鯨號」(Narwhal)、「鯧鰾號」(Pompano)、「銀漢魚號」(Silversides) 潛艇共同行動。新艦長和船員們在前往巡航區的途中適應了各自的崗位。

9月15日 02:20

離開中途島12天後抵達巡邏區，航程平靜無事。9月4日，使用點50口徑機槍和3英吋炮向自製靶標發射了十枚炮彈。除了結構測試的發射外，這是首次實彈射擊，效果良好。途中發現八處漁民的燈光，但都未對航程構成干擾。9月9日，在距離小笠原羣島的父島305海里處，雷達在八海里外探測到目標。此後，白天都在水下航行，天空陰沉，相信未被敵方發現。全程全員每天都進行了全面的訓練。

❶ 「法蘭」是軸與軸之間相互連接的零件，用於管端之間的連接。——譯者註

9月17日 20:00

在男女羣島^❶以東約十海里處的部分海域執行首次巡航任務。該海域在先前的巡航中報告過遇敵情況，並且可能是在能登至佐世保的航線上。我們發現了一艘約 3000 噸的油輪，距離 9000 碼，目標位於左舷 40 度。由於暴雨即將遮蔽目標，立即發起了夜間水面攻擊。在 1500 碼處發射了一枚魚雷（望遠鏡全景可見），但未命中。在魚雷預計穿越其航線時，目標進入了暴雨區，隨後魚雷以 9 節速度（與目標估計速度相同）保持與目標平行的航向。當時，聽到目標方向傳來爆炸聲，類似 4 英吋艦炮的聲音。暴雨之中，潛艇的能見度為零。繼續追蹤目標一小時後，因天氣無好轉跡象而放棄追擊。

9月18日 10:04

夜間移動至男女羣島以西的新位置。發現一艘約 3000 噸的客貨船，距離 10000 碼，目標位於左舷 80 度。以常規方式高速接近目標，聲吶測距未果。於是，在 2000 碼處發射三枚魚雷，分別偏移 0 度、左 1.5 度、右 1.5 度，均未命中。目標三分鐘後轉向逃離。該船煙囪異常高且吃水淺，無法確認其身份。決定沿其可能的貿易航線前往中國沿海，擬轉往長江口海域進行巡弋，因當前區域行蹤已暴露，此時正是良機。

❶ 日本西南端附近的一座小島。

「鱸魚號」蹲守於長江口外、上海以東約 100 英里處的北馬鞍山島附近。這一海域在過去與現在都遍佈島嶼，歷來就是一個航運密集的区域，這裏有進出上海的漁船和貨船。

然後，9 月 20 日當天，「鱸魚號」在下潛巡航時，發現了一艘約 5000 噸的日本貨船，耐心等待月落之後再發起攻擊。凌晨 3 點 15 分，潛艇開始接近目標，發射了一枚魚雷，直接命中了船體中部，導致商船從中間斷裂開來。在 5 分鐘的時間裏，只有船頭和船尾尚可見；還不到半小時，這艘船就完全消失於海浪之下。^❶

四天後的 9 月 24 日，潛艇轉向了上海方向。9 月 27 日，它重返北馬鞍山島附近的巡航區域，在七海里的距離內發現了另一艘船。該目標正在進行之字形航行，難以靠近。「鱸魚號」始終無法靠近到 5000 碼範圍以內，加上當時皓月當空、晴朗無雲，無法發動攻擊。

因以上因素之存在而感到懊惱的「鱸魚號」，帶着重新燃起的信念繼續巡航。9 月 30 日夜晚，麥格雷戈決定在其任務區域最靠西南角的地方巡邏。他們計劃在中街山列島的西南方向守候，看是否能攔截從南方（即從香港方向）駛往上海的船隻。

此時，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正在昏暗而幽閉的控制室裏。控制室是潛艇的心臟和大腦。船首和船尾的舵手在這裏協同工作以控制潛艇的下潛深度，他們操縱着控制室中央左舷的兩個大銅輪（以及輪盤之間的兩個小型手柄），通過觀察深度錶和角度錶來判斷潛

❶ 雖然「鱸魚號」的航行日誌並未試圖確認這艘船的身份，但戰後它通常被記錄為「利根丸」（*Tone Maru*）。然而，這種認定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後續將進一步探討。

艇的姿態和位置。

克瓦赫海姆的工作是通過各個水艙和海水之間的泵水、排水，保持潛艇處於水平狀態並控制其總體重量。控制室的平衡歧管是監控和管理這些水量轉移的裝置。平衡泵位於平衡歧管的艙室下部，通過它將適量的水在水艙之間轉移。負責平衡歧管的人員需要通過儀錶評估每個水艙內的水量（以千磅為單位），而平衡歧管本身則控制着水艙之間的連接方式，以便適當調節重量。

克瓦赫海姆說：「在日本本土水域操作潛艇的感覺真好。我們有任務要完成，顯然我們幹得不錯。」他接着說：

我是後機艙的機工中士，在潛航的戰鬥崗位上，我的職責是在控制室操作平衡歧管。在例行的戰爭巡航期間，我大部分時間都在看書，還會玩一種叫“Accey-Deucey”^❶的遊戲。一切都是那麼的平靜祥和，直到發現目標時，一切才會被激發起來。如果我們足夠幸運，能夠接近目標並獲得有利的射擊位置，就有機會擊中目標。但若是目標突然轉向或是我們被發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而假若目標有護航艦，我們則會遭到深水炸彈的猛烈攻擊，這種情況經常發生。我們的巡航任務通常會持續 50 到 60 天。

時至今日，此次巡航已經過去 30 天了，至少已過半，時間長得足以讓船員比平常更覺疲憊和遲鈍。當「鱸魚號」在月光下的水面巡航時，突然發現一艘大型日本貨輪正以 9 節的速度向 010 度航

❶ 在英國被稱為「十五子棋」。

向航行，這艘船從香港的方向來。^①

1942年9月30日晚，我們正在中國海岸附近巡航，（在10月1日凌晨4點）發現了一個向北行駛的目標。我們跟蹤了這艘船一段時間，繪製了它的航線和速度。由於月光明亮，我們無法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靠近目標。我們採取了所謂的「繞前伏擊」戰術，全速前進，然後在黎明前下潛等待。

進入潛航戰鬥狀態——在潛航戰鬥狀態下，每位船員都有其指定的崗位。在昏暗的指揮塔裏有麥格雷戈艇長、副指揮官（W. 溫特 中校）、一名負責魚雷數據計算機的軍官、負責為艇長升降潛望鏡的舵手，以及負責駕駛潛艇的舵手。在控制室內，有潛水官（霍爾 特中尉）、一名負責液壓歧管的軍官、一名負責高壓空氣集氣管的船員，以及負責平衡歧管的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此外，還有人負責操控聲吶設備，每個魚雷艙也都配備了充足的魚雷手。其他所

① 令人困惑的是，潛艇航行日誌的概要裏顯示「里斯本丸」是07：04在北緯29度57分、東經122度56分的位置被發現的。這與日誌正文不符，後者記錄首次相遇時間為04：00。然而，他們記錄在北緯30°11'、東經123°17'的位置發現了一架日本飛機——他們同時稱這也是「里斯本丸」被魚雷擊中的位置。如果我們假設第一個是首次目擊的位置，而第二個是正確擊中的位置，那麼兩者完全吻合。在地圖上標出這些位置，我們可以看到，以略低於9節的速度，先向010度航向航行約一小時，再向060度航向航行約兩小時，就能從第一個位置到達後一個位置（這是「鱸魚號」記錄的速度，也是其在水下等待「里斯本丸」再次出現時所報告的最終航向）。根據日方報告的位置顯示，似乎在被魚雷擊中後的某個時間點上，「里斯本丸」繼續向北偏西的方向航行，直至被其他船隻拖走。

有艙室都有人員待命，隨時準備應對緊急情況。「鱸魚號」離開港口時帶着 24 枚魚雷，所有發射管（前部六個，後部四個）都已裝填。現在除了用掉的一枚外，其他的都還在。

潛艇調轉船頭，與來時的航向成 180 度，靜靜地在水下等待着日本商船靠近。

六、「動力充足，航線筆直， 航行正常！」：十月一日

可是我們都睡得像死去一般，
也不知道怎麼一下子，都給關閉在艙口底下了。
就在不久之前我們聽見了各種奇怪的響聲怒號、哀叫、狂呼、
鏗鏘的鐵煉聲
以及此外許多可怕的声音，
把我們鬧醒。

——《暴風雨》，第五幕，第一場^❶

那天晚上，「里斯本丸」上沒有一刻是安靜的。病痛難忍、飢餓難耐、擁擠不堪的環境以及簡陋的住宿條件讓人們輾轉難眠、呻吟不已。而幾個幸運兒的鼾聲，讓嘈雜聲變得愈發刺耳。

駕駛台上的哨兵既未發現「鱸魚號」的尾隨跟蹤，也未注意到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370頁。——譯者註

它在劈波斬浪、加速前進。「鱸魚號」最高速度可達 19 節（是「里斯本丸」的兩倍），這使其能夠遙遙領先於「里斯本丸」。麥格雷戈預判了這艘老舊貨船的航向，當潛艇調頭以待時，已離開了「里斯本丸」的視線範圍。他計劃在黎明時分發動魚雷攻擊，在他看來，這不過是一艘甲板上站滿了日軍的日本運兵船。

六點半——潛艇首次發現這艘戰俘船兩個半小時之後——皇家蘇格蘭軍團第二營的喬弗里·費爾貝恩（Geoffrey Fairbairn）中尉（當天的值班軍官）來到下層甲板巡視，檢查士兵們是否都已起牀以備七點鐘的點名。他並不知道，「鱸魚號」的艇長已經在潛望鏡深度下注視着這一切了。循着之前駛過的航線反方向觀察，麥格雷戈發現「里斯本丸」出人意料地改變了航向，向左轉向 060 度。此時該船已遠遠超出了他預期的距離，「鱸魚號」也不再處於有利的打擊位置，他將無法在理想的短射程內發射魚雷。潛艇再次下潛，重新嘗試靠近。而對水下發生的一切渾然不覺的費爾貝恩還在繼續着他的巡視。

「鱸魚號」的指揮塔內裝有兩個潛望鏡、魚雷數據計算機（TDC）、電子控制台和魚雷發射控制面板。這裏一片寂靜，只有愛德華·霍爾特（Edward Holt）在低聲下達着指令。作為潛水官，他指揮着船首和船尾的舵手以及負責平衡歧管的克瓦赫海姆，以保證潛艇始終處於合適的深度。霍爾特知道在波濤洶湧的海面上，潛艇很容易衝出水面而被敵人發現，這種情況下，潛艇可能會遭受到深水炸彈的攻擊而被迫長時間深潛。

但今天的海面相對平靜，「里斯本丸」貨艙中的戰俘們正活動

着痠痛的四肢，揉着疲憊的雙眼，準備迎接新的一天。很多人在咳嗽，他們獨自承受着對咽喉痛的恐懼——這往往是白喉的早期症狀。而在潛艇裏，所有人都已醒來。到了7點整，雖然潛艇的位置遠不及艇長理想的攻擊距離（離目標仍超過兩海里），但他最終還是下達了命令：

一號、二號、三號魚雷管準備發射。

魚雷手們下到前部魚雷艙裏，打開了三個魚雷管的外艙門以注水，並在魚雷管處將魚雷的航行深度設定為十英尺。麥格雷戈擺弄着他的掛墜（裏面裝着一小撮蘇格蘭石楠花，這是他在每次戰鬥中都會佩戴的護身符），耐心等待着指揮塔準備就緒的指示燈亮起。他再次檢查潛望鏡，在聽到魚雷數據計算機算出的有利結果後，麥格雷戈下令：

一號準備——一號發射。

10月1日早上7點04分，在霧氣的掩護下，一枚老式14型魚雷從一號魚雷管發射，此處距離「里斯本丸」約有3200碼。儘管整個控制室已是非常寂靜，但聲吶員還是習慣性地俯身緊貼着耳機。他報告說：

一號魚雷動力充足，航線筆直，航行正常！

這表明魚雷的航向正確，沒有出現回轉向潛艇的狀況。^❶ 在前部魚雷艙內，魚雷手們關閉了魚雷管的外艙門，管內的水流入補重水艙，以抵消這枚魚雷發射後產生的重量變化。此時，它正按照設想，在水下十英尺處劈波前進，駛向「里斯本丸」。霍爾特操控着潛艇，使其處於穩定的潛行深度。

十秒後，麥格雷戈下令發射第二枚魚雷，接着是第三枚。^❷

二號準備——二號發射。

二號魚雷動力充足，航線筆直，航行正常！

三號準備——三號發射。

三號魚雷動力充足，航線筆直，航行正常！

❶ 這是一個明智的預防措施。「刺尾魚號」(USS *Tang*, SS-306) 正是因為類似的迴旋魚雷而沉沒的。1944 年 10 月 24 日，「刺尾魚號」對一艘在先前相遇時已被擊停的運輸船發起水面攻擊。第一枚魚雷發射後，觀察到其航行正常，隨即發射了第二枚。這枚魚雷突然向左舷急轉，浮出水面，跳躍並迴旋。艇長立即下令緊急加速並將舵打到底。結果魚雷擊中了「刺尾魚號」的尾部，而非船體中部。爆炸非常劇烈，甚至連前方控制室的船員都出現了骨折。船尾及後部三個艙室進水，船隻開始下沉。在駕駛室裏的 9 名軍官和士兵中，有 3 人奮力在水中游了 8 小時直至獲救。1 名軍官從進水的指揮塔逃生，與其他人一同獲救。潛艇最終沉在 180 英尺深的海底，隨着後部艙室進水，船員們向前移動。他們燒毀了所有的機密文件，全體船員集中到前部魚雷艙準備逃生。日本巡邏艇投放的深水炸彈，導致逃生行動延遲，並在前部電池艙引發了電氣火災。13 人從前艙逃生，當最後一人逃出時，大火已把艙壁的油漆都燒焦了。這些逃生者中只有 8 人浮上水面，其中僅 5 人能繼續游泳直到獲救。倖存者共 9 名，被一艘日本護衛驅逐艦撈起。

❷ 魚雷每隔十秒發射一次，這樣，如果前一枚魚雷擊中了目標並爆炸，後續魚雷也不會因為共振而被提前引爆。

考慮到與目標間的距離和魚雷的航行速度，「鱸魚號」的船員們緊盯着時鐘，默數着水下魚雷到達目標所需的 157 秒，等着聽到爆炸的聲音。

當三枚魚雷穿過兩海里湍急的海水，嘶嘶作響地向這艘老舊貨船衝去時，船上的戰俘們仍以為他們會迎來普通的一天。

在「里斯本丸」二號貨艙的阿爾夫·亨特（Alf Hunt）回憶道：「10 月 1 日早上 7 點左右，大多數人都已經醒了，正等着一天中的第一餐。突然，我們聽到了一聲巨響（像是輪胎漏氣的聲音），也無法分辨那聲音是來自船內還是船外。大家後來才意識到那是一枚脫靶的魚雷。」

另一位海軍華萊士·黑斯廷斯（Wallace Hastings）在一號貨艙聽到的則是「從左舷^❶傳來的聲音，在我聽來更像是水槽最後排空時發出的咕嚕聲」。

三枚魚雷雖未命中目標，但都只是差之毫厘。事實上，其中一枚撞到船體後就被直接彈開了。

克瓦赫海姆回憶道：「有一點要記住，戰爭初期我們深受魚雷引信故障的困擾，魚雷很多次都擊中了目標卻沒有爆炸。我敢說，

❶ 發射魚雷時，「鱸魚號」確實位於「里斯本丸」的左舷。

首輪發射的三枚魚雷都是潛得過深，而沒有發生爆炸。」^①

那天早晨，「里斯本丸」的駕駛室裏有五個人。大副新岡源太郎和舵手平岡榮吉在一起，還有三名目光敏銳的瞭望員：有我平五郎、杉崎弘和溝口三善。^②

經田回憶說：

10月1日早上7點10分，我們的船遭到了魚雷的攻擊，我被「魚雷來襲」的喊聲吵醒，從房間跑到了甲板上。魚雷擊中了右舷

① Mark 14 型魚雷於 1931 年開始服役，它原本被用作 Mark 10 型的替代品，但却存在着諸多缺陷。珍珠港事件時，Mark 14 型魚雷供應不足，所有在役的魚雷都配備了 Mark 6 型的爆炸裝置。這是一個特別糟糕的組合。魚雷最初的問題主要有四：兩個與爆炸裝置有關，兩個與魚雷的深度設定機制有關。深度問題很早就被質疑了，1942 年 6 月，西南太平洋艦隊潛艇部隊指揮官洛克伍德少將下令在西澳大利亞珀斯外的法國人灣潛艇基地進行測試，測試證實了這些質疑，魚雷比設定深度平均潛深了 11 英尺。然而，紐波特魚雷廠的美國海軍軍械局並未立即承認問題，最終僅承認是由於彈頭比測試彈頭重，Mark 14 型魚雷在航行時會出現頭部朝下的情況。不過，他們估計魚雷僅比設定深度潛深了 4 英尺。8 月，洛克伍德命令潛艇兵將魚雷發射深度比一般設定提高 10 英尺。除此之外，魚雷的深度傳感器是為速度較慢的 Mark 13 型魚雷（速度為 33 節）設計的。Mark 14 型魚雷在高速航行時，魚雷表面的壓力梯度導致傳感器反饋錯誤。傳感器後來被重新安置到中間位置，即使魚雷在正確深度航行，引信仍然不可靠。磁性引信是在北半球地區設計的，在赤道附近效果不佳。英國和德國比美國海軍更早停用了磁性引爆器。傳統的接觸引爆器與深度傳感器一樣，是為速度較慢的 Mark 13 型魚雷所設計的。新的 46 節 Mark 14 型魚雷具有更高的慣性衝擊，可能導致撞針錯過引爆帽。這些問題在 1943 年底前均得到了解決。在此之前，許多日本船隻得以幸運逃脫。有趣的是，克瓦赫海姆始終認為前三枚魚雷中有一枚擊中了「里斯本丸」的尾部，但未能爆炸，船長也證實了這一點。

② 文中所列人名已經查考確證，參見〈りすぽん丸乗組員名簿〉（昭和十七年十月一日現在），日本郵船：《日本郵船戰時船史（上卷）》，東京：日本郵船株式會社，1971 年 5 月，第 128-129 頁。——譯者註

中部但沒有爆炸，它撞上船後調了個頭，回到了其發射方向。幾分鐘後，這枚魚雷又轉了個方向，在水面上向着船衝了過來。由於它的速度很慢，船打了個急轉彎就成功躲避了它。又過了幾分鐘，第二輪攻擊開始，兩枚魚雷以 45 度角從右舷船頭方向襲來，但我們的船都避開了。

潛艇內一片沉寂，大家知道時間已經過去太久了，卻始終沒聽到任何爆炸聲。羅布·羅伊·麥格雷戈（Rob Roy McGregor）下令發射第四枚魚雷，這次調整到了比較淺的深度，有經驗的船員們已經開始懷疑是武器出了問題。

2 分 10 秒後，這個重達 1488 公斤、長達 6.24 米的龐然大物以 46 節的速度撞擊了「里斯本丸」船尾。292 公斤的鋁末混合炸藥（Torpex）^❶ 於毫秒之間引發爆炸，在船體上炸出一個直徑兩米半且

❶ Torpex（魚雷炸藥）是一種混合物，而非 TNT 那樣的純化合物。其成分為：41% TNT、41% RDX（環三亞甲基三硝胺，又稱黑索金）和 18% 鋁粉。Torpex 因其更高的爆炸能量、RDX 比 TNT 更高的爆速以及鋁粉延長壓力波的作用而受到重視。同等重量下，Torpex 對艦船的水下爆炸效果至少比 TNT 高出 50%。然而，Torpex 比 TNT 更為敏感，其成分 RDX 不僅成本高昂，製造過程中的安全隱患也較大。1942 年初，魚雷彈頭開始換裝 Torpex 炸藥，首批訂單量為 2000 萬磅，同年晚些時候，第一批裝載 Torpex 的彈頭投入使用。Mark 14 型魚雷彈頭中有 643 磅 Torpex 炸藥，其爆炸威力至少相當於 960 磅 TNT，這使得彈頭的破壞力近乎於翻倍。Torpex 在戰爭期間還有許多其他用途，例如被巴恩斯·沃利斯博士（Dr. Barnes Wallis）選用於他的「高腳櫃」（Tall Boy）和「大滿貫」（Grand Slam）重型炸彈。此外，1944 年，喬·肯尼迪（約翰·肯尼迪的哥哥）在英國上空執行任務時，駕駛着經過改裝過的「解放者」飛行炸彈（也就是將 B-24 轟炸機改裝成遙控爆炸裝置，用於摧毀堅固的目標——譯者註），試圖摧毀加萊附近米摩耶克斯堡裏的德國 150 毫米「超級大炮」基地，但任務失敗，他最終因 Torpex 炸藥爆炸而喪生。

無法堵住的大洞。

經田說：「大約在 7 點 15 分，第四枚魚雷以 35 度角從右舷船頭方向襲來，距離船 1200 米。當我們發現這枚魚雷時，試圖急轉右舷躲避，但沒能成功。魚雷擊中了右舷船尾的螺旋槳。爆炸造成船隻受損，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

身處七號貨艙的日軍一等兵伊東銳藏（Ito Elzo）在爆炸中被從艙口上方脫落的橫樑壓住，當即死亡。

在爆炸聲回蕩在「里斯本丸」上時，船員們正在為戰俘們準備早餐。二等兵比爾·斯普納（Bill Spooner）回憶說：「我和另一個伙計〔查理·希瑟（Charlie Heather）〕正沿甲板走着，手裏提着一木桶的米飯，還有被我們叫做「泔水」的東西，那是一種看起來很糟糕、散發着惡臭的稀蔬菜湯。這時從船的一側傳來一聲悶響。接下來，日本人就跟發了瘋似的，又推又打地把我們趕回了貨艙。」

當魚雷擊中船體時，塔菲·埃文斯（Taffy Evans）正在甲板上解手：「那些在甲板上如廁的士兵隨即被命令返回貨艙，而所有生病的士兵，不論是海軍還是陸軍，都被匆忙塞進我們的艙室，那裏現在大約有 400 人。病人們唯一可以躺下的地方是下艙的艙口蓋，而現在這些地方已經擠滿了病人和行李。」

潛艇指揮塔裏的船員又一次注視着時鐘，這時他們聽到了等待已久的巨大爆炸聲。「鱸魚號」上升至潛望鏡深度進行了快速觀察（僅僅幾秒鐘，以免被發現），發現「里斯本丸」再次改變了航向，現在似乎已經停了下來。他們還注意到，船上的船首炮正朝着潛艇

開火。^❶

在一號貨艙的羅斯·林納伯格（Ross Lynneberg）描述道：「在艙內，我能聽到一陣『嗖嗖』聲逐漸逼近船隻。聲音掠過後，接着又是一陣『嗖嗖』聲和轟鳴聲，伴隨着強烈的震動，船彷彿擱淺了一般。所有在甲板上的人都被趕回了貨艙，緊接着，日本人就在我們艙室的正上方發起了射擊。」

在二號貨艙的阿爾夫·亨特（Alf Hunt）回憶說：「大約一分鐘後，傳來一聲巨響，比爆炸聲還要大，幾秒鐘後，發動機的轟鳴聲漸漸消失。有人喊出了那句海軍中常開玩笑用的話『只要燈沒滅，你就別慌張』。然後，那個唯一的燈泡慢慢變暗，最終熄滅了。」

此時，水已湧入機艙，淹沒了發電機。

同樣在二號貨艙的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說：「一聲巨響傳來，船身劇烈震動後似乎停了下來，緊接着就開始在水中下沉。船員們都慌了神。警鈴聲、哨聲和喊叫聲此起彼伏，船上的炮也在不斷射擊。」

當甲板上的人們聽到沉悶的撞擊聲、前部貨艙的人們聽到遠處爆炸的轟鳴聲時，三號貨艙裏的人們卻很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艾田蒲就在最靠後的貨艙裏，他是戰俘中距離魚雷擊中處最近的人：「我正躺在靠近底艙的草墊上，突然聽到一枚魚雷呼嘯着穿過船頭。緊接着，我又聽到煤艙傳來巨大的爆炸聲，那個位置就在我本

❶ 在不同情況下，這些炮會被描述為4英寸速射炮和12磅速射炮（速射炮意味着炮彈是一體式的，而非分開的彈頭和火藥包或彈藥筒）。

打算藉以睡覺的隔板對面。海水開始湧入我們下方的艙底，一名日本水手抱下來一堆廢棉絮想要堵住漏洞，但不用說，那根本沒用。」

魚雷炸出的洞有一個成年人那麼高。海水不斷湧入，隨着水壓的增大，任何試圖堵住漏洞的努力都注定失敗。經田說：「後來有人想要往漏洞裏塞破布來止水，但根本不可能完全堵住。」

艾田蒲回憶道：「船停着動不了，日本守衛被派到舷梯那裏，他們接到命令不允許任何人到甲板上。因此，我們無法使用淡水和廁所。」

8 點 45 分，「鱸魚號」潛艇在距「里斯本丸」1000 碼處發射了第五枚魚雷，設定深度為 1 英尋^❶。

經田說：「大約 8 點 50 分，第五枚魚雷從西面朝船的右舷襲來。這枚魚雷剛好從船底擦過，沒有爆炸。」

為了獲得最佳位置，「鱸魚號」在發射第五枚魚雷後整整等了 53 分鐘後才發射了第六枚（也是最後一枚）魚雷，深度設定為 0 英尺——這意味着魚雷將在水面上航行。就在發射魚雷前，艇長發現一架輕型轟炸機（他聲稱是三菱 Darai 108 型）^❷飛過「里斯本丸」上空。他隨即高呼着下達了命令。負責主壓載艙控制面板（因其紅綠指示燈而被稱為「聖誕樹」）的人員拉動操縱杆，打開了

❶ 六英尺。事實是魚雷仍然從船底通過，這清楚地表明了 Mark 14 型魚雷的不可靠性。

❷ 潛艇日誌中一直將這種飛機稱為“Davai”。無論拼寫如何，這種飛機並不存在。三菱 108 型 97 式飛機是盟軍誤認為日本擁有的飛機。儘管有戰俘目擊者描述它為雙翼飛機，但無法確定「鱸魚號」實際觀察到的是哪種飛機。

壓載艙頂部的通風口，水湧入了通風艙，使潛艇失去浮力。「鱸魚號」緊急下潛至 100 英尺的深度，40 秒後艇員們聽到了巨大的爆炸聲。

經田說：「大約 9 點 37 分，第六枚魚雷從船的左舷襲來，距離約 1200 米。船上的炮手憑藉一記精準的射擊就成功將這枚魚雷擊毀。」^①

克瓦赫海姆說：「我們調轉了潛艇的方向，並從七號尾管再次發射了一枚魚雷。雖然聽到一聲爆炸，但我們因為必須深潛而未能觀察到結果。我們遭到了兩艘巡邏艇的猛烈攻擊，此時情況變得非常糟糕。」

對船上的人來說，情況也不容樂觀，因為他們能聽到周圍響起的槍聲和深水炸彈的爆炸聲。塔菲·埃文斯從陽光明媚的甲板上被匆匆趕下漆黑的貨艙後，只能靠耳朵來判斷事態發展：

射擊是從前甲板上架設的一門火炮開始的——這可能是我們前幾天注意到的那門 18 磅炮，同時船尾也有一門差不多大小的炮，它們共計開了大約 15 炮。然後過了半小時到一小時的時間，我們聽到了飛機的聲音和炸彈爆炸的聲音——可能是來自飛機，也可能是後來趕到現場的驅逐艦投放的深水炸彈發出的。

① 沒有證據表明這枚魚雷擊中了船隻，日本炮手稱在水中擊中了它。儘管這聽起來不可思議（與其他日本宣傳聲稱用飯糰擊落盟軍飛機等類似），但可能是真的。包括「鱸魚號」船員在內的許多證人都同意魚雷確實爆炸了，但它沒有擊中船，所以很可能是近距離的高爆彈所引起的感應爆炸。然而，這些炮手並未讓所有人都感到欽佩。皇家通信部隊的巴克中尉在戰後報告中提到這一事件時寫道，「前部炮手的行動極其遲緩」。

在「鱸魚號」潛艇的指揮室裏，有一台深海溫度測量器。這種儀器在二戰結束的多年後一直是軍事機密，它可以同時記錄潛艇船體附近水域的深度和溫度。這種測量器在一張塗有碳粉的校準卡片上描繪出深度和溫度的組合曲線圖，當潛艇下潛時，一支觸針會從上到下刮去卡片上的碳粉；另一個控制杆則會隨着溫度的升降帶動筆尖橫向移動。如果曲線呈恆定角度或平緩彎曲，就意味着溫度隨深度緩慢而穩定地下降。然而，當潛艇下潛時，如果繪製的曲線角度急劇變化，那就表明有溫躍層（一個溫度在劇烈、顯着變化的區域）的存在。聲波會被溫躍層折射，使潛艇有機會隱藏於溫躍層下方，從而避開聲納的探測。

羅布·羅伊神色鎮定，一邊注視着深海溫度測量器，一邊指揮着在控制室前方中央操作着大銅輪（在遭受深水炸彈攻擊和保持靜默航行時用於操控方向）的水手。為了保持靜默航行，嘈雜的通風系統被關閉，艙內溫度開始急劇上升，空氣質量也迅速惡化。克瓦赫海姆和負責操控船首、船尾水平舵的水手們都要依羅布·羅伊之令行事。他們汗流浹背，看着溫度計上的水銀柱緩慢上升到 130 華氏度^❶。

在 9 點 40 分，幾乎就在發射完最後一枚魚雷後，「鱸魚號」上的船員們聽到了三聲深水炸彈的爆炸聲。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Garfield Kvalheim）的朋友們——來自加利福尼亞州密歇根布拉夫的槍炮士官查理·鮑爾斯（Charlie Bowers）、在船尾機艙的魯迪·赫斯（Rudy Hess）、在中途島上的一次事故中燒掉半邊鬍子

❶ 56 攝氏度。

的帕特·希金斯（Pat Higgins）、以及譚名「奧比」的潛艇廚師奧布萊恩（“Obie” O’ Brian）——別無選擇，只能硬撐下去。他們和其他船員們一起緊張地等待着，這些人包括：綽號「沃普」的達萊桑特羅（“Wop” D’ Allesantro）、約翰·埃里姆（John Erim）、鮑勃·格倫（Bob Glenn）、湯米·霍奇森（Tommy Hodgson）、埃里克·勞勒（Eric Lawler）、查理·林克（Charlie Link）、湯米·普洛（Tommy Ploe）、綽號「法國佬」的雷米拉德（“Frenchy” Remillard）和綽號「小拇指」的里默（“Pinky” Rimmer）等人。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承受着這次轟炸。

克瓦赫海姆說：「每當我們操縱潛艇應對深水炸彈時，（達萊桑特羅）就會走向他的牀鋪。作為一名天主教徒，他會拿着祈禱珠躺在那裏，嘴裏開始唸唸有詞並用手反覆畫着十字。我們都覺得，如果他和上帝那麼親近，我們就都安全了。」

一艘日本驅逐艦〔老式的樅型驅逐艦「栗號」（*Kuri*）^❶〕和幾艘輔助艦已趕到現場，正在搜尋「鱸魚號」。

稍作等待後，潛艇上浮到潛望鏡深度。船長沒有看到「里斯本丸」的蹤影，便假定它已經沉沒了。事實上，這艘船直到快整整 25 小時後才最終沉沒。

與此同時，在船艙裏，戰俘們知道船已經停下並開始傾斜。他們能聽到日本兵在甲板上跑來跑去和日本船員用前炮進行攻擊（後

❶ 「栗號」是一艘護航驅逐艦，排水量 1160 噸，長 85 米，航速 23 節，配備兩門 4.7 英寸炮。它於 1920 年 3 月 19 日下水，1920 年 4 月 30 日服役。作為同級艦中少數幾艘在戰爭中倖存的軍艦之一，它於 1945 年 9 月被俘獲，並於 1945 年 10 月 8 日在韓國意外損毀。

炮被魚雷的攻擊所摧毀）的聲音——他們總共發射了 98 發炮彈。他們還聽到了一架飛機的聲音（毫無疑問就是潛艇發現的那架），並從日本人的歡呼聲中推測出那是他們的飛機。

皇家蘇格蘭軍團的詹姆斯·米勒說：「我們堅信日本人不會看着我們淹死。他們不會如此無情，眼睜睜看着 1800 個無助的人死去。船尾已開始緩慢下沉，我們一直在等待日本人展開救援行動。」

然而，在一片黑暗中，隨着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流逝，幾小時後，他們的希望變成了絕望，因為不會有任何救援行動發生。

威廉·保爾特（William Poulter）中士說：「此刻，我心裏想的是：我被子彈和炮彈擊中過，遭受過轟炸，還被手榴彈襲擊過，現在又遇到魚雷攻擊，也許我注定要被淹死，既然如此，我也沒轍。」

羅斯·林納伯格說：「我們接着請求去廁所，但被日本人拒絕了，所以大家只能用僅有的幾個水桶來應急，它們很快就滿得溢了出來。我們請求去倒掉穢物，可還是被拒絕了。到了晚上，痢疾散發的惡臭讓空氣變得污濁不堪、令人作嘔。我們還聽說，已經吃不到東西了……」

很多士兵染上了痢疾，這使得貨艙很快變得臭氣熏天。他們現在才意識到這次不是暫時停靠，便用上了能找到的一切容器，連罐頭盒、帽子、玻璃罐都不放過，但一切都是徒勞的。

阿爾西回憶道：「一整天都沒吃的，也沒有人被允許到甲板上去解手，大家從船艙底部拆了兩塊木板，1100 人排隊小便，士兵們得用他們的飯盒當便盆。」

大約 12 點 35 分，一艘來自「栗號」驅逐艦的摩托艇靠近船邊，艦長就在艇上。他登上駕駛室詢問船隻的受損情況，經田報告說，

魚雷的襲擊導致四名船員受傷。於是，摩托艇返回驅逐艦，帶來了一名醫生為這四人檢查傷勢。

在聖約翰救傷隊的波特中尉（一位會講日語的詩人）之懇求下，守衛們將兩個空汽油罐遞進了二號貨艙，但穢物還是很快就滿溢了出來。波特設法說服日軍送些水下來，但他們只往漆黑的貨艙內放下了兩桶極其污濁的液體。絕望的病人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解渴（然而最靠後貨艙中的海水正以每小時 10 英吋的速度上漲），而病患的人數還在不斷增加。

通信員塔菲·埃文斯說：「別忘了此時貨艙裏已有白喉病人，還有所有痢疾患者和其他病人。」

長遠來看，這讓這場災難變得愈發嚴酷。這些士兵因戰負傷還不到一年，又經歷了十個月的營養不良、遭受了船隻遇襲的打擊，現在已是焦慮不已、身心俱疲，現在不僅飢渴、驚恐，還要暴露在大量的細菌和病毒中，這導致許多在沉船事件中倖存下來的人後來因此而喪生。

豪威爾中尉說：「我們逐漸明白了過來，這種囚禁並不是為了防止人們逃跑，而是偶然地演變成了一場蓄意的大屠殺，他們要讓這些多餘的囚犯淹死。」

而溺亡正在變成一個大概率事件。儘管戰俘們對此並不知曉，但那天下午 5 點剛過，最靠後的貨艙中已經積了 11 英尺深的水。

艾田蒲身處戰俘們所在的最後一個貨艙，那裏最靠近被魚雷炸損的地方。他說：「接着，日本人給了我們一個四人手搖泵^❶和三支

❶ 這是從「豐國丸」(Toyokuni Maru) 轉移過來的。

蜡燭，說，你們的工作就是要確保這艘船不沉。」

三號貨艙裏只剩下三根劈啪作響的蜡燭發出的微弱光芒，除了水泵的嘎吱聲和操作水泵的人們的喘息聲外，唯一的聲音就是海水不斷滲入艙內的咕嚕聲。

炮兵連軍需軍士「大胸」迪克斯（“Busty” Dicks）為泵水的人們鼓着勁，但艙內的空氣變得越來越渾濁、惡臭和悶熱。每隔幾分鐘就會有一個泵水者暈倒，隨後另一個人就會頂上來。

艾田蒲說：

雖然三號貨艙內沒有發生恐慌，但需要有人來指揮抽水工作，在我看來軍需軍士迪克斯就是這樣做的。他不僅組織着大家，確保一直有人泵水，還嘗試着以講笑話的方式來鼓舞士氣。他告訴大家，「堅持住，伙計們，我們快挺過去了！」他邊說邊往水中放了一塊木頭，儘管他深知實際情況恰恰相反。^①

此時，夜幕降臨，10月1日就快要過去了——當然，對於那些已經在沒有光線的貨艙裏被困12個小時的人們來說，「夜幕」一詞已毫無意義。那天晚上七點剛過，「鱸魚號」艇長在附近停留了一整天後，決定浮出水面並離開該區域。當天恰逢瓦爾·克瓦赫海姆（Val Kvalheim）的25歲生日，魚雷軍官愛德華·霍爾特為其製作

① 艾田蒲對迪克斯非常尊敬。他繼續寫道：「我對軍需軍士迪克斯最後的記憶是，戰爭結束後不久，他負責管理我們那個勉強算得上是個廚房的地方，想從美國人空投的44加侖大桶中搶救食物。這些桶沒帶降落傘，最後被壓得像煎餅一樣扁。」

了一張生日賀卡，並在畫着「里斯本丸」的素描上面劃了個叉。當然，美國潛艇兵仍然對他們擊中的那艘船上的真實情況毫不知情。

克瓦赫海姆說：「傍晚我們浮上水面準備給電池充電，但被巡邏艇逼得不得不下潛。我們又試了一次，結果還是一樣。我們顯然無法潛航太久，於是最終浮出了水面，開足了四台引擎的馬力，儘可能與巡邏艇拉開一些距離。天亮前，我們終於為電池充上了電。」

七點半，就在「鱸魚號」駛離後不久，「里斯本丸」上的人們再次聽辨出日本人在甲板上跑來跑去搬運重物的聲音。更重要的是，他們還聽到有另一艘船靠了過來，希望再次燃起——救援來了！

豪威爾說：「經過 12 個小時後，艙內的情景近乎是麥考利（Macaulay）所描述的『加爾各答黑洞』^❶。突然，頭頂傳來一陣碰撞聲和踩踏聲，我們要被放出去了！又過了一個小時，聲音逐漸消失，數百名日軍從這艘正在下沉的船上獲救了。」

日軍登上的船是驅逐艦「栗號」，它與上海海防司令官矢野美年（Yano Mitoshi）指揮的炮艦「豐國丸」（*Toyokuni Maru*）^❷以及「百福丸」（*Hyakufuku Maru*）^❸一起，接走了船上 778 名日本正規軍，只留下 77 名船員和 25 名守衛，由和田中尉指揮。不幸的

❶ 加爾各答黑洞是法國於 1756 年 6 月間在孟加拉倉促建立、用來監禁英國俘虜的場所。它是威廉堡一間環境極為惡劣的普通小土牢。1756 年 6 月 20 日，被囚禁於此的 146 名英國人與印度傭兵中有 123 人窒息身亡，引起了國際社會的爭論。——譯者註

❷ 一個有趣的巧合是，「豐國丸」於 1944 年 3 月 8 日被貓鯊級潛艇「祕號」（*USS Lapon SS-260*，「鱸魚號」的姊妹艦）擊沉。

❸ 1944 年 6 月 30 日被「美洲擬庸鯨號」（*USS Plaiice*）擊沉。

是，當「豐國丸」靠過來時，它撞毀了左舷的兩艘救生艇。一名艦上的醫生登上「里斯本丸」，監督着對魚雷襲擊中受傷日軍的治療。這些傷員被安置在另外兩艘（右舷）救生艇上，連同其餘 12 名船員被一同送往護航艦，之後就再也沒有返回。現在，四艘救生艇都無法供戰俘使用了，矢野艦長決定將「里斯本丸」向西拖曳至淺水海域。^①

其他日本船隻也與「栗號」和「豐國丸」（作為指揮艦）一道，前來援助「里斯本丸」。這些船隻包括炮艦「第十號雲海丸」（*Unkai Maru No.10*）、「利根丸」（*Tone Maru*）^②、「第十號福丸」（*Fuku*

① 「鱸魚號」錯誤地認為船隻在被魚雷擊中的位置沉沒（即北緯 30° 11'，東經 123° 17'）。然而，在向西拖曳約 15 海里後（從第一天的 20：30 到第二天的 07：30），日本郵船公司（*NYK Line*）認為船隻沉沒於北緯 30° 17'，東經 123° 13'。雖然北緯 30° 17' 可信，但東經 123° 13' 過於偏東，這意味着後來游泳逃生的人需要游約 20 海里才能到達島嶼！有趣的是，船長的報告稱，船隻在北緯 30° 17'，東經 123° 13' 的位置上被魚雷擊中，這一說法更為可信。雖然只有能通過潛水探訪殘骸才能確認具體位置，但船隻拖曳後更可能沉沒於北緯 30° 17'，東經 129° 57' 附近。船長本人給出的沉船位置為「距東福山 5 或 6 海里，方位 352 度」。這似乎意味着沉船位置位於東福山 352 度的方向上。

② 這些名字雖然來自「里斯本丸」的二副，但值得懷疑，因為據報道，「利根丸」於 1942 年 9 月 21 日被「鱸魚號」擊沉。「第十號雲海丸」則於 1944 年 7 月 18 日被「軍曹魚號」（*USS Cobia*, SS-245）在父島西北擊沉。其他船隻的命運尚無法確定，日本人習慣給船重複使用相同名稱並加上編號，這使得它們難以追蹤。包括「豐國丸」在內的所有這些炮艇，實際上都是改裝的貨船。經田茂還提到了 *Fukoku maru*、*Wampole*、*Ritsushima*、*Tadashi* 和 *Rikan Maru*。（這些船隻中，根據羅馬字母目前可以確認的是「富國丸」，而另外幾艘根據〈日本船舶命名公約〉推斷，*Ritsushima* 船名的漢字應為「立島（或律島）」，*Tadashi* 應為「忠」，*Rikan Maru* 則有可能是「利鑒丸」，暫時無法準確判斷。——譯者註）

Maru No.10) 和 “Ikusho Maru”^❶。海軍拖船「第一號黃浦丸」(Koho Maru No.1) 也在場，此外還有打撈船「笠島丸」(Kasajima Maru) 和「正生丸」(Shosei Maru)。包括驅逐艦在內，現場現有十艘護航船隻。

當晚 8 點，在經田與和田的一次會面中，後者建議前者完全關閉艙口，以防戰俘逃跑。對此，經田以貨艙內條件問題以及一旦沉船將會造成人員傷亡為由，拒不同意，這引發了其與軍方守衛的爭論。

經田說：「我反對關閉艙口。首先，通風會因此而變得非常差；其次，我們可能還會遭到敵人後續的攻擊。如果這些艙口被關閉，而船隻再次遇襲，可能會造成不必要的人員傷亡。」

然而，經田也承認：「第一個貨艙裏還有大約 300 名海軍人員，因此，如果他們發起反抗，情況會相當嚴重。」^❷

在爭論了一個小時後，他們都筋疲力盡。此時和田在杉山的支持下，直接命令經田關閉艙口。船長服從了這一命令，並傳令給了他的大副。

經田說：「和田中尉不聽我的，沒辦法，所以我下令關閉了艙口。」

水手們安裝好拖纜，日軍開始將這艘受損的船隻向西拖曳時，

❶ 與作者溝通後發現檔案原文如此，暫時無法確認其名。——譯者註

❷ 經田繼續說：「由於這些海軍人員深通船舶和航海，如果他們反抗，將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我們可以從對他進行的戰爭罪審判中清楚地了解到，日本人最擔心的是這些人可能會操縱前部火炮並用它攻擊該區域的其他日本船隻。

艙口最終被關閉了，並被用木板牢牢釘死，還蒙上了防水布。在此之前，戰俘們至少還能通過喊話的方式與甲板上的人交流，能看到頭頂上一小塊漸漸變暗的天空，但現在他們完全與外界隔絕了。貨艙內的空氣不再流動，唯一能聽到的便是病弱、驚恐的人們在愈發污濁的空氣中艱難喘息的声音。

在二號貨艙中，對海難問題頗有心得的豪威爾評估了當時的狀況：

在過去幾個月裏，我們雖已見識過日軍的殘酷無情，但仍然沒有為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做好準備。他們架起了機關槍以防我們逃跑，並且封住了通風井，固定住了木艙蓋，還把防水布鋪在上面扎緊，再用白棕繩捆牢。後來，我們就什麼都看不見了。

同樣在二號貨艙中的詹姆斯·米勒回憶說：「有人大喊船要沉了，這立刻引發了一陣恐慌，大家紛紛涌向通往貨艙外的梯子。但還沒等有人爬到上面，日本人就開始將艙口蓋板蓋上，並蒙上帆布把它們牢牢地扎緊。」

日本人也是如此對待一號貨艙的。法拉斯描述道：

我們的通風管被切斷了，下半部分掉落在躺在貨艙內的病人身上，剩下的艙蓋也都被蓋上了，覆蓋艙口的防水布被牢牢壓緊，從而阻斷了新鮮空氣的流入，使我們完全陷入黑暗之中。從那時起，空氣變得極其污濁，再加上病人們成宿的哭喊和呻吟，情況變得難以忍受。

林納伯格回憶道：「日落時，他們用防水布完全把我們封在了貨艙裏，並打入楔子將其固定住。」

平民亞瑟·埃文斯（Arthur Evans）描述說：「當貨艙裏的人們意識到發生了什麼時，都變得有些激動。當時（波洛克）站起來告訴大家要安靜地躺着，為了節省艙內可能還殘存的一點新鮮空氣，禁止吸煙和說話。」

三號貨艙的人通過在艙壁上敲擊摩斯電碼報告說，水位正在上升，皇家炮兵們仍在泵水，但收效甚微。

午夜已過。大多數人還搞不清具體的時間，只有少數人戴着夜光手錶，這是艙內唯一的光源。凌晨時分，一號貨艙出現了首批死亡者。第一個去世的是「添馬艦」的輪機艙總技師（CERA）赫伯特·托馬斯·貝維斯（Herbert Thomas Bevis），第二個是「燕鷗號」（HMS *Tern*）的一級船工西里爾·阿爾弗雷德·利夫頓（Cyril Alfred Lifton）。二人都患有腳氣病，在魚雷擊中「里斯本丸」後，他們就從甲板上被拖了下來。

吉姆·法拉斯（Jim Fallace）當時也在那個貨艙中：「大約凌晨1點，第一個人去世了。隨後，有人通過在艙壁上敲擊摩斯電碼向二號貨艙傳遞信息，要他們向斯圖爾特中校報告一號貨艙的情況。不久後，第二個人也去世了，這讓我們感到愈發痛苦。」

同在一號貨艙中的無線電操作員羅斯·林納伯格也熟悉摩斯電碼，他說：「我在沉寂的艙室中聽到這個消息被敲擊出來，心甚不安。」

在艙壁另一邊，身處二號貨艙的阿爾夫·亨特與斯圖爾特中校一起聽着敲擊聲：

我們不知道具體時間，但一定是在那個漫長無盡的夜晚之後、凌晨時分傳來的敲擊聲。作為一名無線電操作員，我意識到這是前方貨艙的一名海軍士兵通過一根共用的連接管敲擊出的摩斯電碼。我讀到的信息是：已有兩人死亡，多人危在旦夕。我們貨艙中有人開始回應，隨後一個精神錯亂的人瘋狂地尖叫道：「別敲了！」

隨着電碼傳來，皇家通信部隊的巴克中尉為斯圖爾特解碼了這些消息。信號員弗蘭克·貝內特（Frank Bennett）也在同一個船艙中，他全神貫注地聽着，直至敲擊聲停止。他說：「慢慢地，聲音減弱了，最終歸於寂靜。這很可怕。我們就在一片黑暗裏靜靜地坐着。應該是在夜裏的某個時刻，我們意識到船開始傾斜了。然後，腦海裏就閃過這樣的念頭——我們要麼逃出去，要麼葬身海底。」

情況很簡單：船被魚雷擊中，船上的大多數日本人都已獲救，快要餓死的戰俘們則躺在吃水線以下的無盡黑暗中，浸泡在自己的便溺中。氧氣供應不足，唯一的逃生出口被有意地緊緊封死。現在有人開始死去，當船沉沒時，人們似乎也別無選擇，所有人都注定要在恐懼和一片漆黑中溺斃。

比爾·斯普納說：「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總會有搞笑的人出現。想像一下，就在船已下沉、左右搖晃之時，有人喊了一嗓子：『我他媽餓死了！』一個搞笑的聲音回應道：『好啊，那你他媽就躺下來打個滾兒吧。』」

黑暗之中，人們還是想去談談足球俱樂部、婚禮、家人、家鄉等這般生活瑣事。皇家蘇格蘭軍團軍需軍士亨德森（Henderson）向跟自己一樣不會游泳的人保證：「這正是學習的好時機！」但此時，

大多數人都因為太過難受、恐懼和病痛而笑不出來。^❶

華萊士·黑斯廷斯（Wallace Hastings）描述道：「（痢疾的惡臭）加劇了之前因艙口被封緊、遮蓋後所積聚的悶熱感。人們已無力聊天，一種倦怠感瀰漫開來。我相信，這時獲救的希望已經開始幻滅。」

賴特報告說，「由於腹瀉，蓋爾情況不太好」，而他遠非個例。賴特把自己最後的幾滴水給了他，但在黑暗中，蓋爾誤拿了一瓶尿，喝了一口後噴到了同伴身上。

羅斯·林納伯格說：「空氣現在變得非常渾濁，即使是我們中最健康的人都在出着汗、喘着氣，而幾個被送到我們艙室的病人已經發了瘋，一個個尖叫着說要空氣和水。我自己水壺裏還剩下大約一口水，我時不時倒進嘴裏漱漱口，然後再吐回壺裏留着下次用。」

一個晚上就這樣過去了。

❶ 亨德森未能生還。

七、「放棄那艘船！」：十月二日上午

「可憐可憐我們吧！」

「我們遭難了！我們遭難了！」

「再會吧，我的妻子！我的孩兒！」

「再會吧，兄弟！」

「我們遭難了！我們遭難了！我們遭難了！」

——《暴風雨》，第一幕，第一場^❶

沒有光，也沒有空氣。赤裸的男人們無所事事地躺在自己的排泄物中等待着。這一夜無人入眠，所有人都在喘息着，沒有水源能夠補充他們流失的汗水。絕望扼殺了人們大部分殘存的幽默感，但也有例外。

比爾·斯普納（Bill Spooner）回憶說：

那裏漆黑一片，船艙地板上方有一個木板夾層，大部分人都躺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307頁。——譯者註

在上面。夾層上的人實在憋不住大小便，把我們下面這些被澆到的人氣得大叫：「你們這些肮髒的雜種！」

亞瑟·阿爾西（Arthur Alsey）的記憶卻有些不同：

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人從甲板邊緣往下撒尿，引起下面的人不斷抗議。在悲憤和沮喪中，下面有人喊道：「上面難道沒有士官嗎？」無人回應。「沒有中士嗎？」仍不見回應。「連他媽的軍官都沒有嗎？」一個微弱的聲音回答道：「他們都在排着隊呢。」整個船艙立即爆發出一陣哄笑聲，這足以說明我們是富於幽默感的。

三號貨艙的炮兵們終於停止了抽水工作，他們精疲力竭，半身都淹在水中。在二號貨艙裏，人們能聽到物體（顯然是漂浮在船隻被淹沒處）撞擊着他們艙室後方的艙壁和更靠近船尾的地方。隨着水不斷地湧入，整艘船開始吱嘎作響。被淹沒的後艙在水中沉得更深了，這使得船頭向上翹了起來，船體承受着船頭重量帶來的壓力，金屬發出抗議般的呻吟。「里斯本丸」面臨斷成兩截的危險，若在抵達淺水區前斷裂，它就會像石頭一樣沉入海底。

波特中尉和斯圖爾特中校想去叫住守衛，波特喊了幾個小時的「もしもし」（喂）和「あの、ね」（那個，喂！），但都沒有成功，獲救的希望已經徹底破滅了。是時候採取行動了。斯圖爾特命令皇家陸軍補給與運輸勤務隊（RASC）的哈格里夫斯·「紅毛」·豪威爾（Hargreaves “Ginger” Howell）中尉（他之前遭遇過兩次海難）從二號貨艙突圍。

豪威爾說：

斯圖爾特中校以他一貫冷靜務實的態度提醒我他昨晚提出的意見，並建議我是時候對這次特殊的沉船事件採取行動了！在我們附近（儘管黑暗中完全看不見）有一架沿着艙壁垂直向上延伸的鐵梯，那通常是貨物裝卸工人的出口。如果要從貨艙逃生，難道只能通過那些被牢牢封死的艙口蓋板嗎？托米·阿特金斯（Tommy Atkins）^①是眾所周知的智多星，但我還是很驚訝，因為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當我提出需要某種堅硬的工具時，經過一個類似「傳拖鞋」遊戲的過程，一把遠處廚房的鋒利殺豬刀就被傳到了我的手中。^②在黑暗中傳遞這把刀時，那些躺着的人或被戳到或被踩到，他們在低聲地咒罵着。如果不是咒罵聲暴露出船艙裏許多人已因缺氧而陷入昏迷，這本來會是很滑稽的一幕。我永遠不會忘記爬上鐵梯頂部時因缺氧而帶來的痛苦，接着便焦急地摸索着艙板間的縫隙，一邊氣喘吁吁，一邊在絕望中盲目地對着木板砍砍停停。幾小時後，我精疲力竭，放棄了努力癱坐了下來，聽着周圍和下方的黑暗中一聲大過一聲的呻吟聲、咒罵聲與祈禱聲。

但斯圖爾特是個老兵，他仍未放棄希望。

① 根據帝國戰爭博物館的記載，用“Tommy Atkins”（通常簡稱為“Tommy”）來代指英國步兵的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1743年。

② 據卡魯（Carew）所說，那把殺豬刀是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二等兵斯佩特（Speight）之物，戰前他是克羅伊登的一個屠夫助手。豪威爾在其為戰爭罪行審判所作的證詞中描述道：「我收到了一批麵包刀、剃刀和小折刀。」

早晨 8 點剛過，經田船長（意識到這是他在八個月內第三次失去指揮權）向「豐國丸」發出信號：「『里斯本丸』即將沉沒，我要求所有人棄船。」

他沒有收到任何回應。8 點半左右，「里斯本丸」再次劇烈震動。顯然，這是大限將至之兆。這艘飽受摧殘的老貨船和船上的所有人都將要葬身於舟山羣島的沙質海底之中。

15 分鐘後，經田被告知一艘名為「第一號黃浦丸」的船隻將靠近並接走所有剩下的日本守衛和船員，但不包括戰俘。^❶ 船員們離開了，但當其他人都跳下船時，仍有幾個守衛（連同經田和一些船上的軍官共計六個人左右）留在了船上。大副、二副和輪機長都努力想要說服經田離開，遭到拒絕後，他們便跳入海中游向了護航船。二副荒木說：「輪機長曾在『加爾各答丸』上與經田共事，當時經田也是船長，而『加爾各答丸』沉沒了。船長有很強的責任感，輪機長說他可能會自殺。」

經田確實已將自己綁在船上，決心與船同沉。船體突然傾斜，將他浸入到水中，隨後又再次傾斜，將他拽了起來。「在這個狀態下我有片刻感到茫然無措，然後解開了自縛的繩子。」

阿爾夫·亨特（Alf Hunt）說：「我能聽到隔壁艙室（可能是機艙）的水在晃動，隨後艙壁開始破裂，其聲讓人頓生不祥之感。船往左傾斜得更多了，我估計傾斜度已超過了 30 度，舷梯都幾乎變成水平的了。」

9 點時，斯圖爾特深信危險已是迫在眉睫，於是再次動員大家

❶ 參見照片「『里斯本丸』的沉沒」。



「里斯本丸」的沉沒（英國公共檔案館 2341114 號檔案）

參與到行動中來。他再次下令從二號艙突圍。豪威爾又拿起了刀，與幾名戰友一起（這次他們爬上了一架直接通往艙口的木板樓梯）成功劈出了一條生路。

豪威爾回憶說：

時間漫長如度年。有人拿着一塊說不清是沒被偷走還是沒被換成食物的手錶宣佈，現在是 10 月 2 日上午 9 點，我們在這個地獄般的洞裏已經熬過了 24 小時。差不多就在這時，船體劇烈晃動，向左舷方向嚴重傾斜。一處艙壁已經破裂，船明顯是在快速下沉！希望逐漸破滅，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試着沿着下方裂開的貨艙之邊緣找到一條路，最終走到了那個之前通向甲板的臨時樓梯底部。我爬到最上面被艙板封住的地方，藉助那把殺豬刀，找到了木板間的一條縫隙，成功劃開了帆布並最終割開了它。在後面兩個人的助力下，我用肩膀把一塊木板頂出了一條縫，能讓人勉強擠過去。

他將頭探出甲板，又向船艙裏的斯圖爾特喊話，報告說自己看到了一些島嶼，還看到三號貨艙的一小部分炮兵正試圖穿過舷窗逃生。身處三號貨艙的安德魯·薩爾蒙（Andrew Salmon）證實了這一點，但他指出，「（我們中的一些人）緊緊抓住鉚釘爬上船艙側壁，到達了中層甲板。其他人則想從舷窗逃出去，但被卡住了，對他們來說只能乾等着沉船了」。

這一次，戰俘們算是幸運的。在前一天晚上大約 22 點 35 分，他們聽到「豐國丸」用來拖船的 8 英吋白棕繩斷了。但戰俘們並不知道，日本人在凌晨 1 點 35 分左右又重新安裝了一根類似的繩索，以繼續牽引作業。6 點 10 分，第二根繩子也斷了。日本水手迅速行動，大約 50 分鐘之後，他們又用「豐國丸」上的一根 3.5 英吋鋼纜替換了它，此纜一直堅持到「里斯本丸」停止移動。此刻，「豐國丸」已將船拖到豪威爾所發現的島嶼附近，那是游泳就能到達的距離了。如果沒有這次拖曳，船上的倖存者將寥寥無幾。在距長江入海口更近的地方，來自中國腹地的泥沙在數萬年間慢慢淤積，堆積到距離船底僅幾米的位置。

豪威爾說：

斯圖爾特中校隨後讓我衝到甲板上去，查看一下船的狀況。我有一種強烈的預感，必須要讓會說點日語的波特中尉陪我一起去，儘管那時我們還不知道船上留有六名「自殺式」守衛，以防出現任何戰俘逃跑的情況出現，哪怕這種可能性極小。我們兩個人從剛剛打開的豁口擠了出去，後還跟着幾個頂不住清新空氣與陽光誘惑的人。我們先割斷了繩索，撐開了出口，接着又在鐵梯從貨艙伸出、

幾乎正對着駕駛室下方的位置，開關了第二個通風口和逃生路線。此時海水已經漫過左舷舷牆，這艘老貨船的突然傾斜導致下面的貨艙出現了一陣騷亂。我轉身向船中部走去，打開了一道外面上了栓的沉重鐵門，放出了身在三號貨艙上層的一些倖存炮兵。有些人被卡在了狹小的舷窗裏，眼睜睜地看着甲板井上的水越漲越近，臉上流露出難以掩飾的恐懼之情，此情此景至今仍時常縈繞在我的腦海裏。

就在豪威爾打開艙壁門、放出炮兵們時，他和波特遭到了槍擊。從客艙甲板^①的通道俯視着他們的和田中尉命令船上剩餘的幾個日本守衛向逃跑的人開槍。

豪威爾繼續說道：

一聲槍響之後，一顆子彈打在我身邊的艙口上，這很快就讓我意識到船上不止有我們。我迅速滑到覆蓋着蒸汽管道的鋼板下面，這些管道一直通向甲板井。波特中尉受了傷，另外兩人也倒下了，幾發子彈穿過打開的豁口射進了貨艙^②。四名守衛出現在駕駛台上，他們正透過步槍瞄準鏡俯視着下方。幾發子彈斷斷續續地向包括我在內的不同目標射了過來，然後，我就去問受了傷的波特，如果他還能說話，就去告訴警衛，只要他們停止射擊，我們就回到貨艙裏

① 即船長駕駛台下方的甲板，也就是緊鄰駕駛台的下層甲板。

② 據查利斯（Challis）回憶，當時在船艙中被射傷的人之一，是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樂手普拉姆里奇（Plummeridge），他最終活了下來。

去。他們照做了，於是，臥在蒸汽管道旁的我驚恐萬分地站了起來，將波特背回我們最初撐開的出口。儘管我們離那些步槍槍口還不到 15 碼，就是個活靶子，但他們也沒再朝我們開槍。但這時，一些炮兵並沒有回到他們的貨艙，而是悄悄爬到通向駕駛台的樓梯上。

由於船尾最先下沉，三號貨艙的皇家炮兵們處境也就最為糟糕。他們不顧一切地想要逃跑，卻無法像其他貨艙的人那樣相對從容地逃生，這裏無人「冷靜地撤離」。他們的戰友一打開門，那些能逃出來的人就都跳到了甲板上。

傑克·艾田蒲（Jack Etienne）在三號貨艙裏等着有人能打開艙口或艙壁門放他們出去。

就在他（豪威爾）打開我們的艙板時，日本人開槍擊中了他。我們又想辦法把豁口撐開了些，並開始往外爬，日本人仍在巡邏艇上射擊。我爬了出來，躺在甲板上等待着射擊的間隙，好趁機滑到水裏。而在逃生梯倒塌後，就沒人能出來了。我聽到一名愛爾蘭炮手喊道：「我們出不去了，讓我們給他們唱首歌吧。」他們唱起了《漫漫長路到蒂珀雷里》（*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滑到了海裏的我深知炮兵們在這惡劣的條件下，仍然盡職盡責。沒有水，沒有食物，也沒有空氣，可他們卻讓這艘船在水面上漂浮了 24 個小時，原本也不該有人死去的……炮手柴爾茲和我剛好前後腳爬了出來，我們躺在甲板上，旁邊是那位打開我們貨艙艙板時中彈身亡

的中尉的屍體。在射擊的間隙，我和柴爾茲都滑到了水裏。^①

當豪威爾幫助身負重傷的波特^②回到二號貨艙時，斯圖爾特問他如何看待這艘船的後續可能。豪威爾憂心地表示，此船隨時可能沉沒。

斯圖爾特別無選擇，他下令「棄船」。

下士泰勒當時在那個貨艙裏，他說，「人們不禁大為恐慌。就在幾秒中之間，通往二層甲板的梯子上擠滿了扭動着身體掙扎逃生的人們。第一批上去的人發現二層那裏已經沒有空間了，但梯子下

① 被射殺的中尉很可能是波特。在對經田茂的戰爭罪行審判中，豪威爾描述了他如何在波特被射殺前打開艙壁門，炮兵們隨即湧出。不過，豪威爾還提到，在他救回波特之後，還有一具被射殺的遺體陳屍甲板。

② 戰後，香港聖約翰救傷隊遺忘了波特的犧牲，他的名字甚至沒有出現在該組織為紀念戰爭中的陣亡者而設立的紀念碑上。但是，他的名字被刻在了西灣失蹤者紀念碑上。

1962年，在戰時聯合野戰救護隊指揮官賴廉士（Lindsay Ride）中校給義勇軍默里·布朗（Murray Brown）上校的一封信中寫道：「關於波特的情况如下：1941年香港防禦計劃包括在動員時組建香港野戰救護隊，負責將所有九龍與港島的傷病軍人轉運至醫院。香港野戰救護隊由皇家陸軍軍醫隊、皇家陸軍補給與運輸勤務隊和香港義勇防衛軍野戰救護隊單位組成，但這些還是無法滿足所需人手，因此請求聖約翰救傷隊協助。他們通過設立一個軍事單位來提供幫助，該單位在1940年或1941年被編入香港義勇防衛隊野戰救護隊進行訓練。波特是隨該救護隊而來的軍官，負責其成員的紀律、薪酬等事務。他並非是香港義勇防衛軍的成員。動員時，他帶領其隊向香港義勇防衛軍野戰救護隊報到執勤，並被派往香港野戰救護隊總部，與我在一起。他在整個戰事期間都留在總部，當日軍將我們關進戰俘營時，他也隨我們一起被關押。我不理解為什麼聖約翰救傷隊不承認他，但那真的與我們無關。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動員時被編入香港義勇防衛軍野戰救護隊執勤，在整個戰事期間都與我們一起服役，我認為這種從屬關係應該被視為貫穿其整個拘禁期間。」——香港大學圖書館萊德檔案集（感謝賴廉士的女兒伊麗莎白）。

面的人還是會爬過他們的後背，結果又跌回艙底，砸在下面的人身上」。

起初，人們都各行其是，驚慌失措之下為了爭奪梯子還發生了激烈的打鬥。唯一的光線來自兩層甲板之上新打開的艙口，匆忙逃生的人們在擠向艙口的途中，踩到了那些動作太慢或太虛弱而沒法及時避開的人。

羅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躺在白喉患者海沃德的旁邊，他說，「我聽到海沃德被緊緊地擠壓在臨時安置處的夾板上，絕望地呼喚着他的母親」。

弗蘭克·貝內特（Frank Bennett）說：「我曾在電影中看到過這種恐慌的場景，但自己從未親身經歷過。貨艙到甲板的那段木梯上擠滿了人，大家都只有一個目標——逃出去。那是一場多麼殘酷的混戰啊，人們互相推搡抓撓，想要獲得逃生的優勢。有些人重重地摔回去了，一直摔到船尾下的甲板那麼遠。」

豪威爾回憶道：「正是斯圖爾特中校在中層甲板上，按照團部的傳統，反覆高喊着『穩住』的命令，這才使我們這些在前面的人沒被後面涌上來的人羣推擠到 40 英尺下那擁擠的貨艙裏。」

「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穩住！」中校蒙克里夫·斯圖爾特（Moncreif Stewart）喊道，「記住你們是誰！」

「猴子」和他的士官們迅速恢復了秩序。人們在每個梯子下面都排好了隊，當船再次猛烈搖晃時，人和行囊都在傾斜的地板上來回滑動着。

豪威爾幾乎還沒從之前在甲板上的事故中回過神來，就因其成功而獲得了獎勵——斯圖爾特再次選擇他來領導最後的有序撤離。

在豪威爾身後，二號貨艙的人們衝向了甲板，儘管仍有少數不幸的人滑倒摔回了貨艙——鋼板上沾滿了小便和大糞，變得異常濕滑。此時船尾（擱淺在沙洲上）已經沉下去了，傾斜角度相當大。

雖然這艘船上原本配備了四艘救生艇、兩條舢板、六隻救生筏和 2700 件救生衣，但最終只能找到一艘舢板和零星的幾件救生衣。如前所述，四艘救生艇都已經丟失了，救生筏也不知所蹤，一條舢板找不到了，另一條則尚在原位，只有一半的人拿到了救生衣。

豪威爾第一個登上甲板，徑直跳到了海中：

我飛快地穿過甲板跳到水裏，一發子彈從我頭頂上嗖地一聲打了過去。我加速游着，又一顆子彈在我身旁濺起了水花。為了護住腦袋這個要害部位，我潛入水下游泳，直到憋不住氣才浮上來，然後再潛下去。我記得當時自己還在想，不知道子彈最後會打到哪裏。那時我已不再是唯一的目標，因為目標都泡在水裏，但大多數人都沒游出太遠。一些在甲板上的人完全不顧子彈的威脅，正在拆着木製廁所，他們想要搭個簡易的筏子，或者在入水前找點能用得上的東西。

剩下的六名守衛全副武裝，在駕駛台上俯身向從艙口逃出來、被陽光刺得睜不開眼的戰俘們射擊。但即便是這些武裝人員，也抵擋不住從二號貨艙蜂擁而出的絕望倖存者們。

豪威爾相信是皇家炮兵團解決了那些守衛，他說，「火力突然減弱了，後來我才知道，被放出來的炮兵們已衝上了駕駛台，在瘋狂的衝撞中制服並打傷了那些守衛」。

在一段更為生動的描述中裏，中士「胖子」貝茨（“Porky” Betts）（米德爾塞克斯營的重量級拳擊冠軍）、下士丹·卡維爾（Dan Cavill）、下士「潘喬」·潘廷（“Pancho” Panting）、二等兵「黑皮」霍普（“Darkie” Hope）、二等兵「斧頭」哈切特（“Chopper” Hatchett）、二等兵哈里·懷特豪斯（Harry Whitehouse）以及樂手約翰尼·海姆斯（Johnny Hymes）將守衛們扔下了船，而他們自己則毫髮無損。^❶

根據至少一名目擊者的說法，霍普、潘廷、哈切特和懷特豪斯隨後就衝向了船長的艙室。他們在那裏找到了兩瓶三得利威士忌，由於空腹飲酒，立馬上頭了。潘廷戴着船長的帽子，披着不知從哪裏找來的英國國旗，一邊不停地敲打船鈴，一邊持續播報着：「還有人要坐『雲雀號』（Skylark）嗎？」^❷ 要上岸的都上岸了！」

去他媽的，去他媽的，
不管是高的還是矮的，
在大洋此岸，你都別想升官，

❶ 無論哪個說法更準確（後一種說法來自卡魯），戰俘們後來在附近一個島上避難時發現並埋葬了其中一名守衛的屍體（可能是一等兵寺西清次郎或一等兵杉原實，因為日方記錄顯示前者溺亡，後者失蹤）。然而，這兩種說法可能都不準確，因為在戰爭罪行審判中作證的日方目擊者稱，最後的守衛們是自行跳海的。

❷ 這句話最初是 19 世紀英國萊頓的弗雷德·柯林斯（Fred Collins）船長招徠乘客的經典吆喝，後來逐漸演變成英國的國民日常用語，成為各種需要「最後召集」場合的通用表達。——譯者註

所以來吧兄弟們，去他媽的！^❶

關於這點，羅斯·林納伯格（Ross Lynneberg）的記述或許能夠印證，他說，「在離開『里斯本丸』之前，我記得有個小伙子伏在一塊半邊浸在海裏的廁所木板上漂走了。他一邊大喊大叫，一邊揮舞着一瓶搶來的酒，不停地喝着」。

丹尼斯·莫利（Dennis Morley）也同意說：「是的，我似乎也記得有人在唱歌。不過當時我一心想把自己的救生衣給一位看起來年紀很大的人，並幫他穿好。啊！這就是年輕人的自信啊，我經常會想他最後是否活了下來。」

威廉·保爾特（William Poulter）補充道：

大約五海里外有一些島嶼，還有五六艘大型拖船在附近待命，所以一切看起來都沒什麼大礙。幾乎每個人都有救生圈或者能抓住的東西，而我還有「皇家救生協會」的證書，所以並不擔心下水。兩三個人在船橋上敲打着船鈴，還有幾個人站在下面抽着煙，準備跳到水中。一切都井然有序。我跳入不算溫暖的水中，游走了。

但大多數人仍在試圖逃出貨艙。而二號貨艙底部的人若想要逃出去，就必須爬過兩段梯子：第一段通往二層甲板，第二段則通向艙外和自由。

❶ 改編自二戰期間在英國和英聯邦軍隊中廣為流傳的歌曲《保佑他們》（*Bless 'em All*）。士兵們在傳唱時常把歌詞中反覆出現的“*Bless 'em All*”（保佑他們）改成“*Fuck 'em All*”（去他媽的）。——譯者註

羅伯特·賴特試圖爬上第一段舷梯，但被人羣一次又一次地擠了回去。他抬頭看到「大胸」伊頓^❶把腰帶放了下來，後者把他拉到了上一層。現在，賴特必須爬上第二段梯子。艙底已經擠滿了拚命掙扎的人。強壯者都衝了出去，在甲板上看到海裏已經滿是溺水的人了，有的在打轉，有的則抓着漂浮的殘板。

羅伯特·賴特說：「人們東奔西撞，但不是為了馬上找到自救的方法，而是為了搶劫船上的物品。不遠處停着六艘日本海軍的輔助船，我猜他們是來救援倖存者的。」

同樣從二號貨艙逃出來的阿爾夫·亨特說：

我走到右舷，向後看去，船尾已經沉到海裏了，一些人在四處奔逃，而另一些人則悠閒地走來走去，彷彿在度假游輪上。「棄船時要選擇與船下沉方向相反的一側」這是海軍的準則，這樣做是為了避免被沉船的吸力所捲入。據我估計，從甲板到水面大約有 25 英尺高，海裏已經有許多人在漂浮物中游來游去了。艙蓋的木板還在不斷地被扔到海裏，我覺得直接跳下去太危險了，可能會撞到漂浮物或者其他游泳的人，所以我決定順着船邊的繩子滑下去。船邊和船底的藤壺劃傷了我的腿，但海水涼爽而舒適，感覺棒極了。

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似乎是在亨特之後離開二號貨艙的，他回憶說：

❶ 伊頓沒能倖存。

當我從貨艙出來時，四周都是臉朝下漂浮着的屍體。艙內積水越來越快，船也開始加速沉沒。隨着船不斷地下沉，我被瘋狂逃生的人羣推下了船。落水後，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自救，看到附近漂着一塊艙板，便立即朝它游了過去。我雖是個游泳好手，但當時身體非常虛弱，這塊艙板後來成了我的救命稻草。

弗蘭克·貝內特講：「我們的機械運輸中士斯基茨·蘭利（Skeats Langley）^❶抓住了我，他建議道，『我們做個木筏吧』。於是，我們找到了一塊艙蓋（一大塊厚重的木頭），在每個帶環螺栓上都繫了根繩子好抓住它，然後把這個戰利品沿着傾斜的甲板搬到最上面的欄杆那兒。」

此時，二號貨艙中的一些人已經虛弱到無法逃生了。轟炸員英格利斯（Inglis）說：「我的命是四位勇敢的皇家蘇格蘭軍團的士兵救的，他們問我為什麼坐在那裏一動不動，當聽說我是因為雙腿和雙腳嚴重腫脹而動彈不得時，^❷他們把我抬了起來，費力地沿着梯子把我抬到了甲板上。其中一個人甚至因為沒有救生衣了而向我道歉！」

皇家蘇格蘭軍團的卡斯伯特森（Cuthbertson）上尉是最後一個離開二號貨艙的人，他先下到船底檢查，確保所有活着的人都已經離開。

豪威爾說：

❶ 蘭利在戰爭中倖存。

❷ 英格利斯登船時患有腳氣病，在航行期間病情變得更加嚴重。

難以形容皇家蘇格蘭軍團副官所表現出的勇氣。他自己本已從那個急速進水的艙室裏逃了出來，卻又返回去安慰那些躺在下面的受傷士兵們。因為從底層貨艙通向上的樓梯搖搖欲墜，在逃生人羣的重壓下已經坍塌了，有些人從40英尺高的地方摔了下來，其中一些都已經死去幾個鐘頭了。卡斯伯特森盡心竭力地提供着幫助——給他們遞水，從船上的儲藏室裏翻出最後一支香煙，為斷腿的人綁上木夾板，或者只是說句安慰的話。當船最終沉沒時，他被一股湧入的水流沖出了貨艙。

目前尚不清楚是誰打開了前艙口，讓戰俘們從一號貨艙逃了出來，但豪威爾相信很有可能是他先前從三號貨艙裏放出來的炮兵們。^❶

這個貨艙中海軍的經歷像極了他們在二號貨艙中的戰友們。

新西蘭皇家海軍的林納伯格說：「我到甲板上時，發現那裏已經人滿為患了，海水正湧進我們逃生艙口旁邊的那個艙口裏，船尾已經深深沒入海中，船頭高高翹起。我在那裏站了幾分鐘，然後問他們為什麼不跳到海裏去，許多人告訴我他們不會游泳。」

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的法拉斯說：「我爬起來從船邊跳了下去。這段時間裏，一直能聽到槍聲，似乎是從船尾附近的一艘輔助船上傳來的。當我游離『里斯本丸』時，能聽到子彈打到我附近

❶ 戰後對皇家炮兵團的約翰·英格利斯（John Inglis）的採訪似乎證實了這一點：「我們放了其他貨艙中的人，並殺死了日本哨兵。」——來源不明的報紙剪報

水面的聲音。」

隸屬於皇家海軍的格蘭特·謝潑德（Grant Shepherd）被安置在船艙中部靠近後隔板的地方：

逃出貨艙前大約 15 分鐘，是我三年零八個半月的戰俘生涯中唯一一次感覺大限將至的時刻。儘管我不知該如何祈禱，但那時我還是在真誠地禱告着。我不曉得它是否能讓我逃出貨艙，但我最終得以逃生，還是多虧了一些素不相識的人，他們努力了很久，終於移開了（我所在的）靠近後隔板中央上方的艙口蓋。我跟着其他逃生者沿着我前方靠左舷的樓梯爬了上去。

皇家海軍的華萊士·黑斯廷斯（Wallace Hastings）是唯一一個前一晚想辦法睡着的人：

我想，那天晚上我們時睡時醒，我記得醒來的時候因為船向左舷傾斜得愈發厲害，很難坐起來。從船艙往右舷看去，通往上層甲板的梯子上擠滿了戰俘。就在這時，船突然晃動了一下——我不知道艙蓋是從貨艙內部還是外部被移開的——但通往上層甲板的通道被打開了。在隨後的混亂中，一兩根沉重的板條被撞鬆了，掉落到貨艙裏，砸傷了一些還在下面的戰俘。接着上方傳來了一陣槍聲，但很快就停止了。

與二號貨艙一樣，一號貨艙最後的撤離也是平靜有序的。波洛克中尉還返回貨艙取回了他負責的資金，看護兵甚至用毯子裹住了

兩具夜間離世者的屍體。

亞瑟·埃文斯（Arthur Evans）說：

當海軍隊伍中的第一批人爬上甲板時，他們發現二號和三號貨艙的陸軍已經出來了，數百人都已經跳到海裏去了，並朝着五六艘日本輔助船的方向游去。這些船正在「里斯本丸」和遠處隱約可見的陸地之間來回緩慢巡行。當海軍人員爬出貨艙後，有些人立即跳到水裏了，其中一部分遭到了日軍的射擊，而其他人則跟一些陸軍人員一起擠在船頭那邊。

埃文斯看到一個人拿着水壺，他也去貨艙裏拿了一個，然後帶到了日本船員的宿舍裏裝水。在那裏，他發現船員們因撤離行動而未有吃完的米飯還是溫熱的。

在羅斯上士^❶的帶領下，皇家陸軍軍醫隊從各個貨艙裏找到了大約 40 名傷病人員帶到甲板上進行急救。

海軍士兵們沒有經歷三號貨艙裏的進水和人們被卡在舷窗中溺亡的恐怖情形，所以還能保持鎮靜。他們熟悉船上的一切，因此不像其他部隊的人那樣急於跳海。

❶ 扎茲·皮特（Zazz Pitt）在戰後寫給羅斯母親的一封信中說道：「羅斯上士堅守病員至最後一刻，如果不是一位軍官嚴令禁止，他本打算不帶救生衣、只背着裝滿醫療用品的背包就游泳離船……（此後，在神戶戰俘營醫院的艱難環境中）您的兒子展現了最高尚的領導力、勇氣、責任感、耐心與無私精神。他讓其他護理員和病人（包括我在內）充滿信心。他承擔了遠超正常時期的責任，儘管他自己也因胃潰瘍病重去世（於 1944 年 5 月 15 日），却始終拒絕屈服或認輸。」

格蘭特·謝潑德說：

我在上層甲板看到的第一樣東西是藍藍的天空和平靜的海面。幾分鐘後，我們中的許多人互相擁抱，情緒難以自抑。因為在過去的 24 個小時裏，大多數人都以為那會是我們最後的航程。大約 15 分鐘以後，我們變得更加鎮定——鎮定到有些人甚至回到貨艙裏去了，錯誤地認為船會一直保持傾斜的狀態。這種誤判導致他們隨着船一起沉沒了。當我到達上層甲板後，過了大約半小時，船就開始向海底下沉，就在這時，我從右舷跳了下去，作為一個游泳能力很差又缺乏經驗的人，我完全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看護士官華萊士·黑斯廷斯是那些不急於離船的人之一：

傑克遜醫生告訴我們小隊要等到安全時才能行動。事實證明這是明智的建議，因為我相信那些立即離船的不幸者們遭到了附近船隻的射擊。我們在下面待了一段時間，直到上面沒了聲音後才爬了出來。上面的場景和那幅畫描繪的差不多（參見「『里斯本丸』沉沒手繪圖」）——船尾幾乎沉到了煙囪的位置，左舷附近的海面上到處都是漂浮着的雜物，還有許多正在泗水的人時隱時現。那天陽光明媚，海面相當平靜，由於船看上去沒有要繼續下沉的跡象，我們決定先去找食物或者是淡水，因為我們已經將近 48 個小時沒有吃東西了。我們找到了「寶貝」！那是一小桶糖，大家立馬抓起來吃掉了，這為我們在海中長時間游泳提供了能量。



「里斯本丸」沉沒手繪圖（W.C. 約翰遜繪製）

信號兵阿爾夫·泰勒（Alf Taylor）也發現了糖，「甲板傾斜的角度很大。我們極度缺水，但只找到了一袋被劃開的白糖。大家都吃了一點，卻發現在脫水的狀態下根本咽不下去。陽光燦爛，灑在海面上，像鋪滿了一層耀眼的鑽石。聞過貨艙裏的惡臭後，這裏的空氣清新得如美酒一般」。

平民亞瑟·埃文斯說：「我看到軍人們正向海中放下一艘救生船，它就在船的左舷、駕駛台附近（我想是在駕駛台後面一點的位置），我看着他們成功地將救生船放了下去，然後就划走了。」^❶

埃文斯並不知道，那艘小船上載着一位非常重要的乘客。

❶ 經田陳述道：「在船的右舷，我看到約十名戰俘試圖放下一艘舢板。我幫他們放下去，並向他們演示了如何正確放下舢板。」大約9點40分，他自己跳入海中，後被一艘日本巡邏艇救起。

10 點 30 分，距離斯圖爾特下令棄船已經過去 90 分鐘了，「里斯本丸」終於開始沉入水下。有人看到，皇家蘇格蘭軍團的副指揮官萊頓·威廉·沃克（Leighton William Walker）少校將自己的救生衣給了另一個不會游泳的人，而事實上，這也是人們最後一次見到他。海浪沖刷着甲板，將甲板上的傷病人員和其他人一起捲入了海中。隨着海水逐漸吞沒了船隻，霍普、潘廷、哈切特和懷特豪斯——這些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死硬派（die-hards）便永遠消失了^❶，他們曾經痛飲着繳獲來的日本威士忌，並為離去的戰俘們而引吭高歌。

華萊士·黑斯廷斯近距離目睹了船沉沒的最後時刻：

我們正坐着休息，可能在討論如何保存體力以應對即將到來的考驗，這時一個眼尖的同伴說船尾開始下沉，船就要沉沒了。聽到這句話，我們立即跳到了水裏，拚命地往外游，以免被隨之而來、難以逃避的吸力捲入其中。游泳逃生的過程中，我們能聽到空氣逸出船體的聲音^❷和超負荷的纜繩斷裂的聲音。不幸的是，一些游泳能力較差的人被捲下去了，但大多數人都浮了上來。還有一件事似乎沒有人提起過，但我卻記得特別清楚——當我覺得自己已游到安全地帶可以停下來的時候，我轉身看到「里斯本丸」最後的慘像，令我驚訝的是，桅杆仍露在水面上，一名倖存者正坐在橫桁

❶ 雖然威登通常觀察很準確，但他記錄潘廷死於 1943 年 3 月 12 日的日本戰俘營，可事實上那是下士潘廷。

❷ 指在沉船的過程中，船體內部的空氣會因水的湧入而被擠壓排出，通常會產生「嘶嘶」聲或「咕嚕」聲。——譯者註

上。我確信看護上士艾利森被崩斷的纜繩擊傷了，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因此不幸去世了。^①

弗蘭克·貝內特當時也在附近，他親眼目睹了沉船的最後一刻：「空氣逸出、海水湧入時發出了巨大的聲響，接着我就被捲到了一片翻騰的氣泡之中。我想起了沉船時人會被吸下去的傳聞，於是就在水下拚命的游動。我撞到了一兩樣東西，待我浮出水面時，船已經沉了，只剩兩個桅頂還露在水面上。」

此時，除了在夜裏死去的人、被日軍射殺的人、從梯子上跌回貨艙內的人，以及未能逃出三號貨艙的皇家炮兵團中的不幸者之外，其餘的倖存者不是在海中掙扎，就是拚命抓住桅杆勉強支撐着。

豪威爾在海浪中看到了船上最後的逃生場景：

海水不算太冷，海面平靜，陽光明媚。我在水中停了下來，回頭看了看那艘船。此時，船頭已經沉下去了，甚至那些根本不會游泳的人也不得不棄船。我最後看到它時，桅杆映照在天際線上。很快，除了少數爬上繩索的樂觀主義者之外，幾百人都在水中掙扎着。所有人都被水流帶着——無論是游泳、漂浮還是溺水的——朝着我最初看到的那座島嶼漂去了。

① 英聯邦戰爭公墓委員會（CWGC）的記錄證實，艾利森在到達日本後不久就去世了，就在沉船事件發生三周後。

現在，這是一場耐力的考驗。豪威爾發現的那些島嶼並不太遠，但當時（和現在）該區域的流體動力極其複雜。世界第三大河流、長達近 4000 英里的長江奔騰着匯入這片羣島的淺水域，穿過由大大小小、角度各異的島嶼交錯排列而成的巨大「篩網」，最終流入東海。洋流在這裏交錯匯聚，時而相互增強，時而彼此抵消，先朝一個方向湧動，又迅速轉向另一個方向，在東海形成了一片洶湧湍急的漩渦。

羅斯·林納伯格說：

夜間，船被拖到了距離羣島八海里左右的地方。我能看到驚濤拍崖，於是決定游向離我們大約有一到二海里那些船（四艘小型日本拖船和巡邏艇）。為此，我不得不與一股激流搏鬥，這股水流對那些游向島嶼的人有利，但對我們這些游向船隻的人來說卻是一種障礙。我的行囊中有一件海軍救生衣，但我剛登上這艘船時，就檢到了一件日本救生衣，我確信它還能用，而我自己那件橡膠做的「梅·蕙絲」救生衣^①可能已經老化了。傑克·里克斯（Jack Rix）沒有救生衣，所以我把我的海軍救生衣給他了。^②

上午 10 點 47 分，船終於消失在海平面之下。水中的人們再回

① 「梅·蕙絲」（Mae West）救生衣是一種二戰時期廣泛使用的充氣式救生衣，這種救生衣因穿戴後鼓起的形狀讓人聯想到好萊塢女演員梅·蕙絲（Mae West）而得名——她以豐滿的身材著稱。因此，士兵們戲稱這種救生衣為「梅·蕙絲」。——譯者註

② 多年後，里克斯在羅斯·林納伯格與其未婚妻伯妮斯的婚禮上擔任伴郎。

首時，只能看到桅杆頂端的橫桁。

吉姆·法拉斯（Jim Fallace）說：

我游了大約 100 碼之後，回頭看到在沉船的附近有四艘輔助運輸船。這些船都無意於營救水中的人或是仍待在被魚雷擊中的那艘船上的人。我繼續游着，不久後就聽到一些小的爆炸聲，回頭一看，發現這艘運輸船已經沉沒了，只剩下桅頂還露在水面上。之後，輔助船開始繞着游泳的人們轉圈，零星地救起一兩個人，而對其他人卻視而不見。我自己曾嘗試登上其中的三艘船，但有一次被船隻激起的浪頭沖回了水裏。

亞瑟·埃文斯說：「當船最終沉沒時，我環顧四周，海中有個人喊道，『我們慫了嗎？』所有人都回答道，『沒有！』放眼望去，海面上有數百個人頭。」

對阿爾夫·亨特來說，這是他自香港港口被從摩托魚雷艇上炸下來以後，再次在海水中游泳，「我入水後的第一個念頭與那艘船保持距離，於是朝附近幾艘船中的一艘游去。海面上人頭攢動，似乎有些船在徑直向游泳者們開槍」。

泰勒說：「數百人都已經落水了，一股急流正把人們往西沖，大約四海里外有些島嶼，那裏看起來巖石嶙峋，十分危險。四艘日本輔助運輸船正在緩慢地繞着『里斯本丸』轉圈。當游泳者靠近它們時，我聽到了步槍和輕型武器的射擊聲。日本人正把我們的人當作射擊訓練的活靶子，逐個射殺。」

事實上，在最初的一個多小時裏，這些船上的日本士兵向水中

的人開槍，^❶並將少數成功游到船邊並試圖爬上船的人踢回到水中。隨後，他們開始衝向人羣，把一些人從木筏上或其勉強抓住的漂浮物上撞到水中，並以螺旋槳威脅其他人。

詹姆斯·米勒說：「我注意到幾艘小船正在靠近，我驚恐地看到這些船沖向人羣，隨後便傳來機槍的聲音。倖存者們正在遭到屠殺，而我們對此卻無力制止。」

傑克·艾田蒲回憶道：「我們一起游着，看到日本巡邏艇向水中的人開槍。他們抓起一名炮手（柴爾茲），踢他的頭，然後又把他扔回水裏。我在他後面約 50 碼的地方游着，一艘日本巡邏艇把他撈起來，踢他的頭，又把他扔回到水裏。我明智地轉回身，設法躲過了一些步槍子彈，繼續游着。」

另一名炮手海伍德（Haywood）記述道：

我和戰友們游向那艘商船（一艘日本武裝拖網漁船）。在水中時，我們遭到了射擊。當我們游到離拖網漁船還有幾碼遠的地方時，船上扔下了一根繩子，被一名叫皮爾曼^❷的海軍陸戰隊員抓住了（後來我也不知道他的去向）。當他被拉上船時，一名日本士兵探出身來，射中了他的大腿，他又跌回到水裏了。於是，我決定游向那些島嶼。

❶ 許多在水中遭到射殺的人們身份都難以確認，但卡魯明確提到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下士查爾斯·亨利·哈特菲爾德（Charles Henry Hatfield）是以這種方式被殺害的。

❷ 約翰·愛德華·皮爾曼（John Edward Pearman）。這段引文來自戰爭罪行審判檔案中的一份證詞。

信號兵 R. 帕金森說：「我們游了回去。一等水兵奇爾克羅夫特（Chilcroft）和我找到了一小塊木板。」接下來幾小時裏許多人的經歷顯示，體力較弱的人會從他們抓住的東西上滑落，奇爾克羅夫特就是這樣溺亡的。之後，帕金森終被另一名戰俘拉上了日本的巡邏艇。

豪威爾說：「人們可能會認為，求生的意志幾乎是不可摧毀的。然而在接下來的半小時裏，我親眼目睹一位牛津大學游泳隊藍帶獲得者舉起雙臂，就這樣沉到水裏消失了，因為 26 個小時的黑暗和污濁空氣對一個幽閉恐懼症患者來說實在太難以承受了。」

此時太陽當空，已是正午時分。

八、漫長 游泳：十月二日下午

現在我真願意用千頃的海水來換得一畝荒地，草莽荊棘，什麼都好。

聽天由命吧！但是我真願意死在陸地上。

——《暴風雨》，第一幕，第一場^❶

此時，大約有 1750 名^❷英國戰俘落到了水中。那些不會游泳又抓不到任何東西的人最先消失，但是對那些會游泳或抓到大量漂浮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 年，第 307 頁。——譯者註

❷ 這個數字是通過以下方式得出的：在一號貨艙和二號貨艙中，波洛克（Pollock）和卡斯伯森（Cuthbertson）分別返回檢查，以確保所有生還者都已離船。這意味着沒有人被困在這兩個貨艙中溺水身亡，死亡者僅限於先前因疾病去世、在突圍時被槍殺，或從梯子上摔落致死的人。據估算，一號貨艙有 2 人（儘管他們在沉船前已被轉移），二號貨艙有 9 人，總計 11 人。然而，雖然一號和二號貨艙在 10 月 1 日至 2 日的人員死亡率平均為 41%，三號貨艙的死亡率却高達 62%。假設這一差異（21%）反映的是三號貨艙中在船沉沒時無法逃脫的人員，那麼換算成實際人數約為 70 人。若三號貨艙的死亡人數與一號貨艙相似，已有 2 人死亡，則最終隨船沉沒的總人數可估算為 $0+9+70+2=81$ 人。如果船隻離開香港時船上有 1834 名戰俘，而一號貨艙中已有 2 人死亡，那麼大約有 1751 人活著跳進了海裏。

物的人來說，最初似乎還有生還的可能。上海附近水域的海水在夏末時節並不讓人感到難受，風平浪靜，大多數人一開始還能看到其他戰友的身影。

但此刻距船沉沒已過去了一個多小時，很多人在水中也已泡了兩個多小時了，卻沒有一人獲救。

約翰·英格利斯（John Inglis）說：

聊以慰藉的是，我看到一名日本海軍軍官朝我拋來了一根繩子。我朝繩子方向游去，用盡最後一絲力氣沿着船舷往上爬，爬上去後，我緊緊抓着繩子，打算喘息片刻後作最後的努力爬上救援船，以獲安全。但那名日本海軍軍官不見了，一名士兵出現在了他的位置上。我懇求他「拉我一把」，但令我感到害怕、驚訝，甚至恐懼的是，他竟然打起了我的手。面對他的攻擊，我只能左閃右躲，同時厲聲咒罵他。他終於停了下來，總算讓我鬆了一口氣。但一抬起頭，我卻看到他刺刀上一陣寒光閃過。他故意將刺刀固定在步槍上，俯身拚命地向我刺來。我實在受不了了，大喊一聲「你個狗雜種！」，然後奮力一推，重新落到了海裏。

比爾·斯普納（Bill Spooner）回憶道：「那附近有幾艘日本海軍的船，他們從船舷上拋下了救生繩，一些快要溺水的人就順着繩子往上爬。然而，當他們攀繩而上時，日本人卻慢慢地把繩子重新放回海裏。如果有戰俘爬上了甲板欄杆，你就會聽到一聲槍響，緊接着一具屍體便落入了水中。之後，我們都遠離了日本船。」

阿爾夫·亨特（Alf Hunt）說：「這些船大小不一，其中一艘在

落水者中穿梭，它顯然是想撞沉他們。似乎沒有一艘船有意營救倖存者，於是我就朝遠處可見的陸地方向游了過去。」

時間慢慢流逝，但最終大多數戰俘還是都意識到他們已經在水中泡了好幾個小時了，短時間內獲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們或繼續努力地游着，或向海浪另一邊隱約可見的碧綠巖島划去。這些人當時尚不知，這些島嶼位於浙江省東北部杭州灣之外的東海海域，是舟山羣島最東端的島嶼。

舟山羣島是一個由崎嶇的島嶼、波浪和洋流組成的海洋迷宮。它是中國主要的漁場和最大的離岸羣島，從無人居住的小巖礁到有人居住的陸地，有 600 多個大小不等的島嶼。岱山、六橫、金塘、桃花、朱家尖，這些島嶼的名字讓人彷彿能聽到驚濤拍岸之聲。其中最大的是舟山島，其面積達 524 平方公里。

這裏是寒流與暖流的交匯之處，舟山羣島周圍的海域水淺而豐饒，長江與錢塘江的水流匯入其中，為各種魚類提供了豐富的養分。即使在今天，這片水域仍以盛產大小黃魚、墨魚和帶魚而聞名。普陀山以其秀麗的山峰與古剎，成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而在羣島最東南端有五個遙遠的、鮮為人知的島嶼——黃興島、廟子湖島、青浜島、西福山和東福山。這個位置偏遠、名曰「東極」的小羣島，即將見證其漫長歷史中最為紛亂的事件。^❶

❶ 有趣的是，浙江省西部地區在六個月前曾接待過許多杜利特爾轟炸機隊的飛行員，他們從航空母艦上起飛對東京發動空襲後，因飛機墜毀或跳傘降落在該地區。

倖存者們漂泊於海上，隨波逐流，時聚時散。下士托馬斯·羅爾夫（Thomas Rolfe）發現自己與來自三號貨艙的「胖子」貝茨（“Porky” Betts）和炮兵連軍需軍士「大胸」迪克斯（“Busty” Dicks）一起擠在一塊木板上。一等水兵比爾·塔夫斯（Bill Tuffs）和海軍陸戰隊員傑克·克羅夫特（Jake Croft）背靠背坐在一塊艙口蓋上面。他們只有一件背心，就輪着穿。中士「佩德勒」·帕爾默（“Pedlar” Palmer）、下士吉姆·皮克頓（Jim Picton）和下士哈里·佩勒姆（Harry Pelham）在一塊牀墊上漂浮了四個小時才被救起。中士詹姆斯·托馬斯·愛德華茲（James Thomas Edwards）坐在一塊木筏子上從他們身邊漂了過去，炮手亞瑟·赫明菲爾德（Arthur Hemmingfield）最後一次被看到時，正與另一個人共用一塊木板。^❶

約翰·英格利斯說：

在游過其他倖存者時，我遇到了我在炮兵連的炮手斯皮勒（Spiller）。他一邊狗刨一邊雙手抓着一網筷子，臉上還洋溢着燦爛的笑容。我問他：「你拿的是什麼鬼東西，斯皮勒？」他開心地笑着說：「是紀念品，中士。」「紀念品？」我難以置信地喘着氣。「是的，中士。『里斯本丸』的紀念品，中士！」在這種情況下還想着紀念品的家伙，你該說他什麼才好呢？^❷

羅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回憶道：「就在那時，我聽到有

❶ 愛德華茲和赫明菲爾德（皇家炮兵團）均未能生還。

❷ 炮手斯皮勒不到一年後在日本去世。

人喊我的名字。原來是惠特姆（Whitham）中尉，他一絲不掛地抓着一塊薄木板。」

為了給在香港的戰鬥中腿部受傷的惠特姆尋找救生圈，賴特游了出去。游經格林中士和其他幾名戰友時，他看到他們正抓着一塊從甲板上掉落下來、漂在水裏的廁板。當賴特游回時，惠特姆已不見了蹤影，但二等兵黑爾（Harc）扒在一個小木筏上漂了過去。有人幸運，有人則不然。^❶

比爾·斯普納（Bill Spooner）說：

洋流洶湧，戰友們的臨時木筏不斷地被沖向大海，然後又被沖回到遙遠的海岸線。我估計自己游了大概一個多小時，才爬上了一塊小小的方形軟木筏上。起初，只有我一人，後來，我又費盡全力地把兩名精疲力竭、奄奄一息的戰友也拽上了木筏。木筏載着我們隨着洋流漂過來又漂過去。那天陽光明媚，在臨時木筏上的戰友們與我們擦肩而過，朝着相反的方向漂去。

此時，後來的倖存者們經歷了三種不同的命運。^❷ 游泳能力較強的人能憑一己之力抵達這些島嶼，而那些仍漂在海上的人或是被島上的中國漁民救起，或是被日本巡邏艇救起（可能是因為日本人現

❶ 黑爾、惠特姆和格林全部遇難。惠特姆是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Sun Life Assurance）香港分公司的代理經理，居住在石澳。他從香港義勇防衛軍調至米德爾塞克斯軍團。

❷ 粗略估計，約有 60% 的倖存者被日軍救起，20% 被漁民救起，剩下的 20% 靠自身力量游到了島上。

在意識到會有倖存者）。

亨特屬於第一類：

海水溫暖，波浪起伏平緩，游泳的條件很好。我想辦法抓住了一個蔬菜貨箱，藉着一股強勁的向岸流順利地朝着岸邊游了過去。那片陸地其實是一個羣島，不幸的是，一些游泳者沒能成功上岸，被島嶼間的強潮沖回了大海。這些島嶼都很陡峭，巖石嶙峋，只有一處幾碼寬的小沙灘，我掙扎着爬了上去。四個小時之內，我估計自己游了四海里的距離。

賴特與二等兵唐尼·奧唐納（Donny O'Donnell）一起，也朝着東極島方向游了過去。^①大約有 200 人靠着自己的力量游到了這些巖石島嶼上。妨礙他們抵達這些島嶼的是橫流，它甚至能把最強壯的游泳者沖走並帶入大海。^②即使是那些有耐力對抗洋流的人，也面臨着登陸並攀爬懸崖峭壁的挑戰。

炮兵下士英格利斯回憶說：

當我靠近他們時，我看到一些人想游進一個非常狹小的海灣，但也看到湧浪如何變成怒濤，並將他們猛地沖向巖壁。我便大聲呼喊，警告他們危險之所在。許多人轉身離開，但有一兩個人仍然堅

① Qingbang Dao 和 Sing Pan 島（或 Tsing Pang 島）是同一中文名稱（青浜島）的現代和舊式音譯。

② 賴特等人提到一名軍官，他在接近午夜時被救起，並聲稱有數百具屍體從他身邊漂過。

持往那邊游。我特別認出了其中的一位，他是皇家陸軍軍醫隊的「吉米」·奧菲瑟（“Jimmy” Officer）少校，我一遍又一遍地喊他，告訴他不要進去，但他只是疲憊地搖搖頭，繼續朝裏游了過去。我已無力跟上他並施以援手，只能驚恐地看着他被浪峰捲起，被巨大的衝擊力撞向一塊冰冷的灰色巖石。他消失在狂暴的白色浪花中，片刻後，第二個浪頭又將他捲起，再次撞向了巖壁。^❶

豪威爾（Howell）作為第一個從船上跳下來的人，也是第一批抵達大島的游泳者之一。他用上海話^❷向當地的中國漁民解釋，這些溺水的人是英國人而非日本人。在此之前，中國島民們一直冷漠地看着溺水的「日本人」，但聽到豪威爾的消息後，他們立即展開了救援行動。轉眼之間，島民們的舢板已經下水，朝着戰俘們駛了過去。

其中一位漁民沈阿桂（Shen Agui）回憶道：「我們家所有的男人都衝出了屋子，看到海裏有一艘大船，它的後半部分已經沉到水下了。我們決定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

另一位漁民郭阿德（Guo Ade）補充說：「起初我們看到水面上漂着一些木塊和棉花。但令大夥驚訝的是，我們還發現海裏有許多人，正在呼喊著什麼。」

❶ 炮兵海伍德證實：「我們共有 53 人到了島上。我看到一名軍官，他的名字就叫奧菲瑟，曾負責香港的性病部門，被海浪沖至巖石上，溺水身亡。」海伍德的陳述摘自戰爭罪行證詞。

❷ 豪威爾熟悉上海話，因為他出生並成長於上海。然而，他十分幸運，當地島民聽懂了他的話，雖然這些島民有自己的方言。

沈阿桂說：「藍眼睛，黃頭髮和白皮膚。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英國人，但我們能看出他們是外國人……青浜島大約出動了 30 艘船，救起了 200 多號人。」^①

法拉斯（Fallace）便是其中的一位獲救者：

有一次，當我在幫助一位遇到困難的戰友時，我們距離一艘（日本輔助船）只有 5 碼遠，但沒人注意到我們的困境。我看到有個人登上了這艘船所拖曳的救生艇，於是便朝他大聲呼喊，讓他把救生圈扔過來。我接過後交給了戰友——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HKRNVR）的見習軍官拉洛（Laloe），^②然後我一邊游向岸邊，一邊還幫助着拉洛。最終在離我們登陸的島嶼幾碼遠的地方被舢板救起，並在島上過了夜。^③

泰菲·埃文斯（Taffy Evans）回憶說：「後來，我被一艘散發着魚腥味的小船救起（當時我幾乎已經撐不住了），然後被安置在了岸邊，我和其他人被帶到一個堆滿漁網的棚屋裏。」

連隊軍士長索登（Soden）也有着類似的經歷，他最終也被送

① 2005 年 4 月，舟山政府友好地邀請我訪問並會見了參與此次救援的三位漁民。沈阿桂與他的父親和叔叔在兩次往返中，救起了大約 7 人。郭阿德救起了大約 10 人。第三位王寶榮話不多，但據說他一個人救起了 20 人。

② 在法拉斯的原始報告中，他將拉洛稱為“Laolo”。拉洛在香港戰鬥期間因「英迪拉號」（Indira）遭受空襲而受傷。

③ 儘管人們忙於求生，無暇過多關注地理環境，但似乎最多的一批人起初登陸的是青浜島，這是距離沉船正西方最近的島嶼。法拉斯小組很可能登上的是當時無人居住的西福山島。

到了同一個棚屋裏，「大約在黃昏時分，我們被兩個中國人用一艘划艇救起。其中一個人脫下了我的襯衫和我手腕上連隊軍士長的徽章，只給我留下一塊兜襠布（fundoshi），那是一塊遮蓋私處的小布……我們被帶到一個溫暖的棚屋中，裏面堆滿了漁網，那裏的婦女給我們端來了熱騰騰的蔬菜湯和魚肉拌飯。最讓我感動的是，第二天早晨，一位中國婦女給我送了一件舊大衣過來」。

阿爾夫·泰勒（Alf Taylor）當時正和來自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二等兵費里斯（Ferris）一起在水裏游着。費里斯背部骨折，下半身癱瘓，他可能是從梯子上掉下來的人之一。他說：

到了晚上6點，我們開始靠近陸地，那其實是幾座突出海面的島嶼。顯然，如果不想被浪潮沖出島嶼之間的海峽，就必須努力向急流的邊緣靠近。這意味着我們要嘗試在迎風岸登陸，這是一項雖然危險但勢在必行的行動，因為如果被捲入島嶼之間的湍急潮流中，可能就無法脫身也無法在背風岸登陸了。

他們繼續游着，最終也被一艘中國漁船救起，草草地丟在了岸邊。泰勒獨自爬到更高處的村莊，向村民解釋說費里斯癱倒在了海灘上。村民們用一扇門當擔架，把他抬了回來。^❶

一艘中國漁船救起了安德魯·薩爾蒙（Andrew Salmon）和歐內斯特·普洛曼（Ernest Plowman），另一艘船救起了羅伯特·賴特和樂隊成員吉里（Geary）。在他們所在的島上，發現了至少85名

❶ 費里斯在16天後去世。

戰俘，包括中士羅賓斯、中士霍布森，以及二等兵本寧菲爾德、伍德、納爾遜、瓊斯和格林。他們還發現了一位中文流利的人^❶正打算着組織一次大規模的逃亡。信號兵托普克利夫（Topcliffe）也在那裏，他在途中救下了克里斯托弗·曼（Christopher Man）。

除了曼上尉，在場的其他軍官還包括皇家工兵團（RE）的少校英尼斯（Innis）、R. M. M. 金中尉和豪威爾中尉。那些游上有人島的戰俘們得到了當地村民的衣物和食物。

一個相對貧困的中國漁村能如此善待這些差點溺死的人，這讓羅伯特·賴特和許多其他戰俘感到驚訝：

一個中國人看到我身體被太陽曬傷，就在我的背部、胸部和肩膀上塗抹了一種奇特的藥膏，還遞給我一件棉襖，以防我在寒冷的夜晚裏捱凍。他們給那位肋骨骨折的皇家蘇格蘭軍團的士兵^❷包紮，並像喂嬰兒一樣給他喂溫熱的湯。村民們甚至將最後一點沒味兒的煙草分給了那些將嗜煙如命的人。這些中國人的實際行動足以表現出何謂善意和同情。

沈阿桂說：「我們把他們安置在廟裏和普通的民房裏。他們摸着肚子，用肢體語言表示自己餓了。但他們不會用筷子，就像用叉子一樣用。」

❶ 賴特提及的似乎是三名逃脫者中的一位——法拉斯、埃文斯或約翰斯通，他稱此人為「瑟索」（Thurso），但「里斯本丸」上並沒有這個人。

❷ 賴特提到一位斷了四根肋骨的皇家蘇格蘭軍團士兵，但沒有說出他的名字。

日本巡邏艇在確認已救起所有日軍倖存者後，開始改變策略，轉而打撈戰俘。這一轉變的原因在於他們認為「鱸魚號」潛艇已離開該海域、不再構成威脅，還是他們意識到有些戰俘會活下來並說出他們的經歷，這對泡在水裏的戰俘來說沒什麼本質區別。

傑克·艾田蒲（Jack Etienne）回憶：「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下午某個時候起，日本人開始援救倖存者。被救起的時候，我已經在水裏或游或漂地待了六七個小時了，他們給了我一個生土豆吃，那味道簡直好極了，這是我近 48 小時以來吃到的第一頓飯。」

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說：「我在水中已經泡了大約十個小時了……在這樣的逆境面前，人們會感到多麼的無助，現在只有奇跡才能拯救我們。而奇跡恰好降臨了，一支龐大的中國漁船船隊出現在大家眼前。日本船也開始打撈倖存者了。我是被救上來的幸運兒之一。」

華萊士·黑斯廷斯（Wallace Hastings）回憶了從離開「里斯本丸」到被日本船隻救起的整個溺水過程：

剛開始，天氣晴朗，氣候溫暖，海面平靜。遠處有一些船，更遠處依稀能看到陸地的藍色輪廓。為了減少阻力，我們脫掉了大部分的衣物和鞋子，我只穿了一條 Y 字型內褲，用懶人側泳的姿勢開始游，但根本不知道自己會被射殺、被救起，還是能游到遠方的岸邊。時間一點點過去，我們前進得很緩慢，船隻和陸地看起來仍和開始時一樣遙遠。人們感到極度沮喪，尤其是當同伴們無法繼續游下去而沉沒不見時。只有強烈的求生意志才能克服逐漸加劇的疲憊。幾個小時後，我無法估計具體的時間，當我們接近日本船隻

時，他們開始救我們上船。此時，大家幾乎都已經筋疲力盡，不得不被吊上船。

新西蘭人羅斯·林納伯格（Ross Lynneberg）也有類似的經歷：

當游近第一艘（日本）船時，我發現船的一側站着一羣小伙子，船上掛着的繩子被故意綁得很高，水裏的人根本夠不到。過了一會兒，螺旋槳開始轉動，船尾轉向我們，結果那些已經筋疲力盡的人被吸入了船底，而我們其餘的人及時游開，逃過了一劫。然後我環顧四周尋找更可能救人的船，追了幾艘後，為了避免被螺旋槳捲入而不得不游開。我決定再試一次，如果還不成功，就游向島嶼。最後一次努力成功了，我爬上了船。許多戰友沒有足夠的力氣自己爬上來，也無法把繩圈套在肩上，所以一兩個體力較好的人會下去把繩子綁在他們的胸口上，而我們則在甲板上將他們拉上來。^❶

許多戰俘在日本船的甲板上稍作休息、從煎熬中恢復過來後，

❶ 羅斯的優勢在於他是一名極為強壯的游泳者。作為蒂塔希灣冲浪救生俱樂部（Titahi Bay Surf Life Saving Club）的創始成員之一，他在戰前參加了許多訓練：「後來俱樂部舉辦了救生杯大型游泳比賽——所有參賽者從沙灘出發，奔向大海，游到浮標處再返回岸邊，衝刺到終點線。我記得比賽開始時，我的表弟弗蘭克（Frank）——在恩蓋奧（Ngaio）住我們隔壁，他並不是俱樂部成員——在槍響時與我一起出發。我不記得什麼時候再看到弗蘭克的，但當我拚盡全力完成比賽後，因過度勞累而倒下了，嘴裏罵罵咧咧，看到母親埃塞爾正用手帕擦拭我的臉。結果我成為了俱樂部的首位救生杯得主，而經查閱記錄——可能也是最後一位。」

便加入了救援行動，開始將他們的戰友拖上船。

威廉·格蘭特·謝潑德（William Grant Shepherd）就是這樣被救起的：「我是水中孤獨的游泳者，偶爾抓住漂浮的殘骸以緩解疲勞。我被一名之前獲救的戰俘拉上了船，我記得他的名字^❶——蘇格蘭皇家軍團的風笛樂隊隊長鄧肯·蘭金（Duncan Rankine）。」

丹尼斯·莫利（Dennis Morley）回憶道：「射殺停止後，我被一艘日本海軍船救起。他們給了我一杯綠茶和一支香煙，然後我幫忙把其他人拉上了船。」

韓美洵說：「船上的一個日本兵扔給我一根繩子，把我拉到船邊。我用力想爬上繩子，但令人驚訝的是我根本爬不上去，這在平時是輕而易舉的事。船上的一名英國軍官沃克登（Walkden）放下另一根繩子，我用繩圈套在胸口，他和另外兩名士兵把我拉了上去。然後我們組成了三人一組的小隊去拉其他人，但許多人漂過時，臉已經埋在了水裏。」

對保爾特（Poulter）來說，情況並沒那麼簡單：

我游到最近的拖船旁，他們從船邊扔下繩子讓人們抓住，我這一側大約有 20 個人抓著繩子。拖船開始移動，逐漸加速直至全速前進。它拖著我們行駛了大約五海里，然後停了下來。我這邊只剩下三個人，其中一人已經死了。他被繞在脖子上的繩子勒死了。我

❶ 像許多其他倖存者一樣，謝潑德記不得與他一起登上「里斯本丸」的人的名字，但記得事後看到的第一個人的名字。

們剩下的兩個人也精疲力盡。一個日本水手奉命示意抓着繩子的我登上甲板。我爬上了繩子，但就在正要跨過欄杆時，一名水手攔住了我，不讓我再往前走。我設法幫助其他一些人爬到欄杆邊，但當自己的一位軍官需要幫助時，我已是力不從心了，只把他拉出水面，就再也拉不動了。拖船又開始移動，他命我放手，這真是讓人痛心，但後來我還是看到他活了下來。

然而，正如弗蘭克·貝內特（Frank Bennett）的報告顯示，在靠近一艘船時，日本海軍人員可能會提供幫助：

我游到船的中部，那裏掛着一副帶有木製橫檔的繩梯。我抓住最底部的橫檔並用手臂勾住，抬頭一看，感覺就像在仰望埃菲爾鐵塔。「天啊！」我想，「我永遠爬不上去」。突然一張日本鬼子的臉從船邊探出來，催促我上去。我搖了搖頭，光是抓住繩子就已經用盡了我所有的力氣。接着，又出現了另一張面孔，在簡短交談後，兩個日本鬼子把繩梯拉了上去，而我仍掛在最下面的橫檔上。我被毫不客氣地拉上了船，扔到甲板上。其中一個日本人撕下一大塊棉布，塞給我，示意我好好擦乾身體。那時我才意識到自己一絲不掛。

上士羅斯和海軍軍醫上尉傑克遜最終被海浪沖下沉船時，曾試圖將傷員和病患聚集在一起，儘管其中的一些人還是沒有活下來。現在，這羣人也終於被救起，並被帶上了一艘日本巡邏艇。傑克遜特別擔心水兵托馬斯·埃克爾斯頓（Thomas Eccleston），他腿部受

傷，已經感染了壞疽。傑克遜在航行中只用一把鈍剃刀刀片為其進行了手術，救了他的命。

日本人還救了其他許多人，包括雷格·韋斯特伍德（Reg Westwood）、丹·奧漢隆（Dan O' Hanlon）、威登（Weedon）上校、格雷厄姆（Graham）上尉和巴克（Bucke）中尉。

但有一位軍官——備受愛戴的米德爾塞克斯第一軍團的指揮官「猴子」斯圖爾特，經歷了一次特別而優雅的救援。林納伯格解釋說：

在「里斯本丸」最終沉沒前，一些小伙子掃蕩了駕駛艙，無疑是為了尋找戰利品，他們發現了一艘平底船。上校（斯圖爾特）和另外一名軍官（或其他人）划着這艘船來到了我所在的日本船旁邊。與我們不同，他們衣着整齊，靠近船時還站了起來向小伙子們展示以如此新奇的方式獲救有多好。不幸的是，其中一個人一不小心把船弄翻了，所以最後幾碼他們也不得不游了過來，這讓我們狂笑不已。

弗蘭克·貝內特對這件事的記憶略有不同：「他們不知道這艘船已經被刺穿並灌滿了水。我看到四個人划着船，一名軍官坐在了船尾，所有人都浸在齊腰深的水中，但仍然端坐在船裏，這一幕真是滑稽。」

此時，日本人已經救起了沉船附近海域裏大多數倖存者。但由於人們分散在不同的島嶼和船隻上，沒有人能夠點名確認。當時，人們遠未意識到海流已經將許多人都沖走了。

在島嶼上暫時重獲自由的人們，無論是游到那裏的還是被漁民的船隻載到岸邊的，都審視起了他們的新處境。

阿爾夫·亨特游了很長時間，已是精疲力盡：「因為極度脫水，我的首要任務是尋找水源。四處搜尋後，我發現懸崖表面有一小股清澈的水流，在海灘上形成了一個水坑。那水喝起來就像甘露一樣，上岸的 100 多號人都喝了個夠。直到我們爬上鑿刻粗糙的台階到達懸崖頂部時，才發現這水是從一個（用作廁所的）小竹棚裏流出來的。」

在這個小島上，倖存者們埋葬了一具被沖上海灘的日本士兵的屍體，並遇到了一對當地的漁民父子，他們似乎是島上唯一的居民。這兩個人從小屋裏出來，帶着英國戰俘們來到他們儲藏食物的地方，給了他們米飯和紅薯。

炮兵下士英格利斯說：「回到小屋後，士兵們臉上都洋溢着各種滿足的表情，圍住這兩個中國人，紛紛說着『頂好』（dingho）以表達感謝之情。老人臉上露出了笑容，這些直白的感謝讓他感到高興。他的兒子用手比劃着想告訴我們——在另一個有燈塔的島上，食物和衣服都很充足。」

兩位漁民答應明天一早就回來接其他人，隨後便帶着五名最健壯的戰俘前往下一個更大的島嶼。^❶天下起了雨，氣溫也開始下降。

到 10 月 2 日日落時分，救援行動基本結束。幾乎所有在這期間倖存下來的人，要麼是被中國漁民救起的，要麼是被日本巡邏艇拾獲的，要麼是自己游到島嶼上的。

❶ 沈阿桂估計，大約有 100 人從西福山島（或廟子湖島）被運送到青浜島。

儘管仍有少數人幸運地從海上獲救，但約有 828 人^❶將永遠下落不明，大約 81 人^❷隨船沉沒，其他一些人在水中被槍殺或被日本船隻撞溺。而大多數人，無論生死，仍只是在大海上隨波逐流。他們會一個接一個地沉入海底，或者被沖上無人居住的海岸，曝屍荒島。

這大多數失蹤者是誰？讓他們及其家屬為自己發聲：

威廉·亞瑟·巴洛（William Arthur Barlow）是英國諾丁漢郡傑克斯代爾地區傑克斯代爾街（又稱石街）的 B. 布羅姆利夫人（B. Bromley）的兒子，也是伯特·布羅姆利先生（Bert Bromley）的繼子。威廉曾是傑克斯代爾議會學校的學生，後來在德比郡艾恩維爾的科德諾公園鍛造廠（Codnor Park Forge）工作。他在 18 歲時參軍，逐步晉升為香港皇家炮兵團第 12 海岸團的炮兵連士官長。他是一名出色的運動員，曾受過陸軍拳擊教練的訓練。同時，他還是個短跑和游泳高手，但沒能活下來。

威廉·詹姆斯·L. 博伊斯（William James L. Boyes）服役於香港皇家海軍艦艇「添馬艦」（HMS *Tamar*），他於 1919 年 7 月以少年技師的身份加入海軍。1920 年博伊斯成為機艙技師學徒，1922 年他是五級機艙技師，1923 年晉升為四級機艙技師，再到 1926 年成為三級機艙技師。截至 1929 年，他曾在多艘艦艇上服役，包括「印度號」（*Indus*）、「卡里斯福特號」（*Carysfort*）、「鷹號」（*Eagle*）、

❶ 843 人通常被引用為當天的死亡人數，但這一數字是基於 10 月 5 日在上海點名時的失蹤人數計算的。事實上，在沉船與點名之間的幾天裏，一些倖存者相繼去世，另一些人則尚未被找到，後來才被帶到了上海。

❷ 關於該數字的解釋，參見第 156 頁註釋 2。

「鷗號」(*Curlew*)、「森德爾號」(*Ceindre*)、「印度皇帝號」(*Emperor of India*)和「本鮑號」(*Benbow*)。在「里斯本丸」被美國潛艇「鱸魚號」擊沉時，博伊斯已是一名擁有 23 年航海經驗的首席機艙技師。但那一天，再多的經驗也幫不了他。

查爾斯·弗雷德里克·布魯克斯(*Charles Frederick Brooks*)於 1915 年 2 月 11 日在大雅茅斯加入皇家炮兵團，成為一名少年兵。在愛爾蘭、直布羅陀和馬耳他服役後，他於 1937 年被派往香港。1927 年，他在科克結婚，當時隨皇家炮兵團駐紮在卡萊爾堡，守衛科克港（1921 年南愛爾蘭成為自由邦，科克是一個「條約港口」）的軍港。他的長子傑弗里(*Geoffrey*)於 1930 年出生，次子羅納德(*Ronald*)於 1935 年 8 月 6 日出生在馬耳他。1937 年，他們全家搬到了香港，之後布魯克斯的妻子和兩個孩子乘坐「加拿大皇后號」被疏散到澳大利亞墨爾本。當他漂流在海上時，曾在香港作為戰俘寫的最後一封信仍在寄回家的路上。

皇家工兵軍士西德尼·查爾斯(*Sidney Charles*)於 1900 年 4 月 13 日出生在肯特郡吉林厄姆，當他與同伴們漂散後，最終一定意識到，自己將再也見不到妻子愛麗絲（兩人 1931 年結婚）和兒子大衛了。

來自蘇格蘭洛西茅斯的 43 歲的首席船長、服役於香港佈柵船^❶「巴蓋特號」(*HMS Bargate*)的安德魯·「安德拉」·弗萊特(*Andrew "Andra" Flett*)也在那一天失蹤了。他的姐姐伊莎貝拉尚未得知這一噩耗，但她對戰爭的悲劇並不陌生。18 個月前，她的丈夫約翰·高

❶ 香港港口設有防禦的浮游欄柵，這些設施在戰爭前夕從空中拍攝的百代(*Pathe*)新聞影片中清晰可見。

爾特（John Gault）就在海上遇難。他的漁船「金克拉文」從阿伯丁出海，於 1941 年 3 月 27 日不幸觸雷或遭到德國戰機轟炸而被摧毀。

托馬斯·哈密爾（Thomas Hamill）是皇家蘇格蘭軍團的士兵，1914 年出生於蘇格蘭法夫郡泰波特，1941 年 12 月 21 日他在香港島的戰鬥中受傷。一位戰友最後一次看到他時，他正獨自漂着，周圍環繞着鯊魚。他年僅 28 歲，其遺屬包括兩個兄弟（約翰和喬治）和七個姐妹（伊麗莎白、埃倫、瑪麗·簡、瑪格麗特、珍妮特、凱瑟琳和瑪莎）。

羅納德·蘭利-貝茨（Ronald Langley-Bates）1901 年 7 月 26 日出生於萊斯特。他的父親是一名雜貨商，他們住在雷蒙德路 77 號。1922 年 11 月 1 日，他加入了皇家工程兵團。1929 年，他在布羅姆普頓軍營駐紮期間，與凱瑟琳·艾薇·考克斯-羅傑斯（Kathleen Ivy Cox-Rogers）在牛津沃伯勒的聖勞倫斯教堂結婚。之後，他被派往香港，擔任第 40 要塞連的一級準尉（工程監督員），並用大量時間監督遍佈全島的碉堡建造，這些碉堡對防禦至關重要。除了短暫回英國度假外，他們一家人一直留在香港，直到戰爭爆發前夕。他有三個孩子（1930 年出生的道格拉斯、1932 年出生的德里克和 1933 年出生的丹妮絲），隨着戰爭的爆發，他們與其妻子一起被疏散到了澳大利亞。

珀西·阿爾伯特·喬治·羅賓遜（Percy Albert George Robinson）是他家族中第二代被敵人俘虜的人。他的父親（也叫珀西）是加拿大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曾在西薩里志願軍服役六年，擔任二等兵。老珀西·羅賓遜於 1914 年 9 月 22 日入伍，並於 1914 年 10 月 3 日乘船前往英國。1915 年 2 月 8 日，他隨所屬營（加拿

大第二步兵營，東安大略團）一起前往法國。僅僅兩個多月後，在4月24日，他的雙肺受傷，成為被德國人俘虜的約2000名加拿大人之一。26年後，在新的戰爭中，他的兒子——一名年僅22歲的皇家工兵團第40要塞連的工兵——也被俘虜了，但這次是被日本人俘虜。他卻沒有其父那般走運。

弗雷德里克·塞繆爾·斯坦福（Frederick Samuel Stanford）出生於1901年，是個地道的倫敦東區人。他是達格納姆一位富裕店主的兒子，因為嚮往自由，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離家，遊歷英國各地，最終來到格拉斯哥。由於強烈抗拒過早接手家族生意，他選擇應徵入伍，並加入了皇家蘇格蘭軍團。這在當時是很罕見的，畢竟該團通常只招收蘇格蘭人。這位身高5英尺7英吋^❶，帶着濃厚泰晤士河口口音的英格蘭人，最終還是加入了一個以蘇格蘭人為主的部隊。儘管個子不高，但他是一個安靜而堅定的人，其自信和舉止讓他在軍隊中頗有威望。

斯坦福受過良好教育，儘管他在年輕時離開了家，但他成為了格倫科斯的一名教官，教文盲士兵讀寫。他不顧雙方家庭的反對，與來自拉格斯的愛麗絲·麥高恩（Alice McGowan）結婚。他是在格拉斯哥一家電影院認識那裏的中場歌手、引座員愛麗絲的，儘管舉止自信、性格外向，但斯坦福還是無法鼓起勇氣直接邀請愛麗絲約會，常常選擇通過第三方傳遞信息。最終，對方通過一條消息告訴他，如果想追求她，就該親自開口！她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到，在多年婚姻中她深愛着斯坦福，令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整潔，無

❶ 約1.70米。——譯者註

論是穿便裝還是軍裝，他總是打扮得體。

多年來，他在軍隊中穩步晉升，直至成為連隊軍士長，並在1930年中期隨皇家蘇格蘭軍團第二營C連被派往印度。愛麗絲作為第一位生下三胞胎的軍人妻子，在印度和皇家蘇格蘭軍團裏出了名。不幸的是，由於他們所在的山地軍營缺乏醫療知識和設施，三胞胎在出生兩周後全部夭折。他們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家庭生活是典型的大英帝國式的：輕鬆的駐防任務、儀式性的活動、有僕人和勤務兵的優越生活。

斯坦福在戰爭爆發前不久被派往香港，他將剛懷孕的愛麗絲和兩個兒子（大兒子弗雷德里克和次子約翰）疏散到澳大利亞，自己則留在香港服役並等待退役文件。他本該在服役22年後離開軍隊，但日本入侵香港使其計劃破產。他原本期待着退伍後接回家人，在退休之後經營一家酒吧或商店，但卻再也沒能見到家人，也沒能實現自己的夢想。

皇家蘇格蘭團中士喬治·特林德（George Trinder），1904年2月23日出生於約克郡，並於1924年1月在赫爾加入皇家蘇格蘭軍團。四個月後，他晉升為代理下士，但很快又恢復為二等兵。到7月，他被分配到第二營，軍事表現被評定為「模範」等級，隨後便迅速晉升（代理下士、下士、代理中士、中士、三級準尉^❶、二級準尉——連隊軍士長），直到1941年9月成為團軍需軍士長。特林德懷孕的妻子莉娜·艾米麗（Lena Emily）和兩個兒子伯納

❶ 三級準尉、排軍士長曾作為短暫的試行軍銜。特林德於1938年10月獲此任命。

德（當時七歲）和喬治（四歲）於 1940 年 7 月從香港乘「日本皇后號」〔*Empress of Japan*，後更名為「蘇格蘭皇后號」（*Empress of Scotland*）〕疏散到馬尼拉，他甚至未能見到當月晚些時候在馬尼拉出生的第三個孩子查爾斯，其家人通過「阿瓦蒂亞號」的轉運，最終抵達了澳大利亞的布里斯班。

那一天，除了被銘記的十個人外，還有數百人被海流吞噬，而他們的家人和盟軍對此卻一無所知。

但是，那天晚些時候，美國監聽部門截獲了一條奇怪且混亂的日本無線電信息。這條發給日本「支那方面艦隊」^❶的信息，內容如下：

發件人：HO MU SI （信息混亂） 1942 年 10 月 2 日 22：08

收件人： （支那方面艦隊） JN-25-D-10

抄 送：I WE RE （信息混亂）

（第 65 警備部隊，威克）

（第二遣支艦隊）

（香港地區特別基地部隊）

NU YA TA

（原件譯者註：信息不完整。）

❶ 「支那方面艦隊」（支那方面艦隊）是「大日本帝國海軍」在 1937 年 10 月組建的一支艦隊。到 1938 年，該艦隊下有第三、第四、第五「遣支艦隊」，成為與聯合艦隊相當的大型艦隊編制。隨着太平洋戰爭的爆發，1942 年 4 月 10 日和 1943 年 8 月 20 日，「第三遣支艦隊」和「第一遣支艦隊」先後被解散。最終，「支那方面艦隊」下只剩下「第二遣支艦隊」。——譯者註

上海方面根據地隊^① (53253x) 行動摘要第 ____ 號

(1) 關於 10 月 1 日在東部 (68266x) 海域對陸軍 (運輸?) 船 (56652x) (「里斯本丸」?) 發動魚雷攻擊的敵方潛艇，立即展開了搜索和攻擊，行動持續至 10 月 1 日和 2 日，使用了艦艇和水上攻擊型飛機，但結果未知。

(A) 反潛行動 ____ (42834x) (48741x) 917 G 132 G134 G #1 ____ 丸。

(B) ____ 水上攻擊型飛機，總計 16 架。

(2) 至於 (船隻) (56652x)，____ 直接指揮。131 ____ 通過「早潮號」(HAYASHIO)^②，立即 ____ 和 ____ 拖曳作業。10 月 2 日 10:45，方位 136-17 海里，距離 (____ (羅盤方位)30) 約 10 米。

(3) 上述獲救倖存者狀況如下：

(A) ____ (#) (其中 1 人死亡，1 人 ____)，下落不明 1 人。

(B) ____ 全部。

(C) 在 1800 名戰俘中，除了 ____ 被拘留外，正在進行調查。^③

這是外界首次得知這艘遇難船隻上載有戰俘的消息，但在上海附近的海域，這場悲劇還遠未結束。

① 「上海方面根據地隊」(上海方面根拠地隊)是「支那方面艦隊」的直屬部隊，由 1939 年 11 月「支那方面艦隊」改編的第一基地部隊組成。——譯者註

② 「早潮號」(Hayashio)是「陽炎級」(Kagero class)驅逐艦。其他資料中未曾提及該艦。

③ 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 (NARA)。

九、生存與死亡：十月三日和四日

貪饒的怒海把你們吐了出來。

在這無人居住的島上，

你們在一切人中間是最不適於生存的。

——《暴風雨》，第三幕，第三場^❶

不要怕。這島上充滿了各種聲音和悅耳的樂調，

使人聽了愉快，不會傷害人。

——《暴風雨》，第三幕，第二場^❷

在遠離救援船隻和島嶼的地方，數百名絕望而被遺棄的人已經溺亡了。還有幾百人仍在向外海漂去。有的孤零零地在水中漂浮，有的則緊抓着任何他們能找到的殘骸。

在這些人當中，比爾·斯普納（Bill Spooner）、皇家蘇格蘭軍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352頁。——譯者註

❷ 同上，第349頁。——譯者註

團的米奇·邁爾斯（Micky Myles）以及兩位身份不明的倖存者共用一個臨時筏子。自從比爾把後兩人從水中拉上來後，他們就一直處於很虛弱的狀態。

爬上筏子後，我、米奇和另外兩個家伙在海面上漂流着，時而朝着海岸漂去，時而又漂回大海。很快，曝曬、飢餓和口渴讓逐漸麻木了我們的感官。後來下起了瓢潑大雨，雨水澆在赤裸的皮膚上（我們早已丟掉濕透了的衣物——那已經成了累贅），而我們唯一的保護措施就是圍在隱私部位的小布條。真是讓人羞恥啊！

天空烏雲密佈，巨浪不斷撲向救生筏，拍打着我們的肚子，具體打到哪裏要看當時木筏朝向何方。諷刺的是，我們身處一條航道上，但沒有一艘船想要救我們——毫無疑問，日本人已經警告過所有船隻不許靠近。

上海附近的海域，船隻向來都是絡繹不絕，但在暴風雨中，即便船長願意停下來施救，但要從貨輪上辨認出人頭或是簡易筏子也絕非易事。

第一個溺水的人是坐在我後面的家伙，他都開始喝海水了。我想要阻止他，但他不聽勸，甚至還說服我說，這能防止身體脫水。於是，我也開始喝，但米奇強行制止了我。後來那個最先喝海水的哥們兒跳下了筏子。我依稀記得，我轉過頭時看到木筏的後角，另一個人橫躺在那裏，頭垂在海裏，和腳一起隨着海浪左右搖晃。我呆呆地看着他，頭也隨之晃動。當時人已經麻木了，震驚的感覺是

後來才有的。米奇接管了筏子，他輕輕地把逝者推到了水裏。

斯普納和邁爾斯是幸運的。48 個小時後（在此期間，他們的許多戰友已被海浪沖散到數十平方海里的海域中，幾乎沒有任何獲救的希望），中國漁民意外地發現了他們，並將二人帶到了一個島上。像他們這樣少數的幾個幸運兒，是在其他倖存者被救起後才被帶上陸地的。

我醒來時彷彿置身天堂之中，看到了一位年長的、天使般的中國婦女（沒有翅膀的那種），她穿着黑色褲子和黑色上衣（那是傳統的中國農民的衣服），灰白的頭髮按當地習俗編成了辮子。那時，她正用一個瓷碗和瓷勺喂我喝一種溫熱的甜湯，然後我又昏了過去。

另外兩個人則更加幸運。香港美國會（Hong Kong American Club）的經理弗蘭克·邁爾斯（Frank Miles）和皇家蘇格蘭軍團的士兵麥吉利夫雷（McGillivray）^❶，與其他十人一起擠上了一個大救生筏。他們是在災難發生後的第五天早晨才被救起的，是當時筏上僅剩的兩名倖存者。

但是這些少數在海中存活多日的人只是例外，大多數未被日本巡邏艇救起的人，要麼在 10 月 2 日天黑前就抵達了島嶼，要麼就已經溺水身亡了。

❶ 邁爾斯活下來了，而麥吉利夫雷（卡魯的記錄中誤寫為「麥吉爾夫雷」）則未能生還。

吉姆·法拉斯（Jim Fallace）說：「第二天（10月3日），我和其餘80多名同樣到這個島上的人一起，被舢板帶到了青浜島的主島上。我們在那裏的寺廟得到了一碗米飯，還有一些中國人送了些舊衣服給我們，這自然是非常令人感激的。當時大約有200人^❶登島。」

英格利斯回憶起第二天早晨運送這些人的小船隊，他說：

從晨霧中首先出現了一艘舢板，緊接着又出現了大約十艘。大家不由自主地歡呼了起來，士兵們互相攙扶着走向水邊，等待着舢板靠岸。領頭的船展現了精湛的駕船技術，靠近了巖石嶙峋的岸邊，船伙用一根長長的竹篙撐住船身以躲開巖石，同時示意我們由於海浪太大，他只能載六個人……舢板一艘接一艘地靠岸，載上人後划離岸邊，然後再折返回來繼續接人。

一登上青浜島，他們就與戰友們重聚了。所有人都只為自己能夠倖存下來而感到慶幸。人們渾身濕透、傷痕纍纍、病痛纏身、又累又餓，許多人整夜都在寺廟裏睡覺，10月3日早晨醒來時，夢寐以求的依然是食物。

阿爾夫·亨特（Alf Hunt）在那天清晨說：「寺廟裏擠滿了還在熟睡的人。外屋和草堆裏也擠滿了人。後來我才知道，村民們救起了大約300人，並在他們陸續抵達時給他們提供了食物。」

❶ 關於被中國漁民營救的倖存者人數與被日軍從海上撈起的戰俘數量，各方說法不一。但普遍認為有300多人成功登島（當地島民自稱救起384人），另有500餘人在海上被日軍救起來了。

與此同時，在海上，「鱸魚號」潛艇仍在這片海域活動。它還在尋找獵物，並已移動到了覆蓋台灣與東北方海域之間的航線位置上。

10月3日 11:10

夜間抵達巡航區域。發現煙霧。全速航行，常規接近，但無法向目標（一艘 5000 噸的貨船）靠近至 6000 碼以內。當目標「船體隱沒」時，潛艇浮出水面。原計劃在白天繞行至目標前方，佔據新的攻擊位置，結果發現任務比預想的更困難。由於能見度極佳，且繞行目標的距離非常遠，最後決定在目標側前方等待至晚上。不幸的是，夜晚異常漆黑，目標位於地平線最暗的區域。嘗試定位目標長達三小時，最終放棄並返回巡航線。我們又一次找到了一個不錯的巡航點，但偏差了幾千碼而未能成功。下次將尾隨目標而不是嘗試繞行。

英格利斯回憶說：

島上的中國居民對遇難的倖存者們表現得極為慷慨。他們無私地拿出所有食物和備用衣物……我們都圍坐在一個柴火堆旁吃着熱氣騰騰的米飯，這時一位見習軍官舉起他的碗，對着一位看起來很有威嚴的人說話。那人穿着黑色棉襖和寬鬆的黑褲子，頭戴一頂類似官帽的帽子，用細線把銅絲眼鏡綁在了花白頭髮的後面。見習軍官舉着冒着熱氣的米飯碗，用英語、洋涇浜英語和中文的混合語言大聲對這個人說，「這個好，這個很熱，非常好」。「是的，」對

方回答道，「而且它對我們大有好處！」「天吶！」見習軍官驚呼道，「你的英語說得真好。你是島上的國王嗎？」「我不是，」那人哼了一聲，「我是皇家工程兵團的 W. 克拉克森 (W. Clarkson) 中尉。」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開懷大笑，包括「我們的威利」也笑了——他後來成為了大夥的堅強支柱。

然而，對於滯留島上的這些人來說，幾乎別無選擇。他們不能永遠依靠當地人的款待生活下去，而且許多人還急需醫療救治。雖然與友善的人們共度 24 小時的自由時光令人欣喜，但這一切終究要畫上句號。

信號員泰勒說：

在毫無希望的情況下，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發送煙霧信號，這被日本人發現了。那天中午，他們乘着小船來到島上，要把我們帶走……這些日本人戴着海軍陸戰隊的徽章，大喊大叫，推推搡搡，引起一陣混亂。

漁民沈阿桂回憶：「日本人到來時非常殘暴，他們吹着哨子，端着刺刀。英國人別無選擇，只能投降。」

泰勒繼續說：

一隊人搜查了所有的房間，用刺刀戳進乾草堆，把整個地方翻了個底朝天，還把大家都集中起來。然後他們押送我們來到海灘，我們先上了小划艇，然後被帶到了海灣中的大船上……你從未見過

一羣如此衣衫襤褸的活骷髏。一上船，我們就被擠在了甲板上。下午的時候，我們得到了幾罐熱水，但沒有食物。

然而，亞瑟·「比爾」·埃文斯（Arthur “Bill” Evans）、威廉·約翰斯通（William Johnstone）和吉姆·法拉斯（Jim Fallace）^①這三位能力出眾、身經百戰的「老中國通」拒絕再被日本人俘虜並送回戰俘營。他們說服了當地漁民幫助他們，鄉紳胡棟林明知這樣做要冒巨大的風險，但仍決定將他們藏在村子裏，並設法引開日本人的注意。^②

法拉斯說：「（日本船抵達時）我們三人在此之前就已經與漁民們商量好了，讓他們將我們藏起來並設法幫我們逃跑。我們被帶到島的另一端，從早到晚一直都躲在巖石中，夜幕降臨時，又被帶到一位漁民的小屋裏。我們在那裏吃了一頓熱騰騰的土豆，並被允許睡在他小屋的地上。」

這三個人躲藏了起來，在日本士兵前來重新俘虜他們的戰友時一直藏匿着，希望能逃到未被日軍佔領的中國地區，與那裏的英國大使館取得聯繫。

舟山羣島有許多小島，倖存者們仍然散佈在這些島嶼上，有的是一兩個人，有的則是一羣。10月3日和4日，日軍花了大量時間搜尋「里斯本丸」上的戰俘——有些分散在小巖礁上，有些則已被

① 1996年，法拉斯收到時年84歲的王縵雲（May-Yung Wang Sun）女士的來信，她仍清楚記得14歲時全家照顧這三名戰俘的往事。王女士現居美國。

② 漁民王寶榮證實，這三人起初藏在他家裏，後轉移到人跡罕至的洞穴中。

中國漁民集中到了較大的島嶼上。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加的不幸。加雷思（Gareth）在談到他的父親——皇家海軍陸戰隊員亨利·盧埃林-威廉姆斯（Henry Llewellyn-Williams）時說道：

1980年，我父親患胃癌病危之際，向我講述了一些他從「里斯本丸」逃生的經歷。他是個游泳健將，成功游到了一座島上，他的雙腿被島嶼周圍的巖石嚴重劃傷。那一帶有幾座小島，他登陸的那座島上住着二三十個島民，他們對我父親非常友善，為他包紮傷口，提供食物，還找了一些衣服給他穿。

大約一天後，一艘小型日本巡邏艇靠岸了。他們正在清點倖存者人數，以便安排將他們送往戰俘營。艇上有三四名士兵，沒有地方容納我父親（他是那座島上唯一的倖存者）。為了防止他逃跑（好像他能逃到哪裏去似的），兩名日本士兵按住我父親，第三名士兵則用步槍槍托一個一個地砸斷了他的腳趾。

日本兵離開後，島民們給我父親喝了點酒，同時為他包紮了雙腳。幾小時後，一艘載有其他戰俘的大船靠岸了。日本守衛威脅要開槍射殺那些試圖攙扶我父親上船的島民，因此他不得不獨自一瘸一拐地上了船。

那些被日本人直接從海中救起的人則幸運得多。在日軍的船上，他們得到了食物，總體上還算受到了善待。許多老兵回憶說，他們在甲板上分到了熱騰騰的煉乳和餅乾。

弗蘭克·貝內特（Frank Bennett）與其他20多名倖存者同在一

艘日軍巡邏艇上，他說，「我們中有一些是海軍人員，他們認為日軍水兵比日本陸軍要好些。這顯然是因為日本海軍早年曾受訓於英國海軍，多年來承襲了不少英國的傳統」。

連隊軍士長索登（Soden）描述被日軍船隻救起時的情形：「我們登船後受到了團裏最受愛戴的指揮官斯圖爾特中校的迎接。船上的日本軍官對我們非常友善，還表示他們曾受過我們海軍的訓練。他們為死者舉行了完整的軍禮儀式，並為我們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軍樂隊成員亞瑟·阿爾西（Arthur Alsey）是10月2日最先被日軍救起的那批人之一，當時與大約75個人在同一艘巡邏艇上。他回憶道：

船還在沉船海域附近。天氣晴朗，我拿了一根木棍，削了兩個小時做成了一把勺子。10點半的時候，我喝了大麥茶，享受着清新的空氣，跟船員們閒聊，有幾個不錯的小伙子——其中一個叫我「舒伯特」，還唱了幾首曲子。我的舌頭腫了，嚼餅乾時難受不堪。不過船員給了我們不少香煙，他們與船上的日本陸軍不怎麼來往。

然而到了夜間，這些船上的情況便截然不同了。上海的緯度比香港高得多，秋天也來得更快。

到10月4日中午時，大多數人都已經上了日本巡邏艇，他們要麼是從海中被撈起的，要麼是從島上的庇護所裏被「營救」出來。

羅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說：「幾乎所有人都衣衫單薄，甲板上又寒冷刺骨，這種情況下，根本睡不着覺，獲救後的幾個夜晚簡直是煎熬。」

風勢越來越大，海浪拍打着甲板。冰冷的浪花浸濕了這些衣不蔽體的戰俘們。貝內特說：

船舷上有排水孔，用於排出湧上甲板的海水。此刻寒風正從這些孔中灌進來，寒風刺骨，我們像羊羣一樣緊緊地蜷縮在一起。天吶！簡直太冷了，周圍只能聽到牙齒打顫的聲音。於是我們決定讓裏層的人和外層的人輪流交換位置，這樣每個人都有機會暖和一下。就在一次輪換時，大家發現有人已經凍死了，他實在扛不住這種寒冷。那人的遺體被放在甲板上，而我們繼續交換位置，竭力讓自己的牙齒不要打顫。那是我人生中最寒冷的夜晚。

貝內特接着說：

我們指了指那具屍體，（日本水手）便離開了，不一會兒他帶着另一名水手回來，兩人合力將屍體拋入海中，接着他們又討論了好一陣才離開。半個多小時後，一人端着盛有飯糰的托盤回來，另一人則提着一壺熱氣騰騰的綠茶。這簡直就像是天降甘霖一般。

泰勒當時跟那些從島上被帶走的人在一起，他說，「黃昏後，船駛入了一個艦隊裏，儘管那會兒我們蜷縮在一起取暖，寒風依然刺骨難耐。大約在午夜時分，第一個人死去了。大家躁動不安，驚動了整船的日軍，他們還以為爆發了叛亂。當日本人最終發現只是死了一個戰俘時，竟無情地把屍體直接拋入海中，毫無人性可言」。

林納伯格同樣記得當時的寒冷：

「里斯本丸」沉沒的當天，我們算是幸運的，因為陽光明媚，曬乾了我們的衣服，也帶來了一絲溫暖。但接下來的兩天卻風雨交加、寒風刺骨，夜裏那些虛弱得無法動彈、無法靠活動取暖的人，早晨被發現時都已經凍得僵硬了。我和另外兩個小伙子一起輪流穿我的襯衫，三人相互依偎，搓着彼此的背來取暖。說真的，能促進血液循環的法子我們都試遍了，就為保住這點兒體溫。

羅伯特·賴特說：「平心而論，由於天氣實在太冷了，一些病情較重的戰俘被允許睡在煤艙裏，但甲板下的空間根本容納不下所有人。」

但是，這對那些已經死去的人來說沒有任何意義。賴特記得其中兩位——來自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二等兵威廉·斯蒂爾（William Steele）和皇家海軍機艙技師利斯（Lees）^❶。

賴特講道：「（斯蒂爾）個子很高，身材消瘦，人見人愛，是最人畜無害的一個人。雖然他不屬於我們連隊，但我已經開始喜歡他了，特別是因為他發自內心地渴望同胞之間能夠和平共處。而利斯儘管忍受着劇痛，仍然幽默地給自己逐漸萎縮的雙腿取名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來逗身邊的戰友們開心。」

倖存者們瑟瑟發抖、漉漉其身、驚魂未定、病魔纏身，船搭載着他們向上海行進。

❶ 賴特原本提到的是「一等水兵萊茨（Able Seaman Letts）」，但船上並無此人，可能三級機艙技師亞歷山大·利斯（Alexander Lees）的誤記。

十、上海：十月五日和六日

這損失是無可挽回的，
忍耐也已經失去了它的效用。

——《暴風雨》，第五幕，第一場^❶

那些被日本巡邏艇從海上救起的人是最先登陸的。這些小型船隻將戰俘直接送往大陸，他們在（位於上海和吳淞之間的）黃浦江畔的吳淞沙洲鐵路碼頭登岸。

弗蘭克·貝內特（Frank Bennett）就在其中一艘船上，「船靠岸後，舷梯被放下搭接到碼頭邊，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日軍士兵的身影。我們走到舷梯頂端，在感謝完船員們的關照後就準備下船了。必須承認，在船上的這段時間裏，我們沒有遭受到虐待、吼叫和訓斥，也沒有受到任何歧視。或許那些船員說的是真的，日本海軍確實受到了英國海軍傳統的影響」。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367頁。——譯者註

但這一切都將變得不同——在碼頭上，他們被移交給了日本陸軍。

連隊軍士長索登（Soden）說：「剛下船，我們就立刻注意到，隨着陸軍的接管，氣氛很快發生了變化。我的外套被扯了下來，只剩下一塊 18 英吋乘 6 英吋見方的纏腰布，讓我再次近乎裸體。」

隨後到達的是那些從島上被救起的倖存者。他們的狀況普遍更為糟糕。

貝內特回憶說：「有一大批新的倖存者被帶來了，這些人都是在『里斯本丸』沉沒時逃往各個島嶼的，這些可憐的家伙們個個都慘不忍睹，有的身上還帶着傷，所有人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傾吐。」

此時，日本看守將所有的戰俘集中到了碼頭，和田義雄中尉與臭名昭著的翻譯官新森對他們厲聲訓斥，十月的上海本就不算溫暖，戰俘們被強行扒掉了島上漁民贈予的厚實衣物，有些甚至是赤身裸體，其餘人也都衣着單薄。

比如傑克·艾田蒲（Jack Etienne）就說：「我跳船時還穿着襯衫、短褲和運動鞋，等我最終被救起時，身上就只剩下一條內褲了，很多人更是一絲不掛。抵達上海後，我們見到了那個之前負責看管『里斯本丸』戰俘的翻譯官新森。他『親切』地問候道，『你們中沒有一個人應該出現在這裏，都該像陷阱裏的老鼠一樣死掉』。真是夠『友善』的！」

丹尼斯·莫利（Dennis Morley）說得更直白：「這個混賬翻譯把我們往死裏折磨。」

連隊軍士長查利斯（Challis）回憶道：「大多數人身上只剩一塊纏腰帶。新森命令我們交出這些殘布，我無視了他的命令，於是被

他猛踢了襠部。」^❶

在碼頭寒風中排着隊的戰俘們，驚恐地發現他們的人數少了近一半。在此之前，他們還能安慰自己，「其他人」或許在別的島上，也可能被其他的巡邏艇救起來了。但此時此刻，真相已經明了，人們只是在徒勞地尋找着戰友的身影。

韓美洵說：「第 20 組的 50 名戰俘中，包括軍需軍士亨德森（Henderson）在內的 26 人已經不在了。豪威爾小隊中也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活了下來，而這已是普遍的情況。」

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講道：

大多數倖存者幾乎赤身裸體，飽受嚴寒折磨，個個精疲力盡，飢腸轆轆。更糟糕的是，我們坐在冰冷的石板碼頭上，沒人給我們提供哪怕一件保暖衣物或一條毯子禦寒。在登船的 1800 人中，大約只有 800 人生還。我們被機槍手們包圍着，不敢聊天，否則就有可能捱打。當天晚些時候，我們全被趕到一艘中國帆船的貨艙裏，在武裝士兵的看守下等候發落。這些看守極其殘暴，他們趁機搶走了所有人手腕上的手錶或手指上的戒指。你要麼交出財物，要麼就得挨槍托砸，以我們當時的處境，根本無力反抗。

所有倖存者都記得他們在上海度過第一晚時所栖身的那些船隻，雖然不舒適，但至少能擋擋風。華萊士·黑斯廷斯（Wallace Hastings）說：

❶ 引自經田茂戰爭罪行審判記錄。

那時已經是深夜了，我們被塞進停靠在碼頭邊的敞篷帆船上，空間擁擠得只能站着。很快就有人發現這些船曾運過大米，船板縫隙裏還能找到米粒，我們輪流彎腰撿了起來。

第二天早晨，我們被「卸下」船，在碼頭上列隊，不久後就有人給我們發放了衣物。這些衣物包括一件帶鈕扣的上衣和一種綁在腳踝處的褲子，有黑色或是深棕色，料子是燈芯絨的。此外，我們還得到了一種由帆布和橡膠製成的分趾靴。

威廉·保爾特（William Poulter）回憶道：「發來的每件衣物上都佈滿了虱子卵，換完衣服後，我們又被噴灑了消毒液，然後才被趕回船上。接着，又領到了一頓米飯和看起來像是洋葱湯的東西。我們太需要這些吃的了，尤其是那碗湯，總算讓身子暖和了些。」

詹姆斯·米勒說：「到第二天早晨（10月6日），一些戰俘已經被凍死，或者乾脆放棄了求生意志，任由生命消逝。日本人又開始跑來跑去，呼喊著命令，顯得無比焦躁。我們被匆忙地趕出帆船貨倉，回到了碼頭上。」

在吳淞船塢度過的第二天，士兵們的抵抗力還在不斷地被消磨着。此時，「里斯本丸」貨艙那污濁的空氣所滋生的隱疾，已經在許多戰俘身上顯現出來了，他們列隊站在秋日寒風中，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瑟瑟發抖。

海軍軍醫中尉傑克遜擔憂許多戰俘的身體狀況根本無法承受第二次航運（運往日本），他們唯一的生存機會就是留在上海。

羅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講述說：「在吳淞碼頭，英國皇家海軍的軍醫中尉傑克遜簡直創造了奇跡。我至今都還清晰地記

得，他坐在木箱上，那凡戴克式的鬍鬚隨風飄動，袖口的金穗帶在微弱的陽光下閃閃發光。他努力地在病患中篩選出那些病得更重的人，並與野村^❶爭辯哪些人適合轉運、哪些人應當獲准留下來。」

那些被留在上海的人確實已經病入膏肓。輪機長喬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於10月7日去世，代理海軍信號士官羅伯特·西蒙斯（Robert Symons）於10月12日去世，海軍士官長詹姆斯·托德（James Todd）於10月14日去世，看護兵格溫弗·托馬斯（Gwynfor Thomas）於10月15日去世，機械兵道格拉斯·霍德（Douglas Horder）於10月16日去世，他們所有人都死於細菌性痢疾。在接下來的幾天乃至數周內，信號兵約瑟夫·沃茨（Joseph Watts）、皇家工程兵團中士威廉·坎貝爾（William Campbell）、下士羅納德·凱恩（Ronald Cane）、佈柵指揮官^❷斯坦福·貝利（Stanford Bailey）、皇家工程兵團準尉查爾斯·希斯（Charles Heath）、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準尉埃里克·布徹（Eric Butcher）、工兵愛德華·斯通（Edward Stone）、皇家蘇格蘭團中士約翰·弗格斯（John Fergus）、下士唐納德·格蘭特（Donald Grant）、以及米德爾塞克斯第一軍團的下士羅納德·里夫斯（Ronald Reeves）也都相繼去世。他們的骨灰被裝入16個骨灰甕裏，合葬於吳淞的一座公墓之中。直到1943年1月，日本才允許紅十字會探訪戰俘營。

❶ 戰後文件明確表明，新森（Niimori）和野村（Nomura）說的是同一個人。

❷ 英國皇家海軍預備隊中的一個軍銜，屬準尉軍官級別，負責管理浮游欄柵（即用於阻止船隻通行的障礙物，文中指的是用於阻止船隻進入香港港口的屏障）的人。——譯者註

對那 800 多名逝者而言，這些都已無關緊要。然而，他們的家人卻要在數月之後才會得知他們的遭際。許多人甚至在親人離世後還在陸續收到他們生前寄出的信件。布魯克斯一家便是其中之一。

查爾斯·弗雷德里克·布魯克斯 (Charles Frederick Brooks)
香港 S 戰俘營 (日期不詳)

我最親愛的艾瑪：

距離上次去信告知近況安好已有數月，欣慰的是我現在依然無恙。衷心祝願你和孩子們身體健康，不要太過擔憂，相信我們很快就能團聚。

我將在幾天內離開香港，並會儘快再給你寫信。我希望家裏一切都好，但由於書信字數受限，就只能請你代我轉告大家我的近況。

傑夫和羅恩現在應該已經是地道的澳大利亞小伙了吧？我想他們一定讓你忙得不可開交。不知道傑夫有沒有變樣？他應該能在家裏幫上不少忙了。

好了，親愛的，因為字數原因，我不能再寫了。親愛的，振作起來，保持微笑，我把全部的愛都獻給你和孩子們。

永遠愛你的丈夫

查理

許多這樣的信件帶來了虛假的希望。大多數家庭都將它們寄往倫敦 (W.1 區) 公園街 2 號的殖民地部，作為他們的親人仍然活在

世上的證據。然而，殖民地部很快便擬定了一份標準回覆，正式粉碎了他們的希望：

關於您從令郎處收到的信件，我們必須說明，陸軍部和本部門已被告知有許多此類信件被送達，凡標註日期的信件，其書寫時間均在「里斯本丸」沉沒之前。據此推斷，這批信件應是在船隻出發前從香港被收集、寄出的。很遺憾，收到這些信件並不能證明已被日方列為失蹤人員的寫信者依然活着。

有鑒於此，國務大臣深感遺憾，他無法給予您任何關於您兒子仍然生還的希望……

十一、重返大海：十月七日至九日

讓他們痛痛快快地被追趕一陣子。

此刻我的一切仇人都在我手掌之中了。

——《暴風雨》，第四幕，第一場^❶

「鱸魚號」潛艇裏，船員們在污濁的空氣中氣喘吁吁。自從襲擊了「里斯本丸」之後，潛艇一直在水下潛航，此刻他們正在二氧化碳與水汽瀰漫的密閉空間中艱難呼吸。

距離最後一次聽到深水炸彈的爆炸聲已經過去了一段時間，水面上也沒有船隻發動機的聲音。於是，羅布·羅伊·麥格雷戈（Rob Roy McGregor）下令浮出水面。

當命令傳來時，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Garfield Kvalheim）正在控制室操作平衡歧管。該艙室還設有向壓載艙重新注入空氣的控制裝置，以便排水，讓潛艇獲得浮力上升至海面。麥格雷戈下令執行這一操作。片刻之後，潛艇再次在東海破浪而出，浮出水面。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362頁。——譯者註

控制室的後方是無線電室，那裏裝有「鱸魚號」的通信設備，包括他們的「編碼機」——這可以說是那個時期最安全的通信裝置。然而，「鱸魚號」的船員無需用那複雜的高安全性數據加密設備來讀取那天接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在浮出水面的過程中，他們接收到了一條明文信號。

克瓦赫海姆說：「我們收到了一則來自羅馬的新聞廣播，稱一艘美國潛艇擊沉了載有英國和澳大利亞戰俘的『里斯本丸』。不用說，當我們聽到這個消息時，整個潛艇陷入了沉默。」

羅馬稱美軍潛艇擊沉日本船隻

美聯社羅馬 10 月 7 日電 羅馬電台今天播報了一則東京方面的通報，稱一艘美國潛艇於 10 月 1 日在南中國海擊沉了一艘日本船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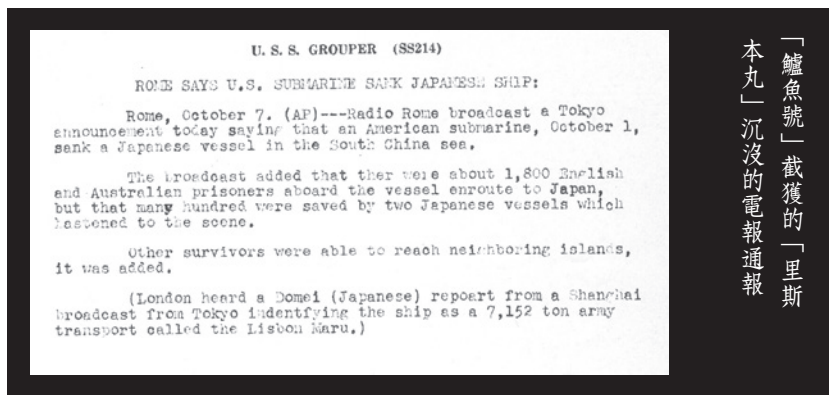
廣播還稱，該船正載着大約 1800 名英國和澳大利亞戰俘前往日本。事後，有數百人被兩艘迅速趕到現場的日本船隻救起。

另有部分倖存者設法抵達了附近的島嶼。

（倫敦方面則收到日本同盟社的一則報道，該報道自東京經上海播發，確認該船是一艘重達 7152 噸的陸軍運輸船，名為「里斯本丸」。）

幸運的是，「鱸魚號」的巡邏任務只剩下兩天，他們將在 10 月 9 日啟程返航。

然而，關於這起沉船事件的噩耗也已傳到了香港的戰俘營和拘



留營中。

曾在戰時服役於香港防空署 (Hong Kong's Air Raid Precaution) 的芭芭拉·雷德伍德 (Barbara Redwood) 當時尚不知情，但她與包括亞瑟·阿爾西 (Arthur Alsey) 和哈里·黑爾 (Harry Hale) 在內的船上數名年輕戰俘相熟，他們都是芭芭拉及其姐妹們的朋友。10月8日，她在赤柱拘留營的日記中寫道：

令人憂心的消息傳來，一艘名為「里斯本丸」的船載着英國和澳大利亞戰俘從南方港口出發後，被美軍潛艇用魚雷擊沉了。一些人成功游到附近的島嶼上，另一些人則被救起，還有少數人溺亡了，家屬們都憂心如焚。但有傳言說中澤 (Nakazawa)^❶ 已經保證目前還沒有士兵離開香港。

❶ 據推測此人是中澤 (Nakazawa)，他是日本佔領香港期間的日軍翻譯，並於1946年9月出現在對田中久一 (Tanaka Hisakazu) 上校的審判中。

香港義勇防衛軍（HKVDC）的米靈頓中士當時被關押在深水埗戰俘營，他在 1942 年 10 月 9 日（周五）時就已明確知曉，「今日從啟德機場^❶的中國工頭那裏得到信息，載着最後一批戰俘前往日本的船在上海以南的海域被魚雷擊中，僅有 300 名倖存者」。

同樣被囚於赤柱的戰俘軍官妻子珍·馬瑟斯（Jean Mathers）^❷幾天後聽到了詳情：

這場災難似乎永無止境。有消息稱，約 2000 名戰俘被押上「里斯本丸」，他們將被送往日本的煤礦、碼頭和鐵路做苦工。當船駛近上海時遭到魚雷襲擊。大多數人被關在甲板下面，根本無處逃生。少數人成功地游到了上海附近的一些島嶼上，其餘倖存者則被重新押往日本。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這都是一次沉重的精神打擊，而且由於缺乏可靠的細節，恐懼感愈發強烈……被押送人員的名單從未被公佈過，不知道自己的親人或朋友是否在船上的那種煎熬，只有通過偶爾傳到營地軍官手中的零星消息才能稍得緩解。

對這些士兵的妻子們而言，痛苦的是她們有辦法確認丈夫是否登船，卻無從得知他們是否還活着。在赤柱拘留營，她們會定期領取丈夫那點微薄的津貼，在排隊領錢時就能看到丈夫的簽名。米德爾塞克斯軍團曼上尉的妻子托普西·曼（Topsy Man）述說道：「有

❶ 戰俘曾被派往啟德機場（當時香港的機場）參與擴建日本軍用跑道的勞役。

❷ 馬瑟斯（Mathers）上尉並未登上「里斯本丸」。該引述出自珍·馬瑟斯的著作《扭龍之尾》（*Twisting the Tail of the Dragon*）。

人告訴我可以領錢了，我排在妻子們的隊伍中，看着她們認出珍貴簽名時流露出的喜悅與釋然之情，我感到無比欣慰。輪到我時，我拿到了比平常多得多的錢，但我只想看到那個簽名，它卻不在那裏。那一刻，我就知道他登上了那艘厄運之船。」

與此同時，在上海，倖存者們全然不知外界正討論着他們的命運，正抓撓着剛發來的日本燈芯絨衣服、內衣和無跟襪子裏藏着的虱子。到了傍晚，他們被押上了「新生丸」(*Shinsei Maru*)啟程前往日本。每個人的腦子裏全都是恐懼、飢餓與寒冷。

威廉·保爾特(William Poulter)說：

要是能吃上一塊鮮嫩多汁的大牛排，再加上滿滿的配菜，那該多好啊！但越想就越餓。晚上我們領到了一頓飯，裏面有魚、米飯、南瓜和紅薯，全都煮成了一鍋，像豬食一樣。你們聽起來可能覺得噁心，看起來也確實如此，但對我們而言，這就是吃的。這是我們六天以來吃的第一頓飯，我自己倒是感到很滿足。

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回憶道：「接到命令說，我們當晚要登上另一艘開往日本的船。戰俘羣中瀰漫着憂慮與近乎恐慌的情緒，我們實在不願再次冒險穿過美國潛艇的封鎖線，但身為戰俘，我們別無選擇。」

亞瑟·阿爾西說：「晚上7點，我們全部登上了『華盛頓丸』^❶，

❶ 該船既被稱為「華盛頓丸」(*Washington Maru*)，也被稱為「新生丸」(*Shinsei Maru*)。

被安置在日軍的下層艙室。艙內惡臭薰天，但我們睡得還算安穩。整艘船從上到下都骯髒不堪，我本來以為日本人是講衛生的！」

華萊士·黑斯廷斯（Wallace Hastings）講道：「那是一艘鏽跡斑斑的破舊廢船，看起來難以經得住海上的風浪，在船啟航前只有一件事令我記憶猶新：有人設法偷來了一大桶所謂的『大豆黃油』，大夥把它分了，這為我們下一頓的米飯和寡淡的燉菜增添了滋味。」

通信部隊的巴克中尉對該船的譴責更為尖銳：「這艘船在府中市註冊，是我見過的最骯髒的船，鼠患成災，積灰數寸，到處結滿蜘蛛網，空氣也無法流通，還滿載着日軍士兵和軍用物資。」^❶

不過也有一個好處。馬丁·威登（Martin Weedon）說：「雖然條件惡劣，我們被安置在通風最差的最底層貨艙之中，但大多數人還是慶幸至少這是個暖和的地方。」

軍需軍士保爾特對此表示贊同：

吃完飯後我們又進行了列隊集合，日軍清點了人數，並噴灑了消毒劑，然後我們就被押上了「華盛頓丸」或者「新生丸」。這次是一種日式牀鋪，只有一塊光木板，沒有毯子，但至少不用再在刺骨的寒風中捱凍了，而且我終於找到了我的兄弟^❷，總算能睡個覺了。

❶ 引自經田茂的戰爭罪行審判記錄。

❷ 上等兵伯特倫·保爾特（Bertram Poulter），同屬米德爾塞克斯軍團。

這一次他們算是走運，「鱸魚號」潛艇本可以輕易地上海附近海域設伏，用其剩餘的 17 枚魚雷中的一枚擊穿「新生丸」那脆弱不堪、鏽跡斑斑的船身。但它的巡邏任務已近尾聲，現在已遠在台灣以南海域。

此時，幾乎所有人都因營養不良、寒冷和極度疲憊而病倒，痢疾肆虐，甚至排隊都需要專人管理。「聽着士官在舷梯頂端喊『小便一位，大便兩位』，這場景真讓人覺得既可笑又可悲。」

作為船上高級士官之一的保爾特記述道：

夜裏，睡在我上鋪的兄弟因嚴重腹瀉發生了意外，結果全都漏到了我的胸口上，現在連背心都沒得穿了。我像維多利亞女王一樣，一點都笑不出來！^❶ 這艘船上的衛生條件非常糟糕，現在許多人都患上了嚴重的腹瀉，還出現了休克的症狀。你排隊去廁所，回來後又得重新排隊，等着下一次去，這都已成常態了。

當然，許多士兵根本撐不到空出蹲位的那一刻。皇家蘇格蘭軍團的卡斯伯森（Cuthbertson）上尉想要給予那些因脫水而瀕死的戰友們些許慰藉，便為他們朗讀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致少男少女〉（*Virginibus Puerisque*）。

❶ 此處保爾特引用了維多利亞女王的一句著名發言：「我們不覺得好笑（we are not amused）。」（亦有人認為女王實際上從未說過這句話。）——譯者註

我不在乎是否有人傾聽，
若他只為苟活度光陰，
不在意生活的浪漫旅程，
不視愛為超越生活必需的珍品，
也不曾將美帶來的饋贈，
看作人生最大的財富象徵。
但在某個春日的午後時分，
當蒲公英點綴金色的原野紛紛，
在春枝沙沙的樹蔭下漫步，
聆聽藍知更鳥那動人的歌聲。

金髮的你啊，
麗質天生，
洋溢青春，
早已為人生最後真正可貴的特權籌劃於心。
請讓這些我舊日的余溫，
成為你閒暇時光的友人，
那時我也曾走過——
甜美的二十到二十五歲的年輪。

然而，文學和善意難以拯救那些病入膏肓的人，他們相繼撒手人寰。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通信官肯尼斯·「奇皮」·揚（Kenneth “Chippie” Young）中尉最先離世，並被葬於大海。在航程結束前，還有另外四人也先後死去。

韓美洵當時和揚在一起，他說，「我和卡斯伯森上尉的鋪位之

間躺着一位得了白喉的米德爾塞克斯軍團軍官，他既不能進食也不能飲水，只能靠我們輪流用筷子蘸水滴入他口中時，才能些許緩解他的痛苦。當他去世後，日本人允許斯圖爾特上校在甲板上為其舉行葬禮儀式，隨後他的遺體被投入大海。日本人在得到了儀式的照片之後，對於後來去世的人，便只是草草將屍體扔進海裏了」。^①

繼揚中尉之後，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的德雷克（Drake）也在同一天（10月9日）被海葬了。^②

當大多數倖存者在前往門司的途中時，斯普納、邁爾斯以及一大批較晚獲救的戰俘終於抵達了吳淞。他們見到了之前被遺棄在那裏等待着的病患們。這些病患在奧弗里（Overy）中士的指揮下，由多名醫務人員照料着。^③

他們——像所有尚能呼吸的人一樣——慶幸自己還活着，但幾乎沒人意識到，在沉船的艙室內與垂死病患一起被關押的那幾個小時對他們造成了多麼嚴重的傷害。

① 卡斯伯森感染白喉並於日本去世。

② 其他可能被海葬的人包括：弗雷德里克·阿徹（Frederick Archer）、羅伯特·布羅姆利（Robert Bromley）和喬治·梅克爾（George Makel）。

③ 這些人在戰時的大部分時間裏被關押於上海的一處戰俘營，負責從舊日軍炮彈中回收無煙火藥，直到戰爭後期被轉移至東京地區。

十二、日本：十月十日

這兒有着一切的迫害、苦難、驚奇和駭愕；

求神聖把我們帶出這可怕的國土吧！

——《暴風雨》，第五幕，第一場^❶

「新生丸」於 10 月 10 日中午抵達門司港，這座港口是通往日本內海的門戶。那天上午，又有三名戰俘被海葬，分別是英國皇家海軍「色雷斯人號」(*Thracian*) 的弗朗西斯·卡辛 (Francis Cassin)、英國皇家海軍「添馬艦」(雖隸屬於「蟬號」) 的邁克爾·馬爾卡希 (Michael Mulcahy)，以及新西蘭皇家海軍志願預備隊 (NZRNVR) 的默多·斯圖爾特 (Murdo Stewart)。^❷ 這段航程讓所有人的健康狀況都雪上加霜。

日本政府敏銳地察覺到這是挑撥盟軍關係的公關良機，便迅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 年，第 366 頁。——譯者註

❷ 在這裏所記錄的人員中，斯圖爾特是唯一被銘刻於奧克蘭的新西蘭海軍紀念碑的人。

速行動起來。碼頭上等候的記者想要詢問戰俘們關於「美軍卑鄙的襲擊」之看法。凍得瑟瑟發抖的戰俘們根本沒有做好面對媒體的準備，但他們卻無法避開攝影師的鏡頭。

威廉·保爾特（William Poulter）說：「船剛靠岸，一羣新聞記者便衝上來提問關於『里斯本丸』沉沒的事情。沒幾個人願意好好兒回答，他們想讓我們承認日本水兵英勇救人，並咬定美軍潛艇是蓄意屠殺。我們才不會上當呢！」

當天下午拍攝的一張照片很快登載在日本雜誌 *Samura*（第4卷第11期）上，照片中，瘦骨嶙峋、滿臉胡鬚的戰俘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蒼老了30歲，而在照片一角，還有一個面目猙獰的富蘭克林·D. 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漫畫形象。^❶

無論戰俘們實際上說了什麼，同盟通信社很快便播出了對他們的「採訪」內容。英國廣播公司監聽部截獲了這段用英語播報的廣播：

倖存者中軍銜最高的海軍軍官（曾隸屬於駐港英軍部隊）S. J. 霍斯威爾（S. J. Horswell）鄭重聲明：他和他的下屬所獲得的待遇是他們所能期望的最好待遇了，（還補充道）日本官兵對我們極為友善——確實無可挑剔。我發誓所言句句屬實。當被告知在英國和其他地方的日本戰俘被當作罪犯對待時，這位英國軍官表示：我只能說，英國官員理應像我們受到的優待那樣對待他們。被問及

❶ 所有被詢問的戰俘都表示所謂的「採訪」是偽造的。這些採訪對了解「里斯本丸」的沉沒毫無價值，但作為戰爭宣傳的例證却很有意思（參見照片「『里斯本丸』倖存者在門司港登陸」）。

日軍圍攻香港期間所展現的戰鬥力與英勇表現時，霍斯威爾指揮官回答道：他們強悍、高效且無畏。更確切地說，他們的作戰方式光明磊落，^❶並具有體育精神。（當被問及他最想要什麼時）他說，我希望戰爭早日結束，這樣我就能回家與妻子團聚。如果有機會，我願向同胞和美國人廣播，讓他們知道，自己所了解的只是過去的日本，而這正是太平洋爭端不幸走向破裂的唯一原因。

皇家通信兵團49歲的查爾斯·D. W. 布朗（Charles D. W. Brown）中尉表示，日軍能在兩周內攻陷香港足見其效率之高。「說實話我無法描述親身經歷，因為戰鬥結束得太快，我還沒反應過來就塵埃落定了。」然而，布朗接着說，「日本空軍投下的炸彈命中率極高，只炸毀了軍事設施，幾乎沒有平民房屋受損」。談到在戰俘營的生活時……他表示……考慮到一切因素，香港的條件已堪稱優渥。在講述他自己的經歷時，他說他想感謝日軍為戰俘竭盡所能提供的一切。他還宣稱：他們的態度極為慷慨。

來自澳大利亞悉尼的矮胖中尉波洛克坦言，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當自己即將沉入水中被日軍救起的一刻，是人生最幸福的時刻。他還透露說，日本士兵立刻遞給他一杯熱水、幾片厚麵包和足以溫暖他冰冷身軀的毛毯。他表示，「所有獲救者都得到了同樣溫暖、友善的對待，這無疑是日本精神

❶ 事實上，霍斯威爾十分清楚，日本對香港的進攻自始至終都伴隨着對被俘的英國、印度、加拿大士兵（以及中國平民）的屠殺。此外，在這場戰役中，被俘後遭到殺害的盟軍士兵比例，遠超二戰中的其他戰役。詳見托尼·班納姆《絕無可能：1941年香港保衛戰》（*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1941*），香港大學出版社，2003年。

的真實體現」。當被問及對戰爭前景的看法時，波洛克中尉咧嘴一笑，「我毫不在乎丘吉爾、羅斯福或尊敬的蔣介石先生。對我來說，愛情至上」。他請求我們給住在悉尼北邦迪海灘路 149 號白金漢公寓的波洛克太太帶個話，告訴她、傑夫、傑西卡和芭芭拉，他受到了友好的對待，並且生活愉快。

但宣傳並未就此停止。

48 歲的斯圖爾特中校——英國戰俘中軍銜最高的軍官，聲稱他們是為英國及其盟友美國而戰，他說，他對許多戰友因美國潛艇的魯莽行為而喪生感到無比的痛心，這種悲痛難以用言語表達。

以上「引述」中唯一可能真實的內容，大概只有波洛克家人的地址。

倫敦勞合社在每周傷亡報告^❶中客觀記載：「『里斯本丸』。倫敦 10 月 10 日電。東京廣播今日報道稱，日本運輸船『里斯本丸』的倖存者今天早上抵達門司港，其中包括英軍戰俘，人數不詳。」

上岸後，戰俘們排隊接受體檢，檢查的方式是用一根玻璃管插入直腸。日本人覺得二等兵格林臀部上的文身十分好笑，上面寫着：我看你如同你看我。

除了這次粗略的檢查外，那天下午幾乎沒有其他活動。懷特說：「我們幾乎整天都在碼頭上，我被允許到水龍頭旁清洗身體，

❶ 1942 年 10 月 9 日至 10 月 15 日。



1942 年 10 月 10 日「里斯本丸」倖存者在門司港登陸，右二為波洛克（查塔姆皇家工兵博物館藏）

這讓我感覺好了些，只是不得不扔掉內衣，這讓我在寒風中更加暴露無遺。」

當晚 7 點，一列火車駛入碼頭，所有英國戰俘都上了列車，被送往神戶和大阪的戰俘營。^❶ 車廂很舒適，食物也不錯。儘管病得最

❶ 傑克·艾田蒲（Jack Etienne）證實是同一列火車將戰俘送往兩個營地：「運送戰俘到神戶和大阪的是同一趟列車。大阪戰俘營主要為皇家海軍、皇家炮兵團及少數皇家蘇格蘭軍團成員……比如馬西森、詹姆斯·科伯恩、查爾斯·杜西等等。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威廉·尤爾、湯姆·羅爾夫和埃里克·倫納德；皇家通信兵團的托馬斯·賴特、蒙塔古·特拉斯科特，以及其他一些人……」除了韓美洵外，所有皇家蘇格蘭軍團的軍官均被關押在神戶。炮兵約翰·英格利斯回憶稱，這是首班通過新建的下關海底隧道的客運列車。該隧道（關門隧道）於 1942 年 11 月正式開放通車。

重的戰俘已被送往醫院，但車上仍有許多人病情嚴重並在旅途中迅速惡化。

保爾特也在那趟列車上，儘管他的身體狀況比大多數人好些，他說：

我從守衛那兒討來幾根煙，他看着一根煙至少被六個人輪流抽，覺得很是滑稽。晚上晚些時候，火車在一個地方停下，我們喝了一些熱水，並帶上了一些裝有食物的箱子，供路上食用。我們每人都分到一個小食盒，看守稱之為「便當」，裏面裝着大麥米飯、小魚乾、海藻、鹽漬梅子、竹筍和腌蘿蔔。這些食物對我們的味蕾來說實在太陌生了，但大家實在是太餓了，狼吞虎咽，風捲殘雲。我有點鬧肚子，可能是被拖船拖着走時灌進了太多的海水，也可能是在碼頭吹風着了涼。

列車在小倉^❶短暫停留，病情最嚴重的 36 人被留在了那裏，這其中有 21 人都未能活下來。

阿爾夫·亨特（Alf Hunt）就在那批人當中：

在門司港登陸後，我與大約 30 名痢疾和白喉患者一道，在前往大阪的途中被送下了火車，安置在廣島和大阪之間的某間日軍附

❶ 小倉已不再作為獨立的都市存在，而是被併入了今天的北九州市。這座都市可謂是因禍得福：因為它原本是第二顆原子彈的目標，但由於主目標上空能見度較差，最終炸彈被投向了長崎。小倉是一座要塞城，其郊區的門司守衛着下關海峽。如今，門司也成為北九州市的一部分。

屬醫院裏。五周後，只有十個人活了下來。^①隨後，我們被火車送往大阪的體育場臨時醫院，那裏都是來自大阪和神戶兩所戰俘營的病患，我在那裏待了一個多月，這期間又有許多人死去。負責的海軍軍醫傑克遜醫術高超，他拯救了許多生命。之後，我就被送往大阪第一戰俘營了。

華萊士·黑斯廷斯（Wallace Hastings）是被派往該醫院的醫護之一：

我和其他幾名醫護人員在海軍志願預備隊傑克遜軍醫上尉的督導下，被派往大阪體育場臨時戰俘醫院。其他被分配到體育場醫院的醫務人員還包括看護士官托馬斯·麥克雷迪（Thomas McCready）、看護士官肯·巴格斯（Ken Baggs），可能還有其他一些人，但我記不起他們的名字了。此外，還有被指派擔任炊事員和助理護理人員的，他們來自不同的兵種，我記得裏面有：皇家海軍陸戰隊的約翰·奎因（John Quinn）、皇家工程兵團的哈里·佩勒姆（Harry Pelham）、一等水手肯·哈格爾（Ken Hagger）、皇家海軍電報員傑克·休伊森（Jack Hughieson）、皇家海軍一級鍋爐工詹

① 在這些醫院去世的人包括：

小倉：約翰·艾利森、弗雷德里克·艾爾斯、詹姆斯·巴傑爾、約翰·福斯特、埃德溫·古德溫、萊斯利·穆萊特；

廣島：羅納德·貝爾斯托、托馬斯·卡斯爾、約翰·達菲、弗雷德里克·戈德史密斯、詹姆斯·哈里森、科林·哈特、愛德華·休伊特、唐納德·馬瑟森、托馬斯·馬修斯、梅爾維爾·摩根、歐內斯特·尼爾、亞歷山大·泰勒、威廉·蒂布爾、托馬斯·沃爾。

姆斯·凱萊赫 (James Kelleher)。還有其他人，但我想不起他們的名字了，另外有位名叫吉布斯^❶的平民也在其中。這座醫院設在體育場的地下區域，我們從未見過外部的景象，整個醫院由一條筆直的通道構成，長度約在 60 到 100 碼之間。

這座臨時醫院拯救了許多生命，但也見證了更多人的臨終時刻。

列車的第二站停靠在廣島，又有 51 名重病患者被送下列車。第三站抵達神戶，大約 500 名皇家蘇格蘭軍團和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士兵下車後，開始步行前往戰俘營。火車繼續穿越黑夜前行，最終在大阪停下，剩餘的 326 名戰俘在此下車，他們同樣列隊走向城鎮中心的戰俘營，其中有 9 人則被當即送往醫院。

韓美洵回憶道：

當我們抵達大阪時，狀況十分淒慘。我們大約有 350 人，包括 7 名軍官，其中 3 名是皇家海軍軍官，波洛克中尉是我們的最高長官。在 4 名陸軍軍官中，有一位曾是《每日郵報》(Daily Mail) 的分銷經理，還有一位是當初為我們打開逃生艙門的「紅毛」豪威爾 (“Ginger” Howell)。

10 月 11 日下午一點半，神戶的戰俘一行抵達了他們的目的地，新任戰俘營長森本 (Morimoto) 做了自我介紹，並命令所有人

❶ 無線電操作員弗蘭克·沃爾特·吉布斯 (Frank Walter Gibbs)。

簽署一份保證書，承諾不會逃跑。

羅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說：「這簡直荒唐可笑，因為我們的反抗意志早已消磨殆盡，既沒力氣也沒膽量嘗試逃脫……新營地由兩座紅磚倉庫組成，帶有鐵欄杆和百葉窗，窗戶上還有木條，整個地方看起來陰森恐怖。諷刺的是，戰前這裏曾屬於一家英國航運公司。」

賴特的戰友威爾遜幾乎站不起來了，他睡在賴特的一側，而另一側躺着同樣病重的傑克·戴利（Jack Daly）^❶。經過一整天的折騰，賴特倒在木地板上沉沉睡去，這是他記憶中睡得最熟的一次。他的兩位同伴也睡着了。

但他們再也沒有醒來，黎明時分，賴特發現兩人都已斷氣了。

保爾特回憶說：

我們所有人都被迫參加了一部分的葬禮儀式，地點就在神戶屋對面的一片空地上，對我們來說，整個過程都令人厭惡。那個負責神戶地區戰俘營的日本軍官用日語向我們訓話，教我們如何鞠躬。我因為腰彎得不夠低，後背被槍托砸了一下。我真想操練他一番，這個老混蛋。我那天晚上過得極其痛苦，腹瀉不止，而且失血嚴重。

遲至 10 月 12 日，英軍服務團（BAAG）75 號情報員才向在桂

❶ 英聯邦戰爭公墓委員會將威爾遜和戴利的死亡日期列為 10 月 1/2 日，對於在沉船之後數日內死亡的人，相關記載存在諸多不一致之處。

林的賴廉士（Lindsay Ride）中校報告：

賴廉士 桂林

祈德尊 75 號 20/10 電。來自 GEOGRE 新聞 12 日。「里斯本丸」運輸船遭魚雷襲擊。船上 1816 名戰俘。約 900 人倖存。916 人失蹤。倖存者已抵達門司港。以下人員安全。霍斯威爾（Horswell）指揮官。傑克遜（Jackson）中校。霍頓（Houghton）上尉。布朗（Brown）中尉。失蹤人員包括。伍德（Wood）中尉。蘇格·沃克（Sugar Walker）少校 W. 倫布魯克（W. Wrenbrook）少校。M. 格林伍德（M. Greenwood）少校。首次攻擊發生在 10 月 1 日上午 7 點。共發射六枚魚雷。第二枚命中船尾。我們掌握的情報是 600 人來自 ALFS，1200 人來自 POINTERS。^❶

祈德尊

然而，對這批香港戰俘而言，無論是身處神戶、大阪戰俘營，還是門司、廣島、小倉、大阪的醫院，真正的考驗都才剛剛開始。

❶ ALFS 代表「深水埗戰俘營」，POINTERS 代表「北角戰俘營」，GEORGE 代表香港。因此，這一引文很可能來自日軍英文宣傳報紙《香港新聞》（*Hong Kong News*）。所謂的「少校」格林伍德很可能是皇家海軍受委任電報員諾曼·T. J. 格林伍德（Norman T. J. Greenwood）。至於“Wrenbrook”仍身份不明，因為名單上並無此人。

十三、戰俘：日本，1942 年至 1943 年

他們一個一個倒下來，好像預先約定好似的，
又像受了電擊一般。

——《暴風雨》，第二幕，第一場^❶

隨後，他們紛紛倒下，接連死去。有 828 人在船上或周邊海域中喪生，另有 6 人在前往日本的途中死亡，這些人原本就已虛弱不堪。所有人就靠着這些令現在的人們為之駭然的飲食熬過了九個月——不僅分量少得可憐，還缺乏基本的營養物（尤其是維生素）。許多人還在香港戰役中負了傷，卻從未能夠臥牀休養和補充營養，而這些在今天都被視為是康復過程中至關重要的部分。

他們所經歷的巨大衝擊、沉船與逃生帶來的心理壓力、「里斯本丸」船艙那惡劣環境中肆虐的疾病、疲憊不堪與營養不良、禦寒衣物不足以及天氣寒冷——這一切都在不斷蠶食着他們的生命。

10 月 10 日，3 人死亡；10 月 11 日，8 人死亡。接下來就是零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 年，第 331 頁。——譯者註

星不斷的死亡，今天 3 人，明天 6 人……到 10 月底，僅在抵達日本後的短短三周內，就又有 83 人離世了。11 月、12 月情況略好，分別只有 23 人和 16 人死亡。但數字的下降實乃「達爾文法則」使然：唯有最強者才能倖存下來。

遠在香港的人們仍在努力接受這個巨大的打擊。芭芭拉·雷德伍德（Barbara Redwood）在 10 月 12 日的日記中寫道：

日本報紙上的標題駭人聽聞，10 月 1 日沉沒的「里斯本丸」滿載着香港的軍隊，據稱船上有 1800 名士兵，僅有 900 人獲救。老霍斯威爾（皇家海軍船塢警察指揮監督官）獲救後發表了聲明，其中提到格林伍德少校（軍銜可能有誤）下落不明，真為格林伍德夫人難過。還有一位伍德中尉失蹤，不知是不是瓊妮的丈夫，她此刻定備受疑慮的折磨。其實我並不覺得托帕·希德^①或者亞瑟會被歸類為「技術人員」（我們起初都以為被帶走的是技術人員），可現在每個人心裏都忐忑不安……

10 月 13 日。很難確信我們的親人仍安然無恙，因為今天的報紙報道了其他已抵達日本的戰俘，他們正在廣播着。恐怕沉船的正

是他們那批，也就是說，我們的小伙子們可能就在其中……

①「希德」（哈里·黑爾，皇家蘇格蘭軍團）因病情過重被留在了上海，他因此成為該批戰俘中少數活到戰後的幸運兒。亞瑟·阿爾西雖登上了「里斯本丸」，最終也倖免於難。瓊妮是幸運的——她丈夫（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成員）當時並不在船上。然而她的護士同事康斯坦絲·戈弗雷尚不知曉，其丈夫阿爾弗雷德·戈弗雷中尉（與皇家炮兵團同困於三號貨艙）已罹難。

「里斯本丸」的沉沒只是悲劇的開始。在 1942 年這個痛苦的年頭結束之前，又有 200 名沉船倖存者相繼死去。

而在大阪的那羣人剛安頓下來後，就意外得知他們將接受電台採訪。

韓美洵講述道：

我們抵達大阪後不久，一些人就被告知能在廣播中向家人報平安，並且我們可以在其中加入關於「邪惡的」美國人如何擊沉「手無寸鐵的」戰俘船，以及感激「勇敢的」日本人救了我們性命的相關內容。那些與我們接洽的電台工作人員似乎對他們自己的宣傳深信不疑。我們自然嚴詞拒絕了。他們隨後又說，廣播內容也可以僅限於個人信息。關於這種做法是否違反了〈國王條例〉，我們經過了一番激烈的討論，最終認定並無不妥，並告知士兵們，如果戰後因為此事出現任何後果，我們會向當局說明，是我們建議他們這麼做的（事實上並未有任何異議）。1942 年 10 月 29 日，我們錄製了廣播內容，包含了我們的姓名、直系親屬的姓名和地址，以及簡短的個人留言。英國廣播公司監聽部捕捉到這些訊息，幾天之內，殖民地部、英國紅十字會戰時組織以及聖約翰騎士團便將消息轉達給了我的父母。這條最新消息應該讓人多少得到些寬慰，因為此前英國媒體有報道稱，包括皇家蘇格蘭軍團在內的許多香港戰俘在「里斯本丸」上遇難。後來，我父親收到了大約 40 封來自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陌生人來信，說他們聽到了這段廣播。而他把這些信息又轉告給了親戚和朋友們。

失事運兵船倖存者將進行廣播

東京電台將播出 60 多段由運兵船「里斯本丸」倖存者錄製的簡短講話。該船於 10 月 1 日在中國海域被一艘美國潛艇擊沉，當時船上載有英國戰俘。廣播將於周一開始，持續大約一個月。

參與廣播的倖存者包括：

皇家通信兵團西里爾·愛德華·巴克中尉（32 歲），住址為薩福克郡伊普斯維奇基奇納路 3 號；皇家通信兵團查爾斯·布朗中尉（49 歲），住址為格洛斯特溫德米爾路；香港駐軍詹姆斯·斯賓塞·巴傑中尉（37 歲），住址為北威爾士卡那封穆裏奧步行街 14 號；前「添馬艦」海軍士官約瑟夫·米利肯（26 歲），住址為蘭開夏郡普雷斯頓達拉斯街 59 號；皇家蘇格蘭軍團詹姆斯·史蒂文森中士（25 歲），阿伯丁人。上述人員均在香港被俘。

路透社東京報導

其中一段錄音的文字稿保存了下來，來自皇家海軍鍋爐軍士傑里邁亞·凱西（Jeremia Casey）：

我是皇家海軍鍋爐軍士 J. 凱西。如果有人聽到這段廣播，請轉告凱西夫人，地址是愛爾蘭科克郡聯合公寓……我們在香港被俘後在那裏被關押了九個月，這期間受到了良好的對待。9 月 27 日，我們被轉移到日本，不幸的是，途中船遭遇了潛艇的襲擊，導致我們中間有很多人喪生。我被日本海軍救起，幸運抵達日本後受到了

極好的對待。^❶

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這樣描述大阪：

營地不過是臨街的一處封閉院子，它只有一個入口，還有廚房、倉庫、醫務室和戰俘的生活區。洗漱設施就是由一根管子連着幾個水龍頭（只有冷水），廁所就是在地上挖的一個坑。我們這個營地大約有 100 人，營區裏已經住了幾名商船海員了，他們應該是最近被俘的，我們從他們那裏聽到的戰事消息全是壞消息。

韓美洵也在大阪，他說：

負責大阪和神戶地區所有戰俘營的日軍軍官村田上校把我們召集起來，發表了一次講話，這是他諸多演講中的第一次。他說我們將會得到很好的照顧，會按照「武士道」的光榮傳統來對待我們。我們必須注意自己的健康，保持乾淨，要用毛巾擦拭身體（我們沒有肥皂、毛巾或牙刷）。我們還必須向所有日軍軍官、士官及哨兵鞠躬敬禮，必須學會用日語報數，今後點名都用日語。勞動小隊將由英軍士官指揮，但必須用日語下達命令，準確地說，是「大日本語」（Nipponese），以後我們都得用這個詞。違抗命令或提出質疑將受到嚴厲懲罰，若是犯了一系列嚴重罪行，就會被處決。

❶ 已知其他有機會廣播的人包括：蓋·卡斯爾頓（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弗蘭克·科頓（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以及弗雷德·伍德海德（香港警察隊）。

在神戶的那批人遭遇的是另一種意想不到的情況。他們的營地由兩棟紅磚大倉庫組成，它們曾是香港太古洋行的貨棧，所有的窗戶都裝有鐵欄杆、百葉窗和木條擋板。

然而，當倖存者們抵達營地時，他們的身體狀況已極為糟糕。其中一棟倉庫的第一層被指定為醫院，有大約三分之一的戰俘（共 500 人）被收治，由羅斯上士負責管理。換作平時，所有人其實都應當被送入醫院。

馬丁·威登上尉（Martin Weedon）回憶說：「第一晚大家隨便找地方擠着睡，沒想到每人都被意外地發了五條毯子——雖然很薄，但遠超我們的預期。」

同樣被關在神戶的索登（Soden）說：

最初的日子是悲傷的，許多人因為得不到適當的治療而死去。第一次進行葬禮時，所有人都被帶到營地對面的公園列隊集合，當時還準備了像樣的棺材。後來死亡的人變多了，遺體就只能被塞進蘋果桶裏。我永遠都忘不了那些可憐的人被放在營地醫院外，等着被送去火化時散發出的氣味。至今每當聽到《滾酒桶》（*Roll Out the Barrel*）這首歌時，我仍會哽咽。

威登最初的希望很快就隨着白喉疫情的爆發而破滅了，就像在香港深水埗戰俘營發生的情況一樣。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裏，「死亡」成了他日記中的主題：

10月12日：海軍準尉在夜裏去世^①……

10月12日至17日：很難寫這段時間的事。真是一段可怕的時光。醫院裏有80多名病患——大多都是痢疾——幾乎整個營地的人都患有急性腹瀉、寒顫和休克……一車最嚴重的病人被送走了，像沙丁魚一樣被塞進一輛敞篷卡車裏，送去了所謂的醫院。我之後得知，有幾人隨後就去世了，包括卡斯伯森（皇家蘇格蘭軍團）、二等兵費里斯（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瓊斯（米德爾塞克斯軍團）^②、方廷（皇家工程兵團）和下士泰勒（皇家工程兵團）。營地內也新添兩例死亡，當他們被帶去火化時我也跟去了。遺體被裝進木桶裏，由靈車運走。我們驅車前往神戶山上的火葬場，目睹了木桶被放入火爐之中。第二天返回去取骨灰，這些骨灰將在戰後交還給親屬。我看着他們用筷子挑出一些較好的木炭殘骸，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事。

17日皇家海軍準尉麥克法蘭去世，18日皇家蘇格蘭軍團中士布斯去世，顯然最近離開這裏的人中又有幾位死亡了……

10月20日：另一批病人被送往大阪，或許那邊條件更好些。斯圖爾特上校和英尼斯都去了，上校看起來病得很嚴重，卻強撐着不表現出來。

① 可能是賈普。

② 瓊斯的父親是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連隊軍士長，在1915年一戰期間被列為失蹤人員。

保爾特是 10 月 20 日那批被送往醫院的人之一，他說：

我們被塞進敞篷卡車，兩個半小時不停的顛簸對腹瀉嚴重者來說真是耍命，抵達時多數人的褲子已經污穢不堪了。我算是比較幸運的，但也只是僥倖。我記不清路上看到了什麼，因為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其他地方了！醫院？其實就是大阪體育場或市岡（Ochinioka）^❶看台下方的空間。它比起我們之前待的地方，有兩處要略好一點：一是我們有了一位真正的醫生；二是這裏光線更好，空間也大一些。醫生是海軍軍醫上尉傑克遜，雖然眼下他還沒有醫療用品，但我們仍懷有一線希望。

疾病肆虐之下，戰俘們的士氣遭受了重創。

豪威爾說：「在隨後三年輾轉各戰俘營期間，我曾三次在清晨醒來時，發現身旁躺着一具看似完好無損的屍體。顯然是因為昨夜他們說過，『這種日子還要熬好幾年，我實在撐不下去了！』」

同一天，日本宣傳部門又傳播了一則爆炸性消息：

抵達門司港的「里斯本丸」倖存者控訴美軍暴行

目擊者講述英勇日軍營救英軍戰俘經過，揭露美軍潛艇

卑劣行徑造成的慘劇

1942 年 10 月 10 日（周六）下午 2 點，一艘信息不詳的船隻抵達門司，船上載有若干英國戰俘。他們曾乘坐搭載 1800 名英軍戰

❶ “Ochinioka” 現在通常音譯為 “Ichioka”（市岡）。

俘的軍用運輸船「里斯本丸」，但該船在中國東海區域被一艘卑劣的美軍潛艇擊沉。這些戰俘幾乎死裏逃生，全靠英勇的日軍奮不顧身地將他們從海中救起。我們的祖國、同胞們，看看事實！這些倖存的英國戰俘緊握拳頭、眼裏閃爍出憤恨的目光，在房頂上高聲控訴美軍的殘忍冷酷，痛斥他們將戰俘遺棄在大海中任其自生自滅。

這些活下來的英國戰俘們異口同聲地以最崇高的言辭，盛讚皇軍的威武仁厚，稱頌日本船員的英勇無畏。

隔離期結束後，英國戰俘被轉移到一列火車上，該車於晚上7點從門司出發。負責此次戰俘轉運的中尉和田義雄，這位曾在「里斯本丸」桅杆頂端指揮救援的軍官，這樣描述災難的現場：

「船隻遇難時，我們腦海中閃過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必須營救英軍戰俘。那時正值戰俘點名的時間，他們一時驚慌失措，甚至差點逃跑。我們安撫他們，『別擔心，日軍的飛機和軍艦會來救你們的』。騷亂隨即平息了下來。令人欣慰的是，這些戰俘在短暫的戰俘營生活中已對皇軍建立起了如此的信任。

「當然所有日軍官兵都已經做好了與英國戰俘共赴生死的準備。正因如此，所有人才同時穿上了救生衣。我們之所以能救下大部分的英國戰俘，這歸功於我部下的效命，也歸功於戰俘們對指揮官的服從、對我們的信賴，以及海軍官兵在面對敵人時的英勇抵抗。」

在船上表現突出的炮手之一，來自東京赤阪區高樹町的 Moji Ryoya^① 下士，他在回應記者連珠炮般的提問中，描述了船隻被擊沉時的實際情形：

① 與作者溝通後發現檔案原文如此，暫時無法確認其名。——譯者註

「上午 10 點半左右，我偶然發現潛艇發射的第六枚魚雷朝我們的船衝來。我們的小組長 Moji 下士告訴我們，『如果它直接命中了我們的船，必將把船體擊得粉碎』。隨後，他下令向那枚從 1200 米外急速逼近的魚雷開火，我們驚訝失語，但仍忠實地執行了命令，裝填炮彈，瞄準魚雷並開火。之後我們往前看去，發現已直接命中了目標。在演習中，命中這樣快速移動的目標的概率微乎其微，但當時一定是老天在保佑我們。」

「里斯本丸」船長經田茂^❶雖高烧不退，仍衝出艙室，指揮抵抗美軍潛艇的行動。直至沉船之際，他還堅守在駕駛台上，待最後一名戰俘轉移到救生艇後才撤離。經田茂船長的英勇行為廣受讚譽。抵達門司後，他說，「很抱歉給大家添了這麼多麻煩」，並對沉船經過作了如下說明：

「聽到美軍潛艇襲擊的警報後，我就立即衝上了駕駛台。我一到駕駛台，便看到一枚魚雷朝着我們破浪而來，我緊閉雙眼，以為大限將至。但這第一枚魚雷是個啞彈，並沒有爆炸。緊接着第二、第三枚魚雷接踵而至，我們操縱船隻躲避了這兩枚魚雷，但第四枚和第五枚魚雷橫穿海面向我們襲來。從正前方射來的第四枚魚雷擊中了我們的右舷，我當即下令船隻右轉，以規避第五枚魚雷。但此時機艙的部分區域和右舷船尾已經開始進水了，隨後，後部的艙口也面臨着被淹沒的危險。眼見回天乏術，我立即發出求救信號。首枚魚雷是在早晨 7 點 10 分襲來的，五分鐘後第四枚魚雷擊中了我

❶ 船長的戰犯審判記錄中顯示，「常田」(Tsuneda，英方記錄中有時誤作 Tsuno) 和「經田」(Kyoda) 這兩個名字常被混淆。

們。第五枚魚雷從右舷穿過到達左舷，當第六枚魚雷逼近時，我軍英勇的炮手在 1200 米外將其擊中，但為時已晚。我們試圖通過密封鍋爐艙來阻止船的下沉，但由於被擊中後不久艙壁就破裂了，船已無法繼續航行。水位不斷上升，最終整艘船都沉沒了。」^①

後來，在 21 日那天，米德爾塞克斯軍團最不願聽到的噩耗傳來：他們的指揮官、「里斯本丸」上最受尊敬的軍官斯圖爾特與世長辭了。

馬丁·威登說：

這是我們遭受的最沉重的打擊，這一消息讓整個營地都陷入了深深的沮喪之中。如果說有人真正為了他人而獻出生命，那便是中校了。他不遺餘力地設法改善這些可怕的條件，卻始終不肯承認自己生病了。他的離去讓我們在諸多方面都感到無比痛心。還有消息說，皇家蘇格蘭軍團的古德費洛（Goodfellow）軍士長在大阪去世了。^②

比爾·保爾特（Bill Poulter）當時和斯圖爾特一起在醫院，他說：

① 摘自 1942 年 10 月 20 日《日本時報周刊》（*Japan Times Weekly*），轉引自馬丁·威登（Martin Weedon）所著《天皇之客》（*Guest of an Emperor*）。

② 在我與謝潑德的通信中，他提到：「我想你在研究中一定聽說過米德爾塞克斯團的 H.W.M. 斯圖爾特中校。在所有軍官中，他是最令我欽佩的，因為他始終致力於抵抗日軍的殘暴行動。他遭受了極端的肉體虐待，最終不治身亡。我希望他在那段艱難歲月中展現出的英勇能得到應有的認可。」

斯圖爾特上校是 1942 年 10 月 21 日早上 6 點去世的，他臨終前我陪在他的身邊。四名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士兵和一名皇家工程兵團士兵協助我將他放入棺材，抬上靈車，這是我們能夠給予他的唯一軍禮。他並非如傳言所說的那樣被打死了，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日本人碰過他。^❶

就在同一個月，悉尼的東亞居民協會向其成員發出了一封不可靠的安慰信：

東京方面宣稱有八九百人溺亡，但未必真的有那麼多人遇難。這很可能是東京方面的宣傳伎倆，目的是阻止美國潛艇在中國海域的行動。

但這是一種虛假的希望，死亡人數早已遠超了對溺亡者的統計人數，而且還在持續增加。

當月末至次月初，其他疾病開始肆虐。威登在 11 月 24 日寫道：

白喉似乎已經結束了，痢疾病例也只剩三例，眼下最嚴重的是腳氣病。戰俘營裏約有兩成的人染病，很多人因腳痛而徹夜難眠。

❶ 保爾特在 11 月的日記中寫道：「我們團的曼上尉和格雷厄姆中尉今天與其他幾位軍官一同抵達。我將斯圖爾特中校的帽徽交給了曼上尉。雖然這可能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對大多數正規軍人來說，帽徽是值得珍視的象徵。」

我的腳踝一碰就痛，糙皮病也依然困擾不休。我們的一名戰友情況極為嚴重，腳氣病已蔓延至全身，但他仍在頑強地與病魔抗爭。要是我們能為他弄到更多食物就好了。^❶

腳氣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威登寫道：

12月11日，經過我們的多次申請，終於獲得了酵母片的供應，並發放了少量的糖和麵粉，用以釀製治療腳氣病的酵母液。

然而，營養不良的威脅始終存在。威登接着記錄道：

12月13日，因為是休息日，只發了半份口糧。中午沒有麵包，只有一碗清湯寡水的蔬菜湯。晚上也只有半碗米飯，大家都餓得不行了。

到了12月，也就是沉船事件發生三個月之後，威登和其他戰俘已將法拉斯、約翰斯通與亞瑟·埃文斯忘在了腦後，這三人曾與他們一同滯留在舟山羣島的島嶼上，但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事實上，他們很可能以為這三人已經死了。

殊不知真相恰恰相反，三人早已成功脫險，正在返回英國的途中。

法拉斯回憶說：「（我們在島上）待了六天，直到10月8日，

❶ 他於11月26日去世。

之後由兩位後來被證實是游擊隊員的人用舢板將我們經浙江、江西、福建、廣東、湖南等地，護送至內陸。」

這三人形成了一支配合默契的小隊，他們都或多或少地與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有所關聯。

亞瑟·埃文斯原本正準備休假，卻因日軍的襲擊而被困在了香港。雖然他被列為「海軍炮手」，但實際上並非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的正式成員。他在香港戰役期間主要從事防空預警（ARP）的工作，當這一崗位不再被需要時，他在投降前的最後兩天轉而在香港仔擔任海軍志願隊的卡車司機。被俘後，他隨海軍志願隊一同被送往北角拘禁，因此也被視為「海軍炮手」。待他終於從「里斯本丸」死裏逃生，輾轉抵達了在中國非日佔區的英國官方機構時，行政人員為如何界定他的身份而大傷腦筋：「他沒有受過任何海軍訓練，本質上是個平民。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他作為戰俘期間的薪資待遇。」^①

威廉·約翰斯通於 1941 年 7 月加入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的水雷檢測分隊，擔任準尉。「在香港戰役期間，他駐紮於香港仔，每日薪資含津貼共計 15.8 港幣。1941 年 12 月他未領取任何工資，但在戰俘營中領到了 20 港幣。他沒有接受過海上訓練，也沒有任何航海經驗。」

吉姆·法拉斯也加入過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的水雷檢測分

① 1952 年，埃文斯在西貢被土匪殺害。他的朋友兼同事約翰·斯特里克（John Stericker）在《中國之淚》（*A Tear for the Dragon*）一書中對他有詳細的回憶。

隊（比約翰斯通早幾個月，於 1941 年 2 月入伍），同樣擔任準尉。儘管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服役於皇家海軍陸戰隊，但記錄仍顯示其「沒有接受過海上訓練或具備航海經驗。他的日薪為 13.2 港幣，也同樣沒有收到 12 月的工資，但在營地獲得過 20 港幣」。不過英國駐華大使館對法拉斯的信任度高於另外兩名逃脫者：「憑藉其警務經驗和在皇家海軍陸戰隊 13 年的服役經歷，此人應對軍方有所幫助。他是一位一級輕型武器教官。」

歷經長途跋涉，埃文斯、約翰斯通與法拉斯最終於 12 月 5 日抵達重慶。他們是「里斯本丸」事件中僅有的三名未被遣送至日本戰俘營的倖存者。三人的到來，將有關沉船事件的一手目擊報告傳回英國及戰俘家屬的手中（他們自 10 月以來一直在等待進一步的消息）。路透社、美聯社及其他新聞機構紛紛對此事進行了報道，除了登上了多家報紙，勞合社也發佈了相關消息：

倫敦勞合社重慶 12 月 22 日電 英國駐重慶大使館今日^①首次

① 這是一份官方新聞稿。12 月 21 日，英國駐重慶大使館軍事專員辦公室向倫敦發送了以下備忘錄：

「致：軍事情報主任

軍事情報二處 (M.I.2.)(2)

陸軍部

倫敦

鑒於當地新聞機構對這三位逃脫者表現出極大興趣，我已通過使館新聞專員發佈了隨附聲明。此舉意在防止其經歷遭過度渲染，並在一定程度上保護浙江沿海那些協助他們的中國恩人。」

該新聞稿本身無甚特別之處，但它提到，「據《香港新聞》上日本方面發佈的報告稱，當時船上有 1816 名戰俘」。這可能就是這個常被引用（但略有出入）的數字的最初來源。

完整披露了三個月前一艘日本戰俘運輸船（「里斯本丸」）在浙江沿海區域被魚雷擊沉的經過，當時有數百名來自香港的英軍戰俘因此而喪生。此次的信息來源於三位當時在船上的英國人，他們現已將情況傳至重慶。作為九龍深水埗營地的戰俘，他們於 9 月 27 日乘坐一艘日本貨船離開香港，船上共有 2000 名英國海軍和陸軍軍官及士兵，所有戰俘都被安置在了貨艙中。10 月 1 日上午，貨船遭到魚雷的襲擊。當晚，艙口被封死，後來，有人掀開了遮蓋艙口的防水帆布，戰俘們由此得以強行衝上甲板。那個時候船尾已經沉沒觸底，船頭則高高翹出水面。日軍隨即棄船，數百名戰俘跳入海中，開始朝着五六艘日本輔助艦游去。轉瞬之間，這艘貨船就完全沉沒了，只剩下桅杆頂部的橫杆還露在水面之外。那些輔助艦隻救起了少數人，並未試圖營救大多數仍在海中的戰俘。這三名倖存者表示，他們在海中漂浮了三小時之後，被中國漁民救起並送上了岸。^①

① 《勞合社每周傷亡報告》（1942 年 12 月 18 日至 24 日）。此時三名脫險者已受到軍方的嚴密管控。埃文斯的調令直白寫道：

「你須於 1942 年 12 月 26 日 8 點 30 分到達重慶機場，乘坐中國航空公司（C.N.A.C.）的航班前往加爾各答。

抵達後，你須向登船指揮官報到，並請他安排你前往新德里的行程。你須出示此信。

抵達新德里後，你須向總參謀部情報處（敵情）的裏奇韋少校報到。

隨信附上 50 盧比，供你初到加爾各答時使用，你可向海關官員出示此信，作為你攜帶此款入境印度的憑證。

簽名：R.A. 少校

（代表英國軍事武官）」

日軍戰俘船遭魚雷襲擊

倖存者的恐怖經歷

澳聯社華盛頓星期三電 英國駐重慶大使館援引了一則來自香港的日本新聞報道，表明一艘自香港駛往上海的日軍戰俘船在中國沿海區域遭到魚雷的襲擊，船上 1816 名英國和加拿大的戰俘逾半數遇難，900 名倖存者已被轉運至日本西南部的門司港。

準尉 J.C. 法拉斯、W.C. 約翰斯通和英美煙草公司的 A.J.W. 埃文斯，以及其他被中國漁民救起並最終抵達未被日本佔領的中國地區的倖存者們，講述了他們在船上的恐怖經歷。

他們說，自己和在香港駐守的英國海軍、陸軍官兵們一起擠在貨艙裏，船上幾乎沒有任何病人照護設施。事實上，當船於 9 月 29 日從香港出發時，已有許多戰俘患上了痢疾、腳氣病和白喉。當船在 10 月 1 日被魚雷擊中（但未沉沒）時，他們在缺糧斷水的情況下整整一天都被困在了艙底。

合眾社（United Press）駐中國西部記者羅伯特·馬丁發來的消息稱，幾位倖存者（無法透露身份，但消息極為可靠）表示，船被擊中後，噩夢便開始了。日本人用防水帆布封死了所有艙口，不留任何通氣孔。貨艙內的環境隨着時間的推移愈發令人難以忍受，沒有廁所，惡臭熏天，數人因此喪生。次日清晨，船體似乎正在下沉，甲板上寂靜無聲。於是，一些更強壯的俘虜決定嘗試逃生。他們強行衝出艙口，看到這艘戰俘船正被拖曳着前進，但船上已經沒有日本人了。隨後日軍解開拖纜，船身突然傾斜，並開始沒入水中。

戰俘們雖然沒有救生衣，但仍然紛紛跳入海中，與此同時，幾艘在四周巡邏的日軍艦艇開始向水中的人羣開槍射擊，部分日軍船隻還一直向溺水的戰俘們開火。許多體力不支的人當場溺斃。日本人後來救起了一些戰俘，但他們始終沒有放下救生艇。

對於那些仍被關押在戰俘營中的人來說，1942 年的聖誕節幾乎沒有任何喜悅可言。

保爾特寫道：

聖誕節這一天距離我們投降已經整整一年了，這一年真讓人苦不堪言。再沒有羅賓來叫醒我，向我炫耀他的禮物了，我的命好苦。下午 4 點眾人聚在一起唱了些歌，但當托普·布朗（Topper Brown）唱起「被聖誕老人遺忘的小男孩」時，我再也忍不住了，這實在太讓我想念多芙和羅賓了。其實這天不算太糟，至少日本人沒來騷擾我們，但我多麼希望這是我在日本度過的最後一個聖誕節，只是，我總覺得未必能夠如願。炊事員們一直在節省配給口糧，想讓我們過個像樣的節日，可日軍這羣小混蛋實在沒什麼可感激的。

保爾特在日記中記錄下了 1942 年聖誕節的菜單：

早餐：米飯和一點來自紅十字會包裹的三文魚，還有豆子和咖啡。

午餐：米飯和橙汁，以及紅十字會包裹裏的物資

晚餐：半碗湯

一個蔬菜菜餡餅

兩片煎土豆

一個胡蘿蔔餡的餃子

一個塗了果醬的小薄煎餅

一碗茶

經過 1942 年初期的傷亡後，戰俘營的死亡率有所放緩。在適應了一段時間之後，神戶的戰俘就被分成 20 人一組，被派去碼頭勞作。這工作既艱苦又危險，但至少帶來了些許變化，更重要的是，給了他們機會實踐碼頭工人長久以來的順手牽羊之技。各種食物就這樣被偷偷帶回了營地。

連軍士長索登回憶說：

有次我在一個冷藏庫卸貨時，其中一個小伙子把一條凍魚藏在了兩腿之間，用繩子綁住固定。被守衛搜身時，這條魚引得他們哈哈大笑。他們摸到魚，誤以為那是他的生殖器，大喊“Oki Jim-po”，意思是「大屌」……我們總是盡力把額外的食物偷偷帶回神戶營地，特別是考慮到軍官和病患們因不參與勞動而只能領半份口糧的情況。如果我們被抓住了，不但會被狠揍一頓，還會被罰在警衛室外面站上好幾個小時。^①

① 在神戶，每個勞工小組都有代號。例如「湊川」(Mintagowa) 稱為「鐵礦」，「昭和電機」(Showa Denki) 是「石墨」，「第一新光」(Dai Ichi Shinko) 是「飯糰橡膠」，「東灘區」(Higashinada) 是「煤炭活」，「五三組」(Itsumigumi) 叫「糖果」，等等。

大阪戰俘的處境也別無二致。到了這個時候，大家都明白，唯一能抵禦疾病的辦法就是吃飽，所以冒險是值得的。餓死的風險遠遠大於捱打的風險。

在大阪的詹姆斯·米勒說：

第二天，我們 15 個人被分配去為一艘停泊在港口的船卸貨，其餘的人則被分配到不同的鋼鐵廠了。周復一周，時間緩慢流逝，我們的處境令人絕望，既沒有任何的娛樂消遣，也沒有足以維持基本生活的健康食物。除了幹活就是睡覺，無聊至極。我們逐漸意識到，要想活下來，並幫助那些病重的戰友，就必須靠偷東西求生。我們清楚這是在玩命，一旦失手便將會被嚴懲。後來我們都成了偷竊和藏匿的高手，但凡是能維繫我們生命的白糖、水果、罐頭、衣物，尤其是能弄到的任何藥物或醫療用品，都統統被帶回了營地。

即便對那些熬過 1942 年的倖存者而言，在日軍戰俘營的歲月也依舊是殘酷的。戰俘們每天在船塢與船廠從事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卻只能靠嚴重不足且缺乏維生素的伙食硬撐着。當有人生病時，他們的口糧就會被減半。日軍的邏輯簡單粗暴：病患無法勞動，沒有價值，所以沒有必要在他們身上浪費食物。

在人們意料之中的是，1943 年新年到來時死亡仍在繼續。威登寫道：「1 月 24 日。我們又一個弟兄在夜裏去世了。他已經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了，大腿甚至還沒有常人的前臂粗。這是自『里斯本丸』

事件以來，我們團第 29 例死亡。」^❶

此時，沉船事件中的個人傷亡通知正陸續送到遇難者家屬手中：

陸軍部福利官員，墨爾本

1943 年 1 月 8 日

親愛的布魯克斯夫人：

我懷着沉痛的心情通知您，我們已收到官方通報，您的丈夫、皇家炮兵團一級準尉 C. F. 布魯克斯（軍號 1410996），在「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中被正式列為海上失蹤人員。

我已請求澳大利亞紅十字會安排專人當面向您遞送此通知，並在完成後向我反饋。

若我能為您提供任何幫助，請隨時告訴我。同時，請接受我最誠摯的慰問。

謹啟

陸軍部

1943 年 1 月 12 日

女士：

關於墨爾本陸軍部福利官員此前向您通報的情況，並參照我部 1942 年 7 月 14 日的信函，我奉命遺憾地通知您，從日本當局收到的報告表明，您的丈夫、皇家炮兵團一級準尉 C. F. 布

❶ 此人為二等兵弗雷德·斯蘭。

魯克斯（軍號 1410996），在搭乘日本船隻「里斯本丸」時該船沉沒，目前下落不明。

我們正竭力獲取這起不幸事件的更多細節，一旦收到任何消息將立即通知您。

這則通知難免會給您帶來憂慮與悲痛，對此，我們深表同情。

謹啟

維多利亞住房委員會

1943 年 1 月 12 日

親愛的布魯克斯夫人：

我剛剛非常遺憾地得知，您已接到您的丈夫在海上失蹤的通知，我對此深感悲痛。

謹代表住房委員會全體同仁，向您及您的兒子們致以最誠摯的慰問。

謹啟

羅恩·布魯克斯（Ron Brooks）回憶說：

我不清楚母親最初是何時得知這一噩耗的，在她的遺物中，有一則聖誕節前夕報道此事的剪報，以及 1943 年 1 月 8 日和 12 日的官方信函，都寫明我父親「在海上失蹤」。直到 1945 年 8 月我們回到英國後，母親才收到父親被推定死亡的正式通知。但我清楚記

得，母親的經濟狀況在 1943 年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我只能推斷，她可能不再能領取到我父親（作為戰俘）的全額薪水了，而是被減為戰爭遺孀的撫恤金。總之，從那時起母親不得不設法維持生計。她曾短期將家中空房出租，我記得有位因戰爭撤離到此的女士和她的小女兒，還有一次是一位來自塔斯馬尼亞的皇家澳大利亞空軍的年輕人。1943 年 3 月，她正式成為墨爾本市曼頓百貨商店女帽部的全職售貨員（我至今仍保留着她在 1945 年 2 月 9 日離職時收到的推薦信）。我和傑夫從此成為了「掛鑰匙兒童（latch-key kid）^①」。有時，我會按事先安排好的，放學後去隔壁鄰居家，那位女士會給我泡杯可可，然後我和她的女兒朱迪斯一起玩耍，直到我母親下班回家。

英國各地報紙也陸續報道這些傷亡消息，字裏行間仍帶着沉痛的期盼。以下為 1943 年 1 月 22 日出版的《伊斯特伍德與金伯利廣告人報》（*Eastwood & Kimberley Advertiser*）中的報道摘錄：^②

傑克斯代爾一軍官失蹤

（照片）

W. A. 巴洛

傑克斯代爾街的伯特·布羅姆利先生收到了他的兒媳巴洛夫人（居於伯克郡老溫莎）的消息，得知她的丈夫——皇家炮

① 指放學後獨自在家的孩子。——譯者註

② 特別感謝傑克斯代爾遺產協會的卡蘿爾·泰勒·科克恩提供的這些新聞剪報。

兵團準尉威廉·亞瑟·巴洛 (William Arthur Barlow) 已被列為失蹤人員。官方文件顯示，此前他被通報為香港戰俘，而現在日本當局的報告稱，在運送英國戰俘前往日本的船隻「里斯本丸」沉沒後，他已下落不明。

巴洛先生 18 歲參軍，他曾就讀於傑克斯代爾公立學校，後來在科德諾公園鍛造廠工作。他是一位全能的運動健將，通過了拳擊教練的資格考試，還是一位相當出色的短跑運動員。

巴洛先生是游泳高手，因此親友們仍相信他很可能安然無恙。

與此同時，英國政府接到大量來自船上人員的親屬們的詢問。當局依據日方從深水埗戰俘營轉交的名單、登上「里斯本丸」人員的記錄，以及三位倖存者提供的信息，盡力進行核實和答覆。然而有時候，就像傳話遊戲一樣，手寫或打印不清的文件在不斷複印、傳抄過程中逐漸失真，導致確認個人身份幾乎變得不可能。例如：

我們沒有這個名字的檔案，但我們有一位安德魯·布羅瑟頓 (Andrew Brotherston) 中士的記錄，他曾在香港海軍警察部隊服役。我們猜測他可能就是在 S. B. 2119 中被報告為戰俘的“Andrew Btoyhrt dyon”中士。巧合的是，我們剛剛收到了紅十字會的消息，說安德魯·布羅瑟頓的姐姐寫信來詢問其弟的下落。由此看來可能存在兩個名字相似的人，或許有必要展開進一步調查。^❶

❶ 此段節選自英國殖民地部數百頁有關船上人員的文件。布羅瑟頓實際上在沉船事件中已經喪生了。

在戰俘營裏，士兵們幾乎不知道有什麼消息傳到了家人那裏，無論是在英國的父母、親屬，還是被撤離到澳大利亞的妻兒。儘管他們憂心忡忡，但填飽肚子仍是他們最關心的生存問題。

威登在 1943 年 2 月 13 日寫道：

我和查利斯軍士長一行人去三菱高濱時走大運了。我們從船上卸豆子時發現一旁的倉庫堆滿了砂糖、三文魚罐頭、沙丁魚和茶葉等等。我們坐在碼頭邊的小屋裏生火，苦力給的糖管夠，於是我們就不停地泡茶喝，還飽餐了一頓三文魚和沙丁魚。我偷鯡魚罐頭時被抓了個正着，捱了幾耳光，不過不礙事，後來都補償回來了！回來時撐得不行了——這是我幾個月來第一次吃得這麼好。

但是第二天，他寫下：

又一個人去世了——魯特二等兵。可憐的老米茲。

2 月 17 日，在香港淺水灣保衛戰中表現出色的奇斯萊特（Cheesewright）「在神志不清和劇痛中死去」。^❶

阿爾夫·亨特（Alf Hunt）回憶說：「在大阪，我們分成三隊在中谷（三菱）、前田和金本三家碼頭公司幹活。在中谷我們裝卸的貨物有大米、豆類、糖、鹽、生鐵、硝酸鈉、羊毛、棉花、煙草、

❶ 奇斯萊特在戰鬥中曾指揮的碉堡（PB 17）至今仍保存於香港，除頂部的一米外，其餘都已被埋在淺水灣海灘西角的沙粒之中了。夏日時常有人在其頂部野餐，全然不知他們所坐的是一座混凝土防禦工事。

椰乾等各類貨物。大約百來人被分在這些隊裏。還有分隊在木材場、水泥廠、鑄鐵廠和其他工廠勞作。」

傑克·艾田蒲（Jack Etienne）說：

大阪的活計五花八門，有在鋼鐵廠、鑄鐵廠、水泥廠和碼頭的。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各個碼頭幹活或卸貨。我們有兩個主要目標：一是儘可能偷食物以維持生存，二是儘可能搞破壞。比如裝卸糖或大米時，只要日軍沒有注意，我們就把貨物先浸到海水裏再裝上火車或者駁船。有一回，要從駁船上卸鐵錠，哨兵溜去打牌了，我們就把所有鐵錠都堆在船的一端，結果船沉了。有人把哨兵叫了回來，說活已經幹完了，他說這也太快了，過來一看，只看到沉船冒出的泡泡，我們就說肯定是船底有漏洞，他也沒法反駁，誰讓他玩忽職守呢！那天早早就收了工！

戰俘們以 15 人為一組在船上勞作。詹姆斯·米勒描述了當時的場景：「每當給裝砂糖的船卸貨時，眾人就用能找到的碎布做成袋子，將它們掛在身上不易被發現的地方。連續三天，他們都竭盡所能地把糖帶回來。第四天日軍發現了端倪，但戰俘營的指揮官只是嚴厲訓誡了大家一通，但仍允許他們繼續在船上幹活，於是大夥決定再搏一把。」

米勒對那最後一天記憶猶新：

收工前，我們把各種形狀大小的袋子裝滿糖，綁在胳膊和腿上，繫在腰間，以及像圍巾一樣掛在脖子上。列隊返回營地時，我

們一個個渾身都鼓鼓囊囊的，模樣想必古怪極了。到了營地門口，守衛把我們攔下清點人數，並向戰俘營指揮官報告「全員到齊」。就在「解散」口令一出，我們一窩蜂地衝向營門，想儘快進營的時候，突然聽到一聲大喊：「立定！重新集合！」我們被推回到隊列中，被命令立正站好。這還是在主街道上，在眾目睽睽之下。指揮官朝我們走來，高舉着一袋糖，那是從某人腿上掉落下來的。指揮官厲聲質問是誰掉的糖，自然沒人承認。見無人應答，他便下令讓所有人都脫衣檢查。令指揮官吃驚的是，衣服和糖袋都紛紛掉落在我們周圍，圍觀羣眾目瞪口呆地望着我們和散落一地的糖。脫光衣服後，我們被命令立正站好，指揮官走上前來，逐一查看每個人面前的戰利品。他看上去與其說是生氣，不如說是覺得好笑。他走到一人面前，彎腰撿起了一個引起他興趣的糖袋，那是一個細長的袋子，顯然是纏在腰上的。指揮官把袋子朝那人的臉上甩去，對方一躲，袋子就纏到了站在後面的日本守衛的臉上，場面十分滑稽。

正如米勒指出的，日本守衛會時不時突擊檢查戰俘們的非法儲藏，對這種偷竊行為是喜聞樂見的，只要他們能拿走這些物品即可。

還有一次，米勒和戰友們在卸生鐵時故意破壞了絞車，這樣一來，當把卸下來的生鐵吊運到等候的駁船上時，貨物就會失控，散落一地。計劃完美奏效，日本守衛喝令讓戰俘們從貨艙出來幫忙。

米勒回憶說：

我們爬出了貨艙，直奔船上的餐廳等候指示。大夥開始四處搜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順手牽羊的東西。有個伙計發現了一個小食品

櫃，裏面有一大條風乾的石鮭魚和一塊不小的火腿，這可是個了不起的收穫。接下來我們得想辦法把它們帶回營地。最近，由於偷盜現象太嚴重，日本人開始搜查所有返回戰俘營的工作小隊，所以得格外小心地把這些寶貝帶回去。最終我們決定把魚綁在一個人外套的標籤上讓它垂在背後，另一個人則把火腿裹在外套裏，搭在胳膊上。這只是計劃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要等回營地搜查時實施。到了營地，我們立定報數，確認無誤後，一個守衛走上前來開始搜查。就在這時，隊伍後面有個人突然倒地昏了過去，守衛見狀，指着旁邊的人說，你把他抬去醫務室。我們的計劃完美得手，火腿和魚都被安全地帶進了營地。

在戰爭期間，戰俘營的生活幾乎一成不變，生存哲學也始終如一：能偷的食物儘量偷，能破壞的日軍設備絕不放過。面對無聊與飢餓的雙重折磨，人們只能想方設法尋找點變化來提振士氣。

韓美洵回憶說：

軍官們偶爾會被帶到附近的空地上去鍛煉身體……有次我們說服了一位友善的守衛，讓我們進商店買了些腌海藻和番茄醬。日軍仍會給我們發薪水。守衛每周都會更換。下一周，我們又在那家店門口停下，向護送的守衛示意要進去，他表示這違反規定，我們佯裝驚訝，說店主認識我們，不信你可以問他。店主承認了這一點，守衛便放我們進去了……幾周下來，我們已經建立起了一條「購物鏈」，這些商店都把我們當成熟客歡迎……可惜好景不長，有次被營地的士官撞見我們從商店走出來，從此就再也沒有機會在鎮上活動了。

然而對於外部世界，戰俘們尚不知情的是，1943年3月20日，一場以中立國瑞士為中介的口水戰已經開始，盟軍就戰俘待遇問題發起抗議。軸心國和同盟國之間相互抨擊。「里斯本丸」的血債既不會被輕易遺忘，也不會被輕易寬恕。

就在這場遠方的爭端爆發三天以後，威登記錄了他自己與軸心國勢力的交易關係，「德國水手又送來了一小份煙草禮物給士兵們，這些水手來自正停靠在幹船塢的襲擊艦。這些德國人對我們非常友善」。

保爾特在第二天寫道：「躺在我身邊的喬·賓登（Joe Bindon）^①知道自己已是大限將至，卻不肯安靜地面對這一切。前一天晚上，他一直試圖起牀去跟日軍醫務兵打架，吵得我徹夜難眠。下午2點40分他去世了，終於安靜了下來。他曾是一名出色的運動員，我的話絕無虛言。」

1943年4月29日，威登寫道：

今天天皇（也是我的）生日，不用工作。我清晨5點15分起牀洗澡——現在已經相當習慣早起了，接着就陸續收到了不少禮物：克里斯送了一塊肥皂，伊萬和查利斯^②送了煙草，一位兄弟送了花生，另一位送了糖果，最棒的是，還有兩個人送了一罐櫻桃，真是一羣好人。在這樣的環境下，許多人都展現出了令人敬佩的一

① 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二等兵弗蘭克·詹姆斯·賓登。

② 曼、伊萬、查利斯分別是克里斯托弗·曼上尉、伊萬·格雷厄姆中尉和羅伯特·查利斯軍士長。奇怪的是，威登和曼這對摯友分別與天皇和希特勒同一天生日。

面。上午營地指揮官和隨行人員來視察，全身酒氣熏天！因為是天皇生日，配給倉庫發了很多食物：一人一罐的鹹牛肉，兩人一罐的肉蔬（M. & V.）^① 罐頭，還有乾果。克里斯和我吃了一頓慶祝午餐，有肉蔬罐頭和櫻桃——堪稱盛宴！晚上吃了水果和稀粥，飯後開了聯誼會，好些戰友來串門，隔壁美軍戰俘區的和聲三重奏還開了場音樂會。這個生日太棒了，我覺得這是我被俘以來最美好的一天。

同樣能提振士氣的是收到家中來信的時刻，山姆·阿特金斯（Sam Atkins）已經成功給他的家人寄去了一封信，告訴他們自己即將轉到另一個營地。如今，他收到了回信。

1943 年 4 月 30 日

倫敦西南 17 區圖廷德靈頓路 135 號

家裏人一起給你寫了一張卡片，我們一切都好，希望你也一樣。瑪麗和孩子們都很好，爸爸和兒子都向你送上祝福。哈里昨天還來看望我。茜絲、亞瑟、托尼都很好。多爾和孩子們也都好，（L- 該行剩餘部分被審查刪除）孩子，你不覺得我的字寫得很工整嗎？希望很快能收到你的來信。

愛你的，

媽媽^②

① 指的是肉和蔬菜。

② 這張卡片的地址是：戰俘郵件，戰俘服務處，6213420 號，S. 阿特金斯二等兵，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第一營 C 連，南京營房，深水埗，香港，英國戰俘，經由日本紅十字會，東京。

由於郵政服務時斷時續，山姆的回信很可能在收到家人來信前就已經寄出了：

大日本帝國陸軍

1943 年 6 月 25 日

親愛的瑪麗：

希望你和孩子們身體健康。我一切安好，身體也還算不錯。請寫信給我，並寄一張你和孩子們的照片。替我親吻安妮和芭芭拉。

滿滿的愛，

塞繆爾·亞瑟·阿特金斯

然而，許多家庭至此仍未收到在「里斯本丸」上的父親、兒子或丈夫的任何消息。英國政府在中多數情況下仍無法提供權威信息。三名逃脫者之一的亞瑟·「比爾」·埃文斯（Arthur “Bill” Evans），收到了大量來信，都是來自那些急於打探在這艘不幸貨輪上失蹤的親友消息的人，懇求他提供任何可能的細節：

來自坎伯蘭郡彭里斯莫斯廷莊園的 P. W. 格蘭特，是皇家工程兵唐納德·格蘭特的父親（事實上，唐納德在沉船後僅九天就在上海吳淞因桿菌性痢疾去世了）：

據日方稱，他當時在「里斯本丸」上，並被他們從海中救起。日軍表示他們總共救了 79 人，而唐納德和另外 14 名被救起的倖存者都因病去世了。既然他曾上了岸，或許有一絲可能您曾見過他。

當然，我們聽聞日軍用機槍掃射落水者，所以我猜測他是因傷勢過重而死的。

來自都柏林埃克爾斯街 10/11 號伯特蘭學校的威妮弗雷德·霍斯福德（Winifred Hosford）小姐（其兄羅伯特·霍斯福德係皇家海軍報務士官，於沉船當日失蹤）在來信中寫道：

六個月後，我才得知他成了戰俘，此後便杳無音信，直到日本方面通報他在「里斯本丸」沉沒後失蹤了。

還有來自約克郡斯基普頓朗普雷斯頓克蘭布爾霍爾姆的 J. A. 賈普（J. A. Jupp）先生（其子約翰·埃德蒙·賈普係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的準尉，沉船十日後於 10 月 12 日在大阪身亡）的信：

收到您的消息一周後，我去了倫敦殖民地部（查詢及傷亡事務部），在那裏我見到了一位哈羅普夫人^❶。她告知我，儘管英方當局多次要求日方提供信息，但東京方面至今未就「里斯本丸」戰俘失蹤事件做出任何答覆。殖民地部承諾說，若收到東京方面的消息將立即通知我們。

在戰俘營中，照顧病人從來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除了有感染

❶ 此人可能是菲利斯·哈羅普，她是戰前不久從香港逃出的平民，後出版了《香港事件》（*Hong Kong Incident*）一書。遺憾的是，她在一份海軍部文件上留下的簽名僅有“Harrop”，而無名字的首字母。

風險、缺乏基本的醫療設備、藥品和食物之外，戰俘們還時刻面臨着惹惱日軍看守的危險，尤其是當他們冒險行事時。

韓美洵說：「另一重折磨是無處不在的蟲害。跳蚤日夜與我們相伴……我最多一次抓到 50 多隻。更令人作嘔的是臭蟲，它們生活在木頭的縫隙中，晚上會出來活動。這種蟲子可以長得很大，差不多有半個小拇指甲那麼大，被捏死時會散發異味……還有蚊子……最後是藏在衣物縫線裏產卵的虱子。」

英軍戰俘認為，偷取日軍船隻的物資或從日軍看守那裏順手牽羊是正當之舉，但偷竊戰友的東西就另當別論了。不過，有時候人們也會打破自己的道德底線：

（詹姆斯·克拉克）給我們講了一件事，他養了一隻寵物雞，照顧了很長時間。每天早上都帶它去碼頭，晚上再偷偷帶回來。有一天，他發現用來拴雞的木杆空空如也。當他晚上回到營地時，聞到了燉雞的味道。有人告訴他，因為大家實在太餓了，就把他的雞偷來吃了，但還算厚道地給他留了個雞腿。他拒絕吃雞，並表示，在整個被俘的期間，儘管經歷了飢餓、酷刑和各種虐待，但只有這件事讓他流淚了。^❶

無論通過何種方式，食物始終是頭等大事——無論是配給的還是「自由獲取」來的。

韓美洵說：「剛開始他們不太熟練，往往會直接撬開（例如）

❶ 據大衛·斯坦福的講述。

裝金槍魚罐頭的箱子偷上幾罐，可一旦箱子破損被發現了，他們就會遭到一頓毒打。後來，他們把整箱貨物搬到隱蔽的角落，取出所有罐頭並藏起來，用磚塊填滿空箱子，再放回到原來的貨物堆中準備裝船。然後這些罐頭就會被螞蟻搬家式地偷偷地帶回營地。」

米勒回憶道：

大約一個月後，我們收到了一個的驚喜——去排隊領取紅十字會物資。這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從紅十字會那裏獲得援助，每十個人共享一個包裹。^❶ 當晚大家一致決定，將所有包裹都

-
- ❶ 對長期缺乏食物（包括種類與數量）的戰俘而言，即便是多人分享，一個紅十字會包裹的到來也仍是大事。戰俘們回憶稱分別收到過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的包裹，其中以加拿大包裹最受好評。以標準美式包裹為例：

美國紅十字會
戰俘食品標準包裹第 8 號
內容清單

輻照淡奶	1 罐，14 1/2 盎司
乾糧餅乾（硬餅乾）	1 包，8 盎司
奶酪	1 包，8 盎司
速溶可可粉	1 罐，8 盎司
沙丁魚	1 罐，15 盎司
人造奶油（含維生素 A）	1 罐，1 磅
鹹牛肉	1 罐，12 盎司
甜巧克力	2 條，每條 5 1/2 盎司
砂糖	1 包，2 盎司
橙汁粉濃縮物（含維生素 C）	1 包，7 盎司
脫水湯料	1 包，5 盎司
西梅乾	1 包，16 盎司
速溶咖啡	1 罐，4 盎司
香煙	2 包，每包 20 支
煙草	1 包，2 1/4 盎司

送給醫務室的病患，他們比我們更需要這些物資。日本人對我們的這一舉動感到震驚，但隨後卻發生了悲劇。當晚，我們的兩個戰友潛入了營地的倉庫，想看看有沒有更多的紅十字會包裹，結果被當場抓住。第二天，得知他們已被移交給了憲兵隊，再也沒有回到營地，我們擔心他們恐怕是凶多吉少。

米勒繼續說道：

大概就在這段時間，我們三個人被調去醫院當炊事員。所謂的醫院，不過是體育場看台下的空間，搭起了兩個木製高台。沒有牀鋪、沒有衛生設施、沒有藥品，也沒有任何醫療設備。醫院的工作人員是四名日軍醫務兵，他們從不照顧戰俘。我們有一位英國皇家海軍軍醫上尉，這個人簡直是在創造奇跡——他用剃鬚刀片和磨得鋒利的普通廚房刀具，給傷員們做腳部和身體的手術。很多病人都患有壞疽，他幾乎每天都在不停地手術。日本人堅信，一個人生病或受傷後就毫無價值了，所以病人的口糧會被減半。戰俘營的基本配給原本就難以維持健康人的生命，如此一來，無異於給他們判了死刑。我們三人日復一日地想要從日軍軍需官那裏多討些糧米，卻總是換來耳光，人們像蒼蠅一樣一個接一個地死去。日軍拒絕提供醫療物資造成了慘重傷亡，對此，我們三人和醫生都深感絕望，只能眼睜睜地看着他們死去而無能為力，這種經歷實在是太可怕了。

看護士官華萊士·黑斯廷斯（Wallace Hastings）從一開始就在那家醫院工作：

患者都來自附近大阪和神戶的英軍戰俘營，醫院很快就爆滿了，直到我們離開時依然如此。由於相關設施和醫療物資有限，很難為病患們提供充分的治療。大多數人不僅患有營養不良導致的疾病，還同時被各種其他疾病所折磨，糟糕的飲食也嚴重阻滯了他們的康復。

每日的伙食如下：早餐是米粥，午餐是三個略帶甜味的小麵包卷，晚餐則是米飯和白蘿蔔（他們稱為「大根」）煮的清湯。偶爾會發一些腌海帶，更難得的是發一點鹹魚。除此之外，還會輪流給大家發放一點鍋巴——就是煮飯時黏在鍋邊的焦糊飯粒。

我們實行的是輪班制，夜班深受大家的歡迎，原因在於，日軍軍需官監管的糧倉是用竹籬笆圍起來的，透過縫隙就能看到裏面的米袋。有個機靈鬼想出了一個法子——用一根中空並削尖的竹竿，捅進編織得不夠緊密的米袋，壓低另一端並旋轉竹竿，米粒就會源源不斷流進接應的容器之中。

我們值班期間用美軍發放的鋁製水壺（我不知道它們從何而來）在爐子上煮吃的。由於這些水壺被用作病人的熱水瓶，守衛們看到幾個水壺放在爐子上也從不會起疑。一天晚上我和哈里·佩勒姆（Harry Pelham）一起值班，他像往常一樣去偷倉庫裏的食物，但這次沒有捅米袋，而是挖了些大豆出來，我們決定也按同樣的方法來煮。沒過多久，一名守衛走了進來，背對着爐子取暖。正當我們感到萬分緊張時，豆子被煮開了並從水壺裏蹦了出來，落到了爐子上。哈里反應神速，抓起帽子包住水壺就衝向了病號區，把它塞進了一位目瞪口呆的病人毯子底下！

很遺憾，我已經記不起當時醫院裏任何一位病人的名字。治療

的手段非常基礎，主要是處理傷口、褥瘡（這是不可避免的併發症），以及對其他病症患者的一般護理。所有人（包括醫護人員）都患有濕性和乾性腳氣病。乾性腳氣病會導致下肢，特別是腳和腳踝劇烈的神經疼痛。冷敷可以讓痛感稍有緩解，我記得非常清楚，有位病人為了減輕痛苦，竟赤腳走進了雪地。幾天後，他的腳趾全部發黑壞死，最後不得不將雙腳所有腳趾全部切除。這次手術是傑克遜醫生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進行的，因為這時腳趾上的組織已經完全失去了知覺，所以是無痛的。患者雙腳其餘部位也已經被感染，出現了嚴重的敗血症。我們清理了創口並將其包紮起來，但傷口癒合得非常緩慢。過了一段時間，在換藥時我發現他腳上的傷口佈滿了蛆蟲。見此情形，傑克遜醫生讓我不要清理，直接更換乾淨綑帶，過幾日再看。後來檢查發現敗血症已經完全消失。經過進一步的護理，這位病人恢復到了可以重新行走的程度，儘管失去全部腳趾關節後舉步維艱。我已記不起他的名字，只記得是一位蘇格蘭裔士兵。

死者眾多，遺體由日方安排火化處理。在收集屍體前，我們必須事先將屍體擺成坐姿——雙腿蜷縮到胸前，頭向前垂下——塞進裝蘿蔔用的半截大木桶。火化後，骨灰會被送回醫院。

儘管戰俘們對獲得的任何醫療照顧都心懷感激，但醫院本身卻是令人生畏之地。威登說：「有位（肺炎患者）從大阪回來，帶來了傑克遜醫生的記錄。174 天內有 24 人死亡，這些數字已說明一切。」

食物是他們唯一的預防藥，但總是供不應求。韓美洵在大阪養

了些鴨子，曼和威登在神戶養了些兔子。^❶雖然這些都是為日軍戰時供給準備的，但戰俘們至少能想辦法分食些它們的飼料。

沉船一周年之際，保爾特在 10 月 2 日的日記中寫道：

一年前我們還在愉快地（？）^❷航行着，突然砰的一聲，我們就被擊中了！那一天，也就是 10 月 2 日，成了我們游往日本的開始，那次游泳經歷真是超乎想像！所幸還有人活着，這多少帶來了一點希望。每次坐下來想這件事，總覺得不像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但這確實發生了。今天我們都當了一回準電影明星——日本宣傳片攝製組來拍攝我們勞作的場面。幾乎所有人都想辦法擺出了丘吉爾式的剪刀手。他們給了指揮吊車的查利斯一個特寫，也拍了我開吊車的鏡頭，還拍了達基·史密斯的鏡頭。我不知道他們會用這些來做什麼呢？

此時，大多數倖存的戰俘已經與家人們取得了一些聯繫。山姆寫道：

❶ 威登飼養的兔子大多數都死了。他的日記後來寫道：「停止餵養兔子——我想這是最好的選擇。」

❷ 原文如此。——譯者註

郵戳：圖廷，1943 年 11 月 18 日 12：45，S. W. 17

大日本帝國陸軍

我被關押在戰俘營的神戶分營。

身體狀況如常。

我做着有報酬的勞動。

請照顧好瑪麗和孩子們。

我愛你們 Lc-y^❶

1943 年聖誕節，戰俘們的狀況比前一年好了一些。威登吃過午飯（包括偷運進來的葡萄酒和啤酒）後寫道：

午飯後去看了文藝演出——先在一棟樓裏，然後又換到這兒。新排的奧利弗·韋克菲爾德（Oliver Wakefield）^❷節目大獲成功，兩次都被要求返場……這是我們看過最棒的一場演出。晚飯是炸魚，我們還打開了一個桃子罐頭。難得飽餐一頓，我們都吃撐了。晚飯後即興表演不斷，歌聲此起彼伏。日軍允許延長照明至晚上九點，夜晚點名後還准許吸煙。看到大夥精神抖擻的樣子真讓人欣慰——士氣空前高漲，與去年聖誕節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那時同伴們像蒼蠅般接連死去，「里斯本丸」的陰影仍未散去。

❶ 原文如此。——譯者註

❷ 南非影星兼喜劇演員（1909—1956）。

十四、戰俘：日本，1944 年至 1945 年

你熬過了十二年痛苦的歲月；

後來她死了，

便把你一直遺留在那兒，

像水車輪拍水那樣急速地、不斷地發出你的呻吟來。

——《暴風雨》，第一幕，第二場^❶

然而，1944 年開年不到一個月，威登筆下那「空前高漲的士氣」便已煙消雲散。在寒氣逼人的一月，他寫道，「食堂因該不該給廚子發香煙而爆發了激烈的爭吵。多少人巴不得這輩子別再相見，我們這幫人真是一羣暴民」。

戰爭的最後兩年裏，生活與之前的日子差不多。配給的食物沒有得到改善，但死亡的人數減少了，戰俘們靠着諾曼底登陸和太平洋戰事的傳言而苦苦支撐着。

1944 年 6 月 7 日，威登寫道，「晚上從日軍報紙上得知第二戰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 年，第 315 頁。——譯者註

場已經開闢。這次似乎是真的」。7月19日的日記又記載：「有未經證實的消息稱盟軍已攻佔塞班島，這大概就能解釋昨天大家為何如此興奮。」^❶

這段時間對戰俘而言尤為煎熬。零星的消息讓他們相信盟軍在歐洲和遠東戰場節節勝利，但他們卻只能乾等着。然而就在這充滿希望的時刻，日軍關閉了傑克遜軍醫上尉那間簡陋卻能救死扶傷的醫院。

傑克遜回憶說：

從1942年10月到1944年7月，我違反禁令，盡力為大約700名住院患者和202例死亡病例保留病歷記錄。然而在1944年3月，我的住處遭到日本官員的搜查，所有紙張記錄全部被沒收，我的助手G. H. 比格納爾（G.H.Bignal）和我本人也被逮捕了。我們被帶到大阪總醫院警衛室被連續審訊了一整天。最終，醫院在工作人員被全部解散的四個月後關閉了，而我則被派往一個位於龜岡的「懲戒」營。

華萊士·黑斯廷斯（Wallace Hastings）也記得醫院的結局：

我們經常會毫無預警地接受突擊檢查。1944年在某次搜查醫生辦公室時，他們發現了些日本報紙，上面印着遠東戰區的地圖，標

❶ 塞班島陷落預示着日本的敗局，這讓美軍得以佔領鄰近的天寧島，次年的原子彈正是從此地發射的。

有盟軍與日軍艦船的動向。在場的日軍軍官頓時炸了鍋，莫名其妙地認定醫護人員參與了什麼陰謀，結果我們所有人被勒令分散到不同的戰俘營裏去了。我們被命令收拾好行李，第二天，我在一名持槍守衛的押送下，乘火車抵達了姬路附近的廣畑戰俘營。到達後，我發現那裏關押着大約 400 名來自菲律賓戰區的美軍士兵，還有一名澳大利亞空軍士兵。

1944 年末，無論是在戰俘營還是在家鄉，所有受到這場災難影響的人們都記得距離這場悲劇的發生已經過去整整兩年了。賴特（Wright）寫道：

「里斯本丸」沉沒兩周年的紀念日提醒着我們，被囚禁在神戶的生活也已持續了兩年。這感覺彷彿是度過了一個世紀。我們為在那場災難中喪生的人們舉行了追悼會，我朗讀了吉卜林的《消失的光》（*The Light That Failed*）。我們的翻譯官是一位基督徒，也參加了儀式。他是我們遇到過的最好的翻譯。

如今，在「里斯本丸」遇難者逝世兩年後，他們的家屬陸續收到了第一批將「海上失蹤」改為「推測陣亡」的通知書。儘管沒有遺體和確鑿證據，但人們不得不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希望已經破滅了。1944 年 10 月 7 日，據《波塔當新聞》（*Portadown News*）報道：

波塔當傳來消息，橋街的以賽亞·博伊斯先生與夫人之子——一等炮兵薩繆爾·約翰·博伊斯於 1942 年 10 月在遠東海域遭敵軍

襲擊陣亡。據悉，在香港被俘後，他被關押在一艘日本戰俘船上。

另外，1944 年 10 月 20 日《伊斯特伍德與金伯利廣告報》
(*Eastwood & Kimberley Advertiser*)^❶ 報道：

傑克斯代爾一軍士長被推定為羅難

(照片)

軍士長 W·A·巴洛

傑克斯代爾街的伯特·布羅姆利先生，今日收到了他兒媳巴洛夫人（現居老溫莎）的一封信。信中稱，她的丈夫、皇家炮兵團的二級準尉軍士長威廉·亞瑟·巴洛，被推定在 1942 年 10 月 1 日至 2 日期間作為戰俘陣亡於海上。

巴洛夫人已收到利物浦陸軍部的正式通知，經審慎核查所有現有證據後，當局認定其丈夫生還無望，不得不推定他作為戰俘從香港被押往日本的途中，在所乘船隻「里斯本丸」沉沒時遇難了。

巴洛先生是伯特·布羅姆利先生的繼子，他 18 歲參軍前，就在傑克斯代爾和艾恩維爾地區頗有名氣，曾就讀於傑克斯代爾公立學校，之後在科德諾公園鍛造廠工作。他自願加入皇家炮兵團，並以拳擊教官的身份結業，還是一位知名短跑運動員。由於他也是游泳高手，親友曾一度認為他可能倖免於難。

❶ 諾丁漢郡。

他們疏散到澳大利亞的家人們同樣不得不為失去父親的未來生活做打算。羅恩·布魯克斯（Ron Brooks）說：

大概是在 1944 年，我母親必須為我們的長遠未來做出抉擇。母親是家裏五個孩子中最年長的一個。外祖母在她 21 歲時離世，此後她便一直操持着家務，直到 1927 年遇見並嫁給我父親。父親當時在英國陸軍服役，駐紮在科克附近的昆士敦。外祖父和四個舅舅中的三位仍居住在南愛爾蘭。她最大的弟弟艾迪曾在敦刻爾克和北非戰役中倖存了下來，當時正在意大利服役。我知道她常與最小的弟弟亞瑟通信，因為亞瑟偶爾會附上寫給傑夫和我的信，我母親對他來說就像是第二個母親。

我祖父住在多佛，他曾是皇家炮兵團的一名正規軍。我父親在英格蘭還有三個兄弟和一個妹妹，我不清楚這些人對她決定返回英國有多大影響，模糊記得她曾與傑夫討論過此事，而後者似乎並不支持。我不清楚母親剛到聖基爾達時交到的那些朋友們後來都怎樣了，他們彼此之間似乎已經失去了聯繫。不過母親在工作中結識了一位好友，她對我非常關照。（我想這位女士的兒子之名已刻在西灣紀念碑上。當時他剛剛被徵召進入澳大利亞皇家空軍。）

母親那時一定倍感孤獨，她遠離家鄉，舉目無親。我甚至在想她是不是隱約意識到自己的健康出了問題，但不記得她在澳大利亞時生過病。我猜，軍方當時為她提供了免費返回英國的船票，而她不敢拒絕這個機會，生怕時不再來。

戰時的最後一個新年悄然而至。

寄件人：S. 阿特金斯（二等兵編號 58）

1945 年 1 月 14 日

我最親愛的瑪麗：

終於又獲准給你寫信了。我們即將迎來新的一年，但願這是和平之年，讓我能重回你們身邊。自離別至今，四年的等待實在太漫長了。安妮和芭芭拉如今的模樣我已無法想像，因為我沒有她們的照片。家裏一切都還好嗎？大家都好嗎？我只能給你寫信，所以你一定要告訴我所有的消息。我的身體還算可以，只是這個冬天支氣管炎發作得很厲害。

請代我向所有人問好，特別是安妮和芭芭拉。希望我很快就能再次回到你們身邊。

你深愛的丈夫

萊尼

然而阿特金斯這封滿懷希望的信寄出僅兩天後，又一起「友軍誤傷」事件發生了。遠在香港赤柱的平民拘留營中，C 棟平房是關押平民的幾棟建築之一。香港戰役期間，進攻的日軍與防守的駐軍曾兩度在此殊死爭奪。而現在一枚美國海軍飛機投下的炸彈，原本瞄準的是近海的一艘日本駁船，卻直接命中了這棟建築，造成 14 名平民俘虜遇難。^❶

❶ 參與此次襲擊的四名美國飛行員被擊落墜海，輾轉到達了澳門。從那裏，他們被操作人員尼爾森·馬爾護送至中國游擊隊。筆者撰寫本書時，尼爾森·馬爾仍然健在（92 歲），正是他將我介紹給舟山市政府的。

令人震驚的是，這起事故的消息在 24 日就傳到了日本戰俘營。威登寫道：「香港拘留營遭到轟炸，多名英國男女都遇難了，這則消息真讓人憂心。」

而在日本本土，隨着盟軍的逼近，戰俘們也頻遭轟炸。保爾特說：「2 月 1 日，我們又經歷了一次空襲警報。這讓我想起了『里斯本丸』上的情形，門被關上並上了門，窗外的鐵百葉窗也被關閉，燈光全部熄滅。這種感覺就像是被困住了，對神經而言是一種極大的折磨。」

賴特寫道：

儘管日軍最初的戰報是想要打擊我們的士氣，但來自太平洋戰場的消息令人振奮。他們聲稱在台灣上空擊落了多架美軍戰機，並在一場大規模海戰中擊沉了 20 艘航空母艦和五艘戰列艦。之後他們才承認日軍傷亡慘重，地面設施嚴重受損。雖然日軍仍表明在台灣取得了一場勝利，但他們折損了四位海軍少將，還暗示台灣周邊局勢不妙，我斷定他們吃了大敗仗。

所有人都知道歐洲和遠東的這兩場戰爭即將結束，一些撤離到澳大利亞的家庭決定返回英國。此時已無人將德國 U 型潛艇的威脅當回事，時代已經變了。

羅恩·布魯克斯（Ron Brooks）回憶說：

1945 年 3 月，我們搭乘「MV 斯特靈城堡」號（MV *Stirling*

Castle) 從悉尼啟航，這艘船原屬於聯合城堡航運公司，往返於英國和南非之間。船上有許多軍人，也有不少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對我和傑夫來說，這簡直是場大冒險。這段航程歷時很久，我記得路上大概耗費了六周時間，但已經記不清確切的出發日期了。

船首先抵達了惠靈頓，在那裏停泊了三天。孩子們被軍用卡車帶到野餐地點，吃了很多冰淇淋。為了避開日本潛艇，船取道南太平洋南部航線駛往巴拿馬運河，再從巴拿馬到百慕大，並在那裏等待與一支艦隊匯合後橫渡大西洋。我們最終在 1945 年 5 月 11 日抵達利物浦。這段航程中發生了許多難忘的事情。船隻的引擎發生故障，我們在南太平洋平靜的海面上滯留了好幾天，船身隨着滿是油污的海浪起伏，底艙傳來工程師們修理輪船時的敲擊聲，給人不祥之感。與我們相鄰的艙室裏，有一位母親不幸去世了，她帶着一個與我年紀相仿的兒子，其遺體被海葬了，棺材從英國國旗下滑出，墜入了大海。一名士兵自願與這個失恃的男孩同住一個艙室。當船上的廣播播放了歐戰勝利的消息時，整個船上的人都歡呼了起來。

我始終不明白母親為何不直接投奔愛爾蘭的娘家，^❶ 那裏物資相對充裕，也沒有食物配給等限制。可我們卻去了多佛這座飽受戰火摧殘的城市，起初與祖父同住在小排屋裏。我記得他是位非常嚴厲的紳士，習慣了獨居的生活。這種環境完全不適合我們這兩個幾個月沒上學的小搗蛋鬼。我們在他的收音機上第一次聽到了廣播節目

❶ 羅恩於 2004 年在香港與作者會面時回憶道，他的哥哥傑夫告訴他，他們的母親返回英國而非愛爾蘭，是因為她從未真正相信丈夫已經去世，並認為如果他回來尋找家人，一定會回到英國。

ITMA^①。我們一家人抵達時正趕上街頭舉行慶祝歐洲戰爭結束的派對。然而，我記憶最深的是所有事物和每個人看起來都是如此的沉悶、灰暗和疲憊不堪。我想我們與祖父同住的時間並不長，母親後來在克拉布爾山買了房（那時多佛的房價很低），那房子就在坎特伯雷通往多佛的繁忙幹道旁。

對於那些集中營裏的倖存者而言，美國對日本的空襲是一種隨着戰局發展而日漸嚴峻的新威脅。

1945 年 3 月 17 日，身在神戶的賴特寫道：

他們向這座城市傾瀉了成千上萬枚燃燒彈，隨後又投下了 500 磅的燃油炸彈。地獄般的轟炸聲中，還夾雜着神戶守軍向敵人開火的喧囂聲……我冒險從窗戶往外看，眼前的景象令我震撼。照明彈在城市上空久久不散，無數枚燃燒彈從天而降，落在早已陷入火海的城區。目光所及之處皆是一片火光，高爆彈更是加速了這種毀滅。^②

保爾特描述了同一次空襲：

3 月 17 日聖帕特里克節，大約凌晨 1 點 50 分，總警報響起，

① 即 *It's That Man Again*，是一檔 BBC 廣播喜劇節目，從 1939 年到 1949 年共播出了 12 季。——譯者註

② 神戶戰俘營於 6 月 5 日遭燃燒彈焚毀，前夜逝世的雷伊士官長的遺體亦葬身火海。戰俘們隨後就被轉移至丸山營地了。

接着是當地警報，我們能聽到頭頂上飛機的轟鳴聲。在沒有接到日本人命令的情況下，所有人都起身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準備撤離。這一切都在黑暗中進行，不過由於我們平時就把衣服當枕頭，取用方便，所以也沒有造成太大的混亂。大家就躺在牀位上，一邊聊天，一邊等待，整個過程中我們都身處黑暗之中。到了大約凌晨4點，我們透過百葉窗縫隙看見了一片紅光，這只能意味着火已經燒到我們附近了。

廣播裏傳來命令，「所有人立即撤離，帶上你能攜帶的所有東西」。我們排隊向外走時，我注意到海軍司令部已陷入了火海，有人向那裏投下了一枚油彈！後來我才得知，他們直接命中了炮台。

我們向日本人展示了何謂紀律。隊伍井然有序地行進到防空洞裏，按班組排好後，就靜靜地坐下等待。我注意到我們被熊熊大火包圍着，所幸風向對我們有利。空襲在清晨6點結束，但我們被要求一直待在防空洞裏直到中午。濃煙遮天蔽日，看不見太陽，當能看到時，它就像他們國旗上的紅球，或者我們稱之為「水波蛋」。

幾個日本家庭也逃到這片空地上，看起來他們過得也不怎麼樣。我伺機與其中一名平民搭話，他偷偷地環顧四周，給了我一支香煙，然後說“korewa pikki”^❶，意思是「這下可壞了！」我也完全同感，並沒覺得有什麼可開心的。

在大阪的米勒寫道：

❶ 應為訛傳，日語中無類似說法。——譯者註

那天我們聽到頭頂上傳來一陣密集的飛機轟鳴聲，無法分辨是敵是友，這也可能是日方的。不久之後，我們聽到碼頭那邊傳來炸彈的爆炸聲，接着飛機飛過大阪上空。這下大家欣喜若狂，毫不掩飾地向日本人展露我們的心情，現在大夥都知道，日本正在輸掉這場戰爭。我們被關在營地裏整整一周，當終於被允許外出工作時，眼前的景象讓人震驚不已。到處都是一片廢墟，整座城市被夷為平地，而這還僅僅是一次空襲的結果。碼頭一片狼藉，倉庫被燒得精光，瓦礫也堆積如山。於是他們決定讓戰俘們開始清理倉庫的碎石……此後再沒見過對大阪的大規模轟炸，我們猜測，可能是因為已經沒有這種必要了，目光所及，滿目瘡痍。大阪的市民一片愕然，但他們依然士氣高漲。船運幾乎癱瘓，我們不再被派去碼頭或船上工作，轉而被分派到各個工廠勞作。時間變得格外漫長，勞動拖垮了我們的身體，口糧也遭到了削減。直到 1944 年中後期，我們收到消息說有一個由 40 人組成的小隊要被轉移至另一個叫「能登川」（Notogawa）的營地，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韓美洵回憶道：「有時候我們的惡作劇也會反噬自己。在 B-29 轟炸機空襲之後，點名時，編號為 29 的人會用一種特別洋洋得意的語氣高聲喊出自己的號碼。這種做法持續了一段時間，日本人才注意到。」

傑克·艾田蒲（Jack Etienne）親身經歷了這種報應：「在營地裏，經過最初幾次空襲後，我們注意到每次點名時，編號是 29 的人都會被帶出去打一頓。追問緣由時，日本人告訴我們，『美國人

用 B29 轟炸，如果你是 29 號，那就得捱打』。你能想像接下來的點名時，大家是如何搶着調換號碼的嗎！」

戰俘們最後一次被允許通過廣播向家中傳遞信息。

Cas/108/570

步兵檔案處

斯坦維爾路學校

阿什福德市

米德爾塞克斯郡

1945 年 6 月 13 日

M. E. 阿特金斯夫人

牛津郡查爾伯里鎮芬斯托克村學校路

夫人：

我奉命通知您，東京電台於 1945 年 5 月 19 日廣播中播報了以下戰俘信息，該信息確係由米德爾塞克斯團的二等兵塞繆爾·亞瑟·阿特金斯（軍號 6213420）發出。

信息內容如下：「我最親愛的——：我已經收到你和母親寄來的明信片。我還算健康，希望家裏一切都好。請代我向所有人問好，特別是——。愛你的丈夫，山姆。」

請您在與該士兵通信時切勿提及此廣播內容。

謹啟

人們已切實地感到戰爭即將終結，大多數人只是對遲遲未結束而感到沮喪，儘管仍有人還在不斷地死去。

保爾特說：「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二等兵安德魯斯於 7 月 30 至 31 日的夜間去世。他似乎是在睡夢中平靜離世的，這是我們轉至此地後的第三位亡者。^❶火化之後，我將他的骨灰收存起來。」

8 月 5 日，威登寫道，「這段日子無疑是戰俘生涯中最難熬的，至少精神上如此。希望近在咫尺卻又遙不可及，每個人熬不下去了」。

但戰俘們所不知道的是，1945 年 8 月，代表「舊戰爭」的坦克、戰艦與 B-29 轟炸機，將與象徵「新戰爭」的核武器在天寧島交匯。正是從這個太平洋小島上起飛的 B-29 轟炸機，將原子彈投向了廣島與長崎。戰爭迅速走向了一個始料未及的結局。然而，對許多人來說，這一切來得太遲了。

皇家炮兵團（海岸炮兵與探照燈部隊）及憲兵隊檔案處

1945 年 8 月 10 日

尊敬的夫人：

1410996 號一級準尉 C.F. 布魯克斯

茲隨函附上您丈夫陣亡的通知書，對此我們深表遺憾。

在此悲痛時刻，任何言語都難以撫慰您的喪親之痛。請允許我謹以個人名義，對您承受的這一沉重損失表達最深切的慰問。

謹啟

❶ 保爾特和他的 123 名戰友被轉移至野町。安德魯斯是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二等兵詹姆斯·H. 安德魯斯。

陸軍文件 B.104-82A

1945 年 8 月 10 日

夫人：

我懷着沉痛的心情通知您，關於 1410996 號皇家炮兵團一級準尉查爾斯·弗雷德里克·布魯克斯（自 1942 年 10 月 1/2 日起失蹤），我們至今仍未收到任何後續消息。

我謹代表陸軍委員會對這位為國捐軀的軍人深表哀悼和遺憾。

謹啟

備註：如需獲取用於人壽保險等用途的死亡證明，請致函以下地址：利物浦韋弗特里藍衣學校（郵編 L15），英國陸軍部

Army Form B. 104-82A.

No. CASH/Div.111/1
(If multiple, please quote above No.)

R.A. (C.A. & B.L.) & C.R.P. Record Office,
Savoy Hotel, West Hill Road,
Bournemouth, Hants.

10th August 1945.

Mrs. _____

It is my painful duty to inform you that, no further news having been received relative to (No.) 1410996 (Rank) M.O.I.
(Name) Charles Frederick BROOKS
(Regiment) Royal Artillery
who has been missing since 1/2 October 1942, the Army Council have been regretfully constrained to conclude that he is dead, and that his death took place on the 1/2 October 1942 (or since).

I am to express the sympathy and regret of the Army Council at the soldier's death in his Country's service.

I am, _____
Mrs. _____
Your Obedient Servant,
C. Laughton
R.C.O.
For Colonel
Officer in Charge of Records.
P.Y.O.

Mrs. Brooks,
5, Limes Road,
Buckland,
Dover, Kent.

PRINTED BY THE GOVERNMENT PRINTER, LONDON. A.S. & W. 1944. C.P. 4/49

查爾斯·弗雷德里克·布魯克斯死亡的正式通知書
(羅恩·布魯克斯提供)

（遺物事務處），國務次官收。

如發現已故軍人留下的私人財物，將會轉交給負責檔案記錄的官員。但這通常需要一段時間，收到後將在獲得遺物事務處的授權後處置，並適時與您聯繫處理相關遺產的事宜。

這些事務不可避免地會有一些延遲，尤其是在海外陣亡的情況下。

皇家炮兵協會

1945 年 8 月 22 日

親愛的夫人：

皇家炮兵協會委員會得知您丈夫的死訊深感悲痛，我受其委託向您傳達他們對您失去親人的深切同情與哀悼。

若您當前或日後需要臨時的援助，請隨時告知，我將安排代表與您接洽。

在此期間，如需任何幫助或建議，請隨時來信告知，無需特意回覆此信。

謹上^①

1945 年 8 月 11 日，在長崎遭鈾彈襲擊僅僅兩天後（這場殘酷

① 羅恩說：「我母親一直希望會有奇跡出現，父親能在戰爭結束時被發現還活着。這些信件與（11 月收到的）彭福德中校的信，最終讓她的希望化為泡影……我仍記得那位穿制服的女士來家中通報時，母親與其走進房間告知我們的情形。」

而無謂的毀滅發生在對廣島進行了理性而必要的打擊之後），皇家炮兵團第 12 海岸炮兵團的連隊士官長托馬斯·威廉·喬治·班納姆（Thomas William George Banham）去世。他如今安葬於橫濱，是在日本投降前最後一位離世的「里斯本丸」倖存者。他的死因未被記錄，英聯邦戰爭公墓委員會的資料中甚至沒有列出他近親的姓名。

十五、解放

在戰俘營裏，情況迅速地陷入一片混亂。大阪被轟炸後，羅斯·林納伯格（Ross Lynneberg）等人被轉移至另一處戰俘營——能登川營。「有一天，當我在營地附近工作時，一架 B-29 轟炸機飛過上空，隨後我們就聽到了爆炸聲，看到一股煙柱直沖雲霄，頂部形成一個巨大的蘑菇雲。^❶我心想，幹得好，因為轟炸機似乎擊中了一家彈藥工廠，這讓我們又在營地裏多待了三天才出去幹活。有天下午我們收工回營的時候，看到一個陌生的日本軍官在打聽是否有人了解輻射中毒——我們壓根兒就沒聽過這詞。」

賴特（Wright）當時正在湊川（Mintagowa）貨場幹活，突然他和同伴們被趕進棚屋鎖了起來。他們從小窗望出去，「苦力們正低頭聽着收音機，女職員們都在痛哭哀嚎着，整座城市陷入了一片沉寂，大家都在收聽一條重要的消息」。

這是日本民眾第一次聽到天皇的聲音，1945 年 8 月 15 日正午：「……然交戰已閱四載，雖陸海將兵勇敢善戰，百官有司勵精

❶ 能登川距廣島超過 100 英里，距長崎則更遠，因此這很可能確實是一場次生爆炸。

圖治，一億眾庶之奉公，各盡所能，而戰局並未好轉，世界大勢亦不利於我。」

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同樣身處能登川營，他回憶說：

不知從哪兒傳出的謠言，說一旦盟軍登陸日本，所有戰俘都將被處死。我們對此深信不疑，^❶發誓絕不任人宰割。我們已經遭受了太多的苦難——侮辱、奴役、飢餓、疾病，還有隨時可能被處決的恐懼。日本人的殘暴成性、毫無人道絕非文明人所能想像。我們開始把一切可以當作武器的東西都藏起來了。1945年8月下旬的一個清晨，大家醒來時發現整個營地一個守衛也沒有，日軍士兵的營房也空了。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只當這是普通的一天。那天晚些時候，我們中的一些人站在營地大門外交談時，注意到有個人影正沿着道路走了過來。看着像個士兵，但不是日本兵，又會是誰呢？我們聽見他問：「這裏是能登川戰俘營嗎？」我們回答：「是的，不過你是誰？」他說：「我是澳大利亞軍官，奉命將你們撤往神戶。戰爭結束了。」起初，我們簡直不敢相信。

韓美洵說：「我們逐步而謹慎地接管了戰俘營，畢竟仍身處敵國民眾的包圍之中。我們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滿足：停止勞

❶ 韓美洵證實：「當時日本軍營的士官醉酒後告訴我們，一旦美軍登陸日本，所有戰俘都將被處決。我們向其他工作人員謹慎打探，確信這是事實，而戰後我們也發現其他幾個戰俘營也收到了類似的消息。」雖然這一說法時有爭議，但文獻證據表明這無疑是日本對待戰俘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

動、增加配給。接着我們索要了食品倉庫、服裝倉庫以及存放紅十字會包裹和藥品的庫房鑰匙，他們都悉數交了出來。那些藥品本可以拯救很多生命。」

像所有在偏遠營地的戰俘一樣，林納伯格也希望儘快回到像大阪、神戶或橫濱這樣的大城市，好儘早被疏散。

營地裏開始流傳出消息，說我們將在幾天內被轉移。加之，聽說從明天開始，行動範圍就將被限制在京都和能登川之間。於是，我和另一個小伙子裝了幾袋食物，在晚上 11 點左右前往車站，等了將近六個小時才等到一列我們可以搭乘的列車。期間好幾列火車直接穿站而過，另一些雖然停了下來，但車廂裏擠滿了復員士兵和返鄉的平民。我們最終擠上了開往大阪的火車，又轉乘有軌電車前往原戰俘營所在地。只可惜電車無法直達，下車後我們迷失了方向，因為所有熟悉的建築都只剩下瓦礫，散落在小巷裏，完全遮蓋了街道。後來終於找到了營地的遺跡，它四面環水，已被夷為平地。從這裏，我們開始尋找那幾座尚未倒塌的建築中的一座，那裏住着原營地中沒有遷往內陸的同伴們。

在我們被轉移到湖區之後，大阪又遭受了多次轟炸，當時使用的是重型炸彈，專門摧毀幾個月前火攻尚未毀掉的少數堅固建築。在探訪舊營地期間，我們與其他許多來訪者一起被我方的人召集起來，他們說有一項統一命令：所有戰俘必須於次日上午 10 點前返回各自的營地，否則將被逮捕並接受軍事法庭審判。所以當天晚上，我和同伴便動身回到能登川。在尋找正確的返程列車時我們有些手忙腳亂，因為第一節車廂是電力驅動，而最後一節是蒸汽機

車。在最後一段路程中我睡着了，醒來時看到車站的名稱既有日文也有英文（大多數車站名都已被塗掉），這讓我一下子清醒了過來，因為我們已經坐過了幾站。車廂擁擠不堪，待我們擠到車門處時，列車已經開動了，我們不得不跳下車去。

我們現在面臨着如何回家、在哪裏過夜以及如何解決當晚伙食的問題。我隨即想起附近車站有一個戰俘營，於是我們在那裏暫住了一晚。趕在第二天上午 10 點回了到我們自己的營地，那裏一片混亂，因為當天我們就要出發去車站，然後去往橫濱，並在那裏搭乘飛機前往馬尼拉。

然而，對阿特金斯一家來說，解放帶來的卻是一場情緒的過山車。首先，他們終於等來了近四年來望眼欲穿的消息：山姆還活着，安然無恙，並已獲釋，正在回家的路上：

1945 年 9 月初？

发件人：愛德華·威爾肖爵士（K.C.M.G.）^①

主席^②

電氣大廈
維多利亞堤岸
倫敦（W.C.2）

① 即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勳章（The Most Distinguished Order of Saint Michael and Saint George），是英國榮譽制度中的一種騎士勳章。——譯者註

② 威爾肖當時擔任大東電報局主席。

尊敬的先生 / 女士：

我很榮幸能隨函附上您親屬的電報副本，他現已從日軍那裏獲釋。

為儘早緩解您的焦慮，此消息已由大東電報公司自遠東免費發送，並由郵政總局與陸軍部協作傳遞。

同樣，我們樂意免費為您發送回信。請將您的回覆（除地址外，控制在約 12 字以內）寫在隨附表格上，並提交至當地大東電報分公司或任何通常受理電報的郵局。

請在回覆表格上填寫隨附電報中提供的地址，並簽上您的名字。

致以最美好的祝願。

主席謹啟

P&M 阿特金斯夫人

倫敦西南 17 區圖廷德靈頓路 135 號

電報內容：已安全獲盟軍解救，盼早日回家，會寫信告知。

信件及電報請寄至：澳大利亞墨爾本陸軍基地郵局轉交獲釋戰俘 S. 阿特金斯

然而幾乎同時，這份安心又被無情地奪走了。他們完全不知道山姆病得有多重。日軍投降後不久，軍需軍士保爾特在野町時，就寫日記說，「二等兵阿特金斯今天乘飛機前往東京，他確實該去，如今他瘦得只剩一副骨架了，肯定經不起長途跋涉」。山姆的生命正在消逝。

電話：MAYfair 9400 轉分機

陸軍部

關於此事的所有後續通訊請致函：

(傷亡 / 戰俘事務)

常務次官

柯曾街大樓

陸軍部

柯曾街

(地址如右側所示)

倫敦，W.1 區

並請註明以下編號：49894 (傷亡 / 戰俘事務)

1945 年 9 月 14 日

您方編號：_____

夫人：

我奉命遺憾地通知您，據官方報告顯示，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二等兵 S. A. 阿特金斯 (軍號 6213420) 現已從日軍手中獲釋，目前正在遠東地區一艘醫院船上接受治療。他患上了慢性阿米巴痢疾與腳氣病，已被列入重症患者名單中。

本部已致電相關當局要求提供您丈夫的病情報告，並確保您將及時獲知所有後續進展。

值此阿特金斯二等兵剛獲自由卻遭此變故之際，謹代表本部對您所承受的憂慮與痛苦致以深切同情。

謹啟

M. E. 阿特金斯夫人

牛津郡查爾斯伯里芬斯托克學校路

Tel. No.— MAYfair 9400 Ext.

Any further communication on
this subject should be addressed
to:—
The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The War Office
(as opposite),
and the following number quoted.



THE WAR OFFICE,
(Cas. PW),
Curzon Street House,
Curzon Street,
LONDON, W.1.

49894(Cas. PW).

Your Reference.....

11 September, 1945.

Madam,

I am directed to inform you with regret, that an official report has been received to the effect that No. 6213420, Private S.A. Atkins, Middlesex Regiment, who has been released from Japanese hands, is at present on board a hospital ship in the Far East, suffering from chronic amoebic dysentery and beri-beri and has been placed on the seriously ill list.

The Department has cabled to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for reports to be rendered on your husband's condition and you are assured that you will be kept informed of all further reports which are received.

I am to convey to you the sincere sympathy of the Department in the anxiety and distress which this news must inevitably cause, especially in view of Private Atkin's release from captivity.

I am, Madam,
Your obedient Servant,

Mrs. M.E. Atkins,
School Road,
Finstock,
Charlesbury, Oxfordshire.

塞繆爾·阿特金斯倖存的正式通知書（芭芭拉·廷德爾提供）

然而，短短四天之後，當局傳來了新的消息。^❶ 山姆的病情正在好轉。

電話：MAYfair 9400 轉分機

陸軍部

關於此事的所有後續通訊請致函：

（傷亡／戰俘事務）

常務次官

柯曾街大樓

陸軍部

柯曾街

（地址如右側所示）

倫敦，W.1 區

並請註明以下編號：49894（傷亡／戰俘事務）

1945 年 9 月 18 日

夫人：

關於陸軍部 1945 年 9 月 14 日的信函，我奉命通知您，本部最新報告顯示您丈夫的病情已略有好轉。

謹啟

這份關於山姆的戰俘營獲釋通知書遲至一周後才送達，想必其平添了幾分荒誕的慰藉。

❶ 考慮到現役軍人、戰俘和傷亡人員的數量，當時需要製作的信件數量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而且全部是費力地手動打字完成。舉例來說，紅十字會中央戰俘機構的志願者在二戰期間就寄出了超過 5000 萬封信件和電報，收到的回信也接近這個數字——通信總量近 1 億份。

電話：MAYFAIR 9400

陸軍部

您方編號：_____

柯曾街大樓

陸軍部編號：SS/330/120/216

柯曾街

(傷亡 / 戰俘事務)

倫敦, W. 1 區

1945 年 9 月 25 日

夫人：

我很高興地通知您，已收到官方信息，您的丈夫米德爾塞克斯軍團二等兵 S. A. 阿特金斯（軍號 6213420），此前被日軍俘虜，現已獲救並隨盟軍部隊安置。

被解救戰俘的遣返工作已被列為最高優先級，但請您理解戰俘遣返至英國本土仍需時日。關於獲救戰俘的總體情況，包括其回國前的動態信息，將通過無線電廣播定期發佈，並刊載於報紙上。

謹啟

但沒人能夠放鬆下來。就在這封信（和許多類似的信）發出並宣稱戰俘已經安全的兩天後，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悲劇。

阿爾夫·「諾比」·亨特（Alf “Nobby” Hunt）在回憶他們被空運至沖繩的情形時寫道：

戰爭結束大約十天後（守衛們早已離開），B-29 轟炸機開始向營地投放補給，用的是 40 加侖的油桶來裝物資，其中許多桶在空中便脫離了降落傘，這比真正的轟炸還危險。我們估計那些物資足

夠 5000 人使用，而營地裏只有大約 800 人。^❶

我們先乘火車前往橫濱，然後坐飛機抵達沖繩，被安排住進了賬篷。有一晚，我們正好遇上一場颱風的尾巴，大多數賬篷都被吹走了。

傑克·艾田蒲（Jack Etienne）與阿爾夫·亨特同行：

戰爭結束大約三周後，一些美國人從橫濱前來安排我們的遣返事宜，其中還有一位女記者，她拍了很多照片，並對我們的生活條件感到震驚不已（要知道我們的營地早已被炸毀）。我們再次一無所有，只能住在一個似乎原本是糧倉頂層的地方。大多數地方的屋頂都很低，甚至連我這個身高 5 英尺 6 英寸^❷的人都沒法站直。之後我們乘火車前往橫濱，在那裏接受了除虱清潔並換上了新衣服，接着我們大多數人就乘坐 B-24 轟炸機飛往沖繩了。

從沖繩出發，下一程是繼續搭乘飛機向南飛往馬尼拉的尼爾森機場。

值得注意的是，阿爾夫·亨特（Alf Hunt）提到：「我確實聽說有人在回家途中失蹤的傳言，但沒有確切的消息」，艾田蒲回憶

❶ 艾田蒲回憶道：「在美軍從橫濱前來安排我們遣返之前，我朋友丹尼·奧漢隆曾與幾架戰鬥機取得信號聯繫。幸運的是其中一名飛行員理解了信號並回應詢問我們需要什麼。丹尼說要食物，幾小時後戰鬥機返回，並投下了裝滿麵包等物資的背包。後來又來了幾架轟炸機投下 44 加侖的大桶，但沒有降落傘。所幸沒有造成傷亡，不過鐵桶完全摔扁了，食物也沒法食用。好在他們吸取了教訓，後來投送都使用了降落傘。」

❷ 約 1.68 米。——譯者註

說：「坐在炸彈艙門上有點可怕！我記得其中一架飛機的炸彈艙門在飛行途中打開，22 名戰俘因此墜亡。」^①

這些傳言都是真的。當美國陸軍航空隊將戰俘從戰俘營送往盟軍控制區的途中，一架飛機墜毀，悲劇再次發生。12 名歷經香港戰火、又在日軍戰俘營忍受三年零八個月飢餓折磨的戰俘因此而殞命。

來自「里斯本丸」的遇難者：

約翰·克拉克（John Clarke），皇家炮兵團。

詹姆斯·克拉珀頓（James Clapperton），皇家蘇格蘭軍團。

西德尼·弗雷德·吉爾漢姆（Sidney Fred Gilham），米德爾塞克斯軍團。

傑拉爾德·戈利奇（Gerald Gollege），香港新加坡皇家炮兵團。^②

德斯蒙德·哈靈頓（Desmond Harrington），香港通信連。

威廉·理查德·詹姆斯（William Richard James），皇家炮兵團。

托馬斯·帕特里克·金（Thomas Patrick King），米德爾塞克斯軍團。

歐內斯特·亞瑟·帕吉特（Ernest Arthur Pargeter），米德爾塞克斯軍團。

① 在被問及對此事的個人回憶時，艾田蒲補充道：「關於 B-24 飛機上戰俘墜落的事情，我恐怕提供不了太多信息。在橫濱厚木機場登機時，我記得並沒有登記姓名。直到抵達馬尼拉後，我才聽說有架飛機因不明原因艙門打開了，導致 22 名戰俘墜落身亡。我認為美軍不太願意讓太多人知道此事。」

② 英聯邦戰爭公墓委員會關於戈利奇的記錄顯示他於 1945 年 9 月 8 日失蹤，但其姓名出現在該航班的名單上。

查爾斯·亨利·普賴斯（Charles Henry Price），香港通信連。

其他轉運來的香港戰俘遇難者：

悉尼·弗朗西斯·貝茨（Sydney Francis Bates），皇家炮兵團。

約翰·伯克（John Burke），米德爾塞克斯軍團。

威廉·多克斯福德（William Doxford），香港義勇防衛軍。

賴特是其中兩位遇難者的密友，他對此記憶猶新：

我們在黎明時分被叫醒，這讓我想起了另一個黎明——我們登上「里斯本丸」那天醒來時的清晨。黑暗中一片混亂。美軍並沒有將我們分成小組或分批安排，只要求我們排成兩列縱隊，走向飛機。帕特·金、維納、肖爾、波普和我始終待在一起，被人羣推擠着往前走。過了很長時間，我們走到了那排等待起飛的飛機旁邊，隨身行李比平時要多。天色極暗，我們幾乎看不清飛機的輪廓。

每架飛機分配 20 人，美軍顯然並不在意人員的組合，因此帕特·金和比爾·波普便與我們分開了。維納、肖爾和我登上了第一架飛機，而帕特·金和波普則在後面一架。

航程令人煎熬，賴特於當天下午 4 點抵達馬尼拉。在等待火車時，他們和阿爾夫·亨特一樣，聽到了兩架飛機失事的傳言。賴特說：

那時我們就知道我們失去了兩位朋友。他們殞命的時機與情境在我們看來特別的殘酷和諷刺。命運實在太無情了。這兩個經歷了無數磨難、靠着重獲自由和回家的信念支撐下來的年輕人，怎麼能在勝利時刻、在與家人團聚的歸途中喪生？他們有着非凡的勇氣、

堅韌的意志和頑強的毅力，卻最終死在了這些品質毫無用武之地的時刻，這真讓我們痛徹心扉。

泰菲·埃文斯（Taffy Evans）對此事記憶猶新，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作為當日從 B-24J「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編號 44-40666）轟炸機跳傘的倖存者之一，他親歷了飛機在台灣西南方 50 海里處墜海的時刻^①：「在日本的營地時，我們領到了胸掛式降落傘，穿戴完畢後登上了飛機。不久，飛機起飛了，我們突然被告知必須（用他的話說）棄機，準備跳傘。」

1945 年 9 月 27 日星期四的《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②在頭版刊登了一篇標題為〈空難〉的報道，講述了 9 月 15 日^③，12 架美國團結飛機公司製造的 B24「解放者」（Liberators）轟炸機從沖繩運送戰俘前往馬尼拉的途中，其中一架在台灣以東海域因發生機械故障，不得不迫降在海上。機組人員發放了降落傘並告訴戰俘們跳傘，但以戰俘們的身體狀況，他們根本無法執行這些指示。第一個跳傘的人沒能拉開降落傘索，而後面跟着跳的一些人則在飛機內部就打開了降落傘。

萬幸的是，「烏爾薩號」（*Ursa*）驅逐艦恰好就在飛機下方的海

① 同日遇難的還有香港戰俘、皇家工兵團的 A. C. 霍頓少校，其墓地位於薩里郡。有意思的是，海軍部檔案中有一條註釋稱：「據信他死於日本至馬尼拉的空難。」

② 遺憾的是，《南華早報》拒絕授權轉載原文中的兩個段落，除非按本書發行量支付相應費用。

③ 實際日期應為 10 日。

域。這艘本應為航空母艦護航的軍艦，因一場颱風而偏離了原定的航線。當其他的「解放者」轟炸機在空中盤旋時，「烏爾薩號」成功救出了 20 名乘客中的 8 人^❶，以及機組人員等所有倖存者。隨後，它將這些倖存者帶到了台灣，在那裏他們被送上了來自香港的「芒格努伊號」(Maunganui)^{❷。❸}

❶ 懷特黑德 (Whitehead) 寫道：「喬·漢利 (很可能是炮兵托馬斯·詹姆斯·漢利) 告訴了我一個驚人的故事：他從日本回國的途中，飛機遇到了颱風，他不得不跳傘落入中國南海。他在黑暗中游了將近 24 小時，快要放棄時，一艘美軍戰艦上的瞭望員在茫茫大海中發現了他的腦袋，並將其救起。」〔懷特黑德，《突圍再戰》(Escape to Fight On)，第 192 頁〕由於賴特的朋友比爾·波普沒有出現在任何傷亡名單中，因此可以推測他也是那幾個被幸運地救起來的人。顯然兩人此後再未重逢，這也並不奇怪，因為他們可能經由不同路線遣返。

❷ 「芒格努伊號」建於 1911 年，二戰期間作為醫院船使用。該船在基隆救起了這些倖存者。

❸ 尤其是慮及乘員名單也不一致，因此日期上的出入可能也就不那麼重要了。此外需注意的是，另一架載有澳大利亞前戰俘的飛機〔B-24M 編號 44-42052，「清算者」(Liquidator)，同屬 494 轟炸大隊〕也於同日墜毀，地點極有可能在台灣。雖然記錄顯示未找到該飛機的殘骸，但以下五名遇難者安葬於香港西灣國殤紀念墳場：

羅納德·西蒙斯·庫珀 (Ronald Simmons Cooper) 炮兵 VX58497 第 4 反坦克團 皇家澳大利亞炮兵

傑克·利文斯通·吉爾丁 (Jack Livingstone Gilding) 下士 SX10013 第 8 師野戰救護隊 澳大利亞補給與運輸勤務隊

阿爾伯特·亞瑟·詹姆斯 (Albert Arthur James) 中士 NX/60056 第 2/19 營 澳大利亞步兵

理查德·托馬斯·諾布爾 (Richard Thomas Noble) 中士 NX35741 第 2/30 營 澳大利亞步兵

哈里·羅傑森 (Harry Rogerson) 二級準尉 VX35009 第 2/29 營 澳大利亞步兵

阿爾伯特·亞瑟·詹姆斯是著名藝人克萊夫·詹姆斯 (Clive James) 的父親。根據詹姆斯自傳第一卷《不可靠的回憶錄》(Unreliable Memoirs) 所述，飛機是在馬尼拉灣遭遇颱風而墜毀的，但其他資料顯示是撞上了台灣的山體，從而導致墜機的，由於戰後台灣的英聯邦戰爭公墓委員會遷葬至西灣，後者的可能性更大。詳見 MACR #14972 和 #14936 號報告。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最初的遣返並非是個悲劇。在大多數人的回憶中，美國人和加拿大人所給予他們的，都是他們受到的最友善的待遇。傑克·艾田蒲說：

我們乘坐 B-24 轟炸機抵達馬尼拉，最終登上了由美國海岸警衛隊執航的「休斯上將號」(Admiral Hughes)。原定駛往舊金山，但因船上還有加拿大的戰俘，目的地便改為了溫哥華。我們在那裏休養了大約一個月，然後乘火車橫穿整個加拿大。他們甚至在班夫停了一個小時，好讓我們欣賞那裏美麗的風景。行至大草原時，火車又停了一次，因為對面駛來一個列車，車上運載着從英國返鄉的加拿大士兵，他們想讓我們了解英國在遭受轟炸後的狀況。

阿爾夫·亨特回憶道：

在馬尼拉，我們登上了美國運輸船「約瑟夫·T. 迪克曼號」(Joseph T. Dickman, APA-13)，先到了珍珠港，然後繼續前往舊金山。在那裏，我們被安置在一座靠近惡魔島^❶的島上，甚至能看見囚犯在島上走動。之後我們沿着聖塔菲鐵路線，途經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一路乘火車到達紐約，但當地正在進行碼頭罷工，所以我們繼續前往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然後乘坐「伊麗莎白女王

❶ 惡魔島 (Alcatraz Island) 是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灣內的一座小島，四面峭壁深水，聯外交通不易，因而被美國政府選為監獄建地，曾設有惡魔島聯邦監獄，關押過不少知名的重刑犯，於 1963 年廢止。——譯者註

號」(*Queen Elizabeth*) 號前往南安普頓，這也是她作為運輸船最後一次執行任務。在遠東度過了七年之後，我於篝火之夜^❶回到了故鄉。

保爾特先後搭乘多艘船輾轉前往馬尼拉，包括美軍醫院船「救援號」(*Rescue*)、美國軍艦「戈塞林號」(*USS Gosselin*)、澳大利亞皇家海軍護衛艦「瓦拉蒙加號」(*HMAS Warramunga*)、美國軍艦「莫尼特號」(*USS Monitor*)，最後是美國軍艦「奧康托號」(*USS Oconto*)，他說：

「帕格」·巴倫 (“Pug” Barron) 和我決定去馬尼拉市區裏逛逛。我們走到門口時，被兩名憲兵攔住了，說我們不能進去。正當雙方發生爭執的時候，有兩名軍官坐着吉普車過來了。他們停下來問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我們解釋說自己是從日本返回家鄉的「英國佬」，想去看看馬尼拉。這下，情況一下子就不同了。兩名憲兵說：「見鬼，你們怎麼不早說呢？」兩位軍官還順路開車把我們帶進了馬尼拉。最讓人難為情的是，一旦這些美國佬知道你是從日本戰俘營裏出來的，他們簡直什麼都願意為你效勞。

❶ 「篝火之夜」(*Bonfire Night*) 又稱「蓋伊·福克斯之夜」(*Guy Fawkes Night*)，是英國的傳統節日，時間為每年的11月5日。它是為紀念「火藥陰謀」這個歷史事件——天主教反叛分子密謀炸毀位於倫敦威斯敏斯特的英國國會大廈，但是密謀泄露了，一個衛兵發現了蓋伊·福克斯，在嚴刑拷打下蓋伊·福克斯招供了一切。今天，孩子們會自己製作「蓋伊」(用舊衣服填充做成的假人)，再將其放到篝火上焚燒。最後，當絢麗的焰火燃放起來時，代表多年前的那場爆炸根本沒有發生過。——譯者註

米勒也是從橫濱乘船抵達馬尼拉的，他搭乘美國軍艦「古德休號」(USS *Goodhue*)^①橫渡太平洋，最終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的維多利亞市登陸。他回憶道：

中轉營地組織得很好，飲食和醫療都堪稱一流。我們獲准出營參觀維多利亞市，還能與當地居民自由接觸。加拿大人對我們非常熱情，邀請我們參加了很多聚會，還去了當地的酒館。不過在這接連的享受中，大家突然意識到一個明顯的短板：我們沒錢承擔這些社交的開銷。營地的負責軍官得知這一情況之後，為所有戰俘安排了預支款項。你猜怎麼着？我們每人只拿到了五加元（五美元），這簡直是侮辱！那點錢能幹什麼？我們提出了抗議，但根本沒人理會。三天後，第一批準備啟程回國的人員被通知出發。我們乘渡輪前往溫哥華，再從那裏搭乘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Canadian Pacific Railway）的火車，橫貫加拿大，前往哈利法克斯港。我們終於踏上了回家的路。火車上配有卧鋪，我們一上車就躺了進去，要知道，我們那時很容易感到疲憊，身體狀況不允許我們過度勞累。從溫哥華到哈利法克斯是一段漫長而疲憊的旅程。每到一個小站，都

① 僅以三艘遣返船的命運為例：「休斯上將號」建於二戰末期，這艘運兵船（AP-124）戰後在加州蘇伊森灣停泊了多年。「約瑟夫·T. 迪克曼號」1922年以「半島州號」（*Peninsular State*）之名開始跨大西洋服役，並在同一年年中更名為「皮爾斯號」（*Pierce*），後又改為「羅斯福號」（*Roosevelt*）。1926年它救援過英國船隻「安提戈涅號」（*Antigone*）上的船員，1940年被美國戰爭部徵用為「迪克曼號」（*Dickman*）運輸艦，曾參與了猶他海灘的諾曼底登陸，最終在1948年於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被拆解。該船屬「535」級郵輪（緊急艦隊公司），長535英尺，總噸位13869噸，單煙囪雙螺旋槳，可搭載644人。「古德休號」（*Goodhue*，APA-107）戰後作為貨船輪「夏威夷公民號」（*Hawaiian Citizen*）出售，於1982年報廢。

會有一大羣加拿大人上火車，給我們提供食物，還送來新鮮水果、香煙、巧克力和熱茶。一如既往，他們的熱情和友善程度讓人驚歎不已。

保爾特是第一批抵達溫哥華的人，他說，「我和第一批人一起到達後，立即被一位女記者攔住了，那真是個標緻的美人兒！她跟着我上了火車，我們相談甚歡，直到列車快要啟動時她才匆忙下車。記者對我捧着的兩個白匣子格外好奇，當得知裏面裝着的是我團兩位戰友的骨灰時，便很想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①

東海岸終點站近在眼前，他們終於迎來了最後一段旅程。艾田蒲說：「終於登上開往英國的『法蘭西島號』（*Ile de France*），你絕對想不到，船上的第一餐竟是米飯！我們派代表向船長抗議，他解釋說自己只是在執行英國政府的命令。大夥客氣地警告他：要是再上米飯，就把他扔到海裏去。抵達南安普頓時，我們受到熱情迎接，碼頭工人正在罷工，英國還是熟悉的老樣子啊。」

加拿大人和美國人把歸來的戰俘奉若上賓，前者甚至將其當作親人對待。如今重回英國，倖存者們發現這些限制和瑣碎的規定^②實在難以接受。一個愛開玩笑的人在船艙壁上留下了這樣一行字：

香港戰俘：1941年12月被日軍俘虜，1945年9月被美軍解放，1945年10月再次被英軍俘虜。

① 另一個骨灰盒是二等兵阿爾弗雷德·基勒（*Alfred Keeler*）的，他於8月15日（日本投降當天）去世，其遺骸現安葬於阿克頓公墓。而安德魯斯不知為何被刻在了西灣紀念碑上，被標註為「無已知墳墓」。

② 不過公允地說，當時英國仍處於嚴格的配給制度之下，其民眾難以像來自新世界的盟友那般慷慨。



就是這樣，一切在沉悶中畫上了句號。經歷了在香港 18 天的浴血奮戰、九個月的囚禁生活、在「里斯本丸」上八天的煎熬、船隻沉沒的災難，以及在日本作為戰俘度過的兩年零十個月後，這些少數的幸運兒們終於回到了故鄉。

14000 名將士曾為保衛香港與日軍血戰。大約 1560 人戰死沙場，其餘（除少數逃脫者外）盡數淪為戰俘。其中 1834 人被押上了「里斯本丸」，最終僅有 761 人重獲自由。^❶

一些人只是慶幸自己還活着。阿特金斯現在已經基本從慢性阿米巴痢疾和腳氣病中恢復過來了：

❶ 關於在戰俘營中死亡的「里斯本丸」倖存者，韓美洵指出，「神戶死亡 114 人，大阪 55 人，小倉 21 人，門司 24 人，其他地區約 30 人，合計 244 人」（而本書所列名單為 245 人）。那些在小倉倖存下來的戰俘十分幸運——若非天氣惡劣，導致將目標改為長崎，小倉本應是第二顆原子彈的投放目標地。

電報

大東電報局 1945 年 10 月 5 日

WZB329G AUK 4

PWM M. E. 阿特金斯夫人

轉交地址：倫敦圖廷德靈頓路 135 號

已安全抵達新西蘭，並受到妥善照料。請將信件與電報寄至：新西蘭奧克蘭中央郵局 前戰俘收

萊尼·阿特金斯

有些人則看到了機遇。新西蘭人林納伯格原本希望從橫濱乘飛機返鄉，卻被安排登上了一艘前往馬尼拉的運兵船，他說：

錨泊一天後，我們被送上岸，安置在一個特別設立的營地裏，配發裝備並接受進一步的體檢，然後就被編入「怨仇號」(HMS *Implacable*) 的姊妹艦「不倦號」(HMS *Indefatigable*) 戰列巡洋艦。我們隨即啟程前往溫哥華，然後經由陸地到達大西洋，轉赴英國。

在這一批人中，有另外兩名新西蘭小伙子不想去英國。我告訴他們這樣的旅行機會一生只有一次，於是他們也加入到了隊伍之中，但還沒走到珍珠港他們就開始想家。上岸後打電話給父母，說自己是被強行送去英國的。惠靈頓海軍部門顯然得知了這些新西蘭海軍士兵走錯了方向，於是下令他們所有人必須報告自己的去向。結果這兩名小伙子被嚴厲訓斥了一番。而對我，他們則道歉說必須送我回去，新西蘭人不能去英國，因為沒有交通工具送士兵們

再回到新西蘭。所以我們只能留在船上，以工作的方式換取回悉尼的返程艙位。結果我不得不在無線電報（w/t）辦公室值班，而那兩個小伙子則像遊客一樣旅行。我被安排與無線電報操作人員一起生活、用餐，被分配到一個位於船隻前部、緊靠錨鏈艙的鋪位。當時的海況極其惡劣，所有人都禁止上到飛行甲板，因為那裏距海平面有 65 英尺，巨浪拍打着甲板又從船尾翻滾而下。那天晚上當我掛起吊牀時，詢問艙內唯一的同伴其他人都去哪兒了，他說上一次遇到類似風浪時，艙壁塌陷了，幾個小伙子被湧入的海水淹死了。

林納伯格最終輾轉加拿大、夏威夷、日本、香港、印尼、馬尼拉、婆羅洲和澳大利亞回到故鄉。

他是幸運者之一，但回家是一回事，重新適應卻是另一回事。

這一點，讓他們的兒子和女兒來講述最合適。

盧埃林 - 威廉姆斯之子加雷思說：

我的父親亨利·盧埃林 - 威廉姆斯（Henry Llewellyn-Williams）曾是皇家海軍陸戰隊（駐「添馬艦」）的一名上等兵。1942 年 10 月時，他 29 歲。父親極少談及自己在「里斯本丸」上的經歷，以及作為戰俘在大阪的歲月。戰爭結束後，他在溫哥華附近的一個康復營待了六個月。回到英國後，他與父母一同住在阿伯德爾，但嚴重的創傷後遺症讓他此後兩年多只敢在夜間出門。他甚至無法適應住在房子裏，所以在花園的小棚子裏給自己搭了個窩。

後來祖父勸說他把經歷都寫下來，還給他買了台舊打字機。

可父親剛寫完不久就把稿子都燒掉了。據祖父說（他本人也未曾讀過），父親不願任何人再經歷一次他所遭受的一切，哪怕是間接地。

盧埃林·威廉姆斯之女希拉里^❶的詩作：

父親游泳

1

他的身體

如同一柄溫熱的刀刃，

劃入冰冷的海水，

堅硬的水面為之而柔軟。

浮起時如黃油般絲滑，

碧浪翻滾，

從他肌膚上滑落。

他張開雙臂，

一次次地把奔涌的浪花甩在身後，

用寬闊的胸懷攬住所有。

臉埋進了泡沫，

海鹽刺得他睜不開雙眼。

他熱愛海水帶着壓力的舔舐，

❶ 希拉里·盧埃林·威廉姆斯（Hilary Llewellyn-Williams）是一位出版過四部詩集的詩人。其詩作〈父親游泳〉（My Father Swimming）收錄於她的詩集《格陵蘭》（Greenland）中，由塞倫出版社（Seren）於2003年出版。

彷彿珍珠的光芒在他身上躍動。

當他抬起頭，

空氣碎裂成旋轉發光的碎片：

天與地混成一片明亮的透明體。

靜寂無聲，唯有心臟的生命跳動——

一切感官皆被淹沒，

唯餘觸覺：太陽之手撫過他的後背與海面，

他已忘記了我。

但我也在那裏，在那巖石之上，

它們堆疊如房屋，

又像動物有着光滑的皮膚，

熏紅於熱浪，閃着雲母的光

我坐在高處，渾身乾爽，

望着他，心中歡暢。

海灣之勺，

他們喚之「水槽」。

花崗巖築成圍牆，

海水在此匯聚、迴響，

而後彷徨，

成片的海藻相互推擠、蕩漾。

遙遠之外，大西洋咆哮着，

沖刷着陸地。

而這裏的暗流張開如蹣的手指，

撕扯着籠罩他們的網。

他感到繩索鬆脫，
便蹬腿游向了自由。

2

父親為海癡醉

母親為之心碎：

他總是拽着我們奔向某個海岸，
又或在某個海角傾聽那海風輕吹，
浪花拍打着臉頰，
映照着他雙眼遙遠的藍灰。
二十年前，戰火紛飛——
地獄航船，橫遭魚雷，
內臟、燃油、垂死的士兵及其守衛，
傾瀉而出，炸得粉碎，
父親游了整日整夜。
沉船帶走了他的活力，
讓他的過去與未來清淨如洗，
徒留一具游動的軀體，
迷失在浩瀚的波光裏，
搖晃着，懸掛在深邃太空的海洋之鏡。
他奮力拯救的朋友已一動不動，冰冷僵硬，
沉向那深海之境。
父親未被吞噬，他得到了大海的愛惜，
仰臥水裏，隨浪漂移，

如一段浮木，被海水溫柔托起。

為生存而浮游，

這是深烙於他身體的痕跡，

終有一日，也將成為我的印記。

黎明時他漂抵一座孤島，

漁夫們輕拽，將他翻身打撈。

這是一次偉大的歷險，

可他隻字不提那囚徒的煎熬，

將他體魄虛耗：

那五英石^①的男人依然行走於天地，

仍相信，

是大海保全了他的呼吸，

讓他拚盡全力回到那片熟悉的土地。

3

他從未教過游泳，

我們都是無師自通，

放學後在公共泳池的淺水區，

掙扎撲騰。

水帶着刺鼻的氯氣味，

刺痛了雙眼，

我厭惡在此流連，

① 約 32 公斤。——譯者註

無邊的嚷喧，
大孩子們飛奔進泳池，
在推推搡搡之間。
狂野的大海，
沖走我雙腳的支撐，
巨浪轟鳴着，沒過我的頭頂，
灌進嘴裏的鐵鏽味，
是血的味覺精靈；
它以整個世界的重量，
撞擊着我的身形。
但當我的腳往下探去，
卻觸不到底，
那才是真正的恐懼，
感到死亡正向我靠攏，
於是我屏住呼吸。
看着父親溺水，
他的身形漸漸模糊，
像是鎮紙下的一片輕羽，
懸浮在凝固如玻璃的海面；
直到他上浮，舒展身體，
向着水面沖去，
重獲血肉之軀，
他縱聲歡愉。
是陸地將他生命奪去，

那些漫長而乾旱的年歲，
 在他體內積堆，
 最終走向一個平凡的結尾——
 困在陸地之中，緩慢逝去。
 潮水逐漸消退，徒留空殼一具。
 我的父親
 絕非棺木中那枯槁的模樣，
 他已經離我而去，
 也許他正在游泳，
 在從容而漫長地划着水，
 被帶向了無盡的遠方
 而我卻無法跟上。

但有一小部分人深知自己永遠無法適應，因此從未回家。對這些人而言，那些經歷帶來的創傷太過深重。在最後關頭，他們意識到，經過這一切之後，自己再也無法面對家人了。

這些失蹤的人活了下來，卻永遠無法歸家了；他們的家人所承受的傷害，與那些失去至親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同樣深重。^①

① 目前尚無法確定這些人確切的人數。至少有三人（一名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成員、一名皇家蘇格蘭軍團士兵，以及一名米德爾塞克斯軍團士兵）似乎移居新西蘭並在那裏開始了新的生活。出於對其家屬的尊重，此處不公佈其姓名。也有一些人回到了家鄉，但後來與家人斷絕了一切聯繫。至少有一人選擇了自殺〔見馬丁·布斯（Martin Booth）的自傳《鬼佬》（*Gweilo*），第127-132頁〕。

十六、重逢

你所看見的這個年輕人就是遭到船難的一人。

要不是因為憂傷損害了他的美貌，你確實可以稱他為一個美男子。

他因為失去了他的同伴，

正在四處徘徊着尋找他們呢。

——《暴風雨》，第一幕，第二場^❶

現在，另一艘美國潛艇「鮑魚號」(USS *Bullhead*)駛入了我們的故事。它於1945年3月下旬至4月底在中國南海進行了首次巡邏。雖然未能與敵人短兵相接，但在3月31日和4月24日，「鮑魚號」用其五英吋的艦炮轟擊了東沙羣島，其間還援救了三名在中國沿海遭空襲而墜毀的B-29超級堡壘轟炸機機組人員。同年5月和6月，「鮑魚號」在暹羅灣和中國南海執行第二次巡航任務。在此期間，它以炮擊的方式擊沉了四艘小型艦船，並損壞了另外三艘。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320頁。——譯者註

那麼，「鮎魚號」與「里斯本丸」的故事有什麼關聯呢？答案在於霍爾特。我們上一次見到小愛德華·R·霍爾特中尉（Edward R. Holt Jr.）是「鱸魚號」發射魚雷擊中「里斯本丸」的那一天，他在該潛艇上擔任魚雷軍官，但他後來身經百戰。

1945年，已晉升為少校的霍爾特被美國海軍調往澳大利亞，出任「鮎魚號」的艇長。7月31日，該艇自弗里曼特爾啟程執行第三次戰鬥巡航任務，在霍爾特的指揮下，駛向其任務海域——爪哇海。同期在該區域巡航的還有美軍潛艇「豚魚號」（USS *Capitaine*）和「四齒魷號」（USS *Puffer*），以及英軍潛艇「沉默號」（HMS *Taciturn*）和「徹底號」（HMS *Thorough*）。「鮎魚號」於8月6日抵達爪哇海的指定位置，「豚魚號」緊隨其後。8月12日，「豚魚號」命令「鮎魚號」第二天與本艇以及「四齒魷號」會合，但未收到任何回應。「豚魚號」等待三日後報告稱，自抵達該海域以來，始終未能與「鮎魚號」取得聯繫。後者成為戰爭中最後一艘全員覆沒的美軍潛艇，84名官兵全部遇難。^❶

「鮎魚號」的失蹤日後將促成一次不同尋常的會面。

對於戰俘們而言，解放來得太突然，但從未有人因擊沉「里斯

❶ 由於當時有四艘潛艇與「鮎魚號」處於同一海域，另有兩艘潛艇〔「鱈魚號」（*Cod*）和「歐鯉號」（*Chub*）〕也曾不同時間穿越該海域，因此很難確切判斷是哪一次日軍的反潛攻擊導致了「鮎魚號」的沉沒。然而，最有可能的是1945年8月6日（也就是「鮎魚號」執行巡航任務的第一天），當時一架日本陸軍飛機用深水炸彈襲擊了一艘盟軍潛艇。據稱有兩次直接命中，並觀察到水面上有大量的油和氣泡。事發位置靠近印尼巴厘島海岸。這艘潛艇很可能至今仍沉沒於此。

本丸」的是美軍潛艇而對美國人心生仇恨。相反，大多數人都樂見盟軍以各種方式展開了反擊。

韓美洵說：

有一點是所有人都認同的，那就是下令發射魚雷擊沉船隻的潛艇指揮官，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就他所掌握到的信息，以及日本人對外釋放的信息來看，這是一艘運兵船，船頭和船尾都配備了武器，而且沒有任何明顯標誌表明船上載有戰俘。美國海軍擊沉它完全是合理的。

但倖存者們如今面臨着重建生活的挑戰，對有些人來說，這幾乎是無法完成的任務。最年輕的一些戰俘除了集中營的生存經歷外，幾乎沒有成年後的生活經驗。當他們終於重獲自由時，卻變得手足無措起來。

所有人都深知，重返家園殊非易事，大部分人終生都飽受健康問題的困擾，但多數人還是以某種方式堅持了下來——他們別無選擇。儘管當時人們心裏都知道他們父輩所經歷那場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了大量的自殺行為和精神疾病，但當時他們還對「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毫無認知。許多歸國的美國潛艇兵同樣面臨着重新適應生活的挑戰，有些人甚至絕口不提戰時經歷。^❶

❶ 比如，「鱸魚號」船員卡爾·謝林（Carl Kjellin）的姪子巴尼·戴伯特（Barney Deibert）在其報告中表示：「他顯然從未向任何人提起過服役經歷，我感覺他是想徹底忘掉這一切。我甚至和一些與他同期服役的海軍士兵談過，他們告訴我，他也從未和他們提起過自己的服役經歷。」

不過，其中一位歸來的潛艇兵——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Garfield Kvalheim），與一位前戰俘——傑克·艾田蒲（Jack Etienne）最終相見了，並分享了彼此的經歷。

傑克·艾田蒲是「里斯本丸」三號貨艙中為數不多的皇家炮兵團倖存者。回到英國後，他繼續在軍隊服役。不久後，軍方便將他調派到多佛，在那裏他遇見了未來的妻子露絲。

1946年初，我所在的團被調往多佛城堡。有一天早晨，我因事要與「海陸空三軍合作社」（NAAFI）^①的女經理談話。等候期間，一位漂亮的女孩走過，我們互相對視了一眼，但除了打招呼外沒說什麼。之後，我常常一有空就到小賣部去，但總是緊張得不敢主動搭話。過了一段時間，部隊在體育館舉辦了一場舞會，我和朋友站在吧台邊兒上喝酒。樂隊宣佈開始「女士邀請舞」（Ladies excuse me dance）環節。露絲走過來邀請我跳舞，但我拒絕了她，然後她冷冷地瞪了我一眼就離開了。我朋友對我說：「你這瘋子！整天盼着人家搭理你，結果人家主動了你倒退縮了，至少該實話告訴她你不會跳舞啊！」第二天，他幫我轉達了這個意思，謝天謝地我得到了原諒，向她道歉後，我們便開始約會，直到後來結婚。

他們於1946年12月19日結婚，正好是五年前香港戰役最激

①「海陸空三軍合作社」是英國政府於1920年12月9日創建的一家公司，負責管理英國武裝部隊所需的娛樂場所，並向軍人及其家屬出售貨物。它主要在英國的軍事基地運營俱樂部、酒吧、商店和餐館等等。——譯者註

烈的那一天。在英國生活了將近十年後，傑克收到了下一次調派任務，目的地竟然是日本。

對於再次前往日本，我的心情很複雜。首先，我並不想離開家人，但與此同時，朝鮮仍在發生戰爭，我不想被當成是懦夫，還是決定前往。我被派往位於吳市近郊廣地區的日軍增援補給基地 (J.R.B.D.)^❶。到達後，有人告訴了我牀鋪的位置，我提着行囊走進去時，一位年長的日本老婦人正在掃地，她嘴裏嘀咕着又來了個英國兵，我用日語回答了，她，驚得她差點把掃帚掉在地上，問我，「你才下船怎麼就會說日語？」我解釋說自己曾經來過這裏。她又問什麼時候來過，我回答是作為戰俘被關在大阪時。「二號營？」她追問道，我說是的。原來她當年就住在二號營附近，而那片區域後來在美軍空襲中被夷為平地。她隨後飛奔出去告訴了其他人。後來，每當我走進食堂吃飯時，無論坐着的是誰，總有女服務員站起來向我鞠躬。這讓一些級別比我高的人不太高興，但日本人堅持傑克桑在他們心中就是第一位的！遺憾的是，我沒能回到大阪，只參觀了廣島。

之後，傑克又先後被派駐到新加坡、馬來亞、德國和巴林。在此期間，他與露絲養育了五個孩子——四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他最後一次服役地點是在北愛爾蘭，1974 年他主動申請了退役。此後，他繼續為英軍工作到 1977 年 12 月，後來移民到澳大利亞。

❶ Japan Reinforcement Base Depot，即「日軍增援補給基地」。

參與了擊沉「里斯本丸」行動的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當天便迎來了自己的 25 歲生日，而他收到的禮物正是愛德華·霍爾特（Edward Holt）畫的「里斯本丸」素描。之後，他在「鱸魚號」潛艇上又執行了六次艱苦的戰時巡航任務。「在某次巡航中，我們遭遇了持續而猛烈的深水炸彈攻擊。潛艇保持靜默航行，通風系統關閉，艙內酷熱難耐。有兩名水兵出現了精神崩潰的跡象，隨後就被調離了潛艇部隊。」

不過，克瓦赫海姆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他一直留在潛艇上，直到第八次巡航任務結束。隨後，當局將他調往另一艘最新的美軍潛艇「小口雙鰭電鰩號」（*Entemedor*, SS-340）服役。當戰爭結束時，他們正在這艘新潛艇上執行首次作戰巡航任務。

1945 年 12 月 31 日，他與心上人格特魯德結婚，育有兩子一女，分別是兒子理查德、拉里和女兒卡米爾。

戰爭結束後，他又在多艘潛艇上服役〔包括「軟棘魚號」（*Tilefish*）、「鼓魚號」（*Drum*）、「鯉魚號」（*Carp*）、「海獅號」（*SeaLion*）、「鏟鮐號」（*Bashaw*）、「巴巴羅號」（*Barbaro*）〕，最終在塔科馬結束了他 20 年的海軍生涯（他自 1955 年至 1957 年在那裏從事岸上勤務工作）。退役前夕，一名政府招聘人員聯繫到他，讓其赴海外任職。在一番神祕的安排下，他被送往華盛頓特區進行面試。面試進行得很順利，他收到錄取通知的同時，被告知新僱主是「中央情報局」（CIA），而其第一個任務的目的地將是台灣。

他們變賣了房產後，踏上了新的冒險旅程，在台灣生活了近十年，這期間執行的任務遍及整個遠東地區。即便到今天，加菲爾德對自己在中情局的工作也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涉及了大量的監視

工作。」台灣之後，他又被調往越南，在那裏工作了三年。按當時的規定家屬不得隨行，但他的兩個兒子恰巧也在越南服役——理查德在陸軍，拉里在海軍。

在此期間，加菲爾德在香港跑馬地租了一套公寓，25年前，英國戰俘就是在對岸被船押送到「里斯本丸」上的。因此，每月他都能赴港小住，並深深愛上了這座城市。

加菲爾德說：

當我被派往越南時，常規的任期是18個月。在這個任期結束後，我獲得了30天的休假，並被安排了一個新的任期（想必我幹得相當出色！）。在休假期間，我告訴我的前妻，自己打算在香港找個住處，這樣她就可以過來，我大約每個月也能去看她一次，她聽了之後也覺得這個主意不錯。在越南期間，我每周七天都要長時間工作。雖然無法領取加班費，但能記為補償的休假時間，用以替代年假。我累積了很多補休的天數。有次回國休假結束，在返程途中，我在香港停留，物色可租住之處。通過在港工作的中情局朋友的關係，我得知跑馬地正在興建一棟公寓樓。長話短說，我在三樓租了一套公寓，從那裏可以俯瞰電車軌道，遠處是賽馬場。我們深深愛上了香港。每月都能去香港住五到十天，這讓我得以遍覽香港風情，結識各路有趣人物。有一個人頗值得一提，那就是灣仔海洋酒吧的老闆，他會把自己賽馬場的會員卡給我，讓我替他下注。通過局裏同事牽線，我妻子還在香港領事館找到一份祕書的工作。

後來，他又在伊朗工作了兩年，接着在弗吉尼亞短期任職，

最後在加利福尼亞州參與 U-2 偵察機項目度過了職業生涯的最後兩年，並於 1974 年底退休。

退休後，格特魯德和加菲爾德在華盛頓州的吉格港附近定居。^❶1977 年格特魯德去世，加菲爾德將房子掛牌出售。他把房子委託給了一家房產中介，那裏有一位名叫弗蘭的女士，與加菲爾德情投意合，二人在 1981 年結婚。弗蘭是寡婦，育有一女，她的前夫約翰於 1975 年去世。

然而，加菲爾德從未忘記 1942 年 10 月在「鱸魚號」上收到的電訊——他們擊沉了一艘載有英軍和澳軍戰俘的船隻。美國潛艇退伍軍人（Subvets）始終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大約在 1983 年末，加菲爾德在《上浮與下潛》（*Blow and Vent*）^❷雜誌上讀到一篇關於美國潛艇「鯛魚號」沉沒的文章，該雜誌是由他所在的退伍潛艇兵地方分會（華盛頓州西雅圖的洛克伍德海軍上將分會）每月出版的通訊。

這引起了他的注意，因為他非常清楚「鯛魚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後一艘全員陣亡的美國潛艇，而且它的艇長正是他的老朋友愛德華·R. 霍爾特（Edward R. Holt）。加菲爾德隨即寫信給《上浮與下潛》，提供了相關細節，通訊這樣報道了他的來信：

❶ 加菲爾德坦言道：「我本想退休後定居香港，但我的妻子堅持搬回到我們孩子居住的美國西北地區。」

❷ “Blow and Vent” 指的是向壓載艙內充氣排水使潛艇上浮，向壓載艙注水使潛艇下潛。

《上浮與下潛》：

我們的一位會員對關於「鮩魚號」艇長、格里菲思海軍少將（Radm^❶）的文章頗感興趣，以下是一封由華盛頓州吉格港的 G·M·加菲爾德寄給梅里爾·埃德森（Merril Edson）的稿件：

「我懷着極大的興趣閱讀了《上浮與下潛》12月刊上那篇關於潛艇艇長（『鮩魚號』艇長沃爾特·T. 格里菲思）之悲痛經歷的文章。我這裏也有一個小故事，能為『鮩魚號』的故事補充一些細節。

「1942年10月1日，我隨『鱸魚號』在中國沿海巡航時，發現了一艘從廈門駛出的船。經過一番調整，我們靠近目標並發射魚雷擊中了船尾，使其失去動力漂停在水面上。不久，便有兩架飛機趕來對我們進行了持續的攻擊。但在短暫周旋後，我們設法繞到船的後方，又發射了一枚魚雷，命中了船體中部。艇長透過潛望鏡觀察到，許多人正四處跳海逃生，於是判斷這應該是一艘運兵船。此時，巡邏艇已經出動，不必說，我們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脫身的。

「當時，『鱸魚號』上的魚雷軍官是小 E. R. 霍爾特中尉，他還是一位出色的素描畫家。由於10月1日是我的生日，他畫了一幅被我們擊沉的那艘船之剪影圖，背景是一輪旭日，並簽上了生日祝福。

「故事的重點是：後來霍爾特中尉晉升為小 E. R. 霍爾特海

❶ Radm 為 Rear Admiral 的縮寫，即海軍少將。

軍少校，接替了沃爾特·T. 格里菲思上校成為『鮎魚號』的艇長。而眾所周知，該艇是二戰中最後一艘被擊沉的美軍潛艇。

「我們在10月1日擊沉的那艘船被確認為『里斯本丸』，當時它載着英國和澳大利亞戰俘前往日本。每當回憶此事，我總是忍不住想，而且這個念頭已經浮現過很多次：會不會有當年船上的倖存者如今仍在澳大利亞某處生活？有沒有人在當地有認識的人，能幫我打聽一下嗎？」

另一位美國潛艇老兵傑克·基德（Jack Kidder）也饒有興趣地讀了這篇文章。基德一直與他二戰時期結識的、住在澳大利亞珀斯的女友保持聯繫，便把這篇文章寄給了她。後者又將文章轉交給了《西澳大利亞人報》（*West Australian*）的專欄作家比爾·貝利（Bill Bailey）。貝利對這個故事產生了濃厚興趣，一位潛艇兵，得知自己所在的潛艇導致了許多戰俘遇難後，竟想與倖存者取得聯繫。於是，他發表了以下回應文章：

比爾·貝利：1984年3月26日^①

許多二戰老兵或許不願與這位想要重拾往日記憶的美國潛艇兵取得聯繫。他們唯一共同的經歷就是這位潛艇兵所在的潛艇曾在中國南海擊沉了他們乘坐的船隻。

華盛頓州吉格港的瓦爾·克瓦赫海姆說：「我當時在美國海

① 經《西澳大利亞人報》授權引用。

軍『鱸魚號』潛艇上服役。1942年10月1日，我生日那天，我們在廈門附近發現了一艘日本船隻。」

「我們發射了一枚魚雷，擊中了船尾，使其失去動力停在了海面上。艦長觀察到有許多人棄船逃生，便推測那艘船上載有軍隊，應該是艘運兵船。」

「我們隨即轉向發射艇尾魚雷將其徹底擊沉。由於遭遇持續追擊，『鱸魚號』在整整兩天後才恢復正常，當我們浮出水面為其電池充電時，收到了這條新聞報道。」

報道引述了東京廣播電台的公告，稱一艘美國潛艇擊沉了一艘日本船隻，該船載有約1800名英國和澳大利亞戰俘，他們正在駛往日本的途中。公告還提到，數百人被另外兩艘日本船隻救起，還有一些戰俘設法游到了鄰近的島上。

克瓦赫海姆先生說：「或許有倖存者最終回到了澳大利亞並仍然健在，若我能聯繫上其中幾位，那將意義非凡。」

這場重逢或許會令倖存者竭力忘記他們第一次相遇時的情景。

事實上，船上並沒有澳大利亞人（除了可能有一兩位已經加入了英軍部隊）。按理說，這篇文章本應無人回應，但是機緣巧合，移民澳大利亞的傑克·艾田蒲並沒有移居到澳大利亞移民的主要聚集地悉尼或墨爾本，而是去了西澳大利亞。不僅如此，他看到了這篇文章並熱切地想要作出回應。值得稱讚的是，美國郵政局在信封上僅寫着「華盛頓州吉格港，G. 克瓦赫海姆收」的情況下，仍然將信成功地送到了加菲爾德的手中。

傑克·艾田蒲，1984年4月16日

瀉湖大道 84 號

揚切普（郵編：6035）

西澳大利亞

1984年4月16日

親愛的瓦爾：

我滿懷興味地閱讀了您刊登在3月26日《西澳大利亞人報》上的信件。1942年10月1日，我正是「里斯本丸」上1800名從香港押往日本的英軍戰俘之一。當時我與皇家炮兵團的多數戰友一起被關押在三號貨艙，恰好就在機艙的旁邊，而那裏正是第二枚魚雷擊中的位置。艙壁被炸開了一條大裂縫，海水不斷湧入進來。甲板上的大多數日軍士兵都登上了救生艇，剩下的人則將所有戰俘艙口封死，只向我們艙內遞下一台手搖泵和四根蠟燭，勒令我們必須確保船隻不沉。

貨艙內的慘狀難以言喻：沒有食物、飲水和新鮮空氣。我們四人一組輪流操作水泵，但隨着情況的惡化，不斷有人因筋疲力盡而昏厥過去，水位也在持續上漲。

我們硬撐着讓船漂浮了27個小時，但那時，船體已經嚴重傾斜了。幸運的是，一名戰俘設法從另一個貨艙逃了出來，幫我們撬開了封板，但他也在那時被日軍守衛開槍射殺了。我們爭先恐後爬出貨艙，順着甲板滑入到海中。那時，日軍的巡邏艇和拖船正繞着垂死的「里斯本丸」轉圈。那些「英勇」的日本兵竟以射殺游向他們的戰俘為樂。他們還假裝要救人，待將

人從水中拉到與甲板齊平的位置時，猛然用腳踢人並將其推回水中。

我是少數幸運者之一，僥倖躲過了槍擊，在海裏游了六個小時後，終於被救起並被送往上海。在那裏，我們被排成一排，日軍翻譯告訴我們，我們本應該像老鼠一樣全部淹死。從香港出發的 1800 名戰俘中，大約有 900 人在「里斯本丸」上喪生，更多的人後來死在了大阪和神戶的戰俘營裏。巧合的是，這兩座戰俘營後來都被美軍轟炸機炸成廢墟。我看，「美國佬」肯定對這些來自香港的「英國佬」戰俘頗有意見啊！！

向你以及「鱸魚號」的其他船員致以問候！

傑克·艾田蒲謹啟

他們取得了聯繫。1986 年，瓦爾和弗蘭前往澳大利亞拜訪傑克和他的妻子露絲。克瓦赫海姆說：

在與傑克·艾田蒲通信大約兩年後，我決定是時候到南半球與傑克和露絲見上一面了。此外，我還想去布里斯班，看看戰時我們在那兒執行過任務的新農場碼頭（New Farm Wharf）。弗蘭和我先飛往悉尼，在這座美麗的城市裏遊覽了幾天，然後飛往珀斯與傑克和露絲會面。我們在珀斯的酒店辦理好入住後聯繫了傑克，並約好第二天在酒店見面。我和弗蘭在大堂入口處等候，不一會兒就看到傑克和露絲走了進來，傑克之前寄過照片給我們，所以一眼就認出他來了，那感覺就像是老友重逢一樣。傑克打趣地說道：「這可與我們上次在魚雷兩端相遇的情景大不相同。」

寒暄過後，我們聊起他在「里斯本丸」上的經歷。還談到他們在船沉沒後被撈起、然後被塞進漁船運送到日本的情景，戰俘們被擠得像沙丁魚一樣，一半人站着，一半人坐着，然後輪換位置。有些人病得很重，有些還患上了痢疾。我相信你也讀到過那些恐怖的故事，因為這是戰爭中最殘酷的暴行之一。他還告訴我，在「里斯本丸」上時，他聽到或感受到一次明顯的撞擊（我推測那可能是我們發射的一枚啞彈），後來他又聽到一聲巨大的爆炸，相鄰艙室的艙壁上出現了一道大裂縫。我則向他講述了我們與「里斯本丸」狹路相逢的情況，以及我們如何繞到船的前方並在黎明前下潛等待他們經過。我們還談到了他在戰俘營中的生活，其中既有一些幽默的故事，也有一些非常悲慘的經歷。聊到東京和大阪遭受燃燒彈轟炸時，他們一度以為盟軍要趕盡殺絕。他還解釋說，戰後他曾回到了戰前生活的澤西島，但那裏生活成本變得過於高昂，這才讓他來到澳大利亞工作，而且他們的女兒也在這裏成家了。

我們一邊喝着啤酒一邊閒聊，傑克告訴我他已經將我們見面的消息告知了報社。沒過多久，一名記者和一位攝影師就趕到了。值得一提的是，這位攝影師是一位美國潛艇老兵的兒子，他父親娶了一位澳大利亞姑娘並定居在了珀斯。不幸的是，他父親在我們到訪前幾周遭遇車禍去世了。傑克和露絲帶着我倆遊覽了當地所有著名的景點，整整一周的旅行安排得很精彩。我們共同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不僅參觀了潛艇紀念碑，還在皇家遊艇俱樂部看到了展出的美洲杯，那一年美國隊恰好敗給了澳大利亞隊。我們真希望當時能在珀斯多待些日子，但七天之後，我們只得與這對新朋友告別，

乘坐印度洋—太平洋列車^❶返回悉尼。火車穿越了納拉伯平原，三天三夜的旅程實在是枯燥乏味。我們在美麗的悉尼待了幾天後，就飛往布里斯班了，在那裏我看到了舊日熟悉的地方，又乘巴士沿「黃金海岸」一路前行，拜訪了我多年前休假時常去的一家老酒吧。令人驚喜的是，那家酒吧居然還在，依舊是原來的模樣。

但這次見面遠非僅有的一次重逢。

在見過傑克之後，我在《海軍學刊》(*Naval Proceedings*，一本海軍期刊)上讀到一篇丹·奧漢隆(Dan O'Hanlon)寫的文章，他自稱是「里斯本丸」上的戰俘，詢問是否有人知曉擊沉該船的潛艇名稱。我寫信答覆他的疑問，並告知他我與弗蘭在珀斯結識傑克夫婦的經過。他回信表示感謝，並說自戰爭結束後就再也沒見過傑克，還附上了諾比·亨特(Nobby Hunt)與雷格·韋斯特伍德(Reg Westwood)的聯繫方式。我們幾人開始互通信件。後來，在1995年伯恩茅斯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我們大家得以見面。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聚會。

1995年，瓦爾與弗蘭受邀參加在英國伯恩茅斯舉行的遠東戰俘紀念大會，在那裏，他們見到了約20位「里斯本丸」的倖存者。他說：「我們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還見到了市長和市長夫人。這

❶ 印度洋—太平洋列車是連接澳大利亞悉尼和珀斯的客運鐵路列車，1970年在全線鋪成標準軌距後開通。——譯者註

是我們第一次見到丹·奧漢隆、雷格·韋斯特伍德、諾比·亨特以及他們的妻子，傑克·艾田蒲也出席了會議，這彷彿是一場老同學聚會。」

1997年，丹和諾比以及他們的妻子在加拿大西岸的雷格·韋斯特伍德家中再次相聚。

我和妻子也在那裏與他們相見，我們又舉行了一次聚會。離開時，還帶着丹和他的妻子帕特一起回家，他們在我們家住了大約一周。1998年，我們又在英格蘭的樸次茅斯重聚。參加聚會的有丹、雷格、諾比、吉姆·法拉斯（當時95歲，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服役於皇家海軍陸戰隊）和我本人，以及我們的妻子們。大家都住在「皇家水手之家」俱樂部，那時我們已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了。

關於您詢問與倖存者會面的問題，起初我確實心懷忐忑，但他們所有人都對我、對美國沒有表現出絲毫地怨恨。相反，他們很欣慰看到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取得長足的進展。丹·奧漢隆打趣道：「我在海裏漂着的時候還在想，你們這些家伙早餐是不是吃着火腿煎蛋呢！」我向他保證我們整天都在戰鬥崗位上，根本沒吃上早飯。

因此，那枚魚雷終究成了一枚「迴旋」魚雷，儘管身在這段短暫而殘酷的航程兩端之當事人，直到魚雷發射40多年後才得以相見。這場戰爭中最悲傷的篇章終於落幕了，它以重聚和友誼告終。

「里斯本丸」上的戰俘們從未犯下任何罪行，即便獲得了自由，他們也無法擺脫那些關於沉船、死亡、飢餓、疾病以及虛耗青春的記憶。這些傷痕永遠無法癒合，也不存在真正的解脫。我們所能給予他們最接近自由的方式，就是講述他們的故事。

正如你們舊日的罪惡不再追究，

讓你們大度的寬容給我以自由！^❶

——《暴風雨》，第五幕，第一場最後兩句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374頁。——譯者註



1998 年倖存者們重聚的合影，從左至右：諾比·亨特、吉姆·法拉斯、雷格·韋斯特伍德、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丹·奧漢隆（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提供）



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與傑克·艾田蒲在 Mark 14 型魚雷前：「迴旋」魚雷（傑克·艾田蒲提供）

十七、後記

陛下，他也許還活着。

我看見他擊着波浪，

將身體聳出水面，不顧浪濤怎樣和他作對，

他凌波而前，盡力抵禦着迎面而來的最大的巨浪；

他的勇敢的頭總是探出在怒潮的上面，

而把他那壯健的臂膊以有力的姿勢將自己划近岸邊。

海岸似乎在俯向他那和波濤戰乏了的軀體，而要把他援救起來。

我確信他是平安地到了岸上。

——《暴風雨》，第二幕，第一場^❶

至此，「里斯本丸」的故事畫上了句號。但是對於倖存者和遇難者家屬而言，生活仍在繼續，沒有了戰爭的紐帶，人們便四散而去，從澳大利亞到加拿大，從香港到新西蘭、菲律賓、南非，以及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328頁。——譯者註

英國的每一個角落。

就讓這篇後記將他們的故事重新匯集在一起吧。

我們追隨主炮手查爾斯·布魯克斯(Charles Brooks)從被俘到溺亡的生命足跡，也見證了他的家人從香港撤離直至戰爭結束的歷程。1945年年中，布魯克斯一家已重返英國，隨即便收到了查爾斯所屬的部隊——皇家炮兵團第12海岸團指揮官理查德·彭福爾德(Richard Penfold)中校的來信：

漢普郡弗利特

1945年11月27日

親愛的布魯克斯夫人：

遲至今日，我才寫信給您，在得知您的丈夫在「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中遇難後，我悲痛萬分，謹向您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我最近才從香港回國，向檔案處申請獲取您的地址，耗費了些時日。

1942年10月，日本人就告知我們「里斯本丸」已被擊沉，但我們無法從他們那裏獲得任何細節。我們直到今年(1945年)8月17日掌控了局勢之後，才設法獲得了乘船者和遇難者的名單，當看到您丈夫的名字赫然在列時，我很難過。我在馬尼拉遇到了一些老部下。他們曾搭乘過那艘船，證實了您丈夫已不幸失蹤。

讓我深感悲痛的是，作為團裏的精銳，一個我如此熟悉的人，在香港戰役中倖存下來後，卻以這種方式失去了生命。在

香港的戰鬥中，如您所想，他出色而全面地完成了任務。更令人遺憾的是，他在即將得到軍官任命之際離世，而這正是他已獲得推薦的職位。

這次沉船事件本可以避免任何傷亡，因為船在被魚雷擊中後至少漂浮了 27 個小時，所有日軍都已撤離，但我方士兵，特別是皇家炮兵團的人被牢牢封鎖在船艙內。當終於有人逃出來時，卻為時已晚，有些人甚至在逃出後仍慘遭日軍的射殺。很明顯，他們原本是想讓所有英軍士兵隨船一同葬身海底的，直到其中一些士兵成功逃生，才不得不開始營救那些仍在水中的人。

如果我還能為您做些什麼，請隨時告訴我。

謹啟

與當時所有的指揮官一樣，彭福爾德忙於給在他指揮下犧牲的士兵家屬寫信。

漢普郡弗利特

1945 年 12 月 12 日

親愛的布魯克斯夫人：

感謝您 11 月 30 日的來信，很抱歉未能及時回覆。我之前外出了，而且從陸軍部獲取了一批新的「親屬聯絡地址」，需寫信聯繫。

得知您生病的消息，我深感擔憂。毫無疑問，這都是壓力

和焦慮所導致的。^❶

我想皇家炮兵戰俘基金會（地址：倫敦西南五區，伯爵宮，炮兵大樓）應該可以在您困難時給予一些幫助。請致信該基金祕書，我也會寫信去聯繫他們。

彭福爾德夫人與我共同祝願您在此境遇下仍能度過一個儘可能快樂的聖誕節，也祝您新的一年更加幸運。

謹啟

又及：請向戰俘救助基金會詳述您的家庭狀況，您的兒子們現在多大了？

羅恩·布魯克斯回憶說：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一點是我父親的去世以及那段日子的遭遇如何影響並縮短了母親的生命。與許多其他人的戰爭經歷相比，我們兄弟二人已算是相對幸運的了。回溯母親的過往，她從科克郡遠嫁給一位英國軍人，並隨軍輾轉到了馬耳他和香港這些異域之地，這都讓這場悲劇愈顯辛酸。她的一生由此而崩塌，只能獨自撫養兩個年幼的孩子，遠離故鄉和親人。她於1949年因結核病去世。

我記得，傑夫原本應該去讀某種技術學校，但我知道母親非常

❶ 返回英國後，布魯克斯夫人被診斷患有咽喉結核，被迫臥牀靜養，也不允許說話。

擔心他交友不慎。想來，他就是一個普通的青少年，只是在那段時間享有了比平常更多幾個月的自由。在我保存的傑夫 1946 年 7 月的旅行身份證上，職業一欄寫的是「電工助理」。

也大約是在那段時間，母親發現自己患上了咽喉結核。她被強制臥牀休養，也不允許說話，只能通過寫字與我們交流。我們必須嚴格遵守衛生規定，確保不與她共用任何餐具、碗碟等等。我真的不知道她和傑夫是怎麼挺過來的。當時醫院一牀難求，除臥牀靜養外也沒有任何的治療。有護士定期來探視，但日常家務恐怕完全沒人幫忙。我被送去住在薩里郡費查姆的伯父家。弗雷德伯夫與艾姆伯母有一個 18 歲左右的兒子，每天去倫敦上班，還有一個大約 16 歲的女兒艾薇兒。他們待我極好，我在新學校過得也很愉快，但我依然很想念母親，還記得自己曾偷偷跑去當地的郵局給她寄信。

我記不清自己是何時回到多佛的。那時母親已經獲准下牀活動，也能再次開口說話了，但仍有護士定期來訪。那段日子對傑夫和她來說一定很艱難，但傑夫後來從未向我提起過那段往事。1946 年，母親決定返回愛爾蘭。她的弟弟伯蒂與弟媳薇拉把他們在都柏林租住的一座豪宅中的一套公寓讓給我們住。母親與在多佛照顧她的護士結下了深厚情誼，這位護士陪同我們母子三人前往都柏林，返程路費由母親承擔。

都柏林彷彿是另一個世界，相較於英國的荒涼與蕭條，這裏是一個富足之地。我在都柏林的高中重拾學業，而且得到了一輛自行車用來上學。這是一所收費學校，但我應該是獲得了某種獎學金。通過舅舅伯蒂的關係，傑夫在附近布萊克羅克（Blackrock）的一家汽車修理廠當上了汽修學徒。我還記得外祖父曾來都柏林探望她。

他們大概已經有 16 年未曾見面了。而母親再也沒回過科克郡，她的另外兩個兄弟還住在那裏。

奇怪的是，我不記得母親後來有沒有繼續接受結核病的治療。在那個年代，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疾病，它被認為具有高度傳染性。我們仍然嚴格遵守飲食衛生。儘管房子很氣派，但它只有一個浴室，我們所住的頂層公寓的佈局也並不理想。舅媽是名足科醫師，在房子的一樓開了一家診所，她的母親也住在這裏，負責打理家務。母親與這位老太太相處得並不融洽。不到一年，母親就在都柏林一個較為貧窮但體面的郊區買下了一棟聯排尾端的房子。

我母親非常看重自己的獨立性，但她的健康狀況在不斷惡化。傑夫買了一輛摩托車用於上下班，而我仍然騎自行車去上學。缺錢是個相當大的問題，我想她已經用完了家裏所有的積蓄。於是，母親在報紙上刊登廣告，開始接待寄宿客，主要是為到都柏林出差的人提供住宿和早餐。儘管如此，我認為我們一家在基米奇（Kimmage）短暫居住的那段時光對母親來說是幸福的。傑夫已經適應了他的學徒生活，做着他喜歡的行業，而我在學校的表現也不錯，還通過學校結識了一戶人家，他們也成為了我母親的朋友，並給予了她很多幫助，對我更是照顧有加。

我母親於 1949 年 9 月在睡夢中去世。她最小的弟弟亞瑟是她的遺囑執行人。他和他的妻子格拉迪斯從科克趕來處理後事。我暫時搬去和伯蒂舅舅、薇拉舅媽住在一起，以便繼續走讀上學。傑夫則住進了一家青年旅舍，繼續他的學徒工作。這對他來說是巨大的打擊，不久他便在鄧萊裏的一戶殯葬師家找到了寄宿之處，才算安定了下來。他在學徒期結束之後，就前往倫敦工作了。我轉學至都

柏林的蒙特喬伊學校寄宿，假期則回科克與亞瑟舅舅一家同住。舅舅在科克港口的羅奇斯角（Roches Point）附近有間海濱小屋，就在卡萊爾堡的下方。1927年我父親曾在此地駐防，這也是他與母親的初遇之地。在那裏，我逐漸知曉了些家族往事。後來我獲得了都柏林聖三一學院的獎學金，並於1956年從那裏畢業，獲得了工程學學位。來自蘇格蘭的瑪格麗特也在那兒，她學習社會科學，我們相識相戀。畢業後，我在倫敦找到了一份諮詢工程師的工作，我們於1957年10月結婚。婚後育有三個孩子，現已有四個孫輩。傑夫與珍在1958年結婚，他們沒有孩子。傑夫的哮喘最終奪走了他的生命，於1997年去世。

那麼，協助我完成本書的其他倖存者後來境遇如何呢？

香港通信連的弗蘭克·貝內特（**Frank Bennett**）回憶沉船後戰俘登陸上海時的情景，說道，「在所有最終抵達碼頭的倖存者中，我始終沒有找到姪子的身影，此後也再未見到他」。弗蘭克本打算服役21年，但在作為戰俘的時間裏，他已完成了規定的服役期限，並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轉入了預備役。他在吉爾福德退伍時，領到一套復員西裝和存有410英鎊的郵政儲蓄存摺（那是他戰爭期間積攢的工資）。為適應平民生活，他同兩個哥哥（莫里斯在飛機製造廠連續上了四夜班，喬治在先鋒兵團和皇家薩塞克斯軍團服役了四年）一起做油漆生意。就在這段時間裏，他得知父親實際上是由一位名叫約翰遜的姑媽撫養長大的，而他真正的姓氏應為貝內特，於是他通過法定聲明改變了自己的姓氏。「我仍在學習如何當一個平民，」他在2004年5月的一封信中寫道，「我現在差

不多已經掌握了。祝本書好運。」

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通訊兵湯姆·「泰菲」·埃文斯（Tom “Taffy” Evans）戰後回到香港並再婚。他加入香港船塢警隊，擔任警長，之後晉升為督察。船塢關閉後，他與另外六人一起被調去當文職警察了。1990年再度結婚後，他移居馬尼拉，至撰寫本文時仍在那裏生活。他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在2003年8月30日的一封信的最後一行中，他很好地總結了自己人生際遇：「無論如何，一切都已經過去了。我真是幸運。」

皇家海軍華萊士·黑斯廷斯（Wallace Hastings）在獲釋後過得並不輕鬆。甚至在廣畑的受降儀式上也不順利，作為營地中僅有的兩名非美軍人員，黑斯廷斯和澳大利亞空軍士兵威廉·布萊克曼（William Blackman）負責升起英國國旗：「我必須跟你說說那場儀式。那天下了傾盆大雨，旗幟升到一半時，被繩索給纏住了，按照傳統，這時旗幟不能降下來調整。我們花了很久才解開纏結，而當我們終於搞定後，美國的星條旗已經順利升起，全營都在唱美國國歌，而我和布萊克曼則因挫敗感和當時的情緒而流下了眼淚。」

幸運的是，他的婚姻還算圓滿，「我的未婚妻邦妮與我自1938年11月分別之後，歷經七年戰亂依然在等我，我們於1946年1月完婚」。在廣畑戰俘營的美軍指揮官的推薦下，他被傳令嘉獎。後來，黑斯廷斯繼續在海軍服役，1948年他因攜帶一瓶裝有海軍配給朗姆酒的酒瓶而被攔下，在當時，這被視為一種走私行為。此次與軍方的衝突促使黑斯廷斯決定離開軍隊。

過了幾年艱苦的個體戶生活，他能夠熬過那段時光，「全靠我



廣畑戰俘營解放儀式（站在美國國旗與旗杆之間者為華萊士·黑斯廷斯）

親愛的妻子邦妮始終陪伴在我身邊」，他在地方政府工作了 20 年。1973 年，黑斯廷斯買下了一家報刊亭，1977 年將其售出，又於 1979 年購買了另一家經營狀況不佳的報刊亭。他成功扭轉了生意的頹勢，終於積攢了足夠的錢退休。他有一個在計算機行業工作的兒子，是兒子引導他接觸了個人電腦（「經兒子指點，我逐漸馴服了這個怪物。我主要是不滿它會拼錯單詞，而且有些語法簡直糟糕透頂」），如今我們仍通過電郵保持聯繫。

阿爾夫·「諾比」·亨特（Alf “Nobby” Hunt）在 1941 年的戰鬥中倖免於難：

我記得大約有 200 人搭乘約瑟夫·T. 迪克曼號運輸艦 (APA-13)，其餘的人則去了澳大利亞（大多數是重傷員和病患），還有一些人去了加拿大的維多利亞，然後從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乘坐「法蘭西島號」回國，並於 11 月 4 日抵達南安普頓，比我們早一天。還有一些人是經由印度回去的。不知道有多少人。

（我們離開馬尼拉，經過夏威夷、舊金山、鳳凰城、紐約、哈利法克斯和南安普頓，於 1945 年 11 月回到了英國。）

之後，我被獲准無限期休假，所有的兄弟們都在斯特拉特福德車站迎接我。兩個月後，我被送進布里斯托爾的一家皇家海軍醫院，在那裏療養了四個月以後，因多處槍傷被認定為不適合繼續服役而正式退伍。

之後，我在姐姐的農場幫工三個月，並在那裏遇見了我未來的妻子，她當時是婦女土地服務隊 (Women's Land Army) 的一名成員 (Land girl)。之後我參加了為期九個月的電氣進修課程，並進入伯明翰一家大型電氣工程公司工作，負責在全國不同的地區進行電氣安裝。我在那家公司工作了三年。

後來，我到了一家中型工程公司，負責製造重達 50 噸的鋼結構製品，擔任工廠工程師，主管維護工作，並一直做到了退休。退休後，我又在夜校學習了三年日語。

1954 年，我被任命為伯明翰遠東戰俘協會 (Association of FEPOW) 的主席兼祕書，並一直擔任至今。我在 1970 年代曾一度擔任皇家海軍協會伯明翰分會的主席，現在是終身會員，並代表中部地區參加全國遠東戰俘俱樂部的聯合會。

到 (2004 年) 4 月份，我與妻子就結婚 56 年了。我們有三個

兒子，分別是 54 歲、46 歲和 42 歲，還有六個孫輩。

戰後，阿爾夫回憶起與他同在「蟬號」(HMS *Cicala*) 服役的兩位中國無線電操作員——喬·常 (Joe Siong) 和查理·王 (Charlie Ong)：「他們都是很好的小伙子，可惜戰後我多方尋找都杳無音信。」

新西蘭皇家海軍預備隊的羅斯·林納伯格 (Ross Lynneberg) 於 1945 年 11 月 27 日回國：

在我們婚後最初的時間裏，我的雙腳完全沒有知覺，所以上牀睡覺時，都是伯妮絲告訴我什麼時候才可以把腳放到熱水袋上去。她還得時刻擔心我的呼吸，因為我經常陷入極深的睡眠，呼吸似乎會暫停一段時間。除此之外，我還總做噩夢，夢見自己再次被日本人俘虜，重新經歷了戰俘營的生活，並與那些第一次成為戰俘的人討論。夢中總感覺這一次我再也回不了家了。這些夢魘持續了數年，我後來才漸漸擺脫了它們。

我先在肥皂廠工作，直到工廠被收購並拆除。這期間在父親的資助下，我在海濱度假區建了間店鋪，讓妻子經營一家布料店。同時，我還在原來房子的基礎上擴建了一幢更大的住房，這是必要的，因為我們有了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

工廠被賣掉以後，我做了一段時間的土方承包商，然後在父親去世後變賣了店鋪，並處理了土方機械，買了一輛新的房車，把幾年前建造的那輛房車停在陶波湖邊一塊租賃的地皮上，這麼做是為了尋找更靠近湖邊的收入來源。起初，我浪費了好幾個月的時間，

想收購一家酒吧，卻未能成功。後來，我買下了一座在建倉庫，結果發現被狡猾的律師和承包商給坑了，花了四年才追回我們的錢。在此期間，我在當地一個機構找了份工作，而我妻子則在當地一家旅遊酒店工作。

沿懷卡托河建造的最後一座地下發電站的挖掘工程開始後，我加入了其中，成為維修車間的一員，水電工程完工後，我又在公司擔任了幾年管理員，最後才徹底退休。

退休後，羅斯有了一個有趣的發現。在二戰期間，他的薪酬竟然少發了！按新西蘭軍方的標準，他所屬軍銜的薪資要高於英國皇家海軍。雙方曾達成協議，由皇家海軍支付基礎薪資，新西蘭政府補足差額。這些年新西蘭政府確實將補發的部分支付給了羅斯的父親，但由於羅斯的工資單始終未能送達香港（他初抵香港時曾預支 30 港幣，待薪資單寄到後再行結算，未曾想日軍的勝利來得太快了），因此他從未收到皇家海軍應支付的那部分薪水。

羅斯於 1998 年向英國政府提出索賠，但遭到了拒絕。到 2004 年初，按照 1945 年的貨幣標準，他仍被欠薪 238 英鎊 10 先令。^❶

皇家蘇格蘭軍團的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戰後曾在愛丁堡市政局和費蘭蒂公司（Ferranti）工作。1956 年他移民至澳大利亞，在武器研究機構任職，其大部分時間在烏美拉負責後勤。米勒在一個為他的前戰俘朋友舉辦的聚會上邂逅了他後來的妻子，而這

❶ 英國政府多年前已結清二戰期間所有個人薪餉索賠。但令所有認識羅斯的人驚喜（且意外）的是，他最終在 2004 年 8 月領到了應得的報酬。

位朋友恰好就住在她父母家隔壁。兩周後他們便結婚了，至本書撰寫時已在一起了 58 年。如今他們有五個女兒（伊莎貝拉、帕特里夏、克里斯汀、珍妮特和菲奧娜），十個孫輩和八個曾孫輩。

同樣來自皇家蘇格蘭軍團的丹尼斯·莫利（**Dennis Morley**）說：「戰後我做過幾份工作，以便搞清楚自己想要從事什麼職業。我娶了一位非常出色的女性，並育有一女。不幸的是，她在 30 歲時因癌症去世。我和第二任妻子一同前往加拿大六次，可惜她去年也去世了。我們曾一起走遍了英國的大部分地區。我之前去過一次香港，特別是在國殤紀念墳場那裏，情緒尤為激動。大約在六年前我退休了，現在 84 歲，身體還很硬朗。」當我問起他為何將姓氏從丹尼斯·希肯博頓（**Dennis Hickenbottom**）改為丹尼斯·莫利（**Dennis Morley**）時，他回答，「改名的過程其實很簡單。我的全名是丹尼斯·約翰·莫利·希肯博頓（**Dennis John Morley Hickenbottom**），所以只是把末尾那部分正式去掉了而已」。

英國皇家海軍的威廉·格蘭特·謝潑德（**William Grant Shepherd**）回憶道：

我於 1945 年 11 月 1 日回到（蘇格蘭的）家中，不久之後我便意識到，戰俘生活在我身上留下了一些傷痕。直到我回離開前曾作為學徒工作的工廠，重新以熟練機械工的身份工作時，這些創傷的全部影響才真正顯現出來。很快我就發現自己的神經狀況極其糟糕，此後的整個職業生涯我都在與這種狀態抗爭。值得慶幸的是，這種狀況最終有所改善，尤其是在 1949 年 3 月我移民到加拿大、在溫尼伯定居之後，那裏從此就成為我的家了。我在溫尼伯的第一

份工作是加拿大國家鐵路維修車間的機械師，從1949年3月一直幹到了1951年12月31日。1952年1月1日，我成為了省級公務員，被聘為曼尼托巴政府勞工部的工廠檢查員。1960年6月，我調入勞工部的另一個部門，當學徒督導。之後我在學徒管理部門擔任過多個職位，最終於1982年3月4日退休，時任代理主任。考慮到我在戰爭年代的遭遇，我覺得自己如今還能活着，甚至享受了將近22年的退休生活，是非常幸運的。很多人都為我能夠走到今天付出了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我的妻子和兩個女兒。尤其是我的妻子瑪格麗特，在我深度抑鬱的那些日子裏，她承受了太多。我常想女兒們年幼時會怎麼看待這一切，但相信她們的母親給予了她們巨大的力量。瑪格麗特也來自蘇格蘭福弗爾，她在1950年4月，僅憑我一紙婚約的承諾，就隻身勇敢地來到溫尼伯與我相聚。我們於1950年7月5日結婚，欣慰的是我們克服了婚姻路上的重重困難。在我的職業生涯中，也遇到了不少耐心體貼的上司。

我好像還沒跟你講過我們的兩個女兒。大女兒莫伊拉1953年生於溫尼伯，她和丈夫先後育有一兒一女。自1982年起，他們就定居里賈納，兩個孩子都已20多歲。小女兒琳達1960年也出生在溫尼伯，她和丈夫有個剛滿11歲的兒子，夫婦倆都在溫尼伯工作和生活。我們為他們所有人感到驕傲——不過別天天這麼說。說真的，我們有太多值得感恩的事情了。

皇家蘇格蘭軍團的威廉·斯普納（William Spooner）說：

這個故事差不多就要講完了，只是我最終還是回到了家鄉，並

結了婚。我們有四個孩子，目前有八個孫輩和三個曾孫輩。每當我提起戰爭，他們總是坐在一旁顯得很無聊，表情彷彿在說「他又來了」。我再也沒見過米奇·邁爾斯（Micky Myles），但聽說他被驅逐出香港了。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不過發生在他身上倒是很可信。米奇是個討人喜歡的無賴，一個騙子，一個擁有多重面孔的人，一張讓人可以信賴的臉，但也是一張精於算計的臉，像是在盤算着「這對我有什麼好處？」但他救了我的命。多虧他，我才能與一位賢惠的女子共度 57 年的婚姻生活——可惜她最近離我們而去。同樣多虧他，我才有了四個孩子，在我失去摯愛的妻子時，他們都給了我極大的安慰、幫助與關懷，儘管他們自己也在為失去一位慈愛的母親和祖母而悲傷。

如今，斯普納居住在艾塞克斯郡的巴西爾登。

其他提供記錄和回憶的倖存者們：

亞瑟·阿爾西（Arthur Alsey）1933 年 5 月作為樂手加入皇家蘇格蘭軍團。在二戰爆發前曾駐防印度（奎達和拉合爾）及香港地區。戰後他調換了部隊，仍然留在軍中，轉入了伍爾維奇的皇家炮兵團，繼續擔任樂手。他在那裏服役了 18 個月，一直到 1948 年初。此後便杳無音訊。

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山姆·阿特金斯（Sam Atkins）（來自其女兒芭芭拉·廷德爾的講述）：1945 年 9 月 4 日，他被空運到了東京，並登上了「金盞花號」（*Marigold*）醫院船，次日便被移交給了英方。10 月 3 日他抵達了新西蘭奧克蘭，11 月 20 日離開奧克蘭，

11月23日抵達悉尼，並於1945年12月10日乘坐「阿奎坦尼亞號」(Aquitania)啟程回國。「他在新西蘭期間被安置在一個康復營裏，我想當局當時認為不能讓獲釋的戰俘以那種樣子回國，所以他們先對這些戰俘進行了悉心的照料，幫助他們恢復到健康的體重，然後才安排他們返鄉。我父親對他在新西蘭所受到的照顧讚不絕口。」

山姆記錄了他在1945年10月4日（解放後一個月）的體重為52公斤。到10月底，他的體重已增加到65公斤（在1943年5月23日至1944年12月6日期間，他的體重在52至63公斤之間波動，而在被囚禁的最後階段，1945年9月，他的體重曾低至43公斤）。「當他被解救時真可謂千鈞一髮，我記得他告訴我，當美軍進入營地的時候，他正躺在牀上，他們兩次從他身邊走過，以為他已經死了！能活下來實屬幸運，畢竟那麼多人都沒能等到這一天。他患過的疾病也都被記錄了下來，包括痢疾、腳氣病、慢性支氣管炎、哮喘，以及在神戶碼頭勞作時受的工傷。」

他於1992年1月9日去世，享年76歲。

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的吉姆·法拉斯(Jim Fallace)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服役於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之後在中國天津警察局工作了12年。1939年他移居香港並加入了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他從「里斯本丸」逃生並躲過日軍追捕後，加入了印度皇家海軍，但沒再出過海。1947年，在遠東戰爭罪行委員會工作了十個月以後，他返回了英國，並因在「里斯本丸」沉沒時拯救了見習軍官拉洛而獲皇家人道協會獎章。戰後他成為一家酒館的老闆，但從1956年起又再次為皇家海軍陸戰隊服務，擔任軍官食堂的管理員，直到1972年以69歲的年齡退休。之後他在

英格蘭肯特郡迪爾的一家名為「船」的公共酒吧繼續工作，最終於 1998 年在迪爾去世。

香港皇家義勇防衛軍和皇家蘇格蘭軍團的韓美洵（**Geoffrey Hamilton**）與幾位老朋友，包括克里斯·曼（Chris Man）和馬丁·威登一起乘坐「澳大利亞皇后號」（*Empress of Australia*）返回英國。他抵達英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寫信給德國的朋友安妮麗澤·戈德勒（Anneliese Goerdeler）夫人，與眾多從遠東返回的戰俘一樣，他發現歐洲戰場同樣令敵友雙方付出了慘痛代價。

戰前，韓美洵曾在卡爾·戈德勒（Karl Goerdeler）博士（萊比錫市長兼帝國物價監督專員）的家中寄宿過四個月，而戈德勒的兒子克里斯蒂安則住在韓美洵父母的家中。克里斯蒂安於 1943 年在東線陣亡。卡爾·戈德勒博士作為 1944 年 7 月刺殺希特勒行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被納粹處決。戈爾德勒夫人和另外四個孩子則在戰爭餘下的時間裏被關押在集中營裏。

戈德勒夫人回信說：

親愛的傑弗里……在 1944 年 7 月 20 日之後，瑪麗安娜和我在萊比錫被捕，尼娜和我的兒媳（烏爾里希的妻子）在農場這兒被捕，烏爾里希在呂訥堡石楠草原的一個機場被捕，而萊因哈德則在意大利劇院被捕。我們先是被關進監獄裏數月，之後又被送往了不同的集中營……我的丈夫和他最小的弟弟弗里茨（你認識的在柯尼斯堡的那位）在歷經了長期的折磨後，分別於 1945 年 2 月 2 日與 3 月 1 日遇害。之後，我們不得不尋找烏爾里希的兩個小兒子，他們被蓋世太保以假名帶走、下落不明，最後我們在哈爾茨山脈找到了

他們。親愛的傑弗里，你的父母願意收養其中一個男孩，實在是令人感激，但他們年紀還太小……

英國皇家海軍的丹·奧漢隆（**Dan O'Hanlon**）（根據阿爾夫·亨特 2004 年的記述）：

丹尼一直服役到 40 歲才離開海軍，之後他移民南非，加入了南非海軍。他學會了南非荷蘭語，最終在 65 歲時以海軍中校的軍銜退休，負責管理南非海軍所有的雷達系統。丹尼兩年去世了，我仍與其遺孀帕特保持聯繫，她現居開普敦。丹尼有兩個兒子，都是南非海軍的中校。

皇家陸軍補給與運輸勤務隊哈格里夫斯·豪威爾（**Hargreaves Howell**）（根據其女兒阿德里安娜的記述）：

戰後，他在一家木材公司工作，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到了晚年，他為一家證券經紀公司工作。他是香港狗會（Hong Kong Kennel Club）的忠實會員，組織了許多犬展活動，同時兼任香港防止虐待動物協會（Hong Kong Society of Prevention to Cruelty to Animals）的秘書，因此我們家時常收留各種珍奇動物！1966 年 8 月 27 日，他在前往啟德機場託運小狗回英國的途中因中風猝逝。我的母親嘉露蓮·豪威爾，或許更廣為人知的是她的藝名——嘉露·貝文，她曾多年在梅夫人婦女會（Helena May）主樓以此藝名開辦芭蕾舞學校。我於 1952 年 10 月 2 日出生，1957 年被我的父母收養。

英國皇家炮兵團的約翰·英格利斯（John Inglis）戰後在曼徹斯特地區擔任儀器機械師，他於 1946 年結婚，並育有一子一女。因患有呼吸系統疾病，醫生建議他離開城市。因此，1954 年他在坎布里亞郡的溫茨凱爾英國原子能管理局（United Kingdom Atomic Energy Authority）獲得了工作。1961 年，他被調往英國核燃料公司（British Nuclear Fuels Limited），他於 1980 年退休，時年 63 歲，後來在 1986 年 6 月 26 日猝然離世。

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威廉·保爾特（William Poulter）被遣返回了英國，與妻子多蘿西（多芙）及兒子羅賓團聚，這對母子在澳大利亞生活兩年後就乘船回國了，他們當時並不知保爾特是生是死。

保爾特退役後，在郵政局擔任電話接線員。他的二兒子克里斯托弗於 1947 年 6 月出生。羅賓後來加入了英國皇家海軍，而克里斯托弗則加入了英國皇家空軍。

1973 年 7 月 31 日，保爾特在 64 歲生日的四個月之後，因突發嚴重心臟病去世了，多芙於 1994 年 5 月 1 日因癌症病故。

皇家炮兵團的安德魯·薩爾蒙（Andrew Salmon）返回香港後，離開了炮兵團，於 1949 年開始在香港懲教署工作。在那裏，他經歷了一件頗為有意思的事情。在赤柱監獄裏，他立刻認出了一名正在監獄農場裏安靜而謙遜地種菜的日本男子。那人正是當年臭名昭著的「深水埗惡獸」。「我想他原本是做好了被判處死刑的準備的。眼前這個人，我曾目睹他掌摑、毆打我的戰友，如今卻在圍欄的另一邊。他已經判若兩人，只要你開口，他就會跪下來為你擦鞋。我們雖然沒有刁難他，但並不意味着我們沒有這麼想過。」

包括「里斯本丸」船長在內的大約 40 名日本戰犯都被關押在赤

柱監獄，但在薩爾蒙回到香港幾個月之後，所有的日本戰犯都被遣返回國了。^①

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馬丁·威登（Martin Weedon）（根據其子馬克的記述）：

馬丁曾就讀於哈羅公學和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當時托尼·休伊特和克里斯·曼也在，他們同屬一個團），之後便加入了米德爾塞克斯軍團。戰後不久，他和妻子麗茲就離婚了。兩人已變得相當不同，比如麗茲無法忍受馬丁整天帶着戰俘營指揮官的武士刀（就像許多當過戰俘的人那樣緊抓着自己的東西），而且兩人在戰時的1941年都有過婚外情。之後馬丁與珍·萊斯利再婚〔珍原是麗茲的朋友，兩人都曾在皇家海軍女子服務隊（Wrens）服役〕，麗茲則於1949年改嫁托尼·休伊特，他曾是米德爾塞克斯軍團一營的副官，與另外兩人一起成功從深水埗逃脫。^②

戰後，馬丁離開軍隊，取得大律師資格，先後在威廉·科里公司（William Cory，一家煤礦企業）和羅得西亞選礦信託公司（Rhodesian Selection Trust，礦業公司，先在盧薩卡，後在索爾茲伯里）擔任法律顧問。之後，他投身教育界，出任格雷科特基金會（Greycoat Foundation）理事會的祕書（相當於六所學校的總財務長，其中之一——卡弗舍姆的安妮女王學校，後來成了他兩位個

① 薩爾蒙在去世前不久，正與克里斯汀·亨德森（Christine Henderson）博士合作撰寫關於「里斯本丸」沉沒事件的記錄，目前尚未出版。

② 休伊特的戰時經歷被記錄在他的著作《三人橋》（*Bridge with Three Men*）中。他於2004年8月在澳大利亞去世，當時本書尚在寫作階段。

孫女的母校)。馬丁與新婚妻子生了一個兒子克里斯托弗(現為薩默塞特的特許測量師)和一個女兒蘇珊(現居澳大利亞)。他們兩人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撰寫本文時,珍已82歲,住在溫坎頓。麗茲和托尼也仍然健在,住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州的布德林。

馬丁·威登60歲退休時健康狀況欠佳,僅僅兩年後就去世了。戰俘營的歲月對他的身心造成了極大消耗(其他人亦是如此)。^❶

皇家工兵團的雷格·韋斯特伍德(Reg Westwood)(據阿爾夫·亨特所述):

獲釋後我們就分開了,他應該是坐「法蘭西島號」回家的,先我們一步抵達南安普頓。戰後我們一直保持聯繫,還在幾次聚會上見過面,第一次是在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後來又在節日音樂廳。1951年他與喬伊斯結婚,並於1957年移民加拿大,他在那裏當碼頭主管。之後,他搬去了北巴特爾福德,在那裏擔任一所大型醫療中心的總工程師。退休後,他搬到了靠近基洛納的韋斯特班克,在那兒一直住到去年。我和妻子多次去看望他們,在他們最後一次搬家時,我們還幫着整理房子和佈置花園。和我們一樣,韋斯特伍德夫婦也有三個兒子。大兒子羅傑現在是加拿大海軍負責造船事務的海軍少將。在雷格去世後,喬伊斯搬到了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奇利

❶ 馬丁的兒子馬克(也是哈羅公學的學生,後就讀於劍橋和哈佛)曾於1970年代擔任麥肯錫公司的顧問,為香港總督麥理浩(Murray McleHose)爵士提供諮詢。後來,他在倫敦擔任頂級獵頭逾25載。

瓦克，我經常通過電子郵件與她聯繫。

香港通信連的**阿爾夫·泰勒 (Alf Taylor)**（據友人瑪喬麗·布雷^①所述）：

阿爾夫年長我丈夫十多歲，所以我們估計他應該出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娶了阿蒂恩薩醫生的一位女兒（我想是在二戰之後），他們育有一女，母女二人後來去了英國生活，阿爾夫則留在香港擔任新界民政署（New Territories Administration）的土地執達主任。瑪麗·阿蒂恩薩（他妻子的養姑媽）頗為喜愛阿爾夫，經常和他在一起。瑪麗在長洲有一處退休住宅，我想阿爾夫曾在那兒住過一段時間。後來奧斯汀·科茨（Austin Coates）^②在70年代從她那裏租下了這棟房子。

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羅伯特·賴特 (Robert Wright)**退休後定居約克郡，並於1964年撰寫了回憶錄《我是地獄營戰俘》（*I was a Hell Camp Prisoner*）。

「鱸魚號」潛艇上相關人員的情況：

羅布·羅伊·麥格雷戈 (Rob Roy McGregor) 被授予了銀星

① 香港義勇防衛軍博頓利少校的女兒。她的丈夫丹尼斯是大埔的民政事務專員。

② 《光之山》（*A Mountain of Light*）一書的作者。

勳章，「表彰其作為美國『鱸魚號』潛艇指揮官，於 1942 年 8 月 22 日至 10 月 20 日，在日方所控制的水域執行巡航任務期間，所展現出的英勇無畏和卓越膽識……麥格雷戈中校毫不畏懼地對日本船隻發起持續進攻，憑藉非凡的勇氣和鬥志，在敵方水域指揮『鱸魚號』，成功擊沉了兩艘總噸位 12000 噸的日本商船，並重創了一艘 4000 噸的船隻。儘管遭遇日軍水面艦艇和飛機深水炸彈的反擊，他仍憑藉卓越的技藝與精準的判斷力，使潛艇毫髮無損地走出險境，確保全體船員安然無恙地返回……」

1943 年 3 月，他離開「鱸魚號」後，於 1944 年 7 月接任「海貓號」潛艇 (*Seacat*, SS-399) 的指揮官一職，並從 1945 年 1 月起兼任第 202 潛艇分隊指揮官。戰後他繼續留在海軍服役，擔任了多個重要的岸勤和海勤職務，最終成為驅逐艦第 5 艦隊的中隊司令，後以海軍少將的軍銜退休，定居於加利福尼亞州科羅納多。

1940 年，他與瑪麗·伊麗莎白·奧斯本在馬尼拉結婚，育有三名子女：小羅伯·洛伊、瑪麗·卡梅倫和艾莉森·蓋。

約翰·丹寧·梅森 (John Denning Mason) 在「鱸魚號」上又執行了六次戰鬥巡航任務，之後成為了「硬頭海鯽號」潛艇 (*USS Bugara*, SS-331) 的副長兼領航員。他戰後繼續服役於潛艇部隊，歷任過多個職位，包括指揮實驗性潛艇「喬氏喙鱸號」(*USS Baya*)，以及在 1954 至 1955 年間擔任潛艇第 81 分艦隊的指揮官。1964 年，他在調任英國戈斯波特後，出任大西洋艦隊潛艇部隊司令部的參謀長兼副官。

1941 年 3 月，他與來自康涅狄格州諾威奇的瑪格麗特·B. 羅斯結婚，育有三子：小哈里森·D. 梅森、羅斯·M. 梅森和馬修·

C. 梅森。

羅伯特·漢密爾頓·克洛斯（Robert Hamilton Close）在「鱸魚號」上又參加了三次戰鬥巡航任務，他被授予帶有「V」字戰鬥標誌的銅星勳章，「因其在美國潛艇『鱸魚號』第二次和第三次戰鬥巡航中的英勇行為。期間他共擊沉兩艘大型與一艘中型貨船，並重創兩艘中型貨船。作為分隊長和輪機長，他在每次行動中都展現出精湛的技藝和堪稱典範的沉着冷靜，為指揮官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協助……」

1943 年 12 月至 1944 年 10 月，他指揮着美軍「引水魚號」（USS *Pilotfish*）潛艇，在戰爭結束前一直服役於潛艇部隊，然後在訓練單位工作一段時間後，於朝鮮戰爭期間接任了「科利特號」驅逐艦（USS *Collett*, DD-734）指揮官，並因在仁川的戰鬥表現再次獲得嘉獎。朝鮮戰爭後，他被先後派駐在菲律賓（碧瑤市太平洋防務學院，Pacific Defense College）和泰國。

他與來自華盛頓州布雷默頓的弗吉尼亞·M. 蘭特結婚，並育有三個孩子：瑪麗安·哈里特、斯蒂芬·倫特和丹尼爾·愛德華·克洛斯。

愛德華·羅威爾·霍爾特（Edward Rowell Holt）於 1943 年 10 月離開「鱸魚號」，並加入「喬氏喙鱸號」潛艇。1945 年 2 月，他被派往美國海軍「海獅號」潛艇，該艇獲得了總統單位嘉獎。有意思的是，鑒於他「里斯本丸」事件的經歷，嘉獎狀中特別寫道：「『海獅號』不僅以過人的膽識和技藝與敵軍周旋，更冒險穿越熱帶颱風，成功營救了 54 名英國和澳大利亞戰俘，他們是一艘被魚雷擊沉的敵軍運輸船上的倖存者，該船當時正從新加坡駛往日本。」

他與瑪麗·赫恩登·戴維斯結婚，如前所述，他在「鮰魚號」

(USS *Bullhead*) 上犧牲了。

許多「里斯本丸」的倖存者後來都重返香港，他們未曾忘記中國漁民的救命之恩，很可能是漁民們的善舉促使日軍救起了剩下的倖存者們。克里斯·曼少將在倖存者中發起了一項基金，以回報這些救命恩人。1949年2月，香港總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向胡棟林先生及其他島民贈送了一艘機動漁艇和部分資金。當天有13位「里斯本丸」的倖存者出席。

塔菲·埃文斯（Taffy Evans）回憶說：

戰後1949年2月，「米奇」·曼上尉（獲軍功十字勳章，後晉升為少將）組織倖存者們設立了一項基金，以表感激之情。我們在香港皇后碼頭舉辦了一次聚會。出席者包括：總督閣下、米奇·曼、哈格里夫斯·邁爾斯·豪威爾（獲大英帝國員佐勳章）、韓美洵、弗蘭克·凱科維克·加頓、J.希爾、安迪·薩爾蒙、威廉·泰勒、從島上逃脫的威廉·約翰斯通、托馬斯·戈爾曼、我本人湯姆·埃文斯、詹姆斯·羅布森、J.麥克杜格爾、A.伍德黑德，以及J.坎貝爾。^①

① 這些人是：坎貝爾（警察）、埃文斯（即湯姆本人，前米德爾塞克斯軍團士兵，時任香港船塢警察）、加頓（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戈爾曼（船塢警察）、韓美洵（皇家蘇格蘭軍團）、希爾（警察）、豪威爾（皇家陸軍補給與運輸勤務隊）、約翰斯通（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曼（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羅布森（米德爾塞克斯軍團）、麥克杜格爾（皇家蘇格蘭軍團）、薩爾蒙（皇家炮兵團）、泰勒（香港通信連），以及A.伍德黑德應為警隊的弗雷德·伍德黑德。

許多人因其在戰爭期間所作出的貢獻而獲得了表彰，以下三個例子就足以說明：豪威爾因完成艙底突圍而被授予大英帝國員佐勳章；皇家蘇格蘭軍團的諾曼·布朗洛（Norman Brownlow）中尉因救援登島士兵也同樣獲此殊榮；英國皇家海軍艦艇「添馬艦」的管理士官伯納德·查爾斯·利利（Bernard Charles Lilley）獲得卓越獎章，根據《倫敦憲報》（*London Gazette*）1946年7月2日的記載：表彰其在香港戰役及戰俘期間的傑出貢獻。以下信息由受勳者的家人提供：「在香港陷落之後，利利士官率領一支水兵小隊進入山中，堅守了近四周後才被俘。在作為戰俘前往日本的途中，船隻被美軍潛艇的魚雷擊中，並嚴重受損。在日本作為戰俘勞役的期間，他只能靠路人丟給他的食物為生。」^①

那麼，1942年10月2日那天，我們眼睜睜地看着隨海浪漂去、永訣人寰的十人中，另外九位的家屬後來又如何了呢？

威廉·亞瑟·巴洛（William Arthur Barlow）的身世至今仍是一個謎。英國諾丁漢郡傑克斯代爾的一個研究小組在考察當地戰爭

① 伯納德·查爾斯·利利 1907年2月8日生於倫敦西漢姆區。他於1923年5月30日作為二等少年水手加入了英國皇家海軍，在「堅固號」（HMS *Impregnable*）戰列艦上服役。之後，他相繼在「勇士號」（HMS *Valiant*）、「鐵線蓮號」（HMS *Clematis*）、「諾福克號」（HMS *Norfolk*）、「卡利登號」（HMS *Caledon*）上服役，1935年12月晉升為代理海軍士官。1936年4月他被任命為代理管理士官後，調至「利安得號」（HMS *Lean-der*）。1939年2月至1940年5月他被派駐到香港的「添馬艦」上，並於1940年4月3日獲得長期服役和品德優良獎章。他在「無畏號」上短暫服役後重返「添馬艦」，1941年12月被日軍俘虜。在「德雷克號」（HMS *Drake*）戰俘名冊上，他於1942年7月22日晉升為糾察長。1947年5月24日他正式退役了。

紀念碑時，發現他們村裏有一位名叫巴洛的二級準尉在「里斯本丸」上犧牲了。儘管研究小組找到了本文引用的相關報紙報道，但他們至今都未能成功聯繫到巴洛的親屬。研究小組將他的詳細資料收錄在一本特別的紀念冊中，該紀念冊於 2003 年 7 月 19 日被贈送給村裏的聖瑪麗韋斯特伍德教堂。^❶

威廉·詹姆斯·L. 博伊斯（William James L. Boyes）的全套勳章（包括 1939 至 1945 年星章、太平洋星章和戰爭勳章）於 2003 年 11 月在普利茅斯附近牛頓費勒斯的托德霍爾勳章店以 145 英鎊的價格出售。這些勳章按規定並未刻名，但隨附有一份印有他姓名的弔唁證書和原始包裝盒，收件地址是他在德文郡普林普頓的妻子。從他去世到 1961 年後這些勳章被出售，其間發生了什麼，已經超出了業餘調查者們所能查證的範圍。

西德尼·查爾斯（Sidney Charles）的遺孀愛麗絲與其子大衛艱難度日。而悲劇卻再次降臨——大衛在 13 歲那年，作為皇家海軍陸戰隊少年團的一員，和十餘名少年團員一起在行軍途中被一輛卡車撞上，不幸身亡。接連喪夫失子的愛麗絲始終沒能走出陰霾。

托馬斯·哈米爾（Thomas Hamill）被他的兩個兄弟和七個姐妹所深深懷念着。他的姪女瑪麗·巴克回憶說：「我一直記得媽媽（珍妮特）和她的姐妹們談論湯米叔叔，說他是多麼好的一個兄長，又是如何在戰爭中被俘，並在被美軍擊沉的『里斯本丸』上遇

❶ 《一個村莊的記憶》（*A Village Remembers*）一書講述了傑克斯代爾村、紀念碑以及為國捐軀者的故事。該書可在傑克斯代爾花園中心、MCM 地產代理公司、梅因路、艾恩維爾郵局、塞爾斯頓圖書館以及兩家塞爾斯頓郵局購買。

難的。我記得的另一個傳聞是他的一個同伴說的，那人來自泰波特，也在『里斯本丸』上，說他們拚命游泳時被鯊魚包圍。我不知道那位倖存者是誰，也不明白為何他能生還而舅舅卻沒能活下來。」

安德魯·弗萊特（**Andrew Flett**）再也無法回到他位於洛西茅斯皇后街格萊內爾格的家中，與妻子伊莎貝拉及四個孩子伊恩、約瑟夫、亞歷克和伊莎貝爾團聚。他也不再能重操戰前的舊業，作為「犁號」（*Plough*）漁船的船長出海捕魚。如今，儘管他的遺骨長眠於數千英里外的無名海底，但他在洛西茅斯仍有一塊墓碑。「謹以此紀念安德魯·弗萊特，他作為遠東戰俘於 1942 年 10 月 2 日在『里斯本丸』上遇難，時年 44 歲，是伊莎貝拉·默里深愛的丈夫。同時紀念他們的兒子約瑟夫·M. 弗萊特，於 1939 年 10 月 14 日辭世，年僅 16 歲。還有其妻伊莎貝拉·弗萊特，於 1996 年 7 月 23 日離世，享年 98 歲。」^❶

羅納德·蘭利-貝茨（**Ronald Langley-Bates**）有三個孩子（道格拉斯生於 1930 年，德里克生於 1932 年，丹妮絲生於 1933 年）。戰爭爆發後，他的妻兒都被疏散至澳大利亞了。起初，妻子凱瑟琳認為戰爭很快就會結束，他們一家會重新團聚。丈夫的死訊徹底將她擊垮，她終生都沒再返回英國。和許多在澳大利亞的香港遺孀一樣，她在遠離故鄉的萬里之外為自己和孩子們開啟了新生活。她於

❶ 感謝唐納德·斯圖爾特所提供的細節。他補充道：「安德魯與喬·高爾特（另一位來自洛西茅斯的船長）一同前往遠東從事柵欄防禦工作。喬留在了錫蘭，安德魯繼續前往香港。喬回來後成了一名成功的漁夫。安德魯的妹妹貝拉·弗萊特嫁給了約翰·高爾特，後來在阿伯丁成為了一名拖網漁民。」

1999 年去世，享年 91 歲。為了送她的三個孩子上好學校，她辛勤工作，並最終在 71 歲時實現了擁有自己房子的願望。

她的兒子道格拉斯回憶道：

我們從香港去了菲律賓，在邦板牙省卡門市的一座甘蔗種植園短暫地與美國人同住。他們非常友善，母親多年來一直與他們保持聯繫。隨着日軍的逼近，我們又乘坐「約翰·德·維特號」(Johan de Witt) 前往澳大利亞墨爾本。

最初的「家」是弗蘭克斯頓一家名為「蕨園」(The Fernery) 的老舊旅館。在那裏，我們幾個孩子就在當地的公立學校上學。後來母親與另一位撤離者合租了奧利弗山頂一棟地段絕佳的大房子，從那裏可以俯瞰整個海灣。

房東曾以 2000 英鎊的價格向母親出售那棟房子，但她沒有買，因為她相信戰爭結束後我們終將返回香港。後來那片土地被重新劃分，整棟房子以 50 萬澳元售出。如今房子仍在那裏。

在得知父親去世的消息後，母親決定在澳大利亞長住至戰後。我們搬到了聖基爾達的一家旅館，她找了兩份工作，一份是鐵路局失物招領處的文員，另一份是服務員。在鐵路局，她以高效誠實、樂於助人著稱，在那裏工作了 30 多年，許多年輕員工視之如母。

我母親省吃儉用，將我們三個孩子都送進了私立學校。兩個男孩都上了聖三一文法學校。由於實在拮据，她穿上最好的衣服去見校長，講述了自己的遭遇。校長深受感動，將她兩個兒子的學費減半。

後來，旅館被賣掉了，母親需要另覓住所。在四處尋找時，她

看到有人正在搬出聖基爾達靠近海灘的一套地下室公寓。她立即趕回旅館，匆忙收拾好全部家當，叫了一輛出租車趕往那套公寓，強行住了進去。房產中介非常憤怒，並找來了房東。

當時我正在寄宿學校讀書，周末回家時發現房東竟是我正在交往的女友的父親。母親對他說，如果強行驅逐，她就要把「一位帶着三個孩子的英國戰爭遺孀被無情趕出家門」的故事曝光給每日新聞。房東最終冷靜下來，答應讓母親留了下來。

那間地下室公寓只有一間屋子，大約 20 英尺乘 24 英尺，它的一端被分成了兩個小隔間。一個隔間裏放着桌子 and 小型台式烤箱 / 電爐，另一個隔間放着一張牀。廁所 / 浴室不在房間內，而是在外面走廊的盡頭。儘管環境寒冷潮濕，但她仍將這裏變成了一個家。

後來生活漸漸好轉，她又帶我們搬進了埃爾伍德的一套條件好得多的公寓裏。她始終為錢所困，買不起地毯，只好買些地毯襯墊來保暖。我記得自己曾帶一位家境優渥的大學朋友回家，他看到這些襯墊覺得很好笑。

她盡其所能地支持孩子們，出席我們所有的活動——運動會、音樂會等；來看我代表大學參加曲棍球比賽，還幫忙準備茶點。我永遠記得她參加我碩士學位授予儀式時那自豪的神情。

但她最大的願望之一是擁有屬於自己的家，最終她實現了這個心願。那是一棟三居室的房子，有一個花園，她把它打造成了一個真正的英式美麗庭院，裏面有玫瑰、山茶、木蘭，還有一個養金魚的池塘。她對此充滿熱情，並與我終身未婚的弟弟德里克一同住在那裏。

退休後，隨着年齡的增長，她的健康狀況開始惡化，她患有心

房顫動、食管裂孔疝、哮喘和嚴重的關節炎。弟弟的離世給了她致命一擊——她從未想過會白髮人送黑髮人，精神徹底崩潰。她始終無法接受現實，仍會每天去弟弟房間道「早安」和「晚安」，彷彿他還在那裏。每天還會在他房間裏放上一朵新鮮的花。

她的朋友遍佈各地。葬禮上，除了親友，還有前同事、醫生、牙醫、足科醫師和眾多鄰居，都前來為她送別。

珀西·阿爾伯特·喬治·羅賓遜（Percy Albert George Robinson）的父親在一戰期間曾作為戰俘住院近兩年五個月，最終於1919年1月7日被遣返回英國。毫無疑問，他在接下來的數月中對兒子的歸來始終抱有希望。然而這一次卻沒有遣返，他和妻子在埃塞克斯郡的達格納姆終究沒能等到兒子的歸來。

弗雷德里克·斯坦福（Frederick Stanford）被關押在香港戰俘營時，他家的保姆常偷偷溜到圍欄邊，給他和他最好的朋友詹姆斯·克拉克送食物。「里斯本丸」被魚雷擊中後，兩人一同落入水中。克拉克後來唯一告訴斯坦福家人的是：「前一秒我們還在一起，下一秒他就隨海浪漂走，再無蹤影了。」

詹姆斯本人在日本戰俘營裏熬過了三年，期間被迫在碼頭勞作。戰爭結束後，他獲釋回國，卻發現自己的妻子已經去世了。於是他開始尋找自己的兩個兒子，最終在澳大利亞找到了他們。他回到英國後與斯坦福的遺孀愛麗絲相遇，並與之結了婚。兩人曾是朋友，都遭受了戰爭帶來的失親之痛，如今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慰藉。即便沒有刻骨銘心的愛情，至少他們相濡以沫多年。1973年，詹姆斯退休後不久便因癌症去世，當時他是乾草市場工業設計中心的警

衛長。詹姆斯是一位沉默寡言、高大挺拔、口音很重的蘇格蘭人，不苟言笑，但心地純良。他從不談及自己在戰俘營中的經歷，但那被槍托打斷三次的鼻子和疤痕纍纍的後背已說明了一切。他總是捲最細的手捲煙，這是在戰俘營期間所養成的習慣，那時這類奢侈品很稀缺，必須精打細算。他會（溫和地）責備斯坦福的孫輩用超過兩格的衛生紙，告誡他們不應該浪費。

喬治·特林德（George Trinder）甚至沒能見到第三個孩子查爾斯。他懷孕的妻子莉娜·埃米莉帶着兩個兒子伯納德和喬治於1940年7月從香港疏散到馬尼拉，查爾斯就在那個月稍晚些時候出生。與其他撤離的家庭一樣，他們隨後被轉移到澳大利亞。1953年，莉娜去世，當時伯納德20歲，喬治17歲，查爾斯13歲。三個男孩一到年齡便相繼加入了澳大利亞皇家海軍。伯納德在海軍中接受了飛機工程師的培訓，並於1958年1月加入澳州航空公司，一直工作至1993年退休。

至於日本方面，殘暴成性、臭名昭著的日軍翻譯官新森源一郎（Niimori Genichiro）於1946年9月在香港接受戰爭罪行審判，他被判處15年監禁。目擊者稱，他原本以為自己會被判處死刑，得知判決後竟欣喜若狂地跳起舞來。

「里斯本丸」的船長經田茂（Kyoda Shigeru）於1946年10月被送上了法庭，判處了七年有期徒刑（詳見附錄一）。而和田義雄（Wada Hideo）中尉在審判前就已身亡了。

美軍潛艇「鱸魚號」也在戰爭中倖存了下來。它的第三次巡

航，也就是擊沉「里斯本丸」後的下一次任務，從 1942 年 11 月 12 日開始，一直持續到當年的最後一天。這是一次前往澳大利亞布里斯班的巡航，但途中（12 月 17 日）它擊沉了一艘正運送援軍前往所羅門羣島的日軍運輸船萬隆丸（*Bandoeng Maru*）。

在接下來的一次巡航中，從 1943 年 1 月 18 日到 3 月 21 日，「鱸魚號」返回了所羅門羣島。在那裏，船員們救援了一名在倫吉島（Rengi Island）被困數日的飛行員。第五至第八次巡航雖多次攻擊目標但未取得擊沉戰績。然而，在這四次巡航期間，「鱸魚號」又救出了一名飛行員，這次是在新不列顛島上。此外，它還將 50 名全副武裝的士兵送上了岸，他們的任務是在日軍防線後方開展作戰行動。第八次巡航結束後，「鱸魚號」返回美國進行全面檢修，並於 1943 年 10 月 19 日停靠舊金山港口。

在日本投降結束戰爭之前，「鱸魚號」又進行了四次戰時巡航。在 1945 年 5 月 22 日開始的第九次巡航中，它取得了最後一次戰果——於 6 月 24 日的夜間水面攻擊中擊沉了「熊野山丸」（*Kumanosan Maru*）。第 12 次巡航結束後，「鱸魚號」進行了改裝前的最後一次大修，太平洋潛艇司令部（COMSUBPAC）對其 SV 型空中搜索雷達進行了改裝，使其能夠安裝到潛望鏡上，並能在淺潛狀態下進行操作，這項改裝是為預期對日登陸作戰所做的準備。就在 1945 年 9 月 9 日，正好是在長崎投下原子彈一個月後，「鱸魚號」與「大眼鯛號」（*Toro*）和「黑鯨號」（*Blackfish*）潛艇一起從珍珠港啟航前往新倫敦。在接下來的四年裏，它在新倫敦、佛羅里達和加勒比海附近海域進行訓練。但「鱸魚號」已被美國海軍視為潛艇系列中特殊的存在了，二戰結束一年後，它成為第一艘配備作戰情

報信息中心的美軍潛艇，並在 1947 年首次實現潛艇水下航行狀態的人員出入。

1950 年 3 月 5 日，「鱸魚號」返回馬雷島船廠進行改裝，成為美國海軍首艘獵殺型潛艇。因此，其編號於 1951 年 1 月 2 日從 SS-214 變更為 SSK-214。大約六個月後，「鱸魚號」從馬雷島出廠，配備最新電子戰設備（包括雷達、聲吶）和通氣管。此後，它被編入潛艇發展第二組，在接下來的八年中開創了諸多潛艇對潛艇作戰的戰術，這些成果奠定了未來獵殺型反潛戰的基礎。「鱸魚號」航行於整個大西洋，從佛羅里達到蘇格蘭，參與美軍與北約的各項演習。

「鱸魚號」被認為是精英級別的潛艇，於 1964 年獲得作戰效能 E 級獎。1965 年 11 月，它進行了最後一次大修，更新了各種設備以延長其作為水下聲學實驗室的服役壽命。1966 年年中，它返回加勒比海，用於開展密集的科研任務，再次將大西洋作為其主要的活動區域，並航行至納拉甘西特灣和百慕大。1967 年初，它在新倫敦重啟對水下聲音傳播的研究。最終，這艘外形已與 30 年前下水的「貓鯊級」潛艇迥然不同的潛艇，於 1968 年 12 月 2 日正式退役，並於 1970 年 8 月 11 日拆解出售。^❶

但美國康涅狄格州的格羅頓市——也就是「鱸魚號」的誕生之地——仍然繁榮至今。不過，這裏還藏着一個不光彩的祕密。

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格羅頓曾是私掠船的聚集地，這也讓它成為英軍的眼中釘。1781 年 9 月，在本尼迪克特·阿諾德（Benedict

❶ 研究者需注意，「鱸魚號」現存的照片多攝於戰後，其外觀線條與 1942 年時已大不相同。

Arnold) 的引領下，800 多名英軍正規軍和親英殖民者襲擊了鎮外高地上格里斯沃爾德堡的 150 名志願守軍。

這場戰鬥異常慘烈，防禦工事堅固，守軍英勇頑強，但英軍紀律嚴明、久經沙場。眼見敗局已定，守軍指揮官繳劍投降。目擊者說，英軍用這把佩劍殺了他，之後又屠殺了其他倖存者。據稱，此前守軍傷亡不足十人，但戰鬥結束時，80 名守軍陳屍堡壘，遺體殘缺不全，剩餘人員半數以上都是重傷。^❶

香港當然從戰火中保存了下來，只不過現在大部分的建成區與 1941 年相比已經面目全非。但在偏遠的山坡上或被遺忘的巷角裏，仍不時能找到那場戰鬥的痕跡，這裏有鏽蝕的彈殼，那裏則有彈片或子彈在石牆上留下的印跡。赤柱與西灣有兩座戰爭公墓，它們如今寧靜而美麗，雖然赤柱軍人墳場在戰鬥的最後一天都還曾是戰場。今天的遊客們穿行其間，凝視墓碑與蝴蝶，駐足閱讀墓碑的銘文。儘管「里斯本丸」的沉沒給無數人帶來了巨大創傷，但香港至今仍未為其設立紀念碑。^❷

「里斯本丸」仍長眠於東海的海底，從現代化的上海浦東機場搭乘港龍航空航班前往香港的那些疲憊的商人們，每次都不知不覺地從它的上空飛過。英國水文局（沉船部）記錄其沉沒的位置為北

❶ 英國記錄未提及屠殺事件，也未說明萊德亞德的死亡方式。對此，我感謝奇克莫加和查塔努加國家軍事公園網站的邁克爾·米爾斯提供的詳細資料。

❷ 不過赤柱聖士提反書院的小教堂裏設有紀念陣亡皇家炮兵官兵的牌匾。



「里斯本丸」沉沒位置示意圖

緯 $29^{\circ} 57'$ 、東經 $122^{\circ} 56'$ ，^① 水深 52 米的海域。但據當地島民說，實際位置更偏北，且水深僅為 27 米，雖不是準確的「整整五呔」（Full Fathom Five），但仍在潛水可達的範圍之內。雖然按定義它屬於戰爭墓地，但由於沉船位置遠在英國水域之外，^② 它並未受到保

① 在紀錄電影《里斯本丸沉沒》中，導演方勵帶領技術團隊探測出「里斯本丸」沉沒的實際方位為北緯 $30^{\circ} 13'44.42''$ 、東經 $122^{\circ} 45'31.14''$ 。——譯者註

② 這艘船不在英國戰爭墓地保護法的管轄範圍內，該法只對在英國註冊的船隻有效。

護。而這片水域交通繁忙，恐怕它也難以在此安然長眠。

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舟山羣島上的一些居民聯繫到了我，他們對「里斯本丸」的興趣遠遠超出我的想像。他們說，早在 1950 年代，中國海軍曾潛水探查過這艘船。到了 1990 年代，一對父子也曾下水勘探，結果兒子在這過程中不幸喪生。現在他們想建立一個博物館或紀念公園，並且一直有傳言說有人甚至希望打撈這艘沉船，據說早先潛水已經打撈起了船舵。此外，他們還想據此拍攝一部影片。

至於當年的親歷者們——1990 年我開始為本書蒐集資料時，尚有百餘人在世。當我在 2003 年開始正式撰寫時，我所知道的倖存者就僅剩 8 位了。到那年的 3 月，這一數字縮減到 7 位，7 月的時候，則只剩下 6 位了。但令人驚喜的是，在接下來的 18 個月裏，我又意外尋找到了 5 位倖存者。

這 5 位中的 2 位，信號兵梅納德·斯金納（Maynard Skinner）和詹姆斯·迪格南（James Dignan）在 2005 年年中途經香港，當時正值本書的校對階段，我在他們下榻的酒店與二人會面。「當我在水中時，」斯金納說，「我已經準備好迎接死亡了，腦海裏卻浮現出《暴風雨》中的一句話：『五呎的水……』」我聽得目瞪口呆，並一起把那段詩文背誦了下來。

世事難料。互聯網是個奇妙的東西，至少在接下來的幾年裏，我仍有可能收到一兩封讓人起雞皮疙瘩的郵件，落款寫着：「順便一提，我曾經在『里斯本丸』上。」

托尼·班納姆

2006 年於香港

附錄一

判決：對經田茂的審判

1943 年 3 月 20 日，英國政府在了解了三名「里斯本丸」逃生者的報告後，終於通過加拿大駐伯爾尼公使館向東京發出了措辭強硬的抗議。抗議要求日方提供調查委員會的詳細情況，「他們認為日本政府理應成立了此類委員會」，以調查並懲處那些對「里斯本丸」等船上的戰俘待遇負有責任的人。這些人公然違反了戰爭慣例以及《日內瓦公約》的戰俘待遇條款。英國政府雖表示知悉日本並未正式批准《日內瓦公約》，但也補充道，「此等違背海軍人道準則的冷酷暴行，理應立即嚴懲相關責任人」。

5 月 16 日，日本政府終於作出答覆（拖延似乎是因事發後內部匆忙展開的調查所致），仍然是通過中立國伯爾尼：

日本政府認定，英國的抗議旨在基於毫無根據的信息，歪曲和詆毀日方官員在「里斯本丸」遭魚雷襲擊時所採取的合理而正當的措施。

英方所謂的「遺棄傷病員」及「射殺戰俘」等指控，實屬違背常理的無稽之談，因為護送戰俘的人員和船員直到最後一刻都未離棄戰俘，是與他們共赴生死的。部分日方人員甚至為營救約 900 名

戰俘，不幸罹難。這一事實無疑證明，英方指控純屬謊言與謬論。

請貴國就抗議中的各點逐一作出澄清。

大約兩周後，東京方面通過廣播（純屬宣傳）進一步強化了其說辭：

東京廣播（同盟社，美東時間，6月3日凌晨2點）用英語向太平洋地區播報，海事委員會祕書井口武夫（Iguchi Takeo）公開表彰了經田茂船長的英勇事跡。經田所指揮的船——日本郵船株式會社所屬的「里斯本丸」，於去年10月在中國東海遭魚雷擊沉，當時船上載有英國戰俘。廣播稱，井口表示經田船長不顧個人安危，多次游向溺水的戰俘，將漂浮的殘骸推至他們手中助其安全漂抵岸邊。井口補充說，戰俘們對船長的英勇行為讚不絕口，認為其勇氣可嘉。^①

英國官員看清了這則廣播的目的，但他們仍仔細地記下了船長的名字，以便在適當的時候採取行動。然而，在英國，許多人對這些細節有着更加切身的關注。戰爭結束時，我們前文提及的那位兩年前打聽自己在皇家工兵團兒子下落的 P. W. 格蘭特，直接致信首相，要求追究「里斯本丸」船長的責任。這封信引發了政府各部門之間一系列的通信往來^②：

① 聯邦通信委員會報告，1943年6月3日。

② 這些通信可在英國國家檔案館的 FO371/57578 文件中找到。

來信請寄至：財政法律顧問^①

斯托里門

並在信封和信件中註明：WCB/XXXIII(a)PHBK 聖詹姆斯公園

電話號碼：白廳 1124

倫敦，西南 1 區

1946 年 1 月 12 日

親愛的博蒙特：

參考編號：U.8210/211/73

關於您 1945 年 12 月 11 日來信詢問「里斯本丸」船長是否
將被作為戰犯處理一事，遲覆為歉。

對此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起訴書草案已擬定數周，但由
於各種原因直到現在才定稿。在這其中，「里斯本丸」的船長已
被列為被告之一，據悉其名為經田茂。^②

該草案正在騰正當中，一兩天內將提交至聯合國戰爭罪行
委員會。若您尚未答覆格蘭特先生，現可放心回覆。

R. A. 博蒙特先生謹啟

外交部

西南 1 區

① 財政部律師司為英格蘭及威爾士地區中央政府各部門及其他公共資助機構提供法律服務。

② 參見第 225 頁註釋 1。

K 746/746/73

外交部

西南區

1946 年 1 月 29 日

先生：

奉貝文大臣^❶之命，謹此確認收到您去年 10 月 4 日致首相的來信——詢問「里斯本丸」船長是否會被作為戰犯處理。

茲答覆如下：我國政府早已有意將「里斯本丸」的船長之名提交至聯合國戰爭罪行委員會，作為戰犯予以處理。但因確證其姓名遇到困難而有所延誤。未能及時回覆您的來信亦因此故。

現有關政府部門認為，已有足夠證據能夠確認「里斯本丸」船長的身份，並對其提出有力指控，相關程序正在進行中。

謹啟

致：坎伯蘭郡彭里斯莫斯廷莊園

P.W. 格蘭特先生

❶ 1945—1951 年期間的英國外交大臣。

檔案編號

莫斯廷莊園

K 746/746/73

彭里斯

坎伯蘭郡（1946 年 2 月 27 日收）

尊敬的先生：

我已收到您 1 月 29 日的來信，在收到您的信之後，我已了解關於我兒子遇難的全部事實。

我隨信附上一封他所在連隊指揮官的來信，以及另一位戰俘的信件，這些信件會向您說明孩子們是如何因那些畜生的過錯而走向死亡的。我還想補充一點，我接待過另一位倖存的年輕人，他當時也被遺棄在上海，像我的兒子一樣等死。這個年輕人活了下來，他們當時根本沒有獲得任何藥品或其他援助。抓住那個負責上海的畜生，還有「里斯本丸」的船長。煩請在方便的時候將附上的信件歸還於我。

P.W. 格蘭特謹啟

U B244/745/73

外交部

西南 1 區

1946 年 3 月 5 日

先生：

奉貝文大臣之命，確認收到您未註明日期的來信，其中附有兩封關於您兒子在日本人手中死亡的信件，並向您保證，英

國政府將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確保對英國公民犯下罪行的日本人得到應有的懲罰。

您來信所附的兩封信現依請求一併奉還。^❶

謹啟

致：坎伯蘭郡彭里斯莫斯廷莊園

P.W. 格蘭特先生

這封信寫下僅七個多月後，即 1946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10 點，香港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位於東角的貨倉陷入了一片沉寂。駐港陸軍司令拉明（R. C. Laming）中校宣佈軍事法庭開庭。該法庭由拉明擔任庭長，將對「服務於大日本帝國陸軍的平民」、前「里斯本丸」船長經田茂進行審判，指控如下：

被告構成戰爭罪：他作為軍用運輸船「里斯本丸」的船長，對 1942 年 10 月 1 日和 2 日在公海上遇襲的約 1800 名英國戰俘之生命安全負有責任。在該船被魚雷擊中、即將沉沒之際，經田違反戰爭法及戰爭慣例，存在以下行為：(a) 將上述戰俘封堵在船艙內，導致多人因窒息而死亡，身心遭受折磨，船隻沉沒時多人因被困而溺斃；(b) 未為戰俘提供可用的救生艇和救生衣，致使船沉後許多戰俘溺亡，也讓更多人遭受了精神和身體折磨。

❶ 因此很遺憾，這些文件並未保存在英國公共檔案館中。

在翻譯官用日語宣讀指控內容時，經田靜靜地聽着。拉明中校問道：「經田茂，對於剛才宣讀的指控，你認罪與否？」

經田答：「我不認罪。」

這一答覆並不出人意料。隨後，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的范培德（Peter Vine）少校，^❶ 作為檢方律師起立並發表開庭陳詞：

審判長及各位法官。今日審理案件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性。無論是在香港，還是新加坡與東京，本案的審理過程及最終裁決都將受到高度關注。英國海軍部也極為關切此案，因為我將向各位提出的爭議涉及船長對船上所有人員生命安全的基本責任。這種責任對本案的起訴並非必要，但它將大大影響被告相對於其他未出庭人員的相對罪責……

25 分鐘後，他傳喚第一位證人——陳應鴻（Chan Ying Hung）少校，請其出示經田茂關於「里斯本丸」事件的宣誓陳述。確認該陳述的來源後，范培德又傳喚多位證人，宣讀船上若干倖存者所提交的宣誓書。

隨後，范培德傳喚了第一位專家證人，「鹿島號」（*Kashima*）巡洋艦的艦長橫田稔（Yokota Minoru），時年 43 歲的橫田於 1920

❶ 范培德（Peter Alan Lee Vine）在戰後不久於新加坡通過了律師的最終資格考試。在《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報道了此事之後，他被基蘭上校與戴維斯準將招募為檢查官（副助理軍法署長），臨時授予少校軍銜。在新加坡參與了兩次審判後，他被派往香港處理「里斯本丸」案件和另一個關於台灣的案件。戰後他返回香港，加入了的近律師行（Deacons），執業成就斐然，至今仍居香港。——原註
范培德在 2005 年去世，葬於香港墳場（Hong Kong Cemetery）。——譯者註

年進入日本海軍學院，1923 年畢業，1938 年首次擔任指揮官。法庭是否意識到他豐富的海軍經驗尚不得而知。

1941 年 11 月 6 日，橫田稔接管了新建造的日本潛艇「伊 -26 號」(I-26)。11 月 15 日，他收到珍珠港行動的簡報後，於 19 日祕密出發，前往阿留申羣島執行第一次戰鬥巡航任務。其後奉命巡邏夏威夷與舊金山之間的海域。12 月 2 日，潛艇接到警告稱，戰爭將於 12 月 8 日（日本時間）爆發。12 月 6 日，他們發現了一艘載重 2140 噸的美軍租用蒸汽帆船「辛西婭·奧爾森號」(*Cynthia Olson*)，該船正運載着軍用貨物從華盛頓州塔科馬前往夏威夷檀香山。黎明時分，「I-26 號」在水面發起攻擊，持續炮轟直至該船沉沒，成為戰爭期間首艘被日本潛艇擊沉的美國商船。

1944 年 1 月 31 日，橫田稔接管了新的潛艇「伊 -44 號」(I-44)，在帕勞和新愛爾蘭海域巡航期間，他僥倖在一次美軍飛機的襲擊中倖存了下來，但潛艇受損並開始滲漏，已喪失了下潛能力，被迫浮在水面上。

1944 年 9 月 16 日，川口源兵衛 (Kawaguchi Genbei) 接替了橫田的指揮職務。^❶戰後，橫田被任命為「鹿島號」巡洋艦的艦長。該艦當時被用作遣返日軍部隊的運輸船，審判期間正好停泊在香港。

范培德的目的很明確，他意在證明，任何情況下，船上人員的生命安全最終都由船長負責。而辯方策略（正如范培德所料）則是

❶ 他再次幸運地逃過一劫，因為 1945 年 4 月 29 日，一架「復仇者」魚雷轟炸機在沖繩附近擊沉了「伊 -44 號」潛艇，艇上 134 人全部遇難。

要論證，在戰時的日本，即使是軍艦的艦長，其軍階也低於艦上的高級軍官，因而必須服從軍方命令。

范培德預判了經田將以「服從上級命令」來作為抗辯的理由，因此他傳喚橫田作為專家證人，以便明確區分船長的職責與船上軍隊指揮官的職責。可在一系列混亂的問答中（部分混亂來源於翻譯），范培德發現自己始終無法得到明確的答覆。

范培德問：「我想知道，究竟是誰對船上士兵的生命與安全負有責任？」

橫田：「航行的責任屬於船長。其餘所有的責任則由部隊指揮官承擔。」

范培德：「法官閣下，我請求將此證人列為敵對證人。」

拉明：「基於什麼理由？」

范培德：「基於他作偽證。他現在所作的證詞與他的宣誓陳述不符。」

拉明：「他做過宣誓陳述嗎？」

范培德：「是的，先生。」

拉明：「我認為我們應該稍等一下，看能否換種方式提問。」

最終，拉明通過耐心的提問，得到了對雙方職責的明確界定。

拉明：「你是否同意，在救助船上人員性命的事情上，船長不必服從部隊指揮官的命令？」

橫田：「我同意。我認為是這樣的。」

由於整個審判的核心就在這一點上，所以幾乎可以當場作出裁決。

審判第二日開始得晚些，這是因為人們意識到可能有類似案件

的最新判例可供參考。正如拉明對范培德所說的：「在您傳喚第一位證人之前，法庭認為，鑒於本案涉及重要的法律問題，如果能夠獲得剛剛結束的紐倫堡審判的判決文書副本，將對法庭大有裨益。我們相信新聞媒體掌握了完整的判決文本，如果有可能獲得副本，我將感激不盡。法庭可以藉此參考，以獲得指導。」

隨後，范培德傳喚了第二位專家證人——因涉嫌戰爭犯罪而被拘留在赤柱監獄的軍需中校（Pay Lieutenant Commander）今村一郎（Imamura Ichiro）。作為一名軍需官，他在海洋法問題上似乎有些力不從心，也許就像之前的橫田（橫田的巡洋艦當時正停泊在香港）一樣，他也只是剛好到場而已。

正如許多日本海軍軍人，他對陸軍幾乎沒有什麼尊重。

今村說：

我不了解有關船長與部隊指揮官之間關係的具體規定，但據我所知，太平洋戰爭期間陸軍軍官行事往往蠻橫無理，在許多場合，絕大多數陸軍軍官都是靠強迫和武力行事。其行為簡直不可理喻。我還在帝國大學讀書的時候就聽說，1936年陸軍勢力開始變得非常強大，那時有人就呼籲擴充軍備，對軍費的需求也急劇上升。當軍費需求大到一定程度時，財政部門便拒絕承擔這些開支。然後陸軍中那些核心分子就聲稱：「日本人民擁有數億日元的郵政儲蓄。如果把這些郵政儲蓄資金轉用於陸軍，那麼擴軍備戰就毫無問題了。」這就是陸軍的荒唐做派。我剛剛講的這個小插曲就足以說明，陸軍人員的行為有多麼不理性。這也充分證明，在許多情況下，軍方人員的行為已經遠遠超出了常識的範疇。

法庭認為這番激烈陳詞與本案無關，但除了「常識性」的回答外，他們未能從證人那裏獲取其他的信息。

隨後，法庭傳喚首位戰俘證人豪威爾出庭，他向法庭描述了船上的狀況以及沉船事件的經過。「里斯本丸」的二副荒木要（Araki Kaname）在其後也出庭作證（於審判第四天）

除被告本人外，荒木是最能講明事件中高級船員行動的證人。但首先，法庭要求他說明這些高級船員的職能。他回答道：

在船長的指揮下，大副負責航行和甲板上的管理工作；二副在船長的命令和指示下，負責一切與航行相關的事務；三副是大副的助手。輪機長負責機艙，對機艙內的一切事務全權負責。大管輪在輪機長的指揮下，負責機艙的管理事務；二管輪和三管輪在大管輪的指揮下，負責船舶發動機的維護工作。事務長在船長的指揮下，負責船上的行政、總務及會計工作。無線電操作員在船長的指揮下，負責船上無線電設備的收發和維護工作。助理無線電操作員是無線電主管的助手。這些就是船上全體高級船員的職責分工。

問答再次集中在船上的陸軍高級軍官與船長各自的職權劃分上。

「在緊急狀況下，部隊指揮官有權向船員下達命令嗎？他有權命令船長放下救生艇嗎？即便是在部隊指揮官的軍銜低於船長的情況下。」

「是的，因為船長的軍銜只是名譽性的。」

「那麼，如果部隊指揮官下達了可能危及船上人員安全的命令，船長應該怎麼做？」

「他應該設法讓對方改變命令。」

一系列關於救生裝備和船上演練的質詢顯得更有成效，荒木坦率承認這方面確實存在問題。按照慣例，每人應配發一件救生衣，並要求他們在每周的救生演練中隨身攜帶。然而，現已證實，儘管船上有足夠的救生衣供每位戰俘和日軍士兵使用，但這些救生衣從未被正式發放過。

荒木表示，他認為「里斯本丸」的船長本應拒絕執行軍方要求封堵戰俘艙口的命令。他指出，雖然違抗軍令屬於違法行為，但這樣做才是正確的選擇，特別是，按照荒木的邏輯，經田本就打算隨船殉難，那就更應違抗這道命令了。

范培德說：

在你的證詞中，無論是回應檢察官、交叉問詢，還是回答法庭提問時，都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你認為可能存在比單純服從軍令更高的責任義務。我現在並不是專指「里斯本丸」的船長，但我希望你以日本商船高級船員的職業榮譽來回答這個問題。你是否認為，有時出於對正義與恰當行為的信念，一個人應當違抗命令，做他認為正確的事，即便因此面臨懲罰？

荒木回答道：

我認為，如果一項不合理的命令可能導致很多人處於危險之中，而違抗這項命令可以讓許多人獲得幸福或得到拯救，那麼即便事後會受到懲罰，也應當拒絕服從命令。

除了這一點之外，荒木總體上還是對船長給予了正面的評價。然而，他也指出，在試圖營救戰俘的問題上，經田與護航艦上的人員之間明顯缺乏溝通。這是致命的證詞。

荒木作為證人的陳述持續到審判的第七天結束。第八天，另一位戰俘證人——亞瑟·埃文斯（三位逃脫者之一）出庭作證。他憑藉親身經歷，從第一貨艙中海軍人員的角度，對當時的情況進行了有說服力的陳述。次日，督察約瑟夫·希爾（Joseph Hill）補充說明了二號貨艙中的情況，雖然沒有提供更多新的信息，但他曾看到最後一名日本守衛全副武裝、戴着頭盔跳入了海中。第九日下午，香港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的弗蘭克·加頓（Frank Garton）出庭作證。他在1924年加入港英政府之前，曾在英國商船隊服役了六年，其中包括包含在一戰期間六個月的作戰經歷，並在那段時間第一次遭遇了貨船被魚雷擊中的情況。

他在談到第二次沉船經歷時說：「我完全沒料想到，這艘船會被魚雷擊中。我只知道我正在前往另一個國家，去給日本人做苦工。」

加頓還提到，當他從貨艙逃生時，只在艦橋上看見了戰俘，而未見到日軍守衛的蹤影。

第十天，法庭傳喚了韓美洵出庭。他對二號貨艙內所發生的事情予以了更加詳盡的陳述。

次日，庭審一開始，法庭便傳喚了第14位證人——牧田榮一（Euchi Makita），他曾負責翻譯被告的陳述，在確認翻譯無誤後，第三位專家證人、皇家海軍的G. D. A. 格雷戈里指揮官出庭作證，他曾兩次獲得「傑出服務勳章」（DSO and bar）。格雷戈里13歲時加入了海軍。現年36歲的他是英國軍艦「康斯坦斯號」（HMS

Constance) 的艦長。在回答了四個關於他的背景和專業資質的問題後，法庭提出了第五個與本案直接相關的問題，而格雷戈里顯然有備而來。

范培德：「請向法庭陳述，在閣下看來，任何船隻在海上航行時，其指揮官應承擔哪些責任？」

格雷戈里：「我認為任何船隻的指揮官都對該船的安全、全體船員的安全、所有乘員的安全，以及船上發生的一切負全責。」

范培德：「能否請閣下詳述這一觀點？」

格雷戈里：「具體而言，如果上級軍官下達了一道可能危及我所指揮的船隻及船上人員安全的命令，我可以非常明確地說，該命令絕不能免除我對船隻安全和船上人員安全所應承擔的責任。」

隨後，荒木要被再次傳喚出庭。當天結束時，高橋先生抱怨道，他於 10 月 16 日向日本方面申請調取的文件至今仍未送達。

本案第 12 天的庭審以范培德宣讀控方的結案陳詞開場。與此同時，高橋請求休庭，以等待他的文件（即《作戰勤務條例》——一部專門規定在軍方徵用運輸船時，船長權限的條例）送達。法庭因此暫時休庭。

拉明庭長表示：「鑒於本案指控罪行之嚴重性以及被告若判有罪可能面臨刑罰，法庭決定給予最大限度的裁量空間與協助，以確保辯方能夠進行充分的辯護。」

法庭遂宣佈休庭，直到東京方面提交所需文件為止。

當文件送達後，法庭於 11 月 8 日重新開庭。然而，考慮到需要對該文件進行必要的翻譯，法庭再次休庭至 11 月 13 日（星期

三)。最終，在這個不祥的日子裏，被告本人被傳喚出庭。

在被告詳細描述了航程經過及沉船前的船上生活後，范培德再次將焦點轉向有關乘客安全的協議。他試圖再次說明，船長有義務無視任何妨害乘客安全的軍事命令。

范培德：「那麼，如果一名警衛隊的下士命令你安排船員在船尾搭建絞架，將戰俘逐一絞死，你會照辦嗎？」

經田：「如果那名警衛的部隊指揮官在船上，我無需服從他的命令。我只需服從部隊指揮官的命令。如果當時那名下士是指揮官，那麼我就必須服從他的命令。」

范培德：「也就是說，如果接到此類命令，讓你在船尾搭建絞刑架，並將俘虜逐個絞死，你就會執行，對嗎？」

經田：「首先，我會從道義角度提出反對。」

范培德：「如果這個命令被重複下達，並明確告知你，如果不服從將被視為違抗命令，你還會執行嗎？」

經田：「對於讓我搭建絞刑架這樣的命令，這種工作可以由警衛人員或其他人完成，而不必由船員承擔。因此，我不會服從這樣的命令。」

范培德：「那麼你承認有些命令在特定情況下是不應被執行的了？」

經田：「根據具體情況，確實存在不應執行的命令。」

《作戰勤務條例》（第一部分第三章第十條）似乎也佐證了這一點：除非有特別規定，否則運輸途中部隊指揮官無權干涉列車或船隻的啟程、到港及航行。

在庭審中，「阿蘭多拉之星號」^❶(*Arandora Star*) 的名字被提及了兩次，大概是希望將其作為一個先例來引用，但由於日方證人對這個案例並不熟悉，這一質詢方向未能繼續推進。

在審判的第 17 天，經田退庭了。次日，即 11 月 18 日，新森源一郎被傳喚出庭。作為辯方證人，他的證詞在諸如救生衣發放等方面與多位證人的陳述完全相悖，因此對辯護的幫助不大。

辯方的第三位證人是安藤正 (Ando Tadashi) 少佐，一位軍事運輸方面的專家。

辯護律師高橋問：「如果一艘船被（軍隊）徵用，船員的身份會發生什麼變化？」

安藤：「船員將成為附屬於軍隊的平民。」

高橋又問：「附屬於軍隊的平民屬於什麼身份？」

安藤：「他們不具有軍人的身份，但須執行軍方下達的一切命令。」

在交叉質詢中，安藤做出了一項有趣的區分：他區分了「命令」和「私人命令」（即超出上級職責範圍之外下達的命令），他承認自

❶ 有一個極為相似的案例：「阿蘭多拉之星號」於 1940 年 7 月 2 日從利物浦出發，船上共有 1673 人，其中 374 人為英國船員和警衛，其餘為德國和意大利的拘留者（另有近 100 名德國戰俘）。該船在愛爾蘭附近被 U-47 潛艇魚雷擊中後，後部機艙旋即進水，發電機陷入癱瘓狀態。船上大多數德國人和意大利人從黑暗的船艙中衝到甲板上，但許多人拒絕登上船員和警衛引導他們前往的救生筏。沉船之際，加拿大驅逐艦「聖勞倫特號」(HMCS *St. Laurent*) 趕到現場，開始從救生艇上和水中救援倖存者（主要是通過用繩索將驅逐艦上的船員放下到船側，將這些落水者拖上來，其中許多人渾身浸滿燃油，根本無法自救）。船上有 805 人罹難，包括近百名英國船員和警衛。

已沒有義務服從此類「私人命令」。

隨後，一位令人意外的證人被傳喚出庭——「里斯本丸」的三副檜山清之進（Hiyama Seinoshin），檢方此前甚至不知道他人在香港。

此時，《第 2662 號文件：里斯本丸事件相關數據（第十五輯）》被提交至法庭。該文件是戰後美軍在日本海運管理局^❶發現的，其內容涉及日方針對英國關於「里斯本丸」的指控所進行的核實調查。內容包括：（1）英國抗議要點；（2）「里斯本丸」事件發生時的狀況；（3）參考資料；（4）結論。

然而，這份文件令人失望。因為它幾乎完全基於經田和新森的陳述，沒有任何有價值的信息。雖然經田的說法基本接近事實（唯一的例外是他聲稱戰俘是在日軍命令下棄船的），但新森卻把戰俘們自行完成的幾乎所有事情——從照料病患到組織餐食——都歸功於他自己了。儘管新森堅稱日方人員與戰俘在逃生機會方面是平等的，但日本的調查報告卻忽視了一個事實：日方人員中僅有一人溺亡，而戰俘的死亡率卻接近 50%。於是，調查最終得出的結論是：相關指控毫無根據。

11 月 28 日，庭審在休庭六天（供控辯雙方準備結案陳詞）之後重新召開，進入第 23 天的聽證程序。辯方先宣讀了結案陳詞，接着是控方。

❶ 雖然該文件未註明日期，但它很可能是在英國最早提出抗議後日方經過調查的相關文件。1946 年 9 月 9 日，該文件在東京第一復員局檔案中被發現，並於 9 月 17 日轉交國際檢察局進行翻譯，譯文於 11 月 8 日完成。

中午 12 點 30 分，拉明宣佈：「法庭現在休庭，以便審議判決結果。鑒於本案涉及大量證據，以及控辯雙方提出的重要法律問題，法院將於明日上午 10 點 30 分重新開庭。」

次日上午，即庭審的第 24 天（也是最後一天），怡和洋行東角貨倉異常擁擠。在座無虛席的法庭前，拉明宣佈了判決：

經田茂，法庭認定你所被指控的罪名成立，但法庭在作出判決時提到的某些例外情況不構成犯罪。我再次提醒你和你的辯護律師，本判決須經上級軍事當局確認，若你希望就判決結果或量刑提出上訴，須在兩天內發出上訴通知，並在 14 天內提交上訴申請。法庭已慎重考慮了本案證據所揭示出的相關情況，控辯雙方所提出的所有論點，以及辯護律師在減刑陳詞中所強調的要點。^❶ 因此，茲判處你有期徒刑七年。

本庭訴訟程序到此結束。

判決：有罪，但法庭認定，在貨艙內死亡的是兩名而非「許多」戰俘，他們死於一號貨艙的環境條件和本已虛弱的身體狀態，並非窒息身亡。當船沉沒時，是「其他人」而非「許多其他人」被困溺亡。此外，不包括「由於他未能為戰俘提供可用的救生艇和救生衣，許多戰俘在船沉沒時溺亡，更多人遭受了精神和身體上的痛苦」這一指控。

量刑：1946 年 11 月 29 日，判處七年監禁。

❶ 「紐倫堡審判已經明確指出，至少對於執行命令而採取的行動，應當給予充分的減刑考慮。」

判決已下，但正義是否得到伸張？那 828 條人命（若計入後續的死亡人數則達 1073 人）的血債，究竟該由誰來承擔？

潛艇官兵似乎被完全免除了責任。儘管司徒永覺（Selwyn Clarke）、英軍服務團和其他的人都曾試圖傳遞消息，但沒有證據表明，美軍潛艇在發動攻擊前已獲悉「里斯本丸」上載有戰俘的情報。米德爾塞克斯軍團的軍需軍士威廉·保爾特（William Poulter）似乎代表了船上所有人的看法，他說，「我從未聽聞任何人抱怨擊沉我們的那艘潛艇，事實上大家都認為那是正確的行動」。

經田茂被判有罪，控方所主張的其行為違反了當時日本標準之論點，得到了法庭的認可。然而，這一判決是法庭已經明確：在戰時的日本，船長的權威低於船上高級軍官的權威這一事實而做出的。審判所基於的前提——作為軍用運輸船「里斯本丸」的船長，在船隻遭到魚雷攻擊即將沉沒時，對船上約 1800 名英國戰俘的生命安全負有責任，其行為違反了戰爭法規和慣例——本身就是值得質疑的，因為在當時的制度下，船長顯然並不承擔全部的責任。

雖然船長聲稱在和田及其他軍官面前為戰俘辯護的說法無法得到證實（其聲稱協助戰俘放下救生艇的說法亦無法被證實），但他至少參與了將船隻拖至淺水區的行動。儘管這一舉措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拯救船隻及其貨物，而非戰俘，它也可能間接幫助了一些戰俘活下來。

在對他提出的兩項指控中——（a）將上述戰俘關閉在船艙內，導致多人窒息而亡，遭受精神和身體的痛苦，還有許多人在船沉沒時被困溺亡；（b）未向戰俘提供可用的救生艇與救生衣，致使船沉後多人溺水身亡，更多人員遭受身心的折磨——第二項指控被完全

駁回，第一項也被大幅減輕，這一事實表明，法庭並未認為他對數百人的死亡負有責任。事實上，僅被判處七年監禁也暗示着，法院並未認定他對任何一名死者負有完全責任。

真正的罪責，理當歸於那些確實「違反戰爭法規和慣例」的人。大家說得沒錯，日本當時確實並未批准《日內瓦公約》^❶，但同樣被指出的是，日本方面在轉運戰俘時，也應按照公約的規定，使用帶有標識的船隻。

因此，日本當局選擇不在「里斯本丸」這類船隻上標明紅十字標誌，選擇不通知中立國其航行的時間，並選擇將日本軍隊和戰爭物資與戰俘一同運輸，這是故意將這些船隻置於「友軍誤擊」的危險之中。

事實上，真相更為複雜。雖然日軍對待戰俘的方式幾乎在各個方面都公然違反了《日內瓦公約》，但事實上，公約中對船舶標識的規定似乎僅適用於醫院船，有關普通戰俘轉移的條款只有寥寥數行，且均未明確涉及海上運輸。唯一直接相關的可能是公約的第九條：「無論何時，不得將俘虜送置於炮火所及之地方，亦不得利用彼等安置於某點或某地，以避敵人炮擊。」

因此，這場災難的最終責任既在於戰俘運輸指揮官和田中尉，也在於那個漠視個體生命的日本戰時軍國體制。但是，這個政權從未受到審判，而和田本人在被繩之以法前就已經死亡了。

❶ 本文所指的是1929年《日內瓦第三公約》及1907年《第二次公約》（即《海牙公約》）的相關部分，1949年《日內瓦第四公約》強化了部分規定。

附錄二

「里斯本丸」人員名單的來歷

（摘自英軍服務團檔案）^❶

謝滌君（TSE DICKUAN）

中英混血，1900 年 1 月 24 日生於香港，文員，1944 年 6 月 15 日至 1945 年 10 月 31 日效力於英軍服務團。

（嘉獎詞）香港淪陷後，該人員被安排在日軍的戰俘與拘留人員管理總部任職。在工作過程中，他逐漸接觸到了日方的官方記錄以及英國與加拿大戰俘的名冊。他意識到這些材料對我方具有極高的價值，便主動將這些文件一次幾頁地帶回家中，謄抄並打印了下來。在此期間，他自願冒着生命危險進行這項工作，耗時數月。完成後，他主動聯繫英軍服務團（BAAG），並表示願意提供全部名單。

不出一個月，我們便獲得了這份原始名單，首次掌握了真實而完整的戰俘資料及眾多人員的最終下落。

❶ 現存於香港大學圖書館，歸於「萊德檔案集」中。——原註
另，該檔案集中與本附錄相關的內容目前已被移至英國布里斯托大學藝術與社會科學圖書館保管。為確保相關人名的準確譯介，譯者曾求助於該館的相關人員，並得到了對方的熱情幫助，在此謹致謝意。——譯者註

此後他繼續留在日軍戰俘辦公室為我方工作，但在壓力之下，其身體逐漸不堪重負，最終因病入院治療，而被解職。但離職前，他為我們建立了必要的聯絡渠道，使我們能夠持續獲取關於香港戰俘的最新信息。

這項志願工作需要持久而非凡的勇氣，對我方及戰俘家屬而言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聲明 1945 年 9 月 29 日

……1942 年 8 月 10 日，我在位於科發道總部、戰俘處下屬的「情報辦公室」獲得了一份打字員的工作。相關工作人員包括：德永、田中、原、新森、橋川、河內、渡邊、赤田山、松田、井上，以及四名中國人：我自己、亞瑟·李、麥汝勤（Eugene Mak）、譚仲文（Tam Chung Man）。

中國工作人員的工作純粹與戰俘相關。

從 1942 年 11 月接到首份傷亡名單的打字任務開始，我便開始祕密地複製所有與戰俘有關的文件，並將其藏於家中。到 1943 年底，我設法收集了完整的戰俘名單、傷亡名單等資料。1944 年 3 月，我的朋友約翰·麥肯齊要前往澳門，他是歐亞混血，曾在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工作。我囑咐他聯繫（英王陛下）領事館，探詢領事是否願意接收我傳遞的情報。但他後來回覆表示此舉太過危險，因此我只好放棄這一想法。於是，1944 年 5 月，我派我的大姐前往惠州，聯繫負責英軍服務團的軍官，但她不幸去世了。1944 年 7 月 7 日，我的表兄陳漢忠（Chan Hong Chung）代我將一封信帶至惠州交予英軍服務團的負責軍官。大約 10 天後，我收到一封署名

「鮑賓 (Bobbin)」^❶ 的回信，信中指示我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將所有資料都交給他，並附上了一些錢款，資助我的家人前往惠州。我花了 15 個晝夜完善報告，接着身體就垮掉了。之後，我將報告藏入一個舊帆布手提包的夾層裏，由我的堂兄將其偷偷帶出日軍防線，並於 1944 年 8 月 17 日左右在惠州交給了鮑賓。1944 年 8 月，馬頭涌設立了一個新的拘留營，關押了 116 名第三國國民。由於我病得很重，我諮詢了醫生並獲得了一個月的休假。在此期間，我着手策劃了逃脫行動。1944 年 9 月 19 日，儘管我仍未痊癒，但還是重返工作崗位。當天上午 10 點半，我故意從 10 英尺的高處跌落下來並弄傷了自己。我佯裝昏迷，被送回家接受治療。後來我被注射了嗎啡，昏睡了兩日。醒來之後，我就開始裝瘋。一周後，一名醫生抽取了我的脊髓液進行檢查，並未發現腦部有任何損傷，便診斷我患有「神經衰弱」。憑藉這份醫療證明，我獲准休假到 1944 年 9 月底。

1944 年 10 月 2 日，我遞交了辭呈並附上新開具的醫療證明，所幸獲准辭職。11 月 4 日，我攜家人啟程前往大埔。當時我隨身攜帶了 5000 日本軍票和 20000 中國法幣，^❷ 但當我到達大埔時，所有的軍票都已用於行賄。由於當地政府軍與共產黨之間的衝突，我們被扣留了六天。11 月 9 日，一個小男孩給我報信說讓我立刻離開，我便留下妻子和家人，前往惠州，並於 12 日抵達。我的家人們於

❶ 英軍服務團少校羅伯特·庫珀 (Rob Cooper)。

❷ 分別指「日本軍票」(Military Yen) 與「中國法幣」(Chinese National Currency)。

1944 年 11 月 15 日抵達惠州，他們在途中遭遇了搶劫，大部分財物都被掠走了。在惠州，我與庫珀少校取得了聯繫，並在他的協助下，與何小姐和麥汝勤先生建立起了聯絡，他們都曾協助過我的工作，讓我能夠繼續追蹤戰俘的名單以及其他情報。

關於戰俘被捕及之後的處決或監禁，我可以提供以下細節。

1942 年年中，包括佩恩在內的四名加拿大人^❶試圖從北角營地越獄，被捕後遭斬首。

大約在同一時間，一些戰俘試圖挖掘隧道從深水埗營地逃跑。不幸的是，他們被抓住了，結果被日軍要求挖自己的墳墓，繼而遭刺刀處決。其中一個人，我記得名叫斯托普福思（Stopforth）^❷。田中少尉因經辦上述兩案有功，被晉升為中尉，這期間他得到了翻譯官新森的協助。

1943 年 7 月左右，香港義勇防衛軍的二等兵 M. 普拉塔因間諜罪被捕。他被帶到田中位於亞皆老街 161 號的住處，在那裏遭

❶ 中士約翰·佩恩（John Payne），於 1942 年 8 月 26 日與二等兵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上等兵喬治·貝爾津斯基（George Berzenski）和二等兵珀西·埃利斯（Percy Ellis）一同被處決，以上四人均為溫尼伯榴彈兵團的成員。

❷ 詹姆斯·斯托普福思二等兵（皇家陸軍軍需隊），於 1942 年 9 月 14 日與保羅·康諾利二等兵（香港義勇防衛軍）、莫里斯·鄧恩二等兵（皇家陸軍軍需隊）、維克多·布蘭森二等兵（第一米德爾塞克斯軍團）和威廉·喬治上等兵（第一米德爾塞克斯軍團）一同被處決。另有三名參與此次逃脫行動的戰俘倖存了下來。「里斯本丸」上的倖存者丹尼斯·莫利（Dennis Morley）曾嘗試與康諾利一起逃跑。丹尼斯寫道：「非常感謝你提供的關於保羅·康諾利的信息。我終於安心了。我有告訴過你，我們在早期確實嘗試過逃跑，但被哨兵發現而不得不迅速返回的事嗎？我知道他會再次嘗試，但他不會讓我冒險。他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再次感謝你。」

受了水刑，折磨致死。行刑者是兩名日本憲兵，隸屬於九龍界限街警署。田中、新森和長谷川三人都在場。這一事件被一名女傭（其姓名已遺忘）目睹，她在第二天早上告訴了我。普拉塔的死亡在官方記錄中被歸因於「瘧疾」。其葬處不詳（詳見本章文末附記^①）。

1943 年的某天，紐納姆上校、福特中尉（皇家蘇格蘭軍團）^② 和格雷空軍上尉（皇家空軍）以及三名中國司機被捕後遭到處決。三名軍官於 1943 年 12 月 1 日被執行死刑。由於此案被嚴格保密，我未能獲取到相關信息。此外，我雖知悉哈多克海軍中尉被捕之事，但具體案情亦不清楚。

1943 年 9 月，克雷文中校、揚少校、鮑克斯少校、迪克森中尉、勞特利奇中士及哈迪二等兵因涉嫌從事間諜活動及操作無線電發報機被捕。田中中尉、副官橫井上尉及翻譯官新森經辦此案。德永上校在致東京的報告中建議對上述盟軍人員判處死刑。^③

1944 年 8 月，總部收到的一份報告稱，香港義勇防衛軍的 F. M. 黑爾二等兵從陽台上墜落身亡，但我不清楚其死亡的具體情況。

關於施里格利中尉^④的死亡，我一無所知。所有由紅十字會送

① 普拉塔被埋葬在香港天主教墳場。死亡日期被記錄為 1943 年 9 月 14 日。

② 實際上是道格拉斯·福特（Douglas Ford）上尉。處決於 12 月 18 日執行。

③ 事實上，他們是被監禁了，後來獲釋。

④ 施里格利曾在香港義勇防衛軍的財務部服役。他是「在油麻地接受審訊時從二樓窗戶墜落身亡的」，死亡日期被列為 1944 年 6 月 28 日。黑爾曾在香港義勇防衛軍的野戰工兵連服役，他的死亡日期被列為 1944 年 8 月 26 日。其中一個死亡日期可能記錄有誤，這讓人們懷疑他們可能是在同一事件中喪生的。

來的醫療物資都由齋藤上尉保管；而鞋類、洗滌用品和食品等物資則由加藤上尉保管。

我從未被獲准查閱任何對戰俘進行軍事法庭審判的記錄。

我時不時地為塞西爾·布恩（Cecil Boone）^❶少校打字，記錄他的親日言論，這些材料後來被送往了東京。

限制戰俘信件的字數以及匯款至赤柱的規定，都是由翻譯官新森提出來的。

關於「里斯本丸」的悲劇，負責管理戰俘的是新森與一等士官長林仙之助（Hayashi Sennosuke）。新森酒醉後曾吹噓他們封鎖了所有的通道，以阻止戰俘們逃生，並坦言其性命係一名英軍軍官所救（該軍官在他落水時救了他一命）。關於戰俘為日軍充當線人的情況，我未曾聽聞在亞皆老街軍官營中存在此類行為，但在深水埗營地的確有兩人曾這麼做過，但他們的名字我已經忘記了。

附記：

1945年9月29日：關於二等兵普拉塔之死，目睹事件並在後來告知我的女孩名叫玉珍（Yuk Chun）。她與另一位名叫亞典（Ah Din）的女孩一同在九龍亞皆老街161號田中中尉的住所當女傭。後來阿典被調往廚房工作，其職位由一名叫潘潔珍（Poon Kit Chun）的女孩接替。潘潔珍的父親是油麻地勝家縫紉機公司（Messrs. Singer Sewing Machine Co.）的分行經理。

❶ 布恩少校因其親日的立場而被戰俘們憎惡，戰後曾被指控為通敵者，但最終被判無罪。

麥汝勤 (Eugene Mak)

中國籍，出生於香港，25 歲，政府承包商的監工員，野戰救護隊中士。從戰俘營獲釋後，他在亞皆老街戰俘總部擔任打字員和文員，直至日本投降。在 1944 年 9 月至 1945 年 8 月期間，他通過謝滌君與庫珀少校持續保持聯繫。

附錄三

統計數據

艙位	單位	總人數	失蹤	生還	上海	逃脫	死亡	回國	損失率 (%)
一號	皇家海軍	379	158	221	8	2	70	151	41.69
二號	皇家蘇格蘭 軍團第 2 營	373	145	228	7	0	32	196	38.87
	米德爾塞克斯 軍團第 1 營	366	151	215	10	0	57	158	41.26
	皇家工兵團	172	79	93	8	0	35	58	45.93
	皇家通信兵團	129	50	79	3	0	20	59	38.76
	皇家陸軍 軍醫隊	22	4	18	5	0	4	14	18.18
	皇家陸軍 軍需隊	2	0	2	0	0	0	2	0
	皇家陸軍 牙醫隊	2	2	0	0	0	0	0	100
	皇家陸軍補給 與運輸勤務隊	1	0	1	0	0	0	1	0
	皇家香港 警察隊	3	2	1	0	0	1	1	66.67
	平民	5	1	4	0	1	1	3	20

續上表

艙位	單位	總人數	失蹤	生還	上海	逃脫	死亡	回國	損失率 (%)
	貨艙總計	1075	434	641	33	1	149	492	40.37
三號	皇家炮兵團	380	236	144	3	0	26	118	62.11
總計		1834 ^①	828	1006	44	3	245	761	45.15

「失蹤」與「生還」的統計數據截至到 1942 年 10 月 2 日。「上海」指的是當大部分倖存者被轉送到門司時，被滯留在上海的人員名單（包括被安排照顧病患的醫療人員）。「死亡」指的是 10 月 2 日之後死亡的人數。

備註：皇家海軍實際上約有 17 名士兵（包括亨特）在二號貨艙，皇家炮兵團約有 12 名士兵（包括英格利斯、吉登斯和鮑文）也在二號貨艙。本表仍將其計入一號貨艙與三號貨艙的統計數據之中。

① 據日本軍方統計，船上的英軍戰俘共有 1816 人。作者最初認為是 1834 人，但真實情況是，戰俘在登船時，有人在發燒，彼時白喉流行。由於擔心傳染病蔓延，從深水埗上船前，日本人對登船戰俘做過一次檢疫，所有體溫異常的戰俘都被剔除了。有出入的 18 人就在「剔除」之列。作者也於 2023 年確認了「1816 人」這個數據。——譯者註

附錄四

縮略語對照表

ARP (Air Raid Precautions) 防空預警

BAAG (British Army Aid Group) 英軍服務團

BQMS (Battery Quarter Master Sergeant) 炮兵連軍需軍士

BSM (Battery Sergeant Major) 炮兵連士官長

CERA (Chief Engine Room Artificer) 輪機艙總技師

CO (Commanding Officer) 指揮官

CQMS (Company Quarter Master Sergeant) 軍需軍士

CSM (Company Sergeant Major) 連隊軍士長

CTF (Commander Task Force) 特遣部隊司令

CWGC (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 英聯邦戰爭
公墓委員會

ERA (Engine Room Artificer) 輪機艙技師

FEPOW (Far East Prisoner of War) 遠東戰俘

HE (High Explosive) 高爆彈

HKDDC (Hong Kong Dockyard Defence Corps) 香港船塢防
衛軍

HKRNVR (Hong Kong Royal Naval Volunteer Reserve) 香港

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

HKVDC (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Corps) 香港義勇防衛軍

IJN (Imperial Japanese Navy) 大日本帝國海軍

KIA (Killed in Action) 陣亡

LSBA (Leading Sick Berth Attendant) 看護士官

MBE (Memb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大英帝國員佐勳章

MC (Military Cross) 軍功十字勳章

MIA (Missing in Action) 作戰失蹤

MID (Mentioned in Despatches) 傳令嘉獎

MTB (Motor Torpedo Boat) 魚雷快艇

NCO (Non-Commissioned Officer) 士官

NZRNVR (New Zealand Royal Naval Volunteer Reserve) 新西蘭皇家海軍志願預備隊

OBE (Offic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大英帝國官佐勳章

OC (Officer Commanding) 部隊指揮官

PO (Petty Officer) 海軍軍士

POW (Prisoner of War) 戰俘

RA (Royal Artillery) 皇家炮兵團

RAF (Royal Air Force) 皇家空軍

RAMC (Royal Army Medical Corps) 皇家陸軍軍醫隊

RCAF (Royal Canadian Air Force) 加拿大皇家空軍

RCS (Royal Corps of Signals) 皇家通信兵團

RDF (Radio Direction Finder) 無線電測向儀

RE (Royal Engineers) 皇家工兵團

RN (Royal Navy) 皇家海軍

RNH (Royal Naval Hospital) 皇家海軍醫院

RNR (Royal Naval Reserve) 皇家海軍預備隊

RNVR (Royal Naval Volunteer Reserve) 皇家海軍志願後備隊

SBA (Sick Berth Attendant) 看護兵

SBCPO (Sick Berth Chief Petty Officer) 看護上士

TDC (Torpedo Data Computer) 魚雷數據計算機

TF (Task Force) 特遣部隊

TG (Task Group) 特遣分隊

USAAF (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 美國陸軍航空隊

USN (United States Navy) 美國海軍

W/T (Wireless Telegraph) 無線電報

附錄五

在個體記憶與歷史真實之間

——專訪戰爭歷史學家托尼·班納姆

法國年鑒學派打破了傳統史學以政治史、精英史為核心的桎梏，將研究重心下移到「芸芸眾生」，完成了「從閣樓到地窖」的轉向。英國學者托尼·班納姆（Tony Banham）正是這樣一位有着「地窖」視野和關懷的歷史學家。作為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1941*（《絕無可能：1941 年香港保衛戰》）、*The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 Britain's Forgotten Wartime Tragedy*（《里斯本丸沉沒：英國被遺忘的戰時悲劇》，以下簡寫作《里斯本丸沉沒》）等多部二戰香港史專著的作者，他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和深切的人文關懷，揭示了被戰爭史宏大敘事所遮蔽的那些個體的命運。

班納姆不僅是一位深耕香港戰史的研究者，也是「香港戰爭日記」（Hong Kong War Diary）項目的創始人，該項目致力於系統研究 1941 年的香港保衛戰以及守軍及其家屬直至戰爭結束時的完整經歷，為這段歷史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資料。作為《香港皇家亞洲學會學報》（*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的榮譽編輯，班納姆關注戰爭中的人文維度，他還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

邀請，以政府特別小組成員的身份積極與多國外交部門、政府機構及戰爭受害者援助組織展開合作。

我有幸在翻譯過程中與班納姆展開深度對話，本次訪談將聚焦戰爭記憶的多重面向：個人記憶與歷史真相如何相互印證又彼此角力？被主流敘事遮蔽的個體經歷如何被重新發掘？難以言說的戰爭創傷記憶又該如何在倫理與情感中延續下去？

楊惠迪：作為一名英國人，您的研究卻聚焦於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除了「里斯本丸」沉沒事件，還關注包括香港保衛戰、香港保衛戰日記以及保衛戰中的平民等問題。我很好奇，是怎樣的契機讓您對這段特定的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又是什麼內在動力促使您投入如此大量的時間與精力研究香港保衛戰的歷史？香港對您來說意味着什麼？

班納姆：我是在英國的鄉村地區長大的，那裏在中世紀時是很繁榮的，但此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幾乎都沒有變化。二戰期間，整個諾福克郡都變成了機場（以便對德作戰）和各種軍事訓練場。小時候，我常在那些已經廢棄了的場所閒逛，撿拾彈殼和墜機的殘骸等。當時並不覺得這是「歷史」，但那卻是我對歷史產生興趣的起點。我年輕時就離開了英國，先後搬到了荷蘭阿納姆和意大利安齊奧附近的地區。這兩個地方都曾是重要戰役的發生地，而且在 19 世紀 80 年代，戰爭留下的痕跡依然清晰可見。後來，我便開始廣泛閱讀相關題材的作品。有一天，我的一位同事建議我將本科專業（計算機科學）與博士專業（歷史學）結合起來，認為這可能會給我帶來一個有趣的視角。

40年前，我初到香港時，就愛上了這裏東西方交融的活力與創造力。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日軍與英軍在此進行的小規模戰鬥令我着迷，後者人數很少，只有幾千人。我意識到如果投入足夠精力研究，就可以將他們作為個案進行考察，這將為香港本地的歷史增添一個新的維度。我始終認為，這段歷史不僅具有教育意義，香港特區政府更應將其開發為旅遊資源。它是獨一無二的，來自中國內地、歐洲、北美等地的遊客都對這段歷史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種廣泛的吸引力常常讓我感到驚訝。

楊惠迪：我最初知道「里斯本丸」沉沒事件是因為看了方勵導演的紀錄電影《里斯本丸沉沒》。這部電影我看了很多遍，所以在翻譯您的這本著作時，我也會感受到兩者在敘事視角、史料擇取、內容側重等方面的差異。我知道您與方導因有關「里斯本丸」的交流而成為摯友，並在其電影中出鏡。您如何看待方導的電影與您的著作之間的聯繫與差異？

班納姆：我所有作品的宗旨都是構建一個堅實的事實基礎，讓其他人能夠在此基礎上進行拓展、延伸。因此，我的策略是建立起一個儘可能精準的事件時間線，並儘量用親歷者的原話來充實細節。這種基礎性的工作是為了讓後來者可直接以此為根基進行新的創作，而不必浪費時間重複我所做的基礎研究。所以，一個典型的歷史學家可能會選擇以此為跳板，去研究潛艇船員、特定軍營的經歷抑或其他相關領域。而方勵選擇聚焦於兩點：沉船事件對遇難者家屬造成的深遠影響，以及舟山漁民冒死救人的壯舉。如果說我的作品可能更偏學術性，那麼他的作品則蘊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加之影像媒介的天然優勢，將這個故事轉變成了更打動人心、更易於

被那些之前對此毫無了解的觀眾所接受的作品。我認為，我們的努力是完全互補的。

楊惠迪：方導反覆提到，情感是他的電影創作中重要甚至唯一的推動力。作為一位歷史的書寫者，您如何在著作中安置自己的情感，使之與客觀的歷史事實保持一個合適的距離？

班納姆：這正是對我工作的定義！我必須相當的冷靜和客觀。我的工作並非去評判人們的行為，或主觀選擇哪些事實該被納入、哪些該被忽略，更無權表現出憤慨或震驚。在研究和寫作中，我竭力保持完全中立。寫作時，我從不使用「可怕」「殘忍」或「暴行」等情緒化的詞語。如果讀者需要藉助這樣的詞彙才能理解內容，那顯然是我描述的失敗。當然，有些專業的歷史學家會在作品中強調其個人的觀點，比如「我認為……」「我相信……」。但我不認為自己的看法很重要——我並非故事的主角。歷史本身才是主角，我只是一個記錄者，是「無聲的旁觀者」。這種超然態度雖不會讓我名利雙收，但在我看來，對任何想要公正、準確地描述歷史真相的人來說，這才是正確的心態。

楊惠迪：您在著作中廣泛引用了戰俘回憶錄和戰爭審判記錄，而這涉及記憶與史實之間的複雜關係。比如書中描述的經田茂船長與和田義雄中尉關於是否關閉艙口以防戰俘逃生的爭論，相關材料來源應該是戰後經田茂的戰爭責任庭審記錄。在涉及為個人辯護的責任立場問題，特別是在和田義雄已經戰死的情況下，經田茂單方面的辯詞是否可以完全採信，它又能否等同於歷史事實？您如何看待個人記憶與歷史真實的關係？

班納姆：這是一個極具洞察力的問題。在還原船上戰俘經歷

的過程中，我有機會與數十名倖存者交談，並將他們的證詞相互對照。雖然並不是所有說法都能對得上，但我不認為他們在撒謊，只是這些記憶經過 70 年的沉澱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此外，我還有一些正式記錄可以用來校準這些敘述。對日本方面的研究挑戰在於數據的匱乏。話雖如此，經田茂的審判記錄共有六七百頁，包括多位證人的證詞和庭審記錄。我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採信了經田的說法，主要原因在於，這是一個非常不利於他的法庭——是英國的法庭和英國的檢察官在審判他謀殺了（坦白說）近千名英國公民的罪責。確實，經田沒有動機去說任何會給自己定罪的話，而和田也無法為自己辯護（雖然他被推定為陣亡，可我從未找到任何確鑿的證據，僅有些傳言），但法庭上全是專業的法律人士，他們絕不會放過經田證詞中的任何漏洞。儘管他最終被判有罪，但僅七年的刑期表明，法庭其實並不認為他罪孽深重。在所有的這些案例中，我對這一事件初步建立起的可靠框架讓我可以據此校準這些不同來源的信息。

楊惠迪：您剛提到，在與倖存者們交談時，他們的記憶其實已經發生了某些變化。您是否注意到他們晚年的回憶與一些早期記錄（如戰後審判的證詞、檔案記錄等）存在着衝突、矛盾之處？這就像理查德·懷特（Richard White）的公共史學著作《追憶阿哈納格蘭：講述一個家族的歷史》（*Remembering Ahanagan: Storytelling in a Family's Past*）中面臨的問題——歷史與記憶的競爭性真相，即一方面是歷史學家的求真，另一方面是當事人對自我記憶的捍衛，兩者各自提供了不同的真相，於是記憶與歷史之間就出現了一道巨大的裂縫。根據您的觀察，有哪些因素或者機制（包括社會的、心

理的)的存在作用於或改變了他們對這段歷史的記憶和敘述？請您結合在本書寫作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實際案例，展開談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班納姆：我認為這些衝突可以分為三類：衰退的記憶、壓抑或扭曲的記憶，以及引入的記憶。

第一類是顯而易見的：我們都難以清楚地記得某事發生在周二還是周三，或某個名字的拼寫，或事件發生的具體地點。因此，歷史研究者需要儘早建立起準確的事實框架。比如，在對香港保衛戰的研究中就有一個案例：一位曾與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一起駐守金馬倫山的海軍信號兵在其回憶錄中描述了一場持續數日的戰鬥，但實際上，他所說的那場戰鬥只持續了大約 24 小時，儘管如此，他的敘述仍然是有價值的。

第二類通常是最難辨別的，這往往與不愉快的經歷有關，比如人們後悔做過（或沒做）的創傷性事件，或他們不願回憶起的事情甚至是錯誤。在戰爭中，錯誤往往意味着付出生命的代價。有時人們會說服自己「這事可能沒真正發生過」。我不是心理學家，但我懷疑如果這樣做了 10 年或 20 年，然後又花了幾年時間暗示自己「它可能沒有發生」，最終就會確信「它沒有發生」。這就成了新的記憶。

如果歷史學家熟悉二手資料，就很容易發現第三類衝突。舉個例子，一位美國歷史學家研究「地獄航船」（日軍用來將盟軍戰俘從被俘地點轉運到各處勞工營的船隻），他找不到從香港運走英國戰俘的第一艘船（也就是「里斯本丸」之前的那艘）的名字，就將其稱為“*Maru Shi*”（第四艘船），只因這是他的研究中第四艘無法

確認的船隻。後來不少香港老兵及家屬都和我提及“*Maru Shi*”，直到我讀了那本書，才意識到他們是受了書的影響，這個名字已經留存在他們的記憶之中了。最終一位日本學者考證出這艘船其實是「福建丸」(*Fukken Maru*)，但錯誤的記憶已經難以糾正了。

楊惠迪：您在書中寫道，一個兒子回憶起自己的戰俘父親回到家中後，將那段痛苦不堪的經歷寫了下來，但不久就將其燒毀了。他表示不想讓任何人——即便是間接地——再經歷自己所經歷的一切。還有一些美國潛艇兵也拒絕談論他們的戰爭歲月。而對其家人來說，小心翼翼地避免觸碰他們的心理創傷也是家庭倫理使然。日裔美國學者橋本明子在引述以色列心理學家丹·巴昂(Dan Bar-On)的「雙層沉默牆」理論的基礎上指出：「保持沉默需要兩個人才能完成——一個不說，一個不問。沉默需要子女的合作，他們也有參與這種沉默遺產。」戰爭記憶的傳承和延續可能就是這樣被迫中斷的，一方面我們似乎需要這些記憶來讓後人對戰爭的殘酷具象化，另一方面這般回憶對戰爭親歷者無疑是一種二次傷害。您如何看待其中的兩難？您的研究工作又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班納姆：我並不認為他燒掉手稿是不願他人承受痛苦。我想，他是為了將這些記憶從自己腦海中「釋放」出來才寫了那份手稿，然後再刻意地銷毀它們，好讓自己能夠向前看。至於橋本明子的洞見，我不確定它是否如「一個不說，一個不問」那麼簡單。倖存者們常常不敢說，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無法面對那些記憶，而他們的妻子和孩子不敢問，則是因為他們聽過那些噩夢與夜裏的尖叫。這就是心理學家所說的「多代創傷」(*multigenerational trauma*)。我發現自己常常變成兩代人之間的橋樑：老兵們無法對家人講述自己的

經歷，因為情感的羈絆太深；但他們卻能對我開口，我是那個沒有情緒負擔的傾聽者（就像心理治療師那樣）。我傾聽，卻不介入，相信我，這恰恰是他們 70 年來的沉默之後最渴望得到的——一個可以哭訴的肩膀。而且我了解他們的故事，比如我知道「猴子」是誰，貝茨中士是誰，還知道神戶戰俘營和那些碼頭的勞工隊，這讓我幾乎像是他們中的一員，成為他們可以安心分享經歷的人。我發現自己處於一個非常特殊的位置，而我從未濫用這一點。很多次，當這些老兵過世後，他們的孩子——通常也已到中年——會來問我：「我父親當年到底經歷了什麼？」而我能告訴他們答案。

楊惠迪：但事實上，從記憶傳承的角度而言，您已經介入了：隨着「里斯本丸」事件倖存者逐漸離世，這些父輩甚至祖輩的戰爭記憶通過您的再講述傳遞給了後輩。這讓我想到瑪麗安·赫希（Marianne Hirsch）在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後記憶的一代》）中所寫的：「創傷事件的記憶會持續影響着那些未曾親歷事件的後代。倖存者的子女及其同代人並非通過直接回憶，而是通過縈繞不去的『後記憶』（Postmemory）——在家庭乃至整個文化中傳承下來的多重媒介化的圖像、物品、故事、行為和情感一來繼承這些災難性的歷史。」您既是原始證詞的收集者，又是這些「媒介化記憶」的創造者，您如何看待這種雙重身份的重疊，以及這各自意味着怎樣的責任倫理？這些記憶有可能塑造未來幾代人對「里斯本丸」悲劇的理解。

班納姆：（我）其實是在扮演「故事講述者」的角色？這是一個相當好的問題。講故事的人在社會中一直很重要，但講述故事的人也控制着故事。在今天這個充斥着各種宣傳、社交媒體信息、虛

假新聞、AI 生成圖像和赤裸裸的謊言的時代，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對此保持警惕。如果你去看社交媒體上的政治煽動，比如西方的反移民言論，最惡劣的謊言總以「眾所周知……」「我聽說……」「據說……」「有證據表明……」等作為開頭，它們從不標註來源。這些開場白的潛台詞是：接下來我要編故事了。這也是為什麼所有嚴肅的寫作者，無論是歷史學家、科學家還是其他學者，都會明確標註他們的引用來源。你會看到我在書中一直如此，這樣讀者可以確切地看到每條信息的來源，並去核實。這是一位嚴肅寫作者的責任。但問題在於，即使是在英國法庭上宣誓「說出真相，全部真相，唯有真相」(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時，也只是聽上去很崇高，卻不可能實現。是的，你可以（當然也應該）說出真相，並且只說真相，但沒有人能講述全部的真相——時間和篇幅都不允許。因此，真誠的歷史學家必須學會聚焦於最重要的事實，但這種選擇本身也是帶有主觀性的。舉例來說，在現實生活中，並非每個人都是英雄。我既聽說過也讀到過一些人可能表現得不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但我決定不記錄這些負面的故事。畢竟，我如何能確定自己在相同情況下會做得更好呢？對那些已不能為自己辯護的人提出指控公平嗎？我又如何能保證我所聽到的就是真的呢？讓子孫後代對他們的先輩懷有敬意不是更好嗎？我不是來摧毀他人生活的，也並非上帝。

最後，我想再補充一點。戰爭歷史學家總說自己希望通過記錄戰爭的傷痛來警示世人避免戰爭，也即「永不再犯」(Never Again)理論。但我認為，到現在為止，所有人都知道這並未奏效。在一千個讀了書並認同「應當避免戰爭」這一結論的讀者中，總有一個人

會把戰爭看作獲取個人勝利和權力的捷徑，並將這類歷史書當作行動指南，從而讓其他人再次陷入悲劇。那麼，為何我們仍在堅持？首先，應承認我們享受解密的過程——查明誰在何時何地為何行動，這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小說暢銷的原因，每個人都喜歡嘗試解開謎團。但其次，歷史仍具有積極的價值。每當有人試圖在東西方之間製造隔閡時，我就會講述「里斯本丸」的故事——普通人如何在絕境中守望相助。這個故事雖簡單，卻充滿了力量，值得永遠傳頌。

（本文由楊惠迪採訪、撰稿，原載《信睿周報》2025 年第 12 期）

附錄六

戰爭記憶的接力

——專訪《里斯本丸沉沒》導演方勵

「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戰爭是常態，和平是例外，但在冷戰結束後的今天，和平是常態，戰爭才是例外」，此言恰切地描述出了長久以來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徵。然而，2022 年 2 月及翌年 10 月，俄烏衝突、巴以衝突相繼爆發，再次打破了冷戰至今短暫而難得的和平。在衝突硝煙依舊瀰漫的今天，我們迎來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80 周年。身在此際，歷史與當下超越時空、詭譎而真切地交錯，讓人不由得想到《哈姆雷特》中那句著名的台詞——“*The time is out of joint*”（時代整個兒脫節了）。多少做過些歷史研究的人，或許總有一天會發出黑格爾那樣的哀歎：「人類唯一能從歷史中吸取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都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儘管如此，人們依然試圖藉着一些經驗性的論述徒勞地撿拾某些「教訓」，在「以史為鑒」的幻覺中等待戈多，似乎非此便難以安身立命。

或許，對於民眾而言，歷史教訓永遠不應是空洞的說教，它最好是經驗的、及物的，是能讓人感同身受、推人及己、推古及今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果我們不僅把戰爭看作外在於自我的、國與國之間的力量對抗，更試圖看到身在其中的「人」（也是作為

可能性的「自己」)的境遇和命運，那麼戰爭體驗文本、記憶文本的意義就不容小覷。然而，較之戰爭日記、戰敗日記等「彼時彼世」的體驗談，「此時彼世」的記憶文本、經驗之談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事後立場、私人情感、主流意識形態甚至當前國際關係的制約和影響，兩種類型的文本分別表述了當事者兩種不同類型的「真實」。而對於當下的學者和藝術家而言，如何面對和處理這兩種「真實」，不僅是一個學術視角和藝術觀念的問題，更折射出某種有關「當下」的第三重真實。

前些年，每每被同行問起研究領域，我都會感到某種難以言喻的焦慮，因為很難講清楚自己的研究領域究竟是文學史、思想史，還是電影研究、戰爭研究。後來我覺得這種焦慮或許可以稍稍放下，因為我關心的是「極端語境中的人」，至於媒介、載體、表像等似乎不應被置於優先地位，只要它是一個事關「人」的「文本」就好，不必以學科領域設限。在這個意義上，「里斯本丸」沉沒就是一個有關戰爭記憶問題的絕佳思考案例。英國歷史學者托尼·班納姆（Tony Banham）和中國電影導演方勵先後處理了同名歷史題材，他們雖基於各自不同的位置感和歷史觀念，對同一歷史事件做出了各有側重的描述，但終極關切所繫，都在於那些「沒有墓碑的愛情和生命」。

1941年聖誕，駐守香港的幾千名英國士兵在與日軍鏖戰17天後被迫投降，淪為戰俘。1942年9月底，日軍將其中的1800多人送上貨船「里斯本丸」，意圖將他們運至日本成為勞工。由於船體武裝有大炮，且沒有任何戰俘標識，船在駛至中國浙江東極島海域附近時被美軍潛艇「鱸魚號」誤判為日本戰船，並被後者發射的魚

雷擊中。在船被擊中到沉沒的 25 個小時裏，日軍將所有盟軍戰俘封鎖在船艙底，並用木條和帆布釘死艙門。盟軍戰俘奮勇自救，破艙跳水逃生。危難之際，舟山漁民冒着生命危險，划着舢板從水中救起了 384 個奄奄一息的盟軍戰俘，並給他們提供食物、衣物和庇護所。儘管如此，仍有 828 位戰俘或被淹死，或被日軍射殺，或被困在船中溺斃。對於大多數中國（尤其是內地）觀眾而言，若非 2024 年上映的紀錄電影《里斯本丸沉沒》，這件往事想必早已如煙飄散。《里斯本丸沉沒》是一支寫給沉屍東極島海底的那些盟軍戰俘的鎮魂曲、一支寫給冒險施救的東極島漁民之國際主義頌歌。在武裝衝突依然時時威脅着地球居民的今天，這部電影對於我們重審「世界—國家—戰爭—我」的關係有着重要的歷史意義和藝術價值。

電影上映後，儘管被一些媒體描述為「叫好不叫座」，但不容否認的是，它依然在國內外輿論界、社交媒體上引發了廣泛的關注，掀起了輿論的漣漪。有心者（包括我個人在內）可以在不同國家、地區與自己相同或相異的諸多觀點、評論中將自己的認知相對化，從而照亮那個對此事茫然無知的自我，去思考受眾對同一歷史問題的不同反應之下潛隱的當下問題，進而追問盲視與遺忘背後的社會、歷史、國際關係致因。或許，我們可以將這些評論、反饋、認知視為戰爭記憶問題引發出的第四重真實——我們不僅能從歷史記憶中看到歷史、看到國家，更能從中看到當下、看到自我。今天呈現的這份訪談便旨在以「里斯本丸」沉沒事件的檔案敘述、記憶文本、藝術表現和受眾反饋等為媒介，為讀者提供一個思考戰爭記憶問題四個層面的經典案例。

對於方勵導演而言，電影的上映並不意味着「里斯本丸」敘事的終結。2025 年 1 月和 4 月，他兩次來到我的研究室，我們一起討論他新籌備的戰俘題材電影，時而又談及他念茲在茲的「『里斯本丸』沉沒數字紀念館」。「里斯本丸」沉沒所講述的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罪惡、世界諸國反法西斯主義的共同信念、人性的畸變等議題，如能借數字化技術的東風永久保存、永久可視，那麼它可以影響的就不只是一代人了。應方導之邀，我很樂意地加入了這項數字計劃，並已經開始了相關的前期工作。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80 周年自然為此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契機，數字化、可視化無疑將為戰爭記憶之存續提供技術可能，但其間也需要耗費一定的人力和財力成本。我也想藉此機會，期待並呼籲相關部門和社會有識之士以各種形式為這一數字構想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資助和支持。畢竟，戰爭記憶的接力是每個愛好和平的人難以推卸的道德義務和時代責任，哪怕是一個點讚，一聲吶喊，都會讓你我相互看見，從而為和平主義者平添幾分前行的勇氣與力量。

王昇遠：《里斯本丸沉沒》上映至今引發了很多關注和討論。所以，我想跟您聊聊電影上映後受眾的反饋以及您經由這些反饋形成的一些新的思考。

方勵：這部電影今年 3 月在英國駐華大使館官邸做了一場映後交流活動，美國和日本的武官都去了。日本武官第二天還發了一條信息給英國駐華大使館的副官，那位副官是我的好朋友，一個海軍陸戰隊的上校。日本武官說，他原本猶豫要不要接受邀請，但最後還是很高興接受了邀請，看過電影後他覺得我們講得還是很客

觀的。他說，真相就是真相，歷史就是歷史，他們希望不要再有戰爭——這個表達我覺得挺好的。有意思的是，英國大使和日本武官一個坐我左邊，一個坐右邊，他們彼此都在問對方：你看過這種電影嗎？他們都覺得從來沒有看過這樣一種戰爭紀錄片，有着如此濃厚的情感，講述着戰爭中個人的命運。

王昇遠：看來這些官方意義上的觀影者也並沒有糾結於「國家」層面的所謂「真相」問題，而是通過這部電影人同此心，感動於歷史中的「人」的情感和命運。

方勵：從一開始我就告訴大家，我們經常說「要揭開歷史真相」，關於「里斯本丸」沉沒當然是有歷史真相的，班納姆早就寫過了，我只不過是用影像把它呈現出來。這就像計算機有一個底板，上面有好多功能板，《里斯本丸沉沒》這部電影就是歷史真相的一部分。揭開這件事的真相，第一棒是班納姆跑的，我是來接力的。他調查了歷史中所有相關的數字、事實細節，我只是用影像把它呈現出來。作為第二棒選手，我講述的是人的故事。

其實，那天我是帶着七八個主創一起去的，英國駐華大使問了我們一個問題：「能不能告訴我們，做這個電影對你們的生命而言意味着什麼？」

王昇遠：那麼對您個人來說，這件事究竟意味着什麼呢？

方勵：我的感覺是，自己經歷了一場戰爭的洗禮。我與電影中的所有人都有着情感上的聯結，他們都是我的親人。我沒有經歷過戰爭，可當我做完這個電影，再加上想像力、影像，我彷彿完整地經歷了一場戰爭，戰爭裏面的悲歡離合、唏噓命運全部都經歷了。我沒學過紀錄片，也沒學過電影，這次只是站在一個分享的角度，

帶着觀眾一起經歷我的那段心路歷程，我相信那麼強烈地打動了我的情感完全可能打動世人。

王昇遠：這是一部紀錄電影，它有記錄事實的部分，也有藝術敘事的部分，用這種形式呈現戰爭所引發的人道災難的作品似乎並不多見。電影上映以來，想必您也聽到了各種反饋。對此，您有哪些新的觀察？

方勵：這部電影現在在機上娛樂系統中也有了，線上也有了，我每天都能在社交媒體上收到很多觀眾的反饋，很多人都在問我：什麼時候復映？還想到電影院再看一次。他們都說自己沒有看過這樣的電影，情感如此豐富，戰爭中的犧牲者也不再是一個冰冷的數字，而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

王昇遠：年輕世代習慣於通過社交媒體來討論嚴肅的戰爭問題，這本身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這讓我想到了現在的各種短視頻，幾分鐘講歷史。大家都越來越忙，總感覺時間被偷走，總想用儘量短的時間了解更多信息，並以此獲得對歷史的直觀理解。歷史記憶問題在此也遭遇了一個大的挑戰，那就是年輕世代的歷史理解、歷史記憶碎片化。您覺得以電影的方式展開的歷史記憶傳承，該如何面對這種挑戰，應對這種對觀眾市場的爭奪？有關戰爭的歷史記憶應該如何更好地向當下的觀眾呈現？

方勵：這個問題特別好，我覺得我們的創作必須升級。一個簡單的道理，今天我們叫外賣很方便，各種快餐種類又多，為什麼還要去吃私房菜、精品菜？在短視頻時代，年輕觀眾的視野都被豔麗的色彩和動感的畫面佔據了，粗製濫造的娛樂橋段賣不掉了，這些東西完全可以被短視頻替代。但是只要我們還是人，永恆的、真

實的、打動人的情感就會有長久的生命力。在社交媒體上給我留言的有不少女性網友。看戰爭題材的電影，男性觀眾更多關注的是軍人的意義、軍人的友情，感受歷史的震撼。有意思的是，戰爭往往也都是男性幹的，都是在爭奪、對抗。而女性觀眾看戰爭題材的電影基本都會淚流滿面，她們更在乎的可能是情感。我在意的正是大家被感動這一點，它說明人類的情感是跨越代際的、共通的、永恆的。

至於如何以電影的形式呈現嚴肅的歷史問題，我要思考的只是如何能讓意境和鏡頭語言距離觀眾更近。其實最樸實的情感就是最近的，但它必須藉助於呈現方式。拍攝《里斯本丸沉沒》時我用了一個技巧，在歷史和今天之間相互穿插，形成一種電影的敘事節奏，讓歷史和當下相互勾連，形成互動，觀眾就不會覺得疲憊了。如果我一直講船上的故事，離觀眾就遠了，拉回來講今天他們的親人，與觀眾之間的心理距離一下子就近了，大家會感覺一切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共鳴感也會油然而生。

王昇遠：在觀影時，我確實感覺到您試圖把歷史問題納入現實生活的意義層面上去呈現。有一個鏡頭，銀幕上一排排戰俘的名字映在現實中您的臉上，這是我深受感動和震撼的瞬間——歷史映照在一個當代人的身上，似乎在召喚他承擔起傳遞歷史記憶的責任。

方勵：那個圖就是我現在的微信頭像！其實那天我們是在英國遠東戰俘紀念館考察，但那裏並沒有太多「里斯本丸」的影像，只有戰俘名單，於是我們就用投影儀把它投射出來，然後拍出了這麼一小段。

王昇遠：事實上在電影中您也出鏡了。

方勵：我為什麼要出鏡？仔細想想，其實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我若不出鏡，前面的故事就講不了。尋找物證的過程就是要帶領觀眾走進歷史，抽絲剝繭般地把所有的人和真相找到，這個過程本身就非常打動人。而且我是個帶領者，如果故事講到後面我沒了，也很奇怪。我很慶幸自己出鏡了，因為有人說我是英國人的視角。我說：你覺得我長得像英國人嗎？他沒搞懂什麼叫視角，我怎麼會是英國人的視角，我當然是中國人視角。在影片後面的訪談中，我猶豫過自己的情感要不要露出，後來決定露出，因為這是一個態度，我代表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這一代中國人，是今天中國的電影人，也是包括你們在內的中國那些先人們的後代，在繼續關心、講述當年的故事。這就是一個態度、一個立場。

王昇遠：我們「80後」這一代，包括後面的「90後」「00後」都沒有過戰爭體驗，戰爭對於我們而言是遙遠的過去，是觀念化的存在。但事實上，正如比較政治學者劉瑜所說的，其實在最近的幾百年裏，人類大部分時間都在打仗，和平的時間是短暫的。我們常用「爆發」這個詞來形容戰爭，而她卻用這個詞來表述冷戰後這幾十年短暫而難得的和平歲月。您在與年輕世代的朋友們交流時有沒有意識到這種關於戰爭的體感差異？

方勵：我們的國家正處在一個和平時期，一定要懂得珍惜。前段時間在幾所大學參加活動，當主持人問我還有什麼話要跟觀眾說的時候，我都跟那些小朋友說：今天晚上就給你們的爸爸媽媽打個電話，說聲「我愛你」。我最希望輸出的就是人間真情和對和平時代的珍惜，別拿今天的「躺平」、「擺爛」不當回事，你看看烏克蘭，再看看加沙，有多少家庭被摧毀，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就像

你說的，和平只是一個窗口期，它隨時可能被打破。

王昇遠：我感覺到《里斯本丸沉沒》對情感真實的呈現是用力很深的，您似乎很在意也很強調情感的傳遞，在意「以心傳心」的力量。在這部電影拍攝的過程中，您採訪了很多盟軍戰俘及其遺屬、當時東極島親歷者的後人，甚至是「里斯本丸」船長經田茂的子女等，這是一種以口述歷史補全歷史記憶的方式。我關心的問題是，您如何去平衡當事者及其後人的記憶、情感與作為一個歷史敘事者對真實的追求？或者說，如何平衡紀錄電影中「記錄」與「電影」兩部分？

方勵：我覺得不需要平衡，實際上大家需要記住一點：這 1800 多個家庭，包括東極島漁民的家庭都被歷史遺忘了。所以我們用的方法不是去採，而是去訪。這部電影最初的名字不叫《里斯本丸沉沒》，一直到 2021 年，它的名字都是《沒有被遺忘的 828》（*The 88 Unforgotten*）。2017 年 9 月 9 日下午 4 點，我在撒離（沉船所在）海域前突然有了一個觸動，這個觸動推動了我七年。當時，風刮在臉上，我突然意識到腳下有 828 條年輕的生命。那一年我兒子 22 歲，作為一個父親，我本能地想到這羣孩子在我腳下。他們是誰？沒人知道來自萬里之外的 828 條生命是怎麼沒的，但我覺得他們值得被記住、被了解。所以對我來講，情感是推動我進入歷史的唯一動力，我一直說大銀幕電影的靈魂是情感。當然，我們在寫人物、表達情感時也在借鑒自己的生命閱歷、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把這些東西賦予到每一個人物、每一場戲裏面。

王昇遠：電影裏有一個場景，就是您看到一個盟軍戰俘大哥寫給自己年幼的弟弟的一封信，然後您大概是在心塞之下跑出去抽了

一根煙。那部分是因為自己將身為兄長的那種感情代入進去了嗎？

方勵：對，一個 22 歲的大哥把家、把媽媽託付給了自己不到五歲的弟弟——家裏唯一的男人還不到五歲，這已經很讓人心碎了。我採訪到兄弟倆中的弟弟，他長大以後有了兩個孩子，他們告訴我說，在他們的爸爸長大成人以後，爺爺奶奶拿出這封信告訴他：這是你哥哥在人間留給你的最後一封信。這封信就是他哥哥的靈魂，一直在錢包裏陪伴着他。看到這裏，我完全扛不住了，眼淚止不住，得出去抽根煙。在一次讀書會活動上，主辦方一定要讓我去讀點什麼。輪到我上台的時候，我就把「里斯本丸」的聲吶圖像投在背景上，告訴下面 200 多位聽眾，待會兒會給大家讀兩封信，其中一封就是這個 22 歲大哥的絕筆。讀完後，全場掉淚。這就是情感，這種情感是我做電影的最大推動力，因為如果不做，心裏就會過不去，必須得做。

王昇遠：為了祭奠這些逝去的靈魂，您提到打算和我的研究團隊一起做一個「『里斯本丸』沉沒數字紀念館」，能否說說您目前計劃中、想像中的這個紀念館是什麼樣子的？這個數字紀念館是供歷史親歷者的後人緬懷的，還是面向普通觀眾做歷史教育的？

方勵：這個事我們要儘快做起來。我希望觀眾能夠在數字紀念館中理解到「里斯本丸」沉沒事件的來龍去脈和歷史線索。我會做一個船體模型，讓觀眾的鼠標一點，就能知道一號艙、二號艙、三號艙裏面有多少人，是哪些人。既可以按艙位分，也可以按部隊分。等於把電影裏面原來數字建模的東西重新搬出來，建立一個虛擬的數字模型。我要動態地呈現船體斷裂的過程、呈現三號艙木梯斷掉的過程，這樣就能把電影還原的歷史場景搬到這裏，同時還會

設置一個線上電影放映廳，點進去就可以觀看《里斯本丸沉沒》。至於你說的用途，我想它就像一個實體的紀念館，應該兼顧雙重功能。

王昇遠：我這邊的史料蒐集工作已經有了很大進展，找到很多珍貴的檔案和材料。您那邊現在進度如何，還有什麼困難嗎？

方勵：一個字：錢。檔案都在，史料都在，影像都在，錄音也都在。我們兩個團隊合作會把這件事做得很好。正好今年又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80 周年，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上，如果有有識之士或者國家相關部門能夠重視這件事的學術和藝術價值，能投入一筆穩定的經費資助，就可以讓我們把剩下的 130 多位戰俘後人的訪談工作進一步完成，也能支持線上紀念館的長期運營和維護，這一定會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

（本文由王昇遠採訪、撰稿，原載《信睿周報》2025 年第 12 期）

參考文獻

已出版著作

At the Going Down of the Sun. Oliver Lindsay.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81.

Bagged in World War 2. Royal Marines Historical Society, Special Publication No.24.

Beneath the Shadow. James Bertram. John Day, 1947.

Captive Years. Alan Birch and Martin Cole. Hong Kong: Heinemann Asia, 1982.

Death on the Hell Ships. Gregory Michno. Pen and Sword, 2001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Naval Institute Press).

The First of Foot: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cots. A. Muir.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961.

Footprints: The Memoirs of Sir Selwyn Selwyn-Clarke. Selwyn Selwyn-Clarke. Hong Kong: Sino-American, 1975.

Guest of an Emperor. Martin Weedon. London: Arthur Barker, 1948

The Hidden Years. John Luff.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67.

Hong Kong Eclipse. G. B. Endacott; edited and with additional material by Alan Birc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Hostages to Fortune. Tim Carew.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71.

I Was a Hell Camp Prisoner. Robert J. Wright. London: Brown, Watson Ltd., 1963

The Middlesex Regiment (Duke of Cambridge's Own), 1919—52. P. K. Kemp. Aldershot: Gale and Polden, 1956.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1941. Tony Banha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The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 G. Hamilton. Hong Kong, Green Pagoda Press, 1966.

Twisting the Tail of the Dragon. Jean Mathers. The Book Guild Ltd., 1994.

未出版資料

Testimony provided to author — Miles Howell

Testimony provided to author — Alf Hunt

Testimony provided to author — John Inglis

Testimony provided to author — Ross Lynneberg

Testimony provided to author — James McHarg Miller

Testimony provided to author — William Poulter

Testimony provided to author — William Spooner

Correspondence with Frank Bennett

Correspondence with Jack Etienne

Correspondence with Tom 'Taffy' Evans

Correspondence with Wallace Hastings

Correspondence with Alf 'Nobby' Hunt

Correspondence with Garfield 'Gar' Kvalheim

Correspondence with Ross Lynneberg

Correspondence with Dennis Morley

Correspondence with William Grant Shepherd

Correspondence with William Spooner

Sam Atkins' Papers

Arthur Alsey's Diary, IWM

George Hamilton's Diary, IWM

Barbara Redwood's Diary, IWM

Andy Salmon's Diary, IWM

ADM 1/24284: Sinking of *Lisbon Maru*: naval casualties, 1942—1946

ADM 125/149: Lists of Royal and Merchant Navy casualties from Hong Kong, compiled by P.O. Staley

CO 980/67: Protests to Japanese Government on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in torpedoed Japanese transport *Lisbon Maru*, 1942—1944 (Fallace, Evans, Johnstone's reports)

CO 980/102: Shanghai survivors of the *Lisbon Maru*

CO 980/138: Lists of POWs on board Japanese transport *Lisbon Maru*

FO 371/35945: Torpedoing of the *Lisbon Maru*: reports by survivors, 1943

FO 371/57578: Captain Shigeru Tsuno [sic] of *Lisbon Maru* to be arraigned as a war criminal, 1946

FO 916/770: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 1943

FO 916/1083: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 1944

TS 26/803: Hong Kong and at sea: Murder of prisoners lost on sinking of *Lisbon Maru*, 1939—1945

WO 32/11677: Survivors in Osaka and Kobe camps

WO 235/1114: War Crimes tribunals, *Lisbon Maru*

WO 392/23: POW Lists

NARA: Log of *Grouper*,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 Pamphlet describing; M 1752.

NARA: Deck Logs of the USS *Grouper* (SS-214). Record Group 24, stack 470, row 33. Seven logbooks in all.

NARA: Various records relating to *Lisbon Maru*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University of Wyoming: Clay Blair Collection

The Ride Collec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Library

里斯本丸沉沒

The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 Britain's Forgotten Wartime Tragedy

托尼·班納姆 (Tony Banham) 著

楊惠迪 王昇遠 譯

責任編輯 譚俊鵬

裝幀設計 鄭喆儀

排 版 黎 浪

印 務 劉漢舉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 2338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wabook.com.hk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220-248 號
荃灣工業中心 16 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版次 2025 年 7 月初版
© 2025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規格 特 16 開 (210mm×153mm)

ISBN 978-988-8914-52-4

The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 Britain's Forgotten Wartime Tragedy

© 2006 香港大學出版社

版權所有。未經香港大學出版社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電子或機械）方式，包括影印、錄製或通過信息存儲或檢索系統，複製或轉載本書任何部分。

本書繁體中文版由香港大學出版社授權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歷史具有積極的價值。每當有人試圖在東西方之間製造隔閡時，我就會講述「里斯本丸」的故事——普通人如何在絕境中守望相助。這個故事雖簡單，卻充滿了力量，值得永遠傳頌。

——托尼·班納姆（本書作者）

關於「里斯本丸」沉沒當然是有歷史真相的，班納姆早就寫過了，我只不過是用影像把它呈現出來。這就像計算機有一個底板，上面有好多功能板，《里斯本丸沉沒》這部電影就是歷史真相的一部分。揭開這件事的真相，第一棒是班納姆跑的，我是來接力的。他調查了歷史中所有相關的數字、事實細節，我只是用影像把它呈現出來。

——方勵（紀錄電影《里斯本丸沉沒》導演）



ISBN 978-988-8914-52-4



9 789888 914524



聯合出版集團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定價：HK\$178 NT\$660

建議上架分類：世界歷史/二戰史